中文版第一百一十六期
二零二二年

RC

文化雜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以“Macaeneses”（澳門人）之名維繫管治與建立社區
——《蜜蜂華報》再研究

抗戰時期粵劇在澳門的傳播——以報紙廣告為中心的考察

從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看馬來西亞華商角色的演變

胡漢聯姻與北朝皇權政治





《文化雜誌》中文版
2022年．第116期

主辦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總編輯
梁惠敏

編輯部
主編：林玉鳳、林穎娜
顧問編輯：李憑
編輯委員會：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楊斌、朱天舒
執行編輯：陳嘉欣
編務秘書：李丹彤
美術編輯：勞慶欣

出版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電話：(853) 2836 6866 (總機)
網址：www.icm.gov.mo

編輯單位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崇文樓(E34) G025室
電話：(853) 8822 8131
(853) 8822 8130
傳真：(853) 2886 0009
電郵：cms.rc@um.edu.mo

製版印刷
澳門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國際刊號
ISSN 0872-4407

定價
澳門幣 150元



本期封面及封底分別以《澳門城市及港口地圖》和《拉羅謝爾港地圖》為背景（汪藍供圖），串連起1698年法國安菲特里忒號首次中國之行的兩個重要港口；又以《蜜蜂華報》（詳見本期林玉鳳、黃曉蓉文章）及抗戰時期的粵劇廣告（王忠、盧雪純供圖）為主要疊加元素，結合清代反繪玻璃畫元素（梁永澤供圖），反映出澳門作為我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抗戰時期的粵劇市場中心及西學東漸窗口的豐富面貌。

RC 文化雜誌 於1987年創刊，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學術期刊，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本刊以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為重點，兼論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推動東西方文化交往。

本刊以促進學術交流為宗旨，所載文章只求學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作者文責自負，版權自理，其理論和觀點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刊分為中文版和外文版，內容上各有側重，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選購兩種文本會有更大的參考與收藏價值。

文化雜誌 Review of Culture

中文版 · 2022年 · 第116期

目錄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006 **以“Macaeneses”（澳門人）之名維繫管治與建立社區——《蜜蜂華報》再研究**
林玉鳳、黃曉蓉

016 **《蜜蜂華報》目錄索引**
黃曉蓉、林禮賢、古健成譯



澳門研究

034 **鏡海遺珠——第一幅法國人繪製的《澳門城市及港口地圖》**
汪藍

046 **抗戰時期粵劇在澳門的傳播——以報紙廣告為中心的考察**
王忠、盧雪純

南洋研究

058 **從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看馬來西亞華商角色的演變**
陳妙恩

072 **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
梁永澤

086 **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對老撾的探索和記錄**
張晨

文史研究

096 **胡漢聯姻與北朝皇權政治**
張雲華



140 **《歷代神仙通鑑》中《耶穌傳》的文本來源**
姚達兌

152 **“中興業，須人傑”——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育與英語教學**
黃萍萍

166 **“Archaeology”之含義、翻譯與現代學術**
范楨

書籍評論

180 **作為全人教育與知識整合平台的書院——兼評《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念：澳門大學的探索》**
龔映雪、黃承發



186 **《廣州的中國人》——花旗旅人粵海聞見錄**
何思兵

名作賞析

200 **“淡散”“清逸”查士標**
薛達衛

目錄回顧

202 **《文化雜誌》中文版上期目錄（第115期）**
本刊編輯部

以“Macaeneses”（澳門人）之名維繫管治與建立社區——《蜜蜂華報》再研究

林玉鳳 * 黃曉蓉 **

摘　要 1822年創刊的葡文周報《蜜蜂華報》雖然有執政黨喉舌的黨派報刊特色，刊載了不少當時保皇派和立憲派之間的政治爭辯，但它同時是一份兼具新聞、商業資訊傳播和社區聯繫功能的報刊，對了解當時整個在澳門的外國人社區以及不同社群之間的互動有重要意義。同時，作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版的首份報刊，該報對“澳門人”（Macaeneses）的身份進行了大量結合黨派的政治論述，以此突出土生葡人與澳門和葡萄牙之間的政治聯繫，是迄今發現的最早公開討論“澳門人”身份的文獻，說明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早於十九世紀早期的公共場域已出現激烈討論，而且一個具有強烈內部認同的澳門葡裔社群也早在十九世紀初存在。他們有共守的規則，也同時以愛澳門和愛國（葡萄牙）為最核心的身份認同概念。

關鍵詞 《蜜蜂華報》；報刊功能；土生葡人；身份認同；居澳葡人

一、文獻回顧

> 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之一員？如果屬於，澳門居民是否有義務像那些在葡萄牙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一樣繳稅？[1]

這是一名讀者向《蜜蜂華報》編輯部發出的提問，刊登在該報的“讀者來信”欄目當中。這種對土生葡人或居澳葡人身份提出的疑問，在《蜜蜂華報》出現得相當頻繁。可是，過往就《蜜蜂華報》進行的研究，卻鮮有探討該報對土生葡人或居澳葡人族群身份認同的建構作用。

1822 年創刊的葡文周報《蜜蜂華報》，在中國近代新聞出版史和葡萄牙政治發展史上的意義，過去一直是學者研究的核心。在中國新聞史上，《蜜蜂華報》長期被視為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外（葡）文報章和近代報刊，[2] 即使曾有學者就其“第一”的身份提出疑問，也僅僅提出將其修正為“目前有原件可溯的澳門出版的第一份報章”；[3] 而且，針對其進行的為數不多的研究幾乎都以其對中國近代報刊是否具有推動力為主旨。[4] 華語世界當中唯一對《蜜蜂華報》進行過較仔細的內容分析的學術出版物，是程曼麗的《〈蜜蜂華報〉研究》。該書根據報刊內容的標題作分類，將《蜜蜂華報》的內容分為 48 類，再集中劃分為兩大類：新聞類文體和非新聞類文體。[5] 然而，該書僅限於對其進行分類和描述，尤其着重對《蜜蜂華報》牽涉的黨派政治作描述，強調報刊的政治性與鬥爭性。

最早對《蜜蜂華報》內容進行分析的葡文學術著作，是葡裔歷史學家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研究——《澳門新聞出版之始》（*O Início da Imprensa em*

* 林玉鳳，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傳播系副教授。

** 黃曉蓉，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化雜誌》（外文版）校對。



A ABELHA DA CHINA.

NO. L.

MACAO.

圖 1.《蜜蜂華報》創刊號，1822 年 9 月 12 日，第 1 版。（圖片來源：葡萄牙國家圖書館藏，http://purl.pt/32522，Public Domain）。

Macau）。[6] 白樂嘉將《蜜蜂華報》的內容分為八個類別：（1）海外事務國務大臣對華事務公文；（2）有關王室大法官的意見；（3）印度總督致議事會的信函；（4）火神號戰艦來澳的相關信函；（5）公民致函議事會的信件；（6）議事會的會議記錄；（7）果阿總督關於澳門和葡萄牙的信件；（8）巴黎、倫敦和紐約等地的報紙關於葡萄牙政治局勢及其他事務的摘錄。[7] 澳門特區成立前，有研究開始將《蜜蜂華報》視為記錄十九世紀葡萄牙自由主義興起的重要文獻，如達斯內維斯（João Alves das Neves）在其研究澳門出版史的專著中，指該報是十九世紀初期居澳葡人內部的自由主義者（Liberais）和專制主義者（Absolutistas）之間的政治鬥爭的重要文本依據。[8] 自達斯內維斯以後，一直到了近年，才再度出現零星的針對《蜜蜂華報》的研究，如巴勃羅・馬加良斯（Pablo Magalhães）對《蜜蜂華報》創辦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的研究，[9] 但也僅側重於分析該報與政黨的關係。

本文將從報刊功能以及身份認同概念入手，審視《蜜蜂華報》的內容，探討該報如何為土生葡人及居澳葡人以“澳門人”（Macaeneses）的身份概念，構建起澳門認同和族群想像，以達至管治的目標。

二、Macaeneses、Macaista、土生葡人及居澳葡人

早在 1822 年 9 月 12 日發行的《蜜蜂華報》創刊號上，“Macaista”“Macaeneses”及“povo Macàense”[10]（意指澳門人或澳門族群）等族群色彩濃厚的詞彙就已經出現。[11] 它們被用以形容當時報刊的主要受眾——居於澳門的會說葡文的族群。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理解《蜜蜂華報》上頻繁出現的“Macaeneses”（包括“povo Macàense”）以及“Macaista”這兩個皆可以翻譯為“澳門人”的葡文詞彙的身份概念的功能與意義。澳門土語研究者巴塔亞（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曾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的“澳門土生人”特輯中，就“Macaenses”及“Macaista”這兩個與澳門葡人身份認同相關的詞彙釋義，其認為：

> “本地之子”或“澳門土生人”……這些詞已經使用了幾個世紀，至今還被澳門省的土生葡人普遍使用，以便將他們自己區別於宗主國的葡萄牙人，區別於澳門的中國人。我們沒有資料來考察是從哪一個時代開始使用“澳門土生葡人”（macaense）這一詞……而“澳門人”（macaísta）這一詞，則可以在上一個

> 世紀用克里奧爾語寫成的文章中找到，但當時並沒有表示“澳門土生人”的含義，而只是作為形容詞使用，表示任何一種“澳門特有的”東西，特別是其語言。[12]

根據巴塔亞的考證，“Macaeneses”更常用於指稱“澳門土生葡人”；而“Macaista”可以翻譯為“澳門人”，但那是葡裔族群用以稱呼在澳葡人的詞彙，所以也有“土生葡人”的意涵。

“Macaeneses”“Macaista”以及“土生葡人”，所涵括的究竟是甚麼人？最早有關土生葡人起源的研究專著，是葡萄牙學者安娜・瑪里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的著作《大地之子》（*Filhos da Terra*），其認為澳門居民可分為三個群體（歐洲葡萄牙人、澳門人或澳門葡萄牙人，以及中國人），三者獨立享有各自的文化特徵且互不往來。[13]此外，阿馬羅指出長久以來，部分學者將“土生葡人”[14]定義為葡中混血兒是一種謬誤，土生葡人應為葡萄牙裔男性與其他亞裔女性（不限於華裔，還有馬來亞、印度、日本等其他族裔）的結合；[15]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則主張“土生葡人”應為葡萄牙男子與華人女子通婚繁殖的後代，且其中國血統佔大部分的族群。[16]除“土生葡人”外，施安東（António M. Jorge da Silva）認為居澳葡人應細分為三個不同的群體：（1）早期抵達澳門定居的葡萄牙人；（2）他們往後多個世紀生活在澳門的後裔；（3）遠渡重洋到澳門治理這個居留地及教會的葡萄牙人。當中部分人只會因為職務而短暫停留在澳；亦有部分會以通婚的方式融入本地社群，並擔當社會精英的角色，參與議事會等社會事務。[17]當中這一類享有一定社會地位，並熱衷參與政治的居澳葡人，正是《蜜蜂華報》的創辦人巴波沙及其讀者群眾的一種面貌。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當時居澳的會說葡文的族群——“Macaeneses”及“Macaista”。雖然兩者皆可以翻譯為“澳門人”，但在討論澳門族群的華語語境當中，這兩個詞彙所涵括的，是巴塔亞定義的“土生葡人”，以及施安東定義的“居澳葡人”。

《蜜蜂華報》創刊於 1822 年 9 月 12 日，至 1823 年 12 月 26 日停刊為止，一共發行了 67 期。根據《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書所載，1826 年澳門的華人人口約為一萬八千人；1830 年澳門總人口約有三萬四千人，當中三萬人為華人。[18]由於該書所載當時的人口數據分為兩大類——華人與基督徒人口，因此同期最接近土生葡人及居澳葡人人口的數據，應為 1822 年 4 月的澳門基督徒人口，總數為 4,315 人。他們集中居於大堂區及風順堂區內，是《蜜蜂華報》的主要受眾（詳見表一）。

表一. 1822年4月的澳門基督徒人口

堂區	男性		女性	奴隸	總數
	14 歲及以上	14 歲以下			
大堂	289	251	1,342	248	2,130
風順堂	256	170	1,058	236	1,720
聖安多尼堂	59	52	301	53	465
總數	604	473	2,701	537	4,315

資料來源：*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á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1998, p. 102.

這個僅四千多人的葡萄牙人群體，構成了《蜜蜂華報》中旗幟鮮明的以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又譯“雅廉訪”）為首的保皇派，及以少校巴波沙為首的立憲派兩大派系。這兩個派系都曾經因為執掌澳葡政權而掌管《蜜蜂華報》，而且可以以該報的第 54 期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為立憲派主導時期，自第 54 期開始則為保皇派主導時期。

三、“澳門人”作為管治修辭：《蜜蜂華報》對 Macaeneses 的身份建構

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發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一書以來，[19] 儘管他的理論受到部分學者的“歐美中心主義”（EuroAmerica-centric）批評，[20] 但他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概念，包括印刷傳媒對建構民族的作用，仍然是廣受採納的研究民族主義以及傳播與身份認同的概念。德國學者哈特穆特・韋斯勒（Hartmut Wessler）在研究少數族裔的社會融入時提出，大眾傳媒在社會融入的過程中，可能會創造一個基於共同文化價值觀以及歸屬感而建立的象徵性社群（Symbolic Community）。[21] 下文將應用媒體具有建構社群功能的概念，對《蜜蜂華報》的內容進行歸納和描述，以此分析《蜜蜂華報》如何對“澳門人”（Macaeneses）一詞進行身份建構。

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抵澳居留，至《蜜蜂華報》創刊期間，居澳葡人已於社群間逐漸建立起成熟的自治機構——議事會（Leal Senado）。早期的議事會是集司法及行政兩權於一身的居澳葡人最高自治權力機構；然而，自 1783 年葡萄牙王室頒佈《王室制誥》後，由於加強了總督及王室大法官的權力，議事會的影響力大不如前。[22] 受到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及 1820 年西班牙革命等動蕩的世界政治時局影響，葡萄牙立憲議會於 1821 年通過了葡萄牙自由憲法，宣告廢除封建特權。遠隔重洋的澳門於 1822 年亦開展了一場以君主立憲為目的的運動，同年 8 月 19 日，以巴波沙為首的立憲派掌權。

近一個月後，《蜜蜂華報》於 1822 年 9 月 12 日創刊。報章以“蜜蜂”（Abelha）為名，是因為立憲派人將報刊視為揭露政敵的政治工具，要“痛蜇”保守派。[23] 其創刊辭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名表達了對立憲派臨時政府的支持，同時強調立憲派臨時政府一切改革的基礎均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利益為首。

> 我們也渴望盡綿薄之力，來讚揚這一終結了獨裁統治、鞏固了澳門民眾的權利與義務、並在公眾的歡呼聲和喜悅之情中，按照澳門全體公民的願望成立了臨時政府的壯舉。[24]

這是首次有公開文獻將“澳門人”（Macaeneses）一詞與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之間的政治紛爭作出聯繫，並嘗試賦予其具有“君主立憲運動參與者”的行動記憶。

在為立憲派代言的同時，《蜜蜂華報》的創辦人還非常重視保持在澳葡裔群體與葡萄牙的聯繫。《蜜蜂華報》創刊號的社論就強調：

> 同時，我們還要向我們的同胞介紹澳門人民在動搖強權統治的事變中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以及剛剛成立的明智的臨時政府的忠誠和它的政務活動；向澳門人民說明他們具體的權利與義務；最後還要指出這座城市可望得到的種種改善。這些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同樣不會忽略國內外發生的有關葡萄牙的新聞。[25]

這一方面闡明了土生葡人以及居澳葡人的“澳門人”本地身份認同，同時強調重視與葡萄牙之間的連結。此外，創刊號的社論也將立憲派臨時政府推翻保皇派政權的行動定義為“愛國行動”：

> 公眾對（原）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卻一無所知，並且極力美化自己。這就是人民為甚麼採取如此不尋常的行動的原因。……我們的人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美好事物的嚮往通過這一事件充分體現了出來。……那一天，澳門人民的壯舉將永載史冊，我們將為之謳歌不已。[26]

透過這一組論述，《蜜蜂華報》的創辦人一方面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名義執政治理澳門，又同時宣告效忠葡萄牙，而且還將“澳門人”（povo Macàense）的定義，延伸至“熱愛祖國”（Amor da Patria）這種“愛國之士”（amigos da Patria）的身份，相當於為土生葡人構建了對澳門及葡萄牙兩地均表認同的複合型身份價值觀。其在構建“澳門人”身份的同時，既區分開其他葡萄牙人，亦強調其愛國情懷（Patriotismo）及對祖國的忠誠。

這種土生葡人對澳門以及葡萄牙均表認同的複合型身份價值觀，曾經引起讀者討論。例如第 19 期的《蜜蜂華報》刊登了一封來自“*Nossa Senhora da Piedade e São José Igiguá*”號船長康斯坦丁諾・蓋爾菲（Constantino Guelfi）先生的“致編輯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了四點疑問：

（1）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之一員？

（2）如果屬於，澳門居民是否有義務像那些在葡萄牙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一樣繳稅？

（3）澳門居民是否有權利驅逐當局政府，或改革政府機構？

（4）若政府在軍事、民事和宗教事務上有超額支出，這些部分是否會落到葡萄牙公民繳稅的金額上？[27]

編者其後於第 20 期回應了蓋爾菲船長的來函，表示“澳門居民屬於葡萄牙大家庭……並享有和所有葡萄牙公民一樣的權利”。[28] 這個“葡萄牙公民一樣的權利”的回應，相當於以公民的身份，確立了複合型身份價值觀的政治正當性。

出於政治環境變化，《蜜蜂華報》自第 54 期開始由保皇派掌控，其政治立場固然驟變，但對“澳門人”身份的認同卻不減。保皇派接手後，該報雖然一直抨擊立憲派，但他們建構的“澳門人”（Macaeneses）身份卻和立憲派一樣，是同時認同澳門和葡萄牙的複合型身份價值觀。以第 58 期刊載的一篇題為《來自真正澳門人之高呼》（“O Discurso do Macaista Original”）的匿名讀者來論為例，該讀者以“澳門人”為主位視角及從政治社會利益的考量出發，對保皇派表達支持，並將立憲派人劃分為他者（outros）。

> 正是這群人，四處拉幫結派，到處迷惑民眾，左右逢源，對異己進行放肆的貶低與詆毀。他們為了發展自己的黨派，在澳門社會間煽風點火，挑撥離間，妄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穩固其組織基礎的目的。[29]

第 54 期的社論也指“那些企圖引誘澳門民眾犯下在本報第 17、18 期以及隨後幾期中提到的違抗葡萄牙印度州首府果阿政府的命令的罪行的叛黨頭目的邪惡行徑，已經不應再被隱瞞了”。[30] 可見，立憲派人在第 54 期開始，被描述為立意損害“澳門人”權益及破壞“澳門人”與葡萄牙關係的他者。

其後，《蜜蜂華報》又刊出多篇以批評巴波沙執政的立憲政府為主旨的信函，如第 62 期刊登的《愛國者致市政議員演說》（“Philantropo Macaista”）及於第 60、63 及 64 期連載的《來自一個愛國者的闡述》（“Expoziçãо dos sentimentos de hum Patriota”）。這些信函的內容以控訴巴波沙本人及其政府執政時的不法行為為主，如：

> 沒有真正愛國的澳門人能忍受巴波沙在 9 月 26 日上呈的申訴書中，將其一己犯下的罪行歸咎於澳門人當中……出於對祖國的熱愛及澳門人的榮譽，在受到這種不公正的指責，迫使我向公眾表明，澳門人從來沒有做過。[31]

這不僅將愛澳門和愛國家的兩層認同概念緊扣在一起，還用“真正愛國的澳門人”的身份，試圖將立憲派之前賦予“澳門人”（Macaeneses）身份概念中的“君主立憲運動參與者”的行動記憶抹去——“澳門人從來沒有做過”。而在第 60 至 65 期的《蜜蜂華報》讀者來信中，亦相繼出現抨擊立憲派的書信及演說，第 64 期的《政府讚揚市民忠於法律及國王文告》還將擁護保皇派定義為“愛國行為”。

從上述《蜜蜂華報》的內容可見，無論是保皇派或立憲派，都將他們的黨派理念和行動加諸於“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當中，藉此尋求派別理念、行動和政權的合法性，“澳門人”在他們眼中是一種管治修辭。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政治立場為保皇或立憲，愛澳門和愛國家始終是《蜜蜂華報》上“澳門人”身份認同的核心，說明政治立場的變化對於當時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的“澳門人”身份認同的一貫性影響不大。

《蜜蜂華報》上大量圍繞“Macaista”和“Macaeneses”的身份象徵的討論，特別是讀者來信與編者回應的文本，是研究澳門土生葡人以及居澳葡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原始文獻，也說明了至今仍然不乏關注及研究的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早於十九世紀早期的公共場域已出現激烈討論。在土生葡人以及居澳葡人的“澳門人”身份認同建構中，這一群體反映出的共同歷史經歷及文化準則，可理解為一種屬於集體的“自我”。[32] 土生葡人以“我”作為主體，以族群中共有的歷史、習慣、種族、階級等文化符號劃分及定義出一個獨特的身份認同，並以此區分“他人”（客體）。從《蜜蜂華報》的內容來看，無論是立憲派主導時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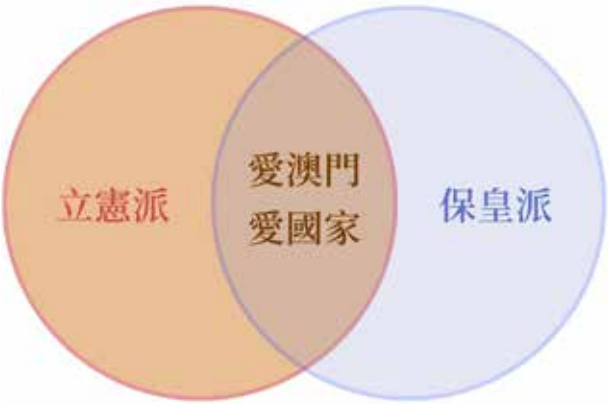


圖 2. 土生葡人的複合身份認同（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社論，還是第 54 期後保皇派主導時期所用的稱謂，皆使用了“Macaenses”或“Macaista”等具象徵意義的字眼，一方面把作為主體的“澳門人”與象徵他者的其他族群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又帶有本土化身份認同的含義在其中。

四、多重效忠與約束的社群生活

由立憲派創辦的《蜜蜂華報》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報刊，而且是兼具官方公報功能的政黨報紙，每期都會刊登政府公文、議事會訓令及會議記錄等政治資訊；又因為以巴波沙為首的立憲派支持 1821 年葡萄牙的立憲革命，信奉葡萄牙的自由憲法，所以《蜜蜂華報》從一開始就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公開的議政平台，刊登市民的政論及匿名來信等個人評論。前文提及的由讀者來信和編者回應兩種文本顯示的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對“澳門人”身份內涵的建構，就是基於《蜜蜂華報》提供的公共言論空間而出現的。

《蜜蜂華報》的創辦人不僅將報紙視為開放的公共場域，該報作為立憲派臨時政府的官報，亦可被視為“政權的延伸”。立憲派主理的議事會曾於《蜜蜂華報》上數次以政治參與（Participação do Governo）為題，公開召集全體市民出席議事會會議或以書面形式表達個人意見。《蜜蜂華報》第 51 期的一則政治

參與告示中，議事會就七項有關政治、教育及軍事等層面的問題向市民作公開諮詢，並呼籲全體市民以書面形式回覆議事會。具體問題包括關於政治的“（1）應否對現有政體作改變，並從哪些方面着手改動”[33]，或討論教育規劃的“（2）應如何制定最貼近現時社會狀況且具有執能力的教育規劃予學生（男性及女性）”[34]等；又設立委員會討論市民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的意見。可見，立憲派主導時期的政治生態鼓勵市民參政議政，而當時的《蜜蜂華報》作為一份政治立場鮮明的刊物，為居民提供了一個公開的議政平台。

這種讓讀者、市民參與的文化，一直延續到第 54 期報刊和政權均易手以後。保皇派當權以後，第 58 期還刊出了一篇署名“J. J. B”，題為《“駝背主義”（Carcundismo）之起源與其根絕之法》的來信，[35] 其內容主要抨擊當時擁護專制主義（即眉額帶歷一派）之人士，也就是當時掌控《蜜蜂華報》的人：

> 在一個專制政府中，每個人只為了一己私利生存，執政者亦漠不關心並毫無節制地破壞自然和人民的權利。[36]

其實，這種葡裔社群內部基於不同政治理念的互相攻擊，可以被視為一種“內部的自由”，能夠讓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與象徵他者的其他族群區分開來。不過，這種內部的自由是建立在眾多外部的行為規範中的。

安德森在論述民族主義起源時，提出十八世紀末在歐洲出現的民族主義，需要被放在宗教共同體（Religious Community）與王朝體系（Dynastic Realm）等更大的文化體系中檢視。[37] 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的“澳門人”族群意識，既體現在《蜜蜂華報》上顯而易見的政治派系鬥爭中，還存在於相對隱藏的宗教共同體和王朝體系當中。

《王室制誥》生效後，葡萄牙王室及葡屬印度總督取代了以本地人為主的議事會，成為管治居澳葡人的最主要權力。居澳葡人當中，也因此出現了透過王室大法官被逐漸強化的對葡萄牙王朝的認同，這個過程在《蜜蜂華報》上亦有所披露。葡印總督委任的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在立憲派上場後曾經策動政變，因而被巴波沙掌控的議事會驅逐出境，其後葡印總督包也（Joaquim Mourão Palha）派出的火神號（*Salamandra*）戰艦於 1823 年 6 月抵澳並協助眉額帶歷奪回政權。

《蜜蜂華報》共載有 46 篇與火神號相關的新聞報導、文告及信件往來。除涉及葡印總督及議事會政治角力的信件外，刊於第 47 期的一篇公文載有澳門理事官致廣東總督的公函，當中詳細交代了葡印總督派火神號戰艦來澳一事的因由。[38] 從這些《蜜蜂華報》刊登的內容中，可以清晰見到當時居澳葡人既受代表葡萄牙王室的葡印總督的武力威脅，也受王室大法官推動的葡萄牙王室認同的影響。

除政治生態外，由於居澳葡人普遍有天主教信仰，他們還有共同遵從的宗教生活規範。《蜜蜂華報》出版期間，澳門的基督徒正經歷教宗庇護七世主理教務時期，如載於第 21 期的教宗庇護七世通諭（1822 年 1 月 16 日）抄本，就涉及天主教節慶期間的守齋及赦免事宜，其後數期又分別刊載了編者及當時澳門主教等人對如何因地制宜地在澳門履行教宗通諭的討論。[39] 而且，當時的議事會也會以宗教音樂作為慶典活動的主要元素，如載於第 17 期的一則議事會公告寫道：

> 澳門議事會為進一步體現其對憲法制度的支持，以及接收到來自“*novo paquete*”號振奮人心的消息後，特此頒佈一則公告，於本月 5、6、7 日晚間全市張燈結綵，鳴槍致意，並於 6 日晨間在澳門主教座堂演奏《讚美頌》。[40]

可見，當時的宗教生活同時也是政治生活的一個部分。

綜上所述，以《蜜蜂華報》作基礎，可以分析出十九世紀初期，當時這群以“Macaeneses”或“Macaista”自居的葡裔“澳門人”社群（無論是土生葡人或居澳葡人），既是明顯的宗教共同體，有共同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戒律；同時，又受到葡萄牙王朝及其代理人的政令和軍事力量的影響與制約。立憲與保皇的政治理念和行動出現以後，結合澳門本地的政治發展，這群“澳門人”一方面受盡各方勢力掣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澳門人”之名來制衡各方。正是因為在這種複合的政治及宗教生活中進退維谷，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透過在《蜜蜂華報》所創造的公共場域進行辯論和論述，從而發現、創造和深化了以“澳門人”為名義的自我身份認同。這個認同的核心是愛澳門和愛國家（葡萄牙），彰顯其與澳門和葡萄牙的聯繫，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文化。在這個基礎上，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可變動的，其政治信仰也可以有內部的自由討論空間。當然，土生葡人與居澳葡人這一獨特的群體，無論是置於歷史時空或澳門的社會現況中，他們的“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就如同霍爾（Stuart Hall）對身份認同的分析一樣，存在着一種由歷史和文化不斷重置（positioning）的社會關係，處於一種流動的定位之中。[41] 在十九世紀初的《蜜蜂華報》上發現的這種社群認同有何影響，目前尚難以作出定論。

附：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學生助理謝涵宇、錢亦堅、韋開元、陳釗燁、馮笑敏協助翻譯了文中引用的《蜜蜂華報》內容，謹以致謝。



註釋：

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74.
2.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 年，第 81 頁；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271 頁；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1–3 頁。
3. 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103–129 頁。
4. 除了前引戈公振、方漢奇、程曼麗及林玉鳳的研究，還有趙殿紅的《〈蜜蜂華報〉的創辦和澳門近代報業的發展》（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6 年第 6 期，第 73–77 頁），都是研究《蜜蜂華報》對中國近代報業的影響。
5.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四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90/html/09901.htm，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6. J. M. Braga, "O Início da Imprensa em Macau", separata do *Boletim Eslesiástico*, Lisboa: Boletim Eslesiástico, 1938.
7. João Alves das Neves, *A Imprensa de Macau e as Imprensa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9, pp. 93–94.
8. João Alves das Neves, *A Imprensa de Macau e as Imprensa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9, p. 93.
9. Pablo Magalhães, "Paulino da Silva Barbosa. O baiano que liderou a Revolução Constitucional em Macau e criou o jornal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Afro-Ásia*, no. 51 (2015), pp. 275–310.
10.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1, 2.
1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1–2.
12. [葡] 巴塔亞（G. N. Batalha）：《澳門語歷史與現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4 年總第 20 期，www.icm.gov.mo/rc/viewer/10020/318，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13. [葡] 阿馬羅（A. M. Amaro）著，金國平譯：《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 年，第 9 頁。

14. 在阿馬羅的《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 年）一書中，譯者金國平先生曾就“土生葡人”一詞的譯法作解譯，認為“Filhos da terra”在一般中文口語中被稱為“土生”，意指“本地人”或“當地人”。
15. [葡] 阿馬羅（A. M. Amaro）著，金國平譯：《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 年，第 9–10 頁。
16. [葡] 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門土生葡人的由來》，《文化雜誌》（中文版）1994 年總第 20 期，www.icm.gov.mo/rc/viewer/10020/317，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17. 施安東（António M. Jorge da Silva）著，葉浩男譯：《跨越文化與時空的葡亞人：澳門葡裔的演化》，香港：中華書局，2019 年，第 5 頁。
18. *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á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1998, p. 99.
1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16.
20. Partha Chatterjee,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Millennium*, vol. 3, no. 20(1991), pp. 521–525.
21. Hartmut Wessler, "Multiple Differentiations and Communicative Integration: Symbolic Communities and Media", in K. Imhof, O. Jarren and R. Vlum eds., *Integration and Media*,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 56–76. (German)
22. 湯開建：《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1583—1865）》，《澳門研究》2016 年總第 81 期，第 83–103 頁。
23.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三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90/html/04301.htm，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24.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附錄《〈蜜蜂華報〉第 1 期、原文及譯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90/html/20901.htm，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25.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附錄《〈蜜蜂華報〉第 1 期、原文及譯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90/html/20901.htm，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26.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三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90/html/04301.htm，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27.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74.
28.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77.
29. 葡文原文為“Allucinando à outros, manchando a este, denegrindo a'quelle, promovao partidos, acendâo o fogo da discordia, seinentem a cizania da desunião, com o único alvo de radicar a estabilidade de seus desordenados caprichos”。*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247–249.
30.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附錄《〈蜜蜂華報〉第 1 期、原文及譯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90/html/20901.htm，2022 年 9 月 27 日讀取。
3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263–264.
32.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22–237.
33. 葡文原文為“Se deve, ou não fazer algumas alteraçõens na forma acutual deste Governo, e quaes devao ellas ser, no cazo de afirmativa”。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41.
34. 葡文原文為“Qual deva ser o plano da educação para ambos os sexos, mais acomodada ás actuacs circunstancias do paiz, e quaes os meios mais suaves e seguros, de que possa lançar mao o Governo para o pôr em execução, e conservalo”。*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41.
35.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69–70.
36. 葡文原文為“Em um governo despotico, cada qual para fazer fortuna, naò procura, se nao ter a seu favor, ou ao menos ser visto indifferentemente pelo tyranno, que desenfreadamente calea os direitos da natureza, e da humanidade”。*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69–70.

3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16, p. 11.
38.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201–204.
39. 見於《蜜蜂華報》第 21 及 25 期。
40.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66.
41.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26.



《蜜蜂華報》目錄索引

黃曉蓉 * 林禮賢 ** 古健成 *** 譯

儘管《蜜蜂華報》在歷史上僅發行了67期，但它記錄及反映了十九世紀初期澳門葡人社群形形色色的社會面貌，至今仍有許多內容未及深究。目前中文學界以程曼麗於1998年出版之《〈蜜蜂華報〉研究》對其研究得最為全面，並翻譯了一些較為重要且具歷史意義的內容，供中文讀者參閱。[1] 適逢《蜜蜂華報》面世二百年，考慮到《蜜蜂華報》原文為十九世紀的葡萄牙文，且目前尚未有專書提供全面的中文翻譯，令有興趣的中文讀者可望而不可即，故作此目錄，以便中文讀者作參考索引之用。

《蜜蜂華報》連載於1822年9月12日至1823年12月26日，每期4版（部分期數另有附錄）。本目錄對每期內容先作分類（共32類文章分類），再作內容簡述，總條目數為614條。[2]“頁數”一欄為澳門大學與澳門基金會於1994年出版的《蜜蜂華報》合訂本的對應頁數，[3] 讀者可據此查找原文。目錄內容若有錯漏之處，祈請專家讀者指正。

表一.《蜜蜂華報》目錄索引

1822年9月12日（第1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創刊辭	1–2
2	會議記錄	1821年8月11日議事會會議；葡萄牙一位王子誕生	2–3
3	會議記錄	1月5日議事會會議	3
3	告示	1月5日告示，葡萄牙王室返回里斯本	3–4
4	會議記錄	1月30日議事會會議	4
4	船期消息	*Palla Conceição*、*Brigue Assumpção* 及 *Navio Castro* 船期消息	4
4	通告／廣告	訂閱廣告	4
1822年9月19日（第2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9月13日反政府之陰謀和行憲後，本地新政府成立之消息	5–6
2	會議記錄	2月5日議事會會議	6–7
4	會議記錄	2月6日議事會會議	8
4	訃告	Hippolito de Sousa逝世	8
4	船期消息	*Brigue Leticia* 及 *Navio Espanhol Conceição* 船期消息	8
4	通告／廣告	訂閱廣告	8
1822年9月26日（第3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Hippolito de Sousa之悼文	9
1	其他	João Joze da Silva e Souza向議事會就遵守憲法提出建議	9–10
2	演說	眉額帶歷（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2月6日於議事會的演說辭	10–11
3	會議記錄	2月7日議事會會議	11
3	其他	擺華（Francisco Jozé de Payva）就2月7日議事會會議後提出的意見	11–12

* 黃曉蓉，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化雜誌》（外文版）校對。

** 林禮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化雜誌》（外文版）助理編輯。

*** 古健成，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化雜誌》（外文版）校對。

4	其他	貝路（Paulo Vicente Bello）就 2 月 7 日議事會會議後提出的意見	12
4	其他	J. d'A. Carvalho e Silva 就 2 月 7 日議事會會議後提出的意見	12
4	船期消息	*Brigue Assumpção* 船期及於船上載貨之廣告	12
4	訃告	Jozé Antonio Pereira 逝世	12
4	其他	Antonio Teixera Macahdo Basto 與 Maria Angelica de Castro 婚訊	12
4	通告／廣告	訂閱廣告	12
1822 年 10 月 3 日（第 4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1821 年 10 月 4 日里斯本議會會議	13
1	會議記錄	2 月 12 日議事會會議	13–14
2	請願書	2 月 12 日議事會會議上，馬埃爾（João Nepomoceno Maher）發表的請願	14–16
4	編者的話	感謝 Senhor Portuguez Constituicional 向本報提供資料	16
4	通告／廣告	Manoel Pereira 賣房廣告及其船隻 *1.º Rey do Reino Unido* 載貨廣告	16
1822 年 10 月 10 日（第 5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告	2 月 13 日與行憲相關之公告	17–18
2	會議記錄	2 月 15 日議事會會議，回應馬埃爾之請願書	18
2	請願書	議事會答覆馬埃爾的請願書之內容	18
2	批示	與行憲相關之批示	18–20
4	聲明	法官頒佈聲明，指出若干人不涉及 9 月 13 日晚上之陰謀	20
4	讀者來信	馬埃爾來信，希望將其寫給眉額帶歷的信刊登於《蜜蜂華報》	20
4	讀者來信	馬埃爾寫給眉額帶歷的信	20
4	新聞	Matheos Vandenberg 獲得拍賣牌照，並將舉行拍賣會	20
4	通告／廣告	Manoel Jozé dos Remedios 舉行拍賣	20
4	通告／廣告	Joaquim Jozé dos Santos 公開拍賣船隻 *Brigue Temerario* 已故船長 João Antonio Morin 之動產	20
4	通告／廣告	王室大法官辦公室拍賣青洲島	20
1822 年 10 月 17 日（第 6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其他	行憲宣誓辭附編者評論	21–22
2	會議記錄	3 月 9 日議事會會議	22–23
3	其他	Francisco Antonio Pereira da Silveira 議員於 3 月 9 日議事會會議上作出之指示	23
3	讀者來信	讀者 Antonio Vicente do Rosario Aggersborg 請求《蜜蜂華報》刊登數名公民聯署之聲請書	23–24
4	抄本	數名公民向議事會遞交請求將參與起義之囚犯押送離澳之聲請書	24
4	演講	譴責參與起義之囚犯	24
4	新聞	議事會容許商人湯馬斯・比爾（Thomas Beale）於澳門自由經商	24
4	通告／廣告	Filippe Joze de Freitas 出售其位於下環之貨棧	24
4	通告／廣告	Antonio Joze de Vasconcellos 出售其位於醫院街（現白馬行）之房子	24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1822 年 10 月 24 日（第 7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3 月 9 日議事會會議上 Silveira 議員之建議書	25
1	公文	4 月 10 日議事會向里斯本所發送之公函	25
1	書信往來	總督歐布基[4]向議事會發送有關委任吉馬良斯（Jozé de Aquino Guimarães）上校於議會任職之函件	25–26
2	書信往來	議事會回覆總督歐布基之信件	26
2	書信往來	議事會致吉馬良斯上校之信件，准許其前往里斯本就任	26
2	書信往來	議事會就吉馬良斯上校前往里斯本擔任議事會駐里斯本代表之信件	26
2	書信往來	吉馬良斯上校就擔任議事會駐里斯本代表回覆總督之函	26–27
3	會議記錄	4 月 24 日議事會會議	27
3	會議記錄	5 月 25 日議事會會議	27
3	會議記錄	6 月 26 日議事會會議	27–28
4	讀者來信	馬埃爾來信，更正早前刊登之文章中的錯誤	28
4	新聞	9 月 24 日有關科舉考試之新聞	28
4	船期消息	*Brigue Assumpção* 號會押送九月反政府陰謀（起義）之罪犯和同謀離澳	28
4	勘誤	編者表示在前期刊登之文章出現多個排版及文法錯誤	28
4	新聞	已故船長 Morin[5] 的拍賣會將繼續進行	28
4	新聞	王室大法官辦公室公佈拍賣船隻 *S. Pedro* 及青洲島之結果，它們分別以 3,000 元及 5,000 元賣出	28

1822 年 10 月 31 日（第 8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6 月 28 日會議記錄	29–31
3	摘錄	摘錄 8 月 3 日的《孟買信使報》（*Bombay Courier*），刊載果阿軍隊元帥 Joaquim Manoel Correa 之來函	31
3	其他	Joaquim Manoel Correa 元帥於 7 月 17 日有關果阿騷亂之澄清	31–32
4	新聞	有關中國邊疆戰事新聞	32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nberg 的拍賣將繼續進行	32
4	通告／廣告	王室大法官辦公室舉行拍賣會	32
1822 年 11 月 7 日（第 9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6月28日議事會會議(續)	33–36
4	讀者來信	讀者 O Imparcial 之來信	36
4	讀者來信	匿名讀者來信反駁 6 月 28 日議事會會議內容	36
4	通告／廣告	拍賣船隻 *S. Pedro* 之船體	36
1822 年 11 月 14 日（第 10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6 月 28 日議事會會議(續)	37–38
2	書信往來	議事會致吉馬良斯上校之信件	38–39
3	讀者來信	擺華來函，回應 6 月 28 日議事會會議之內容	39
3	讀者來信	O Amigo da Verdade 讀者來函	39–40
4	編者的話	編者回應 O Imparcial	40
4	其他	預告下期《蜜蜂華報》將報導在廣東發生之大火	40
4	通告／廣告	馬六甲主教欲將書籍、家具等物品於板樟堂出售，舉行拍賣會	40
4	通告／廣告	*O Despostismo Ecclesiastico-Civil* 訂閱廣告	40

1822 年 11 月 21 日（第 11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政府通告	政府通告，邀請公眾就若干事宜進行討論	41
1	書信往來	議事會致吉馬良斯上校之信件	41
1	會議記錄	7 月 4 日議事會會議	41
2	會議記錄	7 月 4 日議事會會議	42–43
3	新聞	廣東十三行大火	43
3	讀者來信	刊登讀者 O Inimigo do Depostismo 來信	43–44
4	編者的話	編者表示拒絕刊登讀者 O Imparcial 來函之原因	44
4	船期消息	*Navio Vasco da Gama*	44
4	公文	有關一封來自里斯本的公函抵澳之消息	44
1822 年 11 月 28 日（第 12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7 月 13 日議事會會議	45
1	會議記錄	8 月 13 日議事會會議，有關前山寨發出提及澳門之文書	45
1	會議記錄	8 月 14 日議事會會議	45–46
2	書信往來	Emilio Manoel Moreira 之信件，於 8 月 14 日議事會會議提及	46
2	會議記錄	8 月 17 日議事會會議	46–47
4	讀者來信	O Macaense 讀者來函	48
4	讀者來信	O Imparcial 讀者來函	48
4	編者的話	編者回應 O Imparcial 之來函	48
4	通告／廣告	擺華為其船隻 *Conde do Rio-Pardo* 招募船長前往歐洲	48
4	通告／廣告	海郵部通告，*Viajante* 號將前往里約熱內盧，欲寄郵件需提早遞交	48
1822 年 12 月 5 日（第 13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有關 9 月 13 日反政府之陰謀	49
1	文告	向澳門市民發出之文告	49–50
2	會議記錄	11 月 16 日議事會會議	50
2	其他	議事會市民大會（Conselho Geral）[6] 因收到有士兵攜同火器前往議事廳而中止會議	50
2	會議記錄	11 月 16 日晚上議事會會議	50–51
3	其他	11 月 17 日議事會重新召開會議，並指出在當年 8 月 19 日就職之政府合憲和更具有認受性	51
3	文告	Francisco de Mello da Gama Araújo 發出文告，表示士兵須效忠合憲合法的政府	51
3	請願書	83 名市民於 11 月 16 日遞交予議事會之聯署請願書	51–52
4	讀者來信	澳門保險局（Casa de Seguros de Macau）秘書 Bernardo Gomes de Lemos 請求《蜜蜂華報》刊登該機關於 11 月 29 日成立之消息	52
4	船期消息	*Navio Angelica* 載有馬六甲主教、Gonçalo de Miranda e Barros 少校和四名與 11 月 16 日陰謀有關之軍人前往果阿	52
4	通告／廣告	致全體市民通告：未能以口頭方式向議事會市民大會表達意見之人士，可以書面形式遞交予議事會	52
4	通告／廣告	Domingos Polycarpo da Roza 船長可為任何有需要之船隻提供服務	52
4	勘誤	更正 11 月 21 日刊登之政府公告	52
1822 年 12 月 12 日（第 14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回憶錄》[7]	開始連載《回憶錄》（“Memória”）	53 前[8]–54

3	公文	Emilio Manoel Moreira 之第二封信件，於 8 月 14 日議事會會議提及	54
3	書信往來	Francisco Antonio Pereira da Silveira 之覆函	54–55
4	會議記錄	8 月 18 日議事會會議	55
4	讀者來信	Francisco Antonio Pereira da Silveira 之讀者來信	55
4	訃告	擺華逝世	55
4	通告／廣告	Manoel Francisco Marques 之船隻 *Margarida Roza* 將離澳，刊登載貨廣告	55
4	通告／廣告	擺華之子小擺華通知所有與其已故父親相關之欠款須於兩個月內處理	55
18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56 前[9]–56
2	公告	公佈於 8 月 18 日議事會會議後的公告要旨，邀請公眾翌日親臨市政廳商討公共利益事宜	56
2	會議記錄	8 月 19 日議事會會議	56
2	會議記錄	8 月 19 日議事會市民大會會議記錄，公佈新議事會選舉結果	56–57
3	會議記錄	8 月 20 日新一屆議事會首次會議，同時公佈若干項人事任命	57
3	訓令	議事會訓令，通知歐布基擔任本城軍營及炮台司令（應指攝政王子營，Commando do Batalhão e Fortalezas）	57
3	訓令	議事會訓令，通知 Francisco de Mello da Gama e Araujo 有關前總督歐布基就任新職位	57
3	書信往來	眉額帶歷於 8 月 20 日致議事會之信件	57
3	書信往來	歐布基對議事會訓令之回覆	57–58
4	書信往來	Francisco de Mello da Gama Araújo 對議事會訓令之回覆	58
4	書信往來	議事會回覆眉額帶歷	58
4	會議記錄	8 月 22 日議事會會議，決定澳門將慶祝 8 月 24 日波爾圖自由革命週年	58
4	抄本	8 月 22 日議事會會議後之公告抄本，通知市民將慶祝 8 月 24 日波爾圖自由革命週年，舉辦感恩聖祭及於晚間張燈結彩	58
4	船期消息	*Brigue Dolores*、*Brigue Primeiro de Março* 及 *Brigue Viajante* 船期消息	58
1822 年 12 月 24 日（第 15 期副刊）[10]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Filantropo 讀者來信	58 後[11]
3	其他	以船隻 *Assumpção* 運送“擾亂澳門安寧之邪惡人士”離澳集資名單	58 後
1823 年 1 月 2 日（第 16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59–60
2	公文	摘錄 *Astro da Lusitania* 刊登之由司法事務部公佈的公文，稱應對有機會危及公共安寧之人士採取適當措施	60
2	其他	*Astro da Lusitania* 的“編者的話”，評論上述公文：儘管部分權利會受到限制，但應以保障全社會安全為優先	60
2	其他	刊登被政府命令離開里斯本之人士名單	60
3	其他	因第 15 期之內容有大量錯誤和缺失，故重新刊登若干份公告、會議記錄和書信	61–62

4	新聞	宣佈眉額帶歷沒有被拘禁，而是在家受到看管	62
4	船期消息	*Navio Margarida Rosa*、*Navio N. S. da Penha*、*Navio Santo Antonio*、*Navio Samaraõ*、*Navio Carmo*、*Brigue Elisa* 及 *Navio Andromeda* 船期消息	62
4	通告／廣告	擺華遺孀宣佈與其子小擺華成立貿易行“擺華遺孀及其子女有限公司”，倘有相關事宜可與其合夥人聯絡	62
1823 年 1 月 9 日（第 17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里斯本政府公報》公文摘錄，將扣留有可能危害公眾安寧及秩序之人士	63–64
2	其他	因刊登於第 15 期之內容有大量錯誤和缺失，故重新刊登若干份公告、會議記錄和書信	64–65
3	其他	慶祝 8 月 24 日波爾圖自由革命週年新聞稿	65
4	會議記錄	1822 年 8 月 28 日議事會會議記錄：成立一委員會，並任命六名人士負責增加財政收入事宜	66
4	抄本	Francisco de Mello da Gama Araújo 與議事會之間之通訊，稱前者將離澳前往果阿就任新職	66
4	新聞	為表示議事會對憲政制度的支持，澳門將於本月 5 至 7 日晚上張燈結彩，以及於 6 日早上舉行感恩聖祭	66
4	船期消息	*Gallera Conceiçãõ* 及 *Paquete* 船期消息	66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nberg 將繼續進行拍賣	66

1823 年 1 月 16 日（第 18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政府聲明	公佈押解費里西亞努（Feliciano Firme Monteiro）上尉離澳	67
1	其他	建立里斯本銀行之章程國令	67–69
3	抄本	議事會致上次會議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建立的委員會委員之信函	69
3	其他	刊載 J. J. B. 的《“駝背主義”（Carcundismo）之起源與其根絕之法》	69–70
4	其他	編者稱將刊登攝政王子營費里西亞努上尉來信	70
4	通告／廣告	夜啕貨棧有酒、布匹與羊毛衫出售	70
4	船期消息	*Galera Confiança* 船期消息	70
1823 年 1 月 23 日（第 19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摘錄	《里斯本政府公報》摘錄，頒佈有關東方大主教與其轄下教區人事任命之執行細節	71
1	摘錄	《里斯本政府公報》摘錄，公佈倘東方大主教不遵守政府所頒之命令，有機會失去薪俸	71–72
2	摘錄	《里斯本政府公報》摘錄，公佈不容許“傳信部教派”(Propagandista) 教士於東方教區行使管轄權	72
2	其他	編者評論上述摘錄	72
2	摘錄	摘錄 1822 年 5 月 6 日第 105 號命令	72
2	表決	里斯本憲法委員會意見書	72–73
3	雜文／政論文	一篇與宗教和政府相關之評論	73–74
4	其他	政府秘書署對本報第 11 期 7 條問題的回應	74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4	讀者來信	Constantino Guelfi 來函，討論“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之一員？”	74
4	編者的話	編者稱因篇幅所限未能刊登對 Constantino Guelfi 的回覆	74
1823 年 1 月 30 日（第 20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摘錄	摘自 *Astro da Lusitania* 之 1822 年 1 月 19 日會議記錄	75–76
2	其他	裁決有關東方教區及葡萄牙其他海外教區權力過大之問題	76–77
3	編者的話	編者回應 Constantino Guelfi 之來函，答覆“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之一員？”	77
3	讀者來信	O Censor 讀者來信	77–78
4	船期消息	*Navio Barreto* 船期消息	78
4	通告／廣告	Joaquim de Souza 建立一商行，名為 Joaquim de Souza, Filhos & C.ª，於 2 月 1 日啟市	78
1823 年 2 月 6 日（第 21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抄本	庇護七世教宗通諭（1822 年 1 月 16 日）抄本，有關天主教節慶日期間守齋及赦免事宜	79–80
2	編者的話	編者回應教宗通諭	80–81
3	摘錄	《里斯本政府公報》有關守齋事宜的摘錄	81–82
4	公文	下令市政廳盡可能提供一筆款項予 Constantino Guelfi 船長	82
1823 年 2 月 13 日（第 22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波爾圖主教 João de Magalhães e Avelar 就守齋事宜作出解釋	83–84
2	編者的話	編者評論波爾圖主教之解釋	84
2	摘錄	續載上期《里斯本政府公報》之摘錄	84
3	其他	對若干個葡萄牙城市守齋之觀察	85–86
4	編者的話	回覆 O Censor 讀者來信	86
4	聲明	呼籲公眾在最終判決前，勿對 Fernando Morales 及 Pedro Huet 之間的瓜葛作猜測及判斷	86
4	訃告	Ana Joaquina Roza da Silveira 逝世	86
4	船期消息	*Galera Esperança*、*Navio Conde do Rio Pardo*、*Navio Palla Conceição*、*Navio 1.º Rey do Reino Unido* 及 *Brigue S. Jozé* 消息	86
1823 年 2 月 20 日（第 23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1823 年 1 月 23 日議事會會議	87
1	會議記錄	1823 年 2 月 5 日議事會會議	87–88
2	摘錄	《里斯本政府公報》摘錄，有關 2 月 15 日議會討論守齋事宜的記錄	88–89
3	編者的話	編者評論上述摘錄	89–91
5	讀者來信	巴波沙[12]來信	91
5	公文	上述讀者來信提及之 Joz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 之公函	91
5	訃告	Jozé Joaquim Barros 逝世	91
5	船期消息	*Navio Carolina* 船期消息	91
5	通告／廣告	訂閱廣告；出售書籍《憲法綱要》（*Bases da Constituição*）及《葡萄牙商人》（*Pregoeiro Lusitano*）	91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1823 年 2 月 27 日（第 24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命令各教省主教長接受世俗化教會教士於教區提供服務	92
1	抄本	Joaquim dos Ramos 致巴波沙有關於船上服役士兵及水手酬勞之信函	92
1	新聞	葡萄牙有關憲法執行情況之新聞	92–93
2	編者的話	續討論守齋事宜	93–95
4	讀者來信	C. G.[13] 讀者來信	95
4	通告／廣告	擺華遺孀及其子女有限公司處理擺華生前債務及貿易事宜之廣告	95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nberg 之拍賣行售賣船隻 *Vasco da Gama* 之貨物	95
1823 年 3 月 6 日（第 25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宣誓效忠憲法週年紀念；議員 Pinto de França 之演講及國王之回應	96–97
2	摘錄	《里斯本政府公報》討論教宗通諭之摘錄	97–98
4	讀者來信	馬埃爾有關眉額帶歷事件之來信	98–99
5	讀者來信	Joaquim dos Ramos 有關眉額帶歷事件之來信	99–100
5	公文	致澳門主教查善（Fr. Francisco）之公文，內容有關教宗庇護七世通諭	100
5	其他	查善就上述公文之回覆	100
5	其他	續載前期有關教宗庇護七世通諭的內容	100–101
6	船期消息	*Escuna S. Jozé alias Minerva* 及 *Galéra Primeiro de Março* 消息	101
6	通告／廣告	擺華遺孀及其子女有限公司處理擺華生前債務及貿易事宜之廣告	101

1823 年 3 月 13 日（第 26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里斯本日報》葡萄牙時政新聞摘錄	103
1	雜文／政論文	Bèja 區長文章	103–104
2	讀者來信	馬埃爾來信，指責眉額帶歷涉嫌敲詐已故神父 Antonio Jozé da Costa 遺產中的八千兩	104
2	讀者來信	回覆上期 Ramos 先生的來信	104–105
3	其他	有關 Constantino Guelfi 貿易糾紛	105–106
4	通告／廣告	Francisco Cecílio Braga 婚姻告示	106
4	通告／廣告	擺華遺孀及其子女有限公司處理擺華生前債務及貿易事宜之廣告	106
1823 年 3 月 20 日（第 27 期）[14]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Pregoeiro Luzitano* 有關宗教的新聞摘錄	107
1	公文	議事會憲法相關公文	107
1	編者的話	回覆議事會公函	107–108
2	讀者來信	讀者 Miguel Antonio Cortella 來信，有關 Guelfi 事件	108
2	讀者來信	致海關大法官信件	108
3	讀者來信	Joaquim de Souza 來信，有關 Guelfi 事件	113
3	讀者來信	有關 Guelfi 事件	113
4	讀者來信	Joaquim de Sousa Junior 來信，有關 Guelfi 事件	114
4	通告／廣告	首次刊登海關官員對 Guelfi 的反駁	114
1823 年 3 月 27 日（第 28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戰爭事務國務大臣公文	115–116
2	政府聲明	財政部聲明一則	116–117
2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116–117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3	讀者來信	Vicente Caetano da Rocha 等人來信，有關 Guelfi 事件	117–118
4	通告／廣告	拍賣廣告	118
4	船期消息	*Vasco da Gama*	118
1823 年 4 月 3 日（第 29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Palacio de Queluz 頒佈的十項法令	119–120
2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120
2	讀者來信	續載第 117 頁的讀者來信，有關 Guelfi 事件	120–121
3	讀者來信	致海關法官的信，有關 Guelfi 事件	121–122
4	通告／廣告	船隻拍賣廣告	122
4	通告／廣告	失物啟示	122
1823 年 4 月 10 日（第 30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摘錄	有關葡萄牙愛國主義的外國報道摘錄	123
1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123–124
2	讀者來信	Cypriano Antonio Pacheco 的個人聲明書，有關 Guelfi 事件	124–125
3	雜文／政論文	對澳門公立學校機構的建議	126
4	船期消息	Cypriano Antonio Pacheco 的個人聲明書，有關 Guelfi 事件	126
4	通告／廣告	煙草廣告；船隻 *Navio Carolina* 廣告	126
1823 年 4 月 17 日（第 31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第 28 期蜜蜂華報提及眉額帶歷乘船前往里斯本，但有可能身在“Quantong”（廣東）	127
1	新聞	數則與巴西及英國相關的時政新聞	127–128
2	新聞	有關 1822 年 8 至 10 月的西班牙及墨西哥政局新聞	128–129
4	讀者來信	葡文語言研究，與本報的葡文用法相關	130
4	其他	來自葡王亞豐素三世的信件，確認不干擾 Cornelhe㘝 居民	130
4	編者的話	編輯回應同頁的語言相關來信，表示感謝及接受批評指教	130
1823 年 4 月 24 日（第 32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抄本	一封有關財政的皇室信件	131
2	抄本	攝政王署名的皇室信件抄本	132
2	抄本	續第 31 期眉額帶歷乘船去向消息	132
2	書信往來	眉額帶歷於 1822 年 12 月 20 日的回應	132–133
3	書信往來	眉額帶歷與 Carlos Jozé Pereira 於 1822 年 9 月 17 日的回應	133
3	書信往來	眉額帶歷回覆 Carlos Jozé Pereira	133
3	書信往來	眉額帶歷回覆議事會	133
3	文件	眉額帶歷乘船離澳文件（1822 年 9 月 18 日）	133
3	新聞	西班牙恢復憲法制度	133–134
4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134
4	讀者來信	Cypriano Antonio Pacheco 的聲明書，有關 Guelfi 事件	134
4	政府通告	議事會召集全體市民參與會議	134
4	訃告	D. Anna Paschoa Bello 及 João Baptista Marchini 離世	134
4	船期消息	*Galera Conceição*、*Brigue S. Sebastiao de Manila* 及 *Galera Conceição* 船期消息	134
4	通告／廣告	國家航海學校（Escolla Nacional de Pilotos）招生	134

1823 年 5 月 1 日（第 33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頒佈關於選舉投票資格的法令	135–138
4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138
4	通告／廣告	Joze Huet 出售馬尼拉物業	138
1823 年 5 月 8 日（第 34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1822 年 9 月 16 日會議記錄	139
2	會議記錄	1822 年 11 月 17 日會議記錄	140–142
4	抄本	議事會致眉額帶歷信件抄本	142
4	《回憶錄》	連載《回憶錄》	142
4	船期消息	*Galera Conceição* 開往馬尼拉	142
1823 年 5 月 15 日（第 35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書信往來	眉額帶歷回覆 Carlos Josè Pereira	143–146
4	讀者來信	Nicoláo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 就第 34 期市議會會議記錄的意見	146
4	讀者來信	一首佚名十四行詩	146
4	讀者來信	一首來自 V. M. Attento Venerador 的詩	146
1823 年 5 月 22 日（第 36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政府聲明	議員選舉步驟及詳情	147–148
2	其他	第 33 期中刊登的選舉法令	148
2	新聞	數個國家及城市的時政新聞	148–149
3	讀者來信	Cypriano Antonio Pacheco 的聲明書，有關 Guelfi 事件	149–150
4	船期消息	*Navio Luz* 及 *Rio de Janeiro* 船期消息	150
4	通告／廣告	龍思泰出售法國紅酒的廣告	150

1823 年 5 月 30 日（第 37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里約熱內盧主教 Joaquim Jozè Monteiro Torres 的公文	151
1	書信往來	市議會回覆眉額帶歷刊載於本報第 35 期的信件	151–152
2	書信往來	眉額帶歷乘船去向	152
2	《闡述》	連載眉額帶歷《闡述》	152–154
4	讀者來信	Antonio Aggersborg 物業租借廣告	154
4	船期消息	*Navio Luz*	154
4	通告／廣告	公立學校開放招生通告	154
1823 年 6 月 5 日（第 38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抄本	Antonio Francisco Machado 致眉額帶歷信件抄本	155–156
2	抄本	Antonio Francisco Machado 等人致眉額帶歷信件抄本	156–157
3	編者的話	編輯短評眉額帶歷事件	157
3	摘錄	《加爾各答報》介紹本報並刊出翻譯	157–158
4	新聞	歐美各地新聞時政報導	158–159
5	《闡述》	連載眉額帶歷《闡述》	159–160
6	政府通告	議事會召集全體市民參與會議	160
1823 年 6 月 12 日（第 39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抄本	6 月 7 日市民大會會議抄本	161
1	抄本	議事會致函 Companhia Ingleza，就眉額帶歷事件表態	161–162
2	書信往來	Companhia Ingleza 回覆議事會信件	162
2	書信往來	Companhia Hespanhola 回覆議事會信件	162
2	書信往來	Companhia Hollandeza 回覆議事會信件	162
2	書信往來	湯馬斯・比爾回覆議事會信件	162

2	書信往來	Carlos Magniac 回覆議事會信件	162–163
3	書信往來	軍人 Sargento Mor. De Cavallaria 回覆議事會信件	163
3	書信往來	*Navio Luz* 號全員回覆議事會信件	163
3	書信往來	*Navio Carolina* 號全員回覆議事會信件	163
3	書信往來	Claudio Adriano da Costa 回覆議事會信件	163
3	抄本	眉額帶歷致函小擺華抄本	163–164
4	讀者來信	Plutarcho Macaense 來信回應 Joaquim Manoel Milner 的反政府宣言	164
4	讀者來信	評論第 33 期及第 36 期的選舉內容	164
4	船期消息	*Navio Andromesa* 消息	164
1823 年 6 月 19 日（第 40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葡印總督授予市政廳權力召集及限制市民出席會議	165
2	公文	議事會就新政府上任致函澳門主教	166
2	書信往來	澳門主教查善回覆議事會信件	166
2	公文	議事會就新政府上任致函教區	166
2	書信往來	Domingos Antonio Pereira 回應議事會	166
2	公文	議事會致函教區	166
3	書信往來	龍思泰回覆議事會表示保持中立	167
3	書信往來	一名華人致函唪嚟哆追討眉額帶歷債務	167
3	其他	華商向議事會申請追討眉額帶歷債務	167
3	其他	議會將以上申請的副本上呈女王	167
3	文件	眉額帶歷乘船離澳文件，續第 160 頁內容	167–168
4	摘錄	加爾各答報章摘錄	168
4	摘錄	北京及廣東新聞摘錄，講述本年 2 月在北京發生的火災	168
4	船期消息	*Navio Confiança*、*Galera Margarida Roza*、*Navio Barreto*、*Brigue Elisa* 及火神號（*Salamandra*）軍艦船期消息	168
4	通告／廣告	龍思泰之拍賣廣告	168
1823 年 6 月 26 日（第 41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果阿政府來函議事會，涉及火神號來澳事宜	169
1	書信往來	João Baptista Filgueiras 致 Sampaio 伯爵信件	169
1	通告／廣告	有關海外省屬地總督稱謂公告	169
1	命令	有關海外省屬地總督稱謂公告	169
2	訓令	議會命令，僅承認一位屬地總督	170
2	其他	澳門青年軍加入駐軍軍營	170
2	書信往來	果阿政府致函議事會	170–171
3	抄本	議事會回函果阿政府	171
3	書信往來	果阿政府回覆議事會	171
3	其他	澳門駐軍的情況	171–172
4	書信往來	致議事會主席關於火神號的信件	172
4	其他	火神號相關消息	172
4	船期消息	*Brigue Assumpção* 消息	172
1823 年 7 月 4 日（第 42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6 月 7 日政府會議記錄	173–177
5	會議記錄	有關火神號來澳	177–181
10	書信往來	火神號致函議事會	182
10	書信往來	議事會回函火神號	182
10	書信往來	火神號回函議事會	182

10	公文	與火神號相關的果阿政府公文	182
10	書信往來	火神號指揮官回覆議事會	182
11	公文	議事會第三次致函火神號指揮官	183
11	書信往來	火神號指揮官回覆議事會	183–184
12	公文	議事會第四次致函火神號指揮官	184
12	書信往來	火神號指揮官回覆議事會	184
12	公文	議事會第五次致函火神號指揮官	184
1823 年 7 月 10 日（第 43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火神號相關新聞	185–187
3	公文	議事會致火神號有關派員前往船上交涉的公文	187
3	書信往來	聖若澤男爵（Barão de S. Joze do Porto Alegre）回函議事會，有關火神號	187
3	書信往來	Manoel Pereira 議員回函議事會，有關火神號	187
3	書信往來	Domingos Pio Marques 回函議事會，有關火神號	187
3	書信往來	Joze Joaquim Pereira de Miranda 回函議事會，有關火神號	187
3	書信往來	Rafael Bollado de Almeida 回函議事會，有關火神號	187
3	書信往來	Claudio Adriano da Costa 回函議事會，有關火神號	187
3	公文	致函警察 Joaquim de Faria Neves 查詢會見火神號船長一事	187
3	書信往來	Joaquim de Faria Neves 回覆議事會	187–188
4	書信往來	國務秘書回覆火神號船長事件	188
4	讀者來信	火神號相關內容	188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nberg 拍賣廣告	188

1823 年 7 月 17 日（第 44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火神號相關新聞	189–190
2	書信往來	火神號相關消息	190
3	會議記錄	6 月 28 日有關議員選舉的會議記錄	191
3	公文	議事會致函議員 Bernardo Gomes de Lemos 及 Francisco Antonio Pereira de Silveira	191
3	書信往來	Bernardo Gomes de Lemos 回覆議事會	191
3	書信往來	Francisco Antonio Pereira de Silveira 回覆議事會	191
3	書信往來	貝路等人致巴波沙的感謝信	191
3	公文	眉額帶歷致函巴波沙（1823 年 1 月 5 日）	191–192
4	其他	Rafael Bollado de Almeida 等人缺席市民大會理由摘記	192
4	船期消息	*Navio Luz* 消息	192
1823 年 7 月 24 日（第 45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眉額帶歷離澳事件	193
1	其他	議事會致函教區	193–194
2	公文	眉額帶歷致函巴波沙之公文（續）	194–196
4	書信往來	火神號指揮官致函議事會	196
4	書信往來	D. Joaquim d'Eça 致函巴波沙，有關火神號	196
4	船期消息	*Navio Santo Antonio*	196
1823 年 7 月 31 日（第 46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聖若澤男爵就其船隻被火神號扣押致信議事會	197
1	文件	Angelo Joze Barradas 給聖若澤男爵的信，講述火神號隊長登上 *Barreto Junior*	197

1	文件	火神號寄信給 Angelo Joze Barradas 要求船隻拋錨	197
1	文件	火神號隊長通知*Barreto Junior* 未經軍艦陪同不可進入港口	197–198
2	文件	議事會對聖若澤男爵來信的回覆	198
2	文件	火神號軍艦隊長給聖若澤男爵的信	198
2	文件	聖若澤男爵致信議事會	198
2–3	公文	眉額帶歷致函巴波沙之公文（續）	198–199
3	讀者來信	貝路否認發出准照給 Charles Magniac & Co. 卸載 80 箱鴉片	199
4	請願書	炮兵隊長 Bento Zefyrino Gonsalves de Macedo 反對葡印政府派火神號來澳的請願書	200
1823 年 8 月 7 日（第 47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4	公文	澳門理事官致因火神號來澳而被派到澳門的廣東總督之公函	201–204
4	讀者來信	Charles Magniac & Co. 公司回應貝路有關鴉片之事	204
4	勘誤	訂正上期報紙筆誤	204
4	通告／廣告	有關 Jose de Almeida Carvalho e Silva 物業租借	204
1823 年 8 月 14 日（第 48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會議記錄	葡萄牙國王在議會的講話	205
1	新聞	來自里斯本的有關雷戈（Rego）將軍的兩則新聞，關於立憲派軍隊逼近，亂黨持續撤退	205
1–2	書信往來	Joaquim de Ramos 寫給議事會秘書的信，有關眉額帶歷事件	205–206
2	書信往來	Joaquim de Ramos 寫給另一人的信件，講述眉額帶歷沒有前往歐洲，反而留在黃埔	206
2–3	書信往來	*Assumpção* 號船長致議事會的信件，講述火神號對該船開炮等經過	206–207
3	公文	政府秘書發給 *Luz* 號指揮官的公函，要求拯救 *Assumpção* 號	207
3	公文	上述公函的回信，稱達成所求	207
3–4	編者的話	政府拯救 *Assumpção* 號	207–208
4	讀者來信	為嘉獎參與營救的人員而捐款的市民名單及款項列表	208
4	新聞	馬尼拉發生的叛亂	208
4	勘誤	勘正上期筆誤	208
1823 年 8 月 21 日（第 49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3	公文	在中國官員在場時宣讀果阿政府致議事會的公函，要求澳門以 1822 年 8 月 19 日前的方式重組議事會和政府	209–211
3	公文	上述公函談論的政權移交問題	211
3	聲明	葡印總督宣佈委任依德費基（João Cabral d'Estefique）的聲明	211
3	公文	葡印總督寄給議事會有關政權的公文	211
3–4	新聞	葡萄牙政局相關新聞	211–212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相關新聞	212
4	《闡述》	連載眉額帶歷《闡述》	212
4	通告／廣告	兩則拍賣啟事	212
1823 年 8 月 28 日（第 50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3	新聞	有關葡萄牙王后憲法宣誓	213–215
3	新聞	有關葡萄牙王后憲法宣誓	215

3	新聞	西班牙、法國相關新聞	215
3	新聞	西班牙、法國、俄羅斯相關新聞	215
3–4	新聞	智利、巴西革命等新聞	215–216
4	其他	國王要求遊民入軍隊服役的命令（Ordem）	216
4	《闡述》	連載眉額帶歷《闡述》	216
1823 年 9 月 4 日（第 51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西班牙戰事相關新聞	217
1	新聞	法國選舉相關新聞	217
1	新聞	西班牙、法國政治相關新聞	217
1–2	新聞	西班牙、法國相關新聞	217–218
2	新聞	西班牙、法國談判相關新聞	218
2	新聞	希臘人、大馬士革宗教相關新聞	218
2	新聞	馬德里宗教相關新聞	218
2–3	新聞	有關Manoel Fernandes Thomas 死訊的信件	218–219
3–4	《闡述》	最後一次連載眉額帶歷《闡述》	219–220
4	訃告	Nicholas G. Ogden 及 Joaquim Gamboa 逝世	220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nberg 舉行拍賣	220
1823 年 9 月 11 日（第 52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議事會對眉額帶歷《闡述》的回覆	221
1	新聞	巴西皇帝相關新聞	221
1	新聞	葡萄牙通過法令將對西班牙政治制度的破壞視同對葡萄牙直接侵略	221
1	新聞	葡萄牙表示若法國軍隊進入西班牙會撤回使節	221
1	新聞	西班牙軍隊相關新聞	221
1	新聞	葡萄牙起義相關新聞	221
1–2	新聞	葡萄牙起義、戰事相關新聞	221–222

2	新聞	巴西獨立相關新聞	222
2	新聞	巴西獨立相關新聞	222
3	摘錄	1822 年 11 月從澳門寄出的信件，內容有關推翻政府的陰謀	223
3	書信往來	葡萄牙對果阿政府援助款項	223
3–4	公文	眉額帶歷致函巴波沙之公文（續）	223–224
4	摘錄	新舊政制相關新聞	224
4	其他	神父等人計劃在加爾各答建立學校	224
4	通告／廣告	法國人招學生	224
4	通告／廣告	訂戶更新訂閱本報	224
1823 年 9 月 18 日（第 53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2	演說	法國、西班牙相關演說	225–226
2–3	新聞	巴西各地祝賀皇帝	226–227
3	新聞	巴西獨立相關新聞	227
3	新聞	有關巴西伯南布科（Pernambuco）爭端	227
3–4	新聞	有關馬尼拉 6 月 3 日發生的革命	227–228
4	勘誤	更正第 51 期訃告	228
4	船期消息	*Pala Conceição* 消息	228
4	通告／廣告	公開拍賣	228
1823 年 9 月 27 日（第 54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眉額帶歷捉拿巴波沙	229
1–2	摘錄	眉額帶歷捉拿巴波沙	229–230
2	摘錄	眉額帶歷捉拿巴波沙	230
2–4	摘錄	眉額帶歷捉拿巴波沙	230–232
4	抄本	眉額帶歷捉拿巴波沙	232
4	船期消息	*Navio Magnifico* 及火神號船期消息	232
4	通告／廣告	邀請投稿至本報及訂閱印度英文刊物	232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1823 年 10 月 4 日（第 55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2	雜文／政論文	有關巴波沙政府的文章	233–234
2	抄本	巴波沙對政府的申訴書（Requerimento）	234
2	批示	查善主教反駁上述申訴書的批示	234
2–3	雜文／政論文	批評巴波沙政府	234–235
3	其他	議事會新成員就任	235
3–4	文告	火神號指揮官對澳門軍隊的文告	235–236
4	新聞	葡萄牙、法國、西班牙相關新聞	236
4	新聞	葡萄牙軍隊相關新聞	236
4	新聞	葡萄牙戰事相關新聞	236
4	船期消息	*Navio Argyle*、*Navio Primeiro Rei do Reino Unido* 及 *Navio Magnifico*	236
4	讀者來信	感謝信	236
4	通告／廣告	拍賣消息；本報銷售廣告	236
4	勘誤	訂正上期筆誤	236
1823 年 10 月 11 日（第 56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雜文／政論文	有關保守派重新掌權前（1822—1823）的文章	237
1–2	雜文／政論文	有關保守派重新掌權前（1822—1823）的文章	237–238
2	文告	火神號指揮官對澳門人民的文告	238
2–3	告示	議事會有關重組新政府的告示	238–239
3	新聞	葡萄牙、西班牙戰事相關新聞	239
3	新聞	葡萄牙、西班牙戰事相關新聞	239
3	新聞	葡萄牙、西班牙戰事相關新聞	239
4	新聞	有船隻抵達印度；法國對西班牙宣戰	240
4	新聞	法國、西班牙、英國、印度相關新聞	240
4	新聞	有船隻抵達印度	240
4	新聞	澳門新政府上任儀式及慶祝活動	240
4	讀者來信	Pedro Joze da Silva Loureiro 謝卻第 54 期報導中對他協助捉拿巴波沙的讚揚	240
1823 年 10 月 18 日（第 57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告示	政府每週開會時間及市民提交申訴書告示	241
1–3	雜文／政論文	續載第 56 期有關保守派重新掌權前（1822—1823）的文章	241–243
3–4	文告	政府呼籲市民擁護現政府的文告	243–244
4–5	其他	包也（Joaquim Mourão Palha）對澳門人民的宣言（Manifesto）	244–245
5	新聞	西班牙、法國相關新聞	245
5	新聞	法國軍隊相關新聞	245
5	新聞	西班牙戰事相關新聞	245
5	新聞	西班牙對法國宣戰	245
5	新聞	西班牙政府人員變動	245
5–6	新聞	西班牙戰爭計劃及組建游擊隊的法令	245–246
6	新聞	法國船隻扣押西班牙船	246
6	讀者來信	火神號一軍官希望刊登其敍述	246
6	讀者來信	市民來信	246
6	讀者來信	稍後刊登 Macaista Original 及 O Patriota 的文章	246
6	編者的話	本報前任編採人員逃到廣州	246
6	船期消息	*Navio Ashmee* 消息	246
6	通告／廣告	船隻運貨到歐洲廣告	246
6	通告／廣告	法國人招學生	246

6	通告／廣告	本報銷售廣告	246
1823 年 10 月 25 日（第 58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3	雜文／政論文	Macaista Original 批評巴波沙政府	247–249
3–4	其他	包也對澳門人民的宣言（續）	249–250
4	新聞	法國與西班牙戰爭相關新聞	250
4	新聞	巴西獨立相關新聞	250
4	編者的話	為上期本報前任人員逃走辯護；下期刊登署名 O Português 的信件	250
4	船期消息	*Navio Pascoa* 消息	250
4	通告／廣告	法國人招學生	250
1823 年 11 月 1 日（第 59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2	會議記錄	眉額帶歷事件及編輯評論	259–260
2	讀者來信	火神號隨軍神父來信	260
2	書信往來	議事會寄給火神號隨軍神父的公函	260
2–3	書信往來	神父對上述公函的回覆	260–261
3–4	讀者來信	O Português 有關眉額帶歷和巴波沙事件的來信	261–262
4	新聞	美國、秘魯、巴西等地新聞	262
4	船期消息	*Brigue Phenix* 及 *Navio Penang Merchant* 船期消息	262
4	其他	廣州部分商品價格	262
1823 年 11 月 8 日（第 60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2	讀者來信	O Patriota 來信批評巴波沙政府	263–264
2–3	其他	包也對澳門人民的宣言（續）	264–265
3	新聞	英國及葡萄牙反對法國干涉西班牙	265
3–4	新聞	西班牙公爵到達英國	265–266
4	編者的話	回覆 O Português 的來信	266
4	船期消息	*Brigue Dolores* 及 *Navio Penha* 消息	266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mberg 拍賣	266
1823 年 11 月 15 日（第 61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新聞	眉額帶歷提出有關商業的計劃	267
1	書信往來	里約熱內盧主教寄給教士的信件	267
1–3	其他	包也對澳門人民的宣言（續）	267–269
3–4	新聞	巴西新聞	269–270
4	新聞	巴西新聞	270
4	新聞	巴西及非洲新聞	270
4	新聞	英國、法國、俄羅斯新聞	270
4	新聞	巴西新聞	270
4	新聞	法國局勢新聞	270
4	新聞	巴西新聞	270
4	訃告	D. Juliana Antonia Gram-Pre 逝世	270
4	通告／廣告	售賣貨棧、住宅、菜園	270
4	通告／廣告	政府印刷廠售賣葡國憲法；售賣家具和書本	270
1823 年 11 月 22 日（第 62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聲明	一神父向澳門主教作出關於承認現政府的聲明	271
1–2	其他	包也對澳門人民的宣言的結尾	271–272
2	抄本	巴波沙致 1823 年 9 月 23 日終結的舊政府的公函，論及建立新的議事會及選出澳門的葡萄牙國會議員等	272
2–3	演說	Philantropo Macaista 致市政議員（Vereadores）的演說，有關巴波沙政府不法行為等內容	272–273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3–4	新聞	續載上期第269至270頁巴西新聞	273–274
4	新聞	土耳其大火	274
4	船期消息	*Navio Jane*、*Navio Sulimany* 及 *Navio Cornwallis* 消息	274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mberg 售賣房屋和奴隸	274
1823年11月29日（第63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澳門政府致包也的公函	275
1	會議記錄	政府致謝包也的指示（Indicação）	275
1–2	公文	議事會致謝包也的公函	275–276
2	編者的話	關於火神號英雄的行動	276
3	告示	任何人未經政府許可不得離境及收留外國人	277
3–4	讀者來信	續載第60期O Patriota有關澳門政制等內容的來信	277–278
4	新聞	西班牙船載鴉片到伶仃洋與其他船隻交火	278
4	勘誤	訂正上期船期消息有誤的船名	278
4	讀者來信	O Constitucioanl Português 來信刊登於下期	278
4	通告／廣告	拍賣	278
4	通告／廣告	Matheus Vandemberg 售賣房屋	278
1823年12月6日（第64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政府致公函感謝依德費基	279
1–2	會議記錄	政府致謝火神號及依德費基部隊軍官的指示（Indicação）	279–280
2	文告	依德費基致各兵士的文告	280
2	文告	政府讚揚市民忠於法律及國王的文告	280
2–3	讀者來信	續載第60期O Patriota來信	280–281
3	新聞	英國、土耳其、希臘新聞	281
3	新聞	葡萄牙新聞	281
3	新聞	意大利地震新聞	281
3	新聞	法國、荷蘭新聞	281
3	新聞	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醫生去世	281
3–4	新聞	俄羅斯、印度斯坦新聞	281–282
4	船期消息	*Navio Ranger*、*Navio Pather* 及 *Navio Ann & Hope* 消息；秘魯、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新聞	282
4	讀者來信	讀者 Constitucional Português 來信，有關憲法、義務等	282
4	勘誤	第55、61、63期及“Narrativa abreviada”內容勘誤	282
4	抄本	第61期宣佈的改善貿易的計劃，之後刊登	282
4	通告／廣告	售賣 “Janelas verdes” [15]	282
1823年12月13日（第65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議事會致依德費基表達認可及感謝的公函	283
1–2	告示	關於鴉片貿易規章的告示	283–284
2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4
3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5
3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5
3–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5–286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6
4	勘誤	訂正第64期宣佈貿易計劃信件抄本筆誤	286
4	船期消息	*Brigue Esperança*	286
4	通告／廣告	船隻運貨廣告；政府印刷廠售賣航海日記	286
1823年12月20日（第66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文告	依德費基文告，關於上期第283頁的公函	287
1–2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7–288

2–3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8–289
3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9
3–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89–290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0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0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0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0
4	船期消息	*Brigue Eliza* 消息	290
1823 年 12 月 27 日（第 67 期）			
版數	**類別**	**內容概要**	**頁數**
1	公文	神職人員聯署允許眉額帶歷回澳及復職	291
1	公文	軍官聯署接回眉額帶歷	291
1	公文	議事會稱火神號於 6 月 16 日抵澳	291
2	抄本	舊政府發給巴波沙的授權書，授權其到葡萄牙投訴葡印政府派船到澳門	292
3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3
3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3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4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4
4	新聞	葡萄牙政局新聞	294
4	法令	給予米格爾王子權力；葡萄牙重建與歐洲國家的邦交	294
4	讀者來信	讀者 O Constitucional Portuguêes 來信；另有關於第 63 期西班牙船新聞的來信	294
4	船期消息	*Navio Andromeda*、*Navio Angelica* 船期消息	294

註釋：

1.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
2. 本目錄索引以程曼麗在《〈蜜蜂華報〉研究》中的 48 種文類作基礎，並因應內容作增補刪減，整合為以下 32 個分類（葡文部分採用當時原文的拼寫方法）：1. 新聞（NOTICIA）；2. 會議記錄（SESSÃO）；3. 告示（EDITAL）；4. 船期消息（NOTICIAS MARITIMAS）；5. 訃告（NECROLOGIA）；6. 通告／廣告（AVISO）；7. 演說（DISCURSO）；8. 請願書（REPREZENTACAO）；9. 編者的話（CORRESPONDENCIA）；10. 公告（BANDO）；11. 批示（DESPACHO）；12. 聲明（DECLARAÇÃO）；13. 讀者來信（CORRESPONDENCIA）；14. 抄本（COPIA）；15. 演講（PROPNUNCIA）；16. 公文（ARTIGO D'OFFICIO/OFICIO）；17. 書信往來（CARTA）；18. 勘誤（CORRIGINDA）；19. 摘錄（EXTRACTO）；20. 文告（PROCLAMAÇÃO）；21.《回憶錄》（MEMÓRIA）；22. 訓令（PORTARIA）；23. 政府聲明（DECLARAÇÂO DO GOVERNO）；24. 表決（PARECER）；25. 雜文／政論文（VARIEDADES）；26. 文件（DOCUMENTO）；27. 政府通告（PARTICIPAÇÃO DO GOVERNO）；28.《闡述》（EXPOSIÇÃO）；29. 命令（PROVIZAO）；30. 會議記錄（ACTA）；31. 法令（DECRETO）；32. 其他（OUTROS）。
3.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e Fundação Macau, 1994.
4. 總督 José Osório de Castro Cabral de Albuquerque 的中譯名不一，本表統一譯為“歐布基”。
5. 原文為“Morim”，應同指 1822 年 10 月 10 日刊登之“通告／廣告”上的已故船長 João Antonio Morin。
6. 本目錄參考吳志良在 1995 年出版的《澳門政制》一書，將“Conselho Geral”統一譯為“市民大會”。參見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 年。
7. “Memória”在林玉鳳 2015 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中譯為《記憶》，本表統一改譯為《回憶錄》。參見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
8. 合訂本中的第 14 期頭版缺頁碼，故本頁碼以“53 前”作標示。
9. 合訂本中的第 15 期頭版缺頁碼，故本頁碼以“56 前”作標示。
10. 本期以第 15 期副刊（Suplemento）的名稱印行。
11. 合訂本中的第 15 期副刊附於第 58 頁之後，故頁碼以“58 頁後”作標示。
12. 總督 Paulino da Silva Barbosa 有“保連玉”“巴波沙”或“巴爾博托”等譯法，本表統一採用“巴波沙”。
13. 譯者推斷此縮寫指的是 Constantino Guelfi。
14. 由澳門大學及澳門基金會出版的《蜜蜂華報》合訂本中，因原件未能完整保留，故第 109 至 112 頁缺失。
15. 市民 Joaquim Jozé dos Santos 欲出售位於 Janelas verdes 之物業及本報之編輯室（Laboratorio Constitucional）。

鏡海遺珠
——第一幅法國人繪製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

汪藍 *

摘　要 隨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象徵着財富的神秘東方成為西方開展海上探險之路的動力。繼葡萄牙、荷蘭、英國之後，十七世紀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把目光從北美洲和大西洋轉移到東方。1698年，安菲特里忒號在拉羅謝爾港起錨揚帆，揭開了法國首次中國之行的序幕，開啟了中法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新篇章，由此產生許多精美的手繪航海圖和城市地圖。F・弗羅傑繪製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就是其中最早且影響深遠的城市地圖之一，對以後澳門地圖的繪製和印刷出版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本文以全球史觀的視野及圖像學的研究方法，對《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的繪製歷史背景、材質媒介、視覺語言和文字變遷等進行綜合分析和梳理，探討該地圖的譜系關係及其功能、繪製風格與符號系統；通過以圖證史的方式，對十七世紀末澳門城市格局、軍事設施及周邊環境等進行論證。

關鍵詞 手繪地圖；澳門城市；F・弗羅傑

引言

地圖史的發展反映和記錄了人類認識和征服自然的過程，體現了人類對於科學與世界的探索精神。從真實世界的三維空間到點、線、面的圖形語言表述，再現了人類對於物質世界的具象描繪到抽象概念的轉換過程，充滿着人類的智慧、想像和創造力。地圖是藝術與科學的完美結合。

2016 年 2 月，筆者赴法國國家圖書館（BNF）從事研究工作，偶然發現法國人繪製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Plan de la ville et port de Macao*）。該地圖是在 1698 年法國安菲特里忒號（*L'Amphitrite*）首次中國之行期間，由隨船的水文工程師、製圖師弗朗索瓦・弗羅傑（François Froger，以下簡稱 F・弗羅傑）繪製，此前從未被披露和研究發表。隨着地圖資料的不斷收集和整理，筆者萌發了對法國手繪澳門古地圖的研究。

隨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十六世紀的歐洲人在東方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下紛至沓來。地圖的繪製既是科學技術進步的表現，也是當時探險與遠洋貿易的需求，對東方航線的開拓尤為重要，地圖成為海上強國之間的機密及間諜刺探的目標。繼葡萄牙之後，西班牙、英國和荷蘭也爭相加入到海洋貿易的霸主鬥爭之中，相繼開拓東方航線及設立東印度公司，通過貿易為本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然而，法國直到十七世紀才開始加入到東方航線的探險和貿易之中，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

另一方面，澳門地處中國南海之濱，廣東最南端伶仃洋之畔，其時隸屬於香山縣（今廣東中山市、珠海市一帶），曾以濠鏡澳之名見

* 汪藍，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現為澳門科技大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美術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藝術創作與理論。

著於《明史》。成書於清代的《澳門記略》載：

> 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台、北台，兩山相對如門云。[1]

澳門“孤懸海表，直接外洋”，雖方圓不足三平方公里，但澳門作為“廣州外港”，卻是當時中國唯一允許外國人寓居之地。澳門在中西方的貿易中有着極其重要的地位，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強的覬覦，若能夠掌握這塊土地的控制權，無異於在東西方貿易中奪得先機。在早期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等國的東方地圖中，廣州、澳門是最常見的中國地名，幾乎代表了中國。澳門的城市地圖也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地圖集和航海遊記裡，成為東方神秘國度的象徵。

一、惺惺相惜：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中國正邁步進入史稱“康乾盛世”的時代，而西方則開始孕育着工業革命。在東方貿易競爭中落後了一百多年的法國，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歐洲海洋強國中的地位。此時的法國航海技術和地圖繪製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皇家科學院和海洋學院的建立，為法國的“東方之行”和成為海上強國做好了準備。

一個是自詡為“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路易十四（Louis XIV），一個是被奉為“天子”的康熙皇帝，他們分別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遙不相及，各自統治着自己的帝國，引領東方與西方的盛世與文化藝術的發展風潮。兩位君主的身世驚人地相似，他們都是幼沖即位：路易十四即位時年僅六歲，康熙皇帝八歲登基。兩位君主雖不相識，卻同時建立起自己的豐功偉業，仿佛彼此惺惺相惜，相互敬仰。兩人從十七世紀下半葉開始頻頻通過書信往來向對方發出善意（圖 1）。[2]



圖 1. 亞森特・里戈（Hyacinthe Rigaud）繪《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of France*），1701 年。（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ouis_XIV_of_France.jpg）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5 年）是中法關係史上重要的一年，路易十四特別派遣了五位耶穌會的飽學之士前往中國。他們以“國王的數學家”的名義，跟隨第一任駐暹羅（Siam）大使亞歷山大・德・肖蒙騎士勛爵（Chevalier de Chaumont）和阿貝・德・舒瓦西（Abbé de Choisy）率領的使團前往暹羅，其中就有白晉（Joachim Bouvet）[3]、洪若（Jean de Fontaney）、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劉應（Claude de Visdelou）。[4] 其最終的任務是到達中國，為中國皇帝服務。他們在暹羅下船後，沿着陸路繼續他們的行程，最終於 1687 年到達北京。康熙皇帝非常欣賞這些博學多識的耶穌會士，他們以數學家、天文學家或醫生



圖 2. 白晉《中華帝國現狀》中的中國皇帝插圖，1697 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片來源：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608275f, Public Domain）

等身份留在宮中。白晉神父教皇帝天文學和數學，他甚至寫了《中國皇帝康熙傳》（*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1697*）和《中華帝國現狀》（*L'Es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 1697）等著作（圖 2）。

1693 年，康熙皇帝命白晉回法國尋找新的科學家。白晉回到巴黎後，積極推動在巴黎成立一家公司，以裝備一艘開往中國的船隻。當時的白晉神父和其他九位新的“國王數學家”都期盼着能夠早日揚帆遠航，駛向東方的國度——中國。

二、駛向東方：安菲特里忒號首次中國之行

1698 年，安菲特里忒號的首次中國之行，揭開了中法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序幕。

1698 年 3 月 7 日，安菲特里忒號從法國西海岸的拉羅謝爾港（la Rochelle）起航，這是法國武裝商船的首次“中國之行”（圖 3）。安菲特里忒號是一艘 500 噸的輕型護衛艦，購買於皇家海軍，它配備了 30 門加農大炮，操控起來靈活、輕盈。安菲特里忒號此行由拉・羅克騎士勳爵（Chevalier de La Rocque）擔任船長，船上共有 150 名船員和一批前往中國的乘客，包括 30 位商人和 10 名傑出的耶穌會士，[5] 白晉神父是其中唯一到過中國和了解中國的人。[6]

離開拉羅謝爾港的安菲特里忒號沿着歐洲和非洲大陸西岸一路南下。3 月 15 日，船隻經過伊比利亞半島西北的費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到 3 月 21 至 22 日已經來到非洲西海岸的加那利群島（Îles Canaries）。3 月 26 至 31 日，該船經過了維德角群島（Îles du Cap-Verd），其後在 4 月 18 日切換航線，於 5 月 31 日至 6 月 10 日駛向特立尼達群島（l'Île de la Trinité），並停泊在好望角的桌灣（la baie de la Table）。他們在開普敦接到命令前往巴達維亞，並在那裡聘請了領航員前往中國海。儘管他們走的是當時主要的航線，但還是迷路了。

8 月 18 日，他們在阿赫姆（Achem）停泊，並僱了一名葡萄牙領航員。由於這位領航員的疏忽，船隻在馬六甲海峽迷失了方向。9 月 9 日，船長拉・羅克在馬六甲僱了兩名英國領航員，他們於 9 月 19 日離開海峽，出發前往澳門。10 月 5 日，他們在西沙群島（Paracels）險些觸礁後，在上川島（Sanciam）停泊拋錨。10 月 13 日，他們迎來了來自廣海衛（Kouanghai）的引水員，出發前往澳門，並在 10 月 22 日在澳門內港拋錨。11 月 2 日，安菲特里忒號停泊在珠江上。[7]



圖 3.《拉羅謝爾港地圖》（*Plan de la Rochelle*），約十七世紀，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GE SH 18 PF 54 DIV 7 P 6 D。（圖片來源：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53389j.r=Rochelle%20Rochelle?rk=708158;0, Public Domain）

安菲特里忒號經過七個多月的海上航行，跨越了歐亞非三大洲，歷經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三大洋，幾經艱險，終於來到了中國，完成了法國至中國的第一次遠洋航行。

得益於安菲特里忒號的這次航行，隨船者沿途繪製的幾張地圖成為經典。特別是 F・弗羅傑繪製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法國手繪彩色澳門城市地圖。該圖後經改編，多次印刷出版，影響廣泛，意義重大。

三、繪形繪色：F・弗羅傑其人與《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

F・弗羅傑在 1676 年出生於法國，是一名工程師、水文測量師和探險家。他一生曾航行和探索過許多國家，有記載稱他直到 1715 年仍然健在。1695 年，19 歲的 F・弗羅傑就跟隨讓—巴蒂斯特・德熱內斯（Jean-Baptiste de Gennes）遠征南美洲東海岸探險，船隊一路航行至秘魯海岸，卻因為不利的季風阻止了他們穿越麥哲倫海峽。F・弗羅傑通過記錄自己的旅行經歷來介紹各地的風貌，他關於麥哲倫海峽之行的報告是第一份詳細介紹法國至麥哲倫海峽航線的航海記錄。

1698 年，他奉命參與安菲特里忒號的首次中國之行，並作為隨行的工程師和水文測量師繪製了多幅沿途城市地圖，其中就有《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他擅長繪製城市地圖和海岸線航海圖，具有航海家的敏銳觀察力和製圖師的天賦和表現力。

F・弗羅傑在他的著作《法國人的第一次中國之行 1698、1699 和 1700 年寫於安菲特里忒號船上》（*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裡這樣寫道：

> 澳門位於北緯 22° 13'、經度 134° 56' 的大島的尖端。它是中國人交給葡萄牙人管理的，因為他們驅逐了一些在廣東省沿海肆虐的海盜，並且就在海盜退出的地方建造了現在的城市。他們佔據的是一小塊大約三英里的土地，一堵城牆將島上的其他地方隔開，該城牆的入口由中國人嚴格把守，以防止任何人進入澳門。
>
> 澳門港被眾多島嶼環抱，大小船隻進入其中，能躲過各路來風。但裡面的水很淺，隨便來個甚麼潮，船都會擱淺。一艘從果阿來的巨型戰船，三個月前就已經困在這裡，估計要到 1 月初才有機會重新出發。[8]

F・弗羅傑就這樣開始了他對澳門的介紹。看得出來，他在澳門逗留期間，對澳門的由來和環境有非常細緻的觀察和記錄，這對他後來繪製澳門地圖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圖 4）。

《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黎塞留（Richelieu）分館地圖部，屬於海軍水文與日誌部的檔案資料。該圖約繪製於 1699 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由法國人繪製的澳門城市地圖。地圖的背面寫有“MACAO”和“1699”等字樣，還有這張地圖在不同時期被多次修改的編號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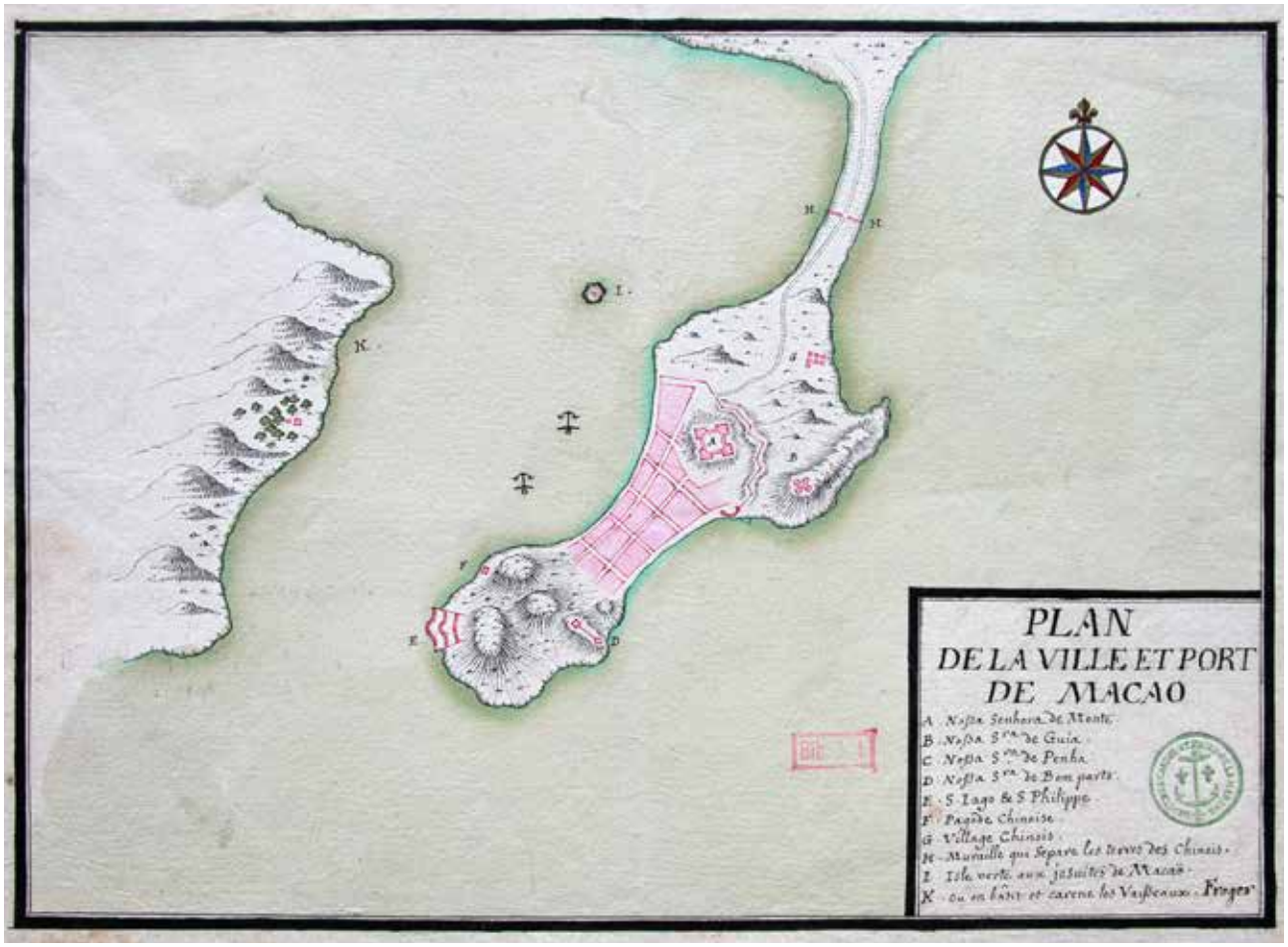


圖 4. F•弗羅傑《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黎塞留分館地圖部，編號：GE SH 18 PF 179 DIV 12 P 2/1 (1) D（圖片來源：筆者攝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表一. F・弗羅傑《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資料

標題	《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
種類	手繪彩色地圖
製圖師	F・弗羅傑（1676—171？）
繪製日期	1699 年
主題	澳門
語言	法語
尺寸	25.6 厘米 ×34.4 厘米
資料來源	法國國家圖書館黎塞留分館地圖部 編號：GE SH 18 PF 179 DIV 12 P 2/1 (1) D

地圖繪製於毛邊水彩紙上，紙質厚實緊密，紋理細膩，無浮水印。它長 34.4 厘米，寬 25.6 厘米，橫式構圖。其畫面整體均衡，左右上下佈局得當。地圖採用粗細線條裝飾圖廓，沒有標註經緯度和比例尺。地圖墨色濃郁，字跡端正，以線條勾勒，水彩敷色，紅、綠色渲染。地圖採用上北下南佈局，中間是澳門半島及城市街區分佈，自上而下分別是蓮花莖、關閘、青洲、城牆、炮台、城區等，地標清晰可辨。地圖左邊是“對面山”（今珠海灣仔），右上角是玫瑰風羅盤（Rose des vents），右下角是方形的圖例框，裡面列有地圖名和 A 至 K 的十個澳門地名標註。

表二. F・弗羅傑《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圖例框

PLAN DE LA VILLE ET PORT DE MACAO		
序號	**原文**	**地名**
A	Nossa Senhora de Monte.	聖母山（大炮台）
B	Nossa S.ra de Guia.	聖母雪地（東望洋炮台）
C	Nossa S.ra de Penha.	主教山（西望洋炮台）
D	Nossa S.ra de Bom parto.	聖母誕（燒灰爐炮台）
E	S. Iago & S. Philippe.	聖地亞哥與聖菲利普（炮台）
F	Pagode Chinoise.	中國寶塔（媽閣廟）
G	Village Chinois.	中國村莊（望廈村）
H	Muraille qui Separe les terres des Chinois.	隔離中國土地的圍牆（關閘）
I	Isle verte aux jesuites de Macaö.	澳門耶穌會士所在綠島（青洲）
K	Ou on Bâtit etcarène les Vaisseaux.	我們停泊和修船處（內港）
F・弗羅傑（製圖者簽名）		

地圖中的地貌用細線勾勒，明暗襯托，沿用了傳統繪畫的處理方法，即光源自左上角射入，山體的左側較亮，右側陰影較暗，運用線條的疏密排列來表現明暗關係，烘托山體的立體感。海岸線以連綿的曲線勾勒，輔以海岸線垂直的短線加強，使得水陸交界更加清晰、立體。從城區穿過城牆通往關閘的小路，用點排列成線，穿過大片的農田，經過關閘直至前山，蜿蜒曲折，饒有意趣。

遠處的山採用了較為平視的角度，如對面山和望廈村的蓮花峰，可以看到“山”形的輪廓。中心位置的東、西望洋山，則採用了較俯視的角度來描繪，通過加強周邊的明暗來表現高程的變化，反映出製圖者的空間遠近意識以及觀者的視覺心理體驗。

地圖基本以紅、綠色為主色調，凡涉及人造物體的地方，如街區、村莊、炮台、廟宇、關閘和城牆等，直接採用紅色勾勒，續以紅色進行描繪。水體則用綠色來渲染，沿着海岸線的部分艷度較高，隨着遠離陸地，艷度逐漸降低。整張圖基本分為兩大明度等級，分別代表陸地和海面：明度較高的是陸地，基本上沒有罩染色彩，透出紙張本身白色的底色；明度較低的是海面，罩染了一層棕綠色，使得整張地圖層次分明，清晰明朗。

四、尋幽入微：《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圖例分析

> 符號是地形圖內容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是地圖的語言。只要掌握了圖例，就可以認識地形圖的內容。[9]

《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圖例目錄的序列號採用了拉丁字母，從 A 到 K，中間缺少字母“J”，共十項文字說明。其中分三個類型：

第一類是炮台，共有五項之多。A 標註的是聖母山，也就是今天大炮台的所在地，外觀形狀和實際大炮台非常相似。這種多邊形炮台的外形結構，是歐洲炮台的主要形制，四角外突，安置火炮，視野好，投射角度大，易守難攻。B 是東望洋炮台，C 是西望洋炮台，D 是燒灰爐炮台，E 是聖地亞哥和聖菲利普炮台。這幾個炮台在地圖中的描繪，基本符合實際炮台的構造和外型，但是已經出現了符號化的傾向，譬如東望洋炮台由於山體的變化，它的外形並不是十分規則的，但是我們在地圖上看到的是一個縮小版的大炮台的圖形。這有可能與 F・弗羅傑未能就近觀察此炮台有關，他只能通過在平地上的觀察來繪製炮台建築外形。

第二類是與中國人相關的地方，共有三處。

F 是有中國寶塔的媽閣廟；G 是望廈村，是中國人生活居住的村落；H 是有中國士兵把守的關閘。

第三類是澳門半島之外的地方，有兩處。I 是青洲，此時的青洲尚是一個獨立的小島；K 是安菲特里忒號的錨地，位於內港靠近“對面山”一側，而靠近澳門的一側繪有兩隻船錨的圖形。最後是製圖者 F・弗羅傑的簽名。

作為地圖主體的澳門城區並沒有被標註。它位於地圖的中心位置，繪以紅色，構成了整幅地圖的視覺中心。澳門城區位於東望洋山與西望洋山之間，地勢較為平坦，南北環山，東西臨海。南北較寬，中間略微狹窄，地勢平坦開闊，適合居住和生活。地圖中的澳門城區採用了大塊分割街區的繪製手法，概括而整體，基本採用了符號化的手法，整齊的東西及南北走向的街道，並不符合澳門城市的實際情況。澳門的城市佈局，基本上是圍繞教堂分佈展開的，保留了歐洲中世紀城區肌理的特點。

F・弗羅傑在他的書中這樣描述澳門：“只有澳門城東西處建有城牆；街道一點都不直，忽高忽低地胡亂穿過，而且很狹窄。”[10] 可以看出，他是了解澳門城區的。地圖中澳門城區的繪製，反映了 F・弗羅傑對於綜合製圖的運用與把握。

> 這座城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任何防禦，但由於荷蘭人圍攻了它，中國人允許葡萄牙人在那裡設防。其中聖母山［大炮台］、雪地聖母［東望洋炮台］、聖母誕［燒灰爐炮台］、聖地亞哥與聖菲利普炮台[11] 防守着港口的入口，是最為重要的炮台，其中一個完全是從岩石中挖鑿出來，那裡的大炮大多發射 18、36 和 48 鎊的炮彈。[12]

如果仔細觀察這張地圖，我們會發現地圖中一共標示了六個炮台，但是第六個炮台卻沒有在圖例目錄中出現，它就是嘉思欄炮台。嘉思欄炮台建於 1629 年，其後在十八世紀末被改建為嘉思欄兵營。炮台的名字是為了紀念一艘名為嘉思欄（*Gallias*）的葡萄牙戰船，這艘戰船在1622年抵抗荷蘭人入侵澳門時被擊沉。嘉思欄炮台的位置十分重要，儘管它海拔比較低，但是它和燒灰爐炮台一起，一南一北共同扼守南灣這片港口和海域。

顯而易見，F・弗羅傑隨船來到澳門的時候，嘉思欄炮台就已經存在了，在他繪製的地圖裡，嘉思欄炮台被仔細地繪製成面向南灣的一座半弧形建築，它的後面是蜿蜒的城牆，而它位於城牆東南面的盡頭。儘管 F・弗羅傑在地圖上已經非常明確地標示了這個炮台，但是在圖例目錄中唯獨缺少了這個炮台。

根據以上的分析和比較，可以看出 F・弗羅傑在繪製這張地圖時，除了澳門城區以外，他關注最多的就是軍事設施，共佔了十項圖例中的六項：五座炮台和一面隔離牆——關閘。當然，港口、錨地也非常重要，同樣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據他在書中所說，當時澳門有耶穌會、道明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和聖嘉辣女修會，總共建有十所教堂之多，但是這幅地圖卻絲毫未標示它們。因此，這張地圖的軍事重要性顯而易見，F・弗羅傑的關注點體現了地圖的功能性，畢竟地圖帶有很強的軍事目的，它是一國對於某一地區的勢力影響和實際控制的體現。這反映了當時的海洋貿易是以軍事實力作為基礎的，沒有強大的堅船利炮作為後盾，就不可能實現跨洋的遠洋貿易，因此當時的商業船隊都是軍事化的船艦，一般配備有幾十門加農炮。澳門作為中西海上貿易的重要節點，自然被海上列強所窺視，反映了澳門當時在中西貿易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安菲特里忒號於 1698 年首航中國，至 1699 年時還在澳門或廣州，直到 1700 年 1 月 28 日才啟程回法國。根據地圖標註的時間推斷，《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應該繪製於 F・弗羅傑在澳門或廣東逗留期間。

《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的繪製是否參考了葡萄牙地圖，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根據F・弗羅傑的遊記來看，他顯然是了解澳門的。他曾親自登岸考察澳門半島，這幅地圖的繪製是基於他自己的測繪數據。鑑於葡萄牙對地圖一貫的保密策略，F・弗羅傑很可能無法參照已有的葡萄牙地圖。無論如何，F・弗羅傑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是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現代地圖學意義上最早的澳門城市地圖。

五、異曲同工：《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的比較研究

目前發現的F・弗羅傑繪製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手稿一共有三幅。除了上文提到的一幅（見圖4，下文稱“地圖一”）之外，還有另外兩幅分別收藏在法國和葡萄牙。法國國家圖書館平面圖和地圖部收藏的另一幅手稿，本文稱“地圖二”（圖5）；葡萄牙阿茹達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收藏的手稿，本文稱“地圖三”（圖6）。

地圖二的紙質較薄，紋理細膩，無明顯肌理，立式構圖，有浮水印。該圖有明顯的破損，上部中間有兩厘米左右的撕裂，右上角缺損。

這幅地圖沒有標註年份，以粗細線條裝飾圖廓，邊框較窄。它在構圖上和地圖一不同，它的圖例說明在左上角，沒有邊框，玫瑰風羅盤在左下角，呈八角十六個方向。畫面中間部分有淡淡的方格輔助線，位於玫瑰風中線與圖例說明之間，具有草圖的特徵。

圖例包括了從A到K十個字母，其中缺少J項。由於地圖標題採用了酸性的墨水，使得紙質變脆，以致出現了字體部分被腐蝕鏤空的情況。灣仔和澳門半島分列地圖兩側，在澳門城區南邊和西望洋山之間有一個十字架，這是地圖一所沒有的。地圖採用以黑色線條勾勒，墨色和彩色渲染的手法。黑色描繪山體陰影和海岸線的陸地部分；綠色沿着海岸線襯托水體部分。海面整體明度較低，陸地明度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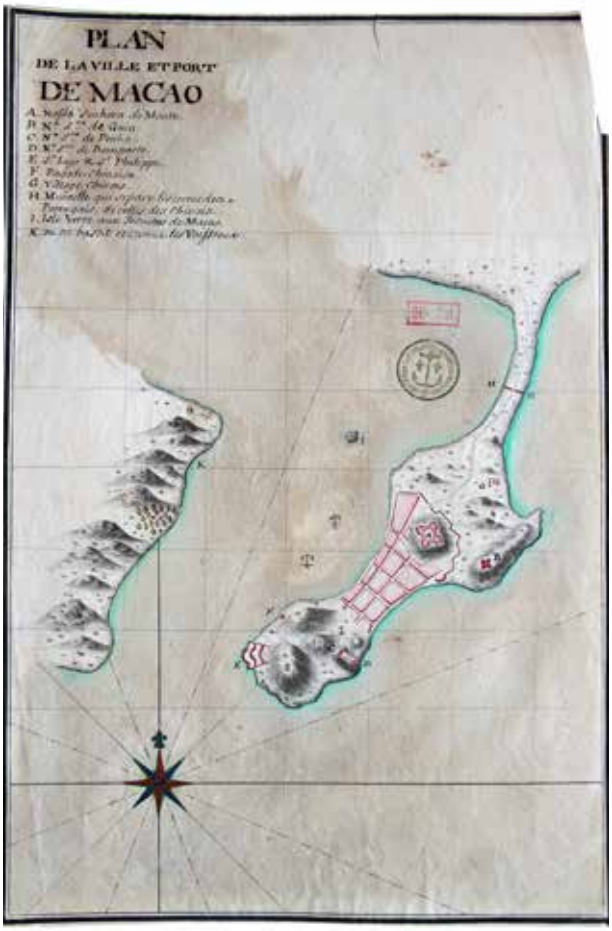


圖5.《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地圖二），法國國家圖書館平面圖和地圖部藏，編號：GE SH 18 PF 179 DIV 12 P 2 D。（圖片來源：筆者攝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表三．法國國家圖書館平面圖和地圖部收藏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地圖二）資料

標題	《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
種類	手繪彩色地圖
製圖師	F・弗羅傑（1676—171？）
繪製日期	17？？年
語言	法語
尺寸	35厘米×23.5厘米
資料來源	法國國家圖書館平面圖和地圖部 編號：GE SH 18 PF 179 DIV 12 P 2 D



圖 6.《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地圖三），葡萄牙阿茹達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藏，編號：3687800354367H。（圖片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組複製提供）

表四.《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地圖三）資料

標題	《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
種類	手繪彩色地圖
製圖師	F・弗羅傑（1676—171 ？）
繪製日期	1698 年
語言	法語
尺寸	內圖：29 厘米 ×20 厘米 紙張：34 厘米 ×22 厘米
資料來源	葡萄牙阿茹達圖書館 編號：3687800354367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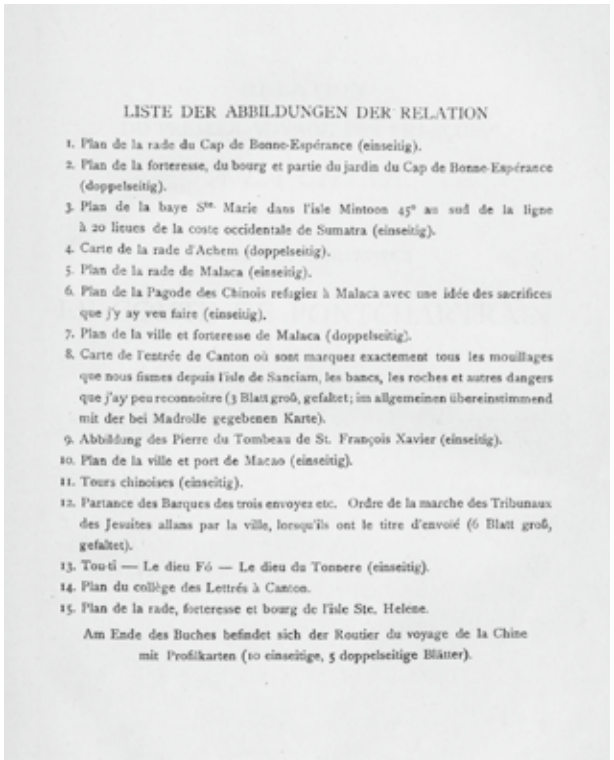
地圖三選自 F・弗羅傑《法國人的第一次中國之行 1698、1699 和 1700 年寫於安菲特里忒號船上》中的第 64 頁的手稿插圖（圖 7）。[13]

地圖三的紙質較薄，以至於背面文字透於紙面，紋理細膩，無明顯肌理，立式構圖，以粗細線條裝飾圖廓，留邊較寬。地圖三在構圖上和地圖二相似，但是它的圖例說明在右下角，呈方形，裝飾有粗細線條的邊框，玫瑰風羅盤在左下角，呈八角八個方向，有圓環外圍裝飾。

地圖三把標題中的“MACAO”拼寫為“MACAÖ”，圖例同樣包括了從 A 到 K 十個字母，並缺少 J 項，和地圖一、地圖二相似。灣仔和澳門半島分列地圖兩側，在澳門城區南邊和西望洋山之間有一個十字架。此外，地圖三同樣採用了以黑色線條勾勒，墨色和彩色渲染的手法。黑色描繪山體陰影和海岸線的陸地部分；綠色沿着海岸線襯托水體部分。由於用色及年代久遠，整個畫面泛黃，較暗淡。

這三幅地圖都出自 F・弗羅傑之手，其內容、繪製方法和風格基本相同，但在細節上還是有些差異。從構圖上看，三幅地圖各有不同：地圖一是橫構圖，地圖二及地圖三是豎構圖。它們繪製的內容相同，擺放的位置卻不一樣，主要體現在圖例框和玫瑰風羅盤。三幅圖的圖例框或者在左上角，或者在右下角，都是畫面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右下角在書寫與藝術作品中往往是簽名的位置，有一種制衡的作用，有利於構圖的平衡和畫面的完成感。左上角在繪圖與繪畫藝術中是光線的入射角，非常醒目，能引起觀者的注視。玫瑰風羅盤在三幅地圖中，或者在右上角，或者在左下角，相對位置沒有圖例框那麼重要，主要起參考和裝飾的作用。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上北下南的地圖方向，在十七世紀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共識。

這三幅地圖都具備了現代地圖的一些基本要素。它們的圖例說明完全一致，都缺少了“J”這一項。這並不是製圖者的疏忽或者遺忘，而是該圖例序號採用的是拉丁字母的緣故，當時



LISTE DER ABBILDUNGEN DER RELATION

1. Plan de la rade du Cap de Bonne-Espérance (einseitig).
2. Plan de la forteresse, du bourg et partie du jardin du Cap de Bonne-Espérance (doppelseitig).
3. Plan de la baye S^te. Marie dans l'isle Mintoon 45° au sud de la ligne à 20 lieues de la coste occidentale de Sumatra (einseitig).
4. Carte de la rade d'Achem (doppelseitig).
5. Plan de la rade de Malaca (einseitig).
6. Plan de la Pagode des Chinois refugiez à Malaca avec une idée des sacrifices que j'y ay veu faire (einseitig).
7. Plan de la ville et forteresse de Malaca (doppelseitig).
8. Carte de l'entrée de Canton où sont marquez exactement tous les mouillages que nous fismes depuis l'isle de Sanciam, les bancs, les roches et autres dangers que j'ay peu reconnoitre (3 Blatt groß, gefaltet; im allgemeinen übereinstimmend mit der bei Madrolle gegebenen Karte).
9. Abbildung des Pierre du Tombeau de St. François Xavier (einseitig).
10. Plan de la ville et port de Macao (einseitig).
11. Tours chinoises (einseitig).
12. Partance des Barques des trois envoyez etc. Ordre de la marche des Tribunaux des Jesuites allans par la ville, lorsqu'ils ont le titre d'envoié (6 Blatt groß, gefaltet).
13. Tou-ti — Le dieu Fó — Le dieu du Tonnere (einseitig).
14. Plan du collège des Lettrés à Canton.
15. Plan de la rade, forteresse et bourg de l'isle Ste. Helene.

Am Ende des Buches befindet sich der Routier du voyage de la Chine mit Profilkarten (10 einseitige, 5 doppelseitige Blätter).

圖 7.《法國人的第一次中國之行 1698、1699 和 1700 年寫於安菲特里忒號船上》地圖目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片來源：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930599m/f13.item#, Public Domain)

拉丁字母中還沒有“J”這一字母。

作為拉丁語系的法語深受拉丁語的影響，拉丁語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都是歐洲社會溝通和傳播宗教的最重要的語言。拉丁字母是多數歐洲語言採用的字母系統，也是世界上最通行的字母文字系統。拉丁字母作為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成果之一，隨着征服者推廣到西歐廣大地區，從基督教早期傳播的希臘化開始，到中世紀，直至文藝復興以後，拉丁語作為基督教傳播的官方語言，在文字的傳播中擔任了重要角色。這種現象隨着大航海時代基督教的全球性傳播，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傳播，拉丁語及其字母體系向不同的文明和國家擴散。

1539 年 8 月，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頒佈了《維萊科特雷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將法語作為官方的第一語言，取代了拉丁語。這一決定促進了基於拉丁語詞源的拼寫同質化，推動建立法語的書面語言和法語現代化的進程。

1635 年，紅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創建了法蘭西學院，進一步規範、完善法語，規定官方和學術書面語言的規則和拼寫，考慮到用法資源和語音的限制，法蘭西學院在其 1694 年的第一版字典中使用官方拼寫，後在 1718 年的第二版詞典中，系統引入了字母 J 和 V 來代替不發音的字母，直到這時才從根本上區別了字母 I 和 U 的書寫。可以看出十七至十八世紀東方航線的開拓時期，正處於拉丁語向法語過渡的階段，法語字母中尚未出現“J”，才會出現《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中圖例說明缺少 J 的現象。

同樣地，澳門的拼寫也是如此。在拉丁語的延伸字母中，我們可以看到“Ö”的書寫方式，這種書寫方式在現代法語中並不常見，應該是借鑑了其他的語言或者作為發音的一種標註出現在早期的《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中。

這三幅澳門地圖都是正南北的構圖，玫瑰風羅盤都採用了八角的形狀，裝飾的形式和方向的多寡上有所不同：地圖一採用了環形的裝飾，地圖二用線條來標註方向，地圖三則採用了環形和線性結合的手法。地圖內容上基本相同，澳門城區採用了 16 塊矩形幾何體來表示，街區和道路概括簡練。炮台和村落都用統一的符號來標示，唯一不同的是在地圖二和地圖三中，在城區的南邊標有一個十字架，疑似聖老楞佐堂（Igreja de São Lourenço）[14]，我們在同一時期由 F・弗羅傑繪製的《澳門天際圖》（*MACAÖ*）中也能看到它的存在。

如 F・弗羅傑書中所述，繪製地圖是他中國之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其書記載他在致海軍部長及國務卿龐恰特雷恩伯爵（Le Comte de Pontchartrain）的信裡寫道：



圖 8. 地圖一和地圖二對比圖（圖片來源：筆者攝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 當我有幸向您提呈本人初航麥哲倫海峽紀行，您善意地為我謀得這個前往中國的機會，叮囑我也要寫一部中國紀行。辭行之際，閣下，您明確指令，要我為您就這次遠航編寫回憶錄，並精確測繪我們沿途所有逗留的城市和地點的地圖和平面圖。[15]

這三幅《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都繪製於 1698 至 1700 年的中國之行期間，由於地圖的功能與作用不同，所以繪製的時間先後略有不同。我們可以從紙質、文字、內容和完整性來分析它們的先後順序。

地圖二和地圖三無論是圖廓的位置、玫瑰風羅盤的畫法，以及圖中十字架的標註都極為相似。其中地圖三的標題“MACAO”採用的是拉丁字母“Ö”，和其他的兩幅地圖不一樣。地圖一和地圖二則採用了規範的法語拼法“MACAO”，顯然地圖面向的使用者不同了，製作者是為回國後的製版印刷做準備。

從細節上看，地圖二和地圖三的山體和海岸線都是用墨色渲染，再用小點、小圈加強。製圖者採用渲染的方式來表現地形起伏和明暗。它們作為手繪地圖，很好地表現了地貌的高程和邊界。地圖一則採用短線條排列的畫法，通過線條的疏密來表現明暗，這種手法適合用於後期的製版印刷。鑑於地圖二和地圖三的紙質都非常薄，地圖二作為草圖便於複製、臨摹，從這一點來看，其功能和紙質是相吻合的。

筆者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研究期間，對於地圖一和地圖二這兩幅地圖的相似性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地圖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通過燈箱對這兩幅地圖進行比對，發現這兩張地圖中的地貌、海岸線和建築輪廓如出一轍，完全吻合。說明地圖一複製於地圖二，地圖一是一幅完成度較高的終稿，是用於製版印刷的地圖。

結論

以上三幅《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都是由 F・弗羅傑繪製於 1698 至 1770 年的中國之行期間，其互相關係大致可以判斷如下：地圖三作為《法國人的第一次中國之行 1698、1699 和 1700 年寫於安菲特里忒號船上》手稿中的插圖，是作者在中國之行期間的記錄，其資料來源於實地考察和其他的參考地圖，是三幅地圖中完成較早的地圖之一；地圖二繪製於同一時期的單頁地圖版本，其較薄的紙張和格子輔助線方便複製，它的作用相當於初稿；地圖一則是在此基礎上的最終完成稿，用於回國後的製版和刻印。因此，製作者在地圖三的紙張選擇、繪製方法和細緻的程度上與其他兩幅地圖有所不同。其採用了單線勾勒、短線排列、點線結合的手法，方便製版師在銅板或石板上刻製。

《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內容明確，標註清晰，畫面簡潔，敷色淡雅，體現了 F・弗羅傑繪製地圖的審美品位及藝術修養，也反映了十七世紀法國整體地圖繪製的水平和港口城市的繪製風格。從地圖繪製的細節可以看出繪製

者的豐富專業經驗和綜合製圖能力。《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是一張城市平面圖，有着極強的軍事功能性質，反映了當時各海洋強國在東西方貿易中的角力，以及澳門作為“廣州外港”和中國門戶的重要地位。《澳門城市與港口地圖》是現代地圖學意義上最早的澳門城市地圖。它的出現形成了澳門城市地圖特有的風格和傳統，為澳門地圖的形制與風格奠定了基礎，對以後的澳門地圖繪製與印刷出版產生廣泛影響。

附：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 年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十七至十九世紀法國手繪澳門古地圖研究”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清] 印光任、張汝霖撰，趙春晨校：《澳門記略校註》，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21 頁。
2. 參見《故宮文物月刊》編輯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故宮文物月刊》2011 年總第 343 期，前言頁。
3. 白晉，一名白進，字明遠，耶穌會法國傳教士。他於 1656 年 7 月 18 日生於法國勒芒（Le Mans），1678 年加入耶穌會，1685 年被路易十四選派出使中國傳教，出發前被授予“國王數學家”稱號，入法國科學院為院士。他於 1687 年進入中國，1693 年被康熙派回法國，招募精通科學的西方科學家、藝術家，1698 年率領另外九位新“國王數學家”隨安菲特里忒號來中國，1732 年 7 月 28 日於北京離世。
4.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410 頁。
5. 十位耶穌會士包括：白晉、翟敬臣（Charles Dolzé, 1663–1701）、南國光（Louis Pernon, 1664–1702）、利聖學（Jean-Charles-Etienne de Broissia, 1660–1704）、顏伯理（Philibert Geneix, 1667–1699）、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以及建築雕塑家衛嘉祿（Charles de Belleville）和意大利畫家聶雲龍（Giovanni Gherardini）。
6. Charles Meyer, *Histoire des Français en Chine (1698–1939)*, Paris: Éditeur You Feng, 2009, p. 11.
7. François Froger, "Discription de Macao", in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pp. 68–69.
8. François Froger, "Discription de Macao", in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p. 68.
9. 高俊：《地圖學尋跡・高俊院士文集》，北京：測繪出版社，2012 年，第 91 頁。
10. François Froger, "Discription de Macao", in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p. 68.
11. 書中採用了法語的聖母“Notre Dame”和聖地亞哥“S.t Jacques”，和圖中的不同。
12. François Froger, "Discription de Macao", in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p. 68.
13. François Froger, "Liste der Abbildungen der Relation", in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14. 聖老楞佐堂，也稱風順堂，是澳門最古老的三座教堂之一，位於今風順堂街。
15. François Froger, "Einleitung", in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抗戰時期粵劇在澳門的傳播——以報紙廣告為中心的考察

王忠 * 盧雪純 **

摘　要 澳門是中國最早發展報刊業的地區之一。早在十九世紀，粵劇廣告的身影就出現在澳門的報紙上。抗日戰爭爆發後，因澳門“中立”的特殊環境，原本活躍在省港等地的戲班演員紛紛移師澳門，粵劇的繁榮中心也轉移到了澳門。粵劇市場激烈的商業競爭蔓延到報紙，戰時的粵劇廣告因戲院產業經營變動、社會時局變化等呈現出複雜多變的面貌。對於澳門粵劇商家而言，報紙是最富有活力的營銷傳播媒介，給商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刊登平台，以便快速招攬觀眾。對於報業而言，粵劇廣告是主要的、穩定的廣告費來源，也因市民對於粵劇的喜愛和追捧，進而刺激了報紙的銷量，促進了報業的繁榮，二者可謂是互相成就。這些浩如煙海的粵劇廣告，是澳門粵劇市場變遷的實物見證，曲終人散後，今人依舊能從字裡行間，窺得戰時粵劇中心的芳華。

關鍵詞 澳門粵劇；廣告；報紙；傳播

一、澳門報業與粵劇的結盟

（一）澳門報業的起源發展

在近代中國，報紙是廣告的主要載體，一個地方廣告業的發達與否與報業息息相關。澳門是近代中國報刊的發源地，也是中國最早出現新聞事業的地區之一，在中國報業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1822 年 9 月 12 日創刊的《蜜蜂華報》是澳門歷史上首份報紙，也是中國境內首份外文報紙和最早的近代報刊。1893 年 7 月 18 日，孫中山的友人飛南第（Francisi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創辦了葡漢雙語的《鏡海叢報》，這是澳門最早期的中文報紙之一。《鏡海叢報》時常刊登一些抨擊時局、宣傳革命救國思想的文章，長篇累牘地報導中日甲午戰爭等重大時事，是愛國報紙的先鋒。《鏡海叢報》設有“中外報”“本澳新聞”“省港報”等多個欄目，為讀者了解澳門本土以及海內外的新聞和風土人情提供了平台。《鏡海叢報》中文版出版發行了兩年左右，時間並不算長，但它與資產階級革命派關係密切，見證了孫中山先生在澳門的行醫經歷和革命之路，以及晚清澳門社會的變遷，是研究晚清澳門歷史和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史料。

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知新報》於 1897 年正式出版，該報由澳門巨賈何廷光出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籌備運營，是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輿論陣地。清末時期，葡萄牙雖已取得澳門的管治權，但本地華人並未偏安一隅，反而因為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政治背景，匯聚了多方勢力，並在中國近代革命活動中擔當了關鍵角色。正因如此，清末民初澳門中文報紙的創辦與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關係很大。然而，政治並不是當時報業唯一的主題。澳門地方狹小，工商業並不發達，煙、賭、娼行業卻畸形發展，跑狗場、舞場、戲院等娛樂場所生意興隆，更被稱為“遠東蒙地卡羅”。因此，報紙上不乏一些娛樂報導，以及與之相關的各色廣告。

* 王忠，博士，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文化產業、非物質文化遺產、科學社會學研究。

** 盧雪純，澳門城市大學文化產業管理課程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文化產業、戲劇產業研究。

（二）早期報紙上的澳門粵劇廣告

以《鏡海叢報》為例，該報紙的廣告集中在“本澳新聞”欄目。廣告內容大約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其一是醫藥廣告，主要宣傳外科醫生醫術與藥品；其二是商品廣告，主要是及時更新火油等商品的價格；其三是粵劇廣告，主要告知本澳民眾粵劇演出的時間和地點。

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五(1894 年 10 月 3 日)，《鏡海叢報》刊登了一則《集款酬神》廣告，曰：

> 現在澳中商店議集鉅資酬神演醮，約需五大千金，僱召名班，金龍彩色各處巡行務極一時之耀，定本月十二舉行。[1]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三(1894 年 10 月 31 日)，《鏡海叢報》刊登了《演戲酬恩》廣告。原文如下：

> 連日蓮峰廟僱有國豐年名班開演，藉以酬答神恩。計訂戲四本，戲金一千四百元，所收回各費約僅千元云。[2]

顯然，清末時期，澳門的中文報紙上已經出現了粵劇廣告的身影，報刊業與粵劇廣告結合的時間幾乎與中文報紙的出現同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粵劇在澳門華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與傳統靠人力走街串巷地散播廣告相比，報紙大大提高了澳門粵劇廣告的傳播效率和傳播範圍。此外，《鏡海叢報》還時常報導一些清平戲院的逸事，例如貴婦將貌美的粵劇小生認作乾兒子，這些都可以視為報紙對戲院的另類宣傳。比之廟宇、戲棚，清平戲院更加需要，也更依賴報紙這樣的近現代傳媒手段，因為酬神演出幾乎是慈善性質的，而清平戲院作為商業演出場所則需要盈利。在經營壓力的驅使下，澳門戲院與報業的關係越來越緊密。有賴於澳門良好的報業基礎，到了抗戰時期，隨着粵劇市場的擴大，戲院廣告刊登量大幅上升，成為了澳門報紙上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

（三）抗戰時期刊登粵劇廣告的報紙

1937 年至 1945 年期間，澳門中文報業進入了一個複雜的時期。當時的通訊手段並不如今天發達，報紙是澳門最主要的傳播媒介，具有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也是愛國者的喉舌。日本特務機關勢力進入澳門後，採取扶持漢奸辦報等多項手段，試圖控制澳門報業，宣傳其所謂的“大東亞共榮”等荒謬思想，企圖為日本的暴行塗脂抹粉。一些不願意被日寇收買的報紙在特務機關的迫害和經濟封鎖下被迫停刊。另一方面，澳門同胞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以《華僑報》為代表的報業，與日偽漢奸扶持的報紙進行了長時間的鬥爭，承擔了幫助澳門民眾了解抗戰真相的工作，對愛國新聞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抗戰時期，澳門發行過的、可查證的，且較為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報紙，主要有《華僑報》[3]《大眾報》[4]《西南日報》[5]和《市民日報》[6]。這四家報紙均刊登過數量可觀的澳門粵劇廣告，下文將對在報紙上刊登過粵劇廣告的商家、粵劇廣告投放情況及澳門粵劇廣告的發展歷程進行分析。

二、報紙上的粵劇廣告商家概況

（一）刊登粵劇廣告的商家

抗戰時期，在報紙上刊登粵劇廣告的商家以戲院為主（參見表一）。除此之外，南灣遊樂場也曾在一段時期內短暫地刊登過粵劇廣告。澳門的戲院通常是綜合性娛樂場所，兼具電影放映、粵劇演出、話劇表演、交響樂演奏等多重功能。澳門這片彈丸之地，在抗戰時期有清平戲院、域多利戲院、南京戲院、平安戲院、國華戲院、海鏡戲院、樂斯戲院和新橋娛樂戲院等近十家戲院營業，可見當時娛樂市場之盛。

表一. 抗日戰爭期間刊登過粵劇廣告的商家（不完全統計）

廣告商家	營業年份	簡介
清平戲院（圖 1）	1875—1992	清平戲院是澳門第一家專演粵劇的戲院，[7] 戲院地址位於清平直街。戲院在戰時與粵劇演員合作組建了錦繡劇團、新青年男女劇團等多個劇團，常有慈善戲劇於清平演出。因戰後戲班紛紛離澳，清平戲院生意大不如前，後改以放映電影為主。
域多利戲院（圖 2）	1910—1971	域多利戲院以放映歐美進口片為主，戲院地址位於新馬路與營地大街交界處，是澳門第一家放映有聲電影的戲院。1935 年 5 月修葺後，院內增設賭場、夜總會和餐廳。[8] 抗戰時期，戲院與演員合作組建了鳴聲男女劇團、域多利劇團等多個劇團，也時常有粵劇大班來此臨時演出。
海鏡戲院（圖 3）	1930—1952	海鏡戲院位於原下環街市二樓，以放映港產片為主，時常在電影放映前增加幻術、歌舞等表演，吸引觀眾。抗戰時期，海鏡戲院除了粵劇演出外，也公演話劇。戲院結業後，街市也遷至附近李加祿街。[9]
國華戲院（圖 4）	1931—1998	國華戲院最初由中葡商人合資創辦，地址位於板樟堂街 38 號。戲院開幕首映外國影片《愛的巡禮》（*Love Parade*）。[10] 澳葡當局曾對全澳戲院實行分級，國華戲院因設備先進及電影品質高，被評為一級戲院。戰時，院方與平安妹等人合作組建“國華劇團”。戲院歇業後，其主體建築被保存並活化為國華戲院商場。
平安戲院（圖 5）	1935—1993	平安戲院位於新馬路，樓高四層，共有座位 1,038 個，為澳門第一座“現代電影院”，[11] 早期以放映電影為主。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平安戲院被富商何賢買下，改建後以演出粵劇為主。戲院與任劍輝、譚蘭卿等人合作組建了“平安劇團”，因其設有專門的編劇部，時常創作新編戲。劇團成員也活躍於澳門義演籌款活動。
南京戲院（圖 6）	1933—1955	南京戲院位於沙梨頭海邊街南京街市三樓。戲院主要面向華人觀眾，放映有聲及無聲電影。戰時由何非凡領導的新青年男女劇團曾在此駐演。上世紀五十年代，南京戲院在停業後被改建為工人康樂館。
樂斯戲院（圖 7）	1940—1970	樂斯戲院位於沙梨頭海邊街，是一家“二輪”戲院，票價低廉，放映的電影以粵語片、西語片為主。戲院在戰時也安排歌舞等現場演出，偶有粵劇演出，但大部分檔期還是放映電影。
南灣遊樂場（圖 8）	1941—1949	1941 年，南灣遊樂場設立露天劇場，地址位於南灣大馬路。劇場演出過《鍾無豔》等粵劇。除了粵劇外，南灣劇場還有新派劇、平劇（京劇）演出。該劇場的具體結業時間不詳。



圖 1 . 清平戲院粵劇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1938 年 8 月 12 日，第 3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2. 域多利戲院粵劇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1942 年 1 月 25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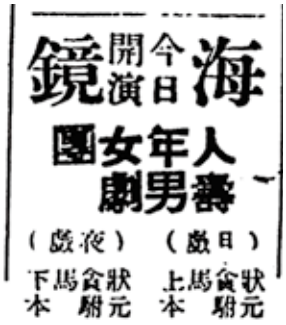


圖 3. 海鏡戲院粵劇廣告（圖片來源：《西南日報》1942 年 2 月 19 日，第 4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4. 國華戲院粵劇廣告（圖片來源：《大眾報》1942 年 8 月 5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5. 平安戲院粵劇廣告（圖片來源：《大眾報》1943 年 5 月 12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6. 南京戲院粵劇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1942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7. 樂斯戲院粵劇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1942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8. 南灣遊樂場粵劇廣告（圖片來源：《大眾報》1941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筆者複製提供。）

（二）粵劇廣告商家的雙重經營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澳門只有清平戲院專演粵劇。正如該戲院曾在廣告上宣傳的“全澳獨我清平一家演大戲”，[12] 其他戲院當時基本以放映電影為主，偶爾有粵劇上演，國華戲院還曾一度改名為“國華有聲電影院”，不涉及粵劇演出業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澳門成為了粵劇中心城市。因粵劇市場火熱，加之戰時交通中斷，電影片源緊缺，原本以放映電影為主的國華、域多利等戲院順勢轉型，增加了粵劇演出業務，以滿足當時民眾的觀劇需求。因此，當時的粵劇廣告商家通常也是電影廣告商家，報紙上時常出現一家戲院的電影、粵劇廣告並存的現象。例如，1943 年 4 月 17 日《大眾報》上的平安戲院廣告（圖 9），右半邊是電影《美國暗殺黨》廣告，左半邊是粵劇《野花香》廣告。因為資料有限，現已無法考證在一家戲院內粵劇演出與電影放映的場所是分開，還是有所重合，但諸如南京戲院這樣的小戲院，總面積只有一層樓，大部分空間都被電影銀幕和音響設備佔據，粵劇演出的地點很有可能是在放置銀幕前的小舞台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光影藝術與南國紅豆，在澳門的戲院舞台上交錯，和諧共存。



圖 9. 平安戲院電影、粵劇廣告（圖片來源：《大眾報》1943 年 4 月 17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三）短期粵劇廣告商家——南灣遊樂場

在所有的粵劇廣告商家中，南灣遊樂場是唯一的室外劇場，也是持續刊登廣告時間最短的商家。南灣遊樂場位於澳門半島一處填海而成的空地上，場地開闊，時常有流動的馬戲團、雜技團等來此演出，場內還有小吃店、大排擋和遊戲攤等，是平民休閒玩樂的常去之地。1941 年夏季，南灣遊樂場以“夏夜樂園”為招牌開演粵劇。與裝修華麗精緻的戲院不同，南灣遊樂場是露天劇場，場地較為簡陋，票價也相對廉價，僅為兩毫半。從1941 年 7 月 11 日《大眾報》的廣告上可知，這一天的南灣遊樂場日夜演出粵劇，日場為下午一時到五時，夜場為晚上七時到十一時兩場。澳門夏季天氣炎熱，當時的戲院還沒有冷氣機，只能用風扇散熱。酷暑難耐，人們習慣晚上出來納涼，南灣遊樂場這樣的室外劇場就有一些優勢；到了冬季，在露天寒風中看戲令大多數觀眾無法忍受，南灣的粵劇演出生意也就維持不下去，粵劇廣告隨之消失。南灣劇場的經營為何會如此短暫？對於粵劇來說，室外演出其實是很常見的，神功戲的演出地點基本都設在廟宇空地或是廣場上。但與神功戲不同的是，南灣劇場演出的粵劇並非神功戲，而是娛樂性質的劇碼，換言之，南灣的演出是商業性質的，觀眾需要付門票費，不像神功戲可以任人免費觀看。因此，南灣劇場失敗的背後是其無法滿足澳門觀眾對於商業劇場的要求，這種要求不僅是指外部的裝修，更有演出的品質。中山大學黃純博士在《晚清民國時期廣州粵劇城市化研究》一書中提到：

> 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勝，戲院首先在演出環境的改善和新興舞美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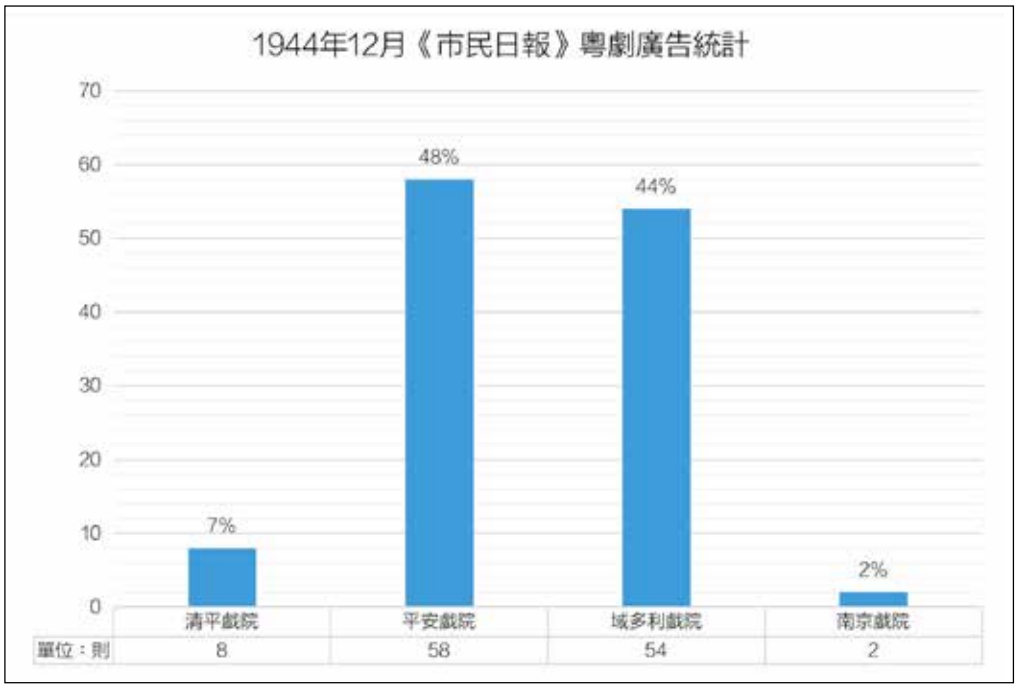


圖 10. 1944 年 12 月《市民日報》粵劇廣告統計（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 的引進上下功夫，以此來提升競爭力。由於戲院環境的好壞與營業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有條件、有經濟能力並善於經營的戲院都力圖改善其觀劇環境，在空氣、衛生、安全、佈景等方面予以改進，以圖號召更多座客。[13]

南灣劇場在演出環境、演員陣容、技術等方面都很難與大戲院媲美。因此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自然會被淘汰。

三、粵劇廣告的投放

抗戰期間，澳門各大戲院凡有粵劇演出，幾乎都會在報紙上刊登粵劇廣告。為搶佔市場先機，清平等大戲院更是幾乎期期不落，日日更新，佔據着報紙醒目的版面。綜合粵劇廣告刊登版面、頻率、數量等因素，清平戲院和平安戲院二分天下，堪稱“劇壇雙璧”，是刊登粵劇廣告數量最多的兩家戲院。通常清平戲院、平安戲院一天會刊登 2 至 3 則粵劇廣告，包括日間演出、夜間演出、預告，平均一年的粵劇廣告數量在 500 至 700 則左右。國華、域多利戲院、南京戲院則稍遜一籌，平均一年的粵劇廣告數量在 200 至 400 則左右。海鏡戲院、樂斯戲院等則更加少一些，平均一年的粵劇廣告數量在 50 至 100 則。

（一）廣告投放與演出的關聯

域多利戲院在戰前主營電影，戰後也依然如此，粵劇演出並不頻繁。比較特殊的是，域多利戲院的粵劇廣告在 1944 年 10 月之後迎來了一個高峰時期，投放的廣告數量驟然上升。以 1944 年 12 月的《市民日報》為例，這個月該報一共發行了 31 期報紙，經過統計，報紙上的粵劇廣告有 122 則（圖 10），其中清平戲院廣告有 8 則，約佔 7%；平安戲院的廣告有 58 則，約佔 48%；域多利戲院的廣告有 54 則，約佔 44%；南京戲院的廣告有 2 則，約佔 2%。在這一個月中，域多利戲院的廣告與平安戲院平分秋色，穩穩壓過了以粵劇專業劇院著稱的

清平戲院。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清平戲院在 1944 年進行了裝修改建，暫停營業，原本在清平戲院的演出有很大一部分都轉移到了域多利戲院；二是 1944 年域多利戲院與廖俠懷、盧海天、小飛紅等演員合作組建了域多利劇團，該劇團在域多利戲院演出了大約兩個月，上演了《啼笑因緣》《乞錢還花債》《叔嫂恩仇》等一批劇碼。1945 年初，域多利劇團解散之後，由譚蘭卿領導的花錦繡劇團又在域多利戲院駐場演出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可以推測，從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4 月，域多利戲院可能停止了電影放映業務，它的電影廣告也幾乎絕跡，戲院應該是專心經營粵劇。直到 1945 年 5 月，該戲院的粵劇演出才告一段落。

（二）不同戲院的廣告投放情況

粵劇廣告刊登的頻率、數量、版面等，既能反映出各家戲院的檔期和經營狀態，也可以從中推測一家戲院的廣告營銷投入。一般而言，戲院的規模大小、資金的雄厚程度，與廣告營銷的投入呈正相關。以清平戲院和海鏡戲院為例，清平戲院位於澳門的繁華地帶，周邊娛樂業發達，戲院分為上下兩層，共一千三百多個座位，是當時最高級的戲院之一。清平戲院根植澳門已久，底蘊深厚，許多演員和劇團時常慕名來此演出，戲院生意紅火，清平戲院的經費因此相對充足，在廣告的投入上也是毫不吝嗇。清平戲院刊登在報紙上的廣告風格多變，圖文並茂，還不時出現“霸佔頭版”的現象。例如在 1943 年 1 月 15 日的《華僑報》上，清平戲院的《冇天裝》粵劇廣告和《玉蟾蜍》粵劇廣告直接佔據了緊鄰報頭的最佳位置。平安等其餘戲院的廣告，則被安排在了報紙的第四版。

另一方面，海鏡戲院被稱為“坊眾戲院”，主要服務對象是平民小販。該戲院規模較小，戰時還一度停止營業。海鏡戲院的報刊廣告位置一向比較靠後，版面也比較小，廣告內容偏簡



圖 11. 戲院廣告合集（圖片來源：《西南日報》1942 年 2 月 19 日，第 4 版，筆者複製提供。）

潔，很少有插圖或使用藝術字體。例如 1942 年 2 月 19 日的《西南日報》，這一期刊有六家戲院的廣告，分別來自域多利戲院、樂斯戲院、國華戲院、南京戲院、海鏡戲院、平安戲院、清平戲院。除此之外，還有一則樂斯戲院的電影廣告。

在圖 11 中，清平戲院廣告所佔的版面大概是海鏡戲院的三倍，域多利戲院的廣告版面也是海鏡的兩倍有餘。大多數時候，海鏡戲院的廣告幾乎是最不起眼的。若有粵劇名班演出或大片上映，海鏡戲院也會在廣告刊登上多花費心思。1942 年，號稱省港第一班的“人壽年”劇團曾經來海鏡戲院演出。海鏡戲院連續幾日在《華僑報》頭版較好的位置刊登廣告，版面較以往擴大了許多，然而在當天其他廣告的映襯下，也沒有奪人眼球的效果。大多數戲院在有名班、名角演出時，必定會採取佔用大幅版面、裝飾演員照片或採用誇張的字體等方式，以求有最好的宣傳效果。相較之下，海鏡戲院的廣告風格還是比較單一且低調的，有時還會中斷幾天，估計是因為這段時間的戲院檔期是



圖 12.《華僑報》上的清平戲院插圖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1943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13.《西南日報》上的清平戲院廣告（圖片來源：《西南日報》1943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筆者複製提供。）

告圖文並茂（圖 12），有“黑俠”插畫及大量具宣傳性質的文案，標題字體也使用了藝術字體。反觀刊登在《西南日報》上的廣告（圖 13），其佔用的版面很小，與《華僑報》相較，連其一半面積都不到。廣告上的文字僅有幾行，非常精簡，除了戲院名、演員、劇名、開演時間，幾乎沒有其他信息，只起到告知的效果。因此，如果觀眾想要提前了解更多關於粵劇演出的消息，那無疑是看《華僑報》更好。可以推測，清平戲院的目標觀眾首選購買的報紙應該也是《華僑報》。《華僑報》上的廣告語、插圖等，也讓廣告更具刺激觀看欲和誘導消費的功能，其商業價值更高。

空的。比起幾家大戲院，海鏡戲院生意較為平淡，背後也沒有大財團的支持，在廣告上的投入自然相對有限。

（三）多渠道廣告投放

對於粵劇商家而言，廣告投放的渠道不可能太過單一化，同一則粵劇演出廣告基本會投放在多家報紙上。商家與報紙大約存在一種隱形的契約關係，以清平戲院為代表，經過比對，雖然清平戲院會在多家報紙上刊登同一場演出的廣告，但其在《華僑報》上刊登的廣告無論是品質還是數量，都是遠勝其他報紙的，呈現出一種“獨家”的效果。1943 年 3 月 19 日，同樣是清平戲院的廣告，刊登在華僑報上的廣

四、粵劇廣告的發展歷程

1937 至 1945 年間，澳門報刊粵劇廣告的外觀設計以及內容幾經變化。總體而言，按照刊登的數量、頻率、設計特徵等因素，可以將這八年間的粵劇廣告發展歷程分為四個時期，分類依據與具體特徵如下。

（一）初期（1937—1939）

這一時期內，澳門的報業市場基本是《華僑報》一家獨大，商家缺乏其他刊登廣告的載體，直接影響到廣告的數量。再者，就粵劇演出市場而言，此時正處於抗戰全面爆發的初期，澳門粵劇產業規模較小，直至香港淪陷之後，

也就是抗戰中後期，澳門的粵劇市場才真正繁榮起來。這一時期來澳演出的粵劇戲班數量相當有限，目前能找到確切記載的，只有“興中華”劇團、“鏡花豔影”劇團。這些劇團只是臨時來澳演出幾場，並不多作停留，廣告數量自然不多。最後，就粵劇演出場所而言，除了酬神演出，其餘粵劇演出基本集中在清平戲院，平安等戲院尚以放映電影為主。反映到報紙廣告上，這一時期的粵劇廣告絕大多數都是由清平戲院刊登的，在一枝獨秀的情況下，粵劇廣告集群也就無法形成。

初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設計簡單。廣告的外觀是一個方正的長方形，文字排佈非常整齊，字體比較嚴肅規矩，沒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但比較特別的是，《華僑報》上的清平戲院粵劇廣告四周框線是波浪線。在該報所有廣告中，使用這種波浪框線的只有清平戲院一家，其他廣告基本都是直線框線。這種符號就等於是清平戲院的獨家記號，雖然微小，但也表明清平戲院在廣告設計上，已經初步具有創新意識。

2. 廣告刊登位置較為隨意。當時的粵劇廣告因為數量稀少，所以時常會與酒店、酒吧等娛樂場所的廣告混雜在一起，置於報紙的第二或第三版。廣告所佔的面積約為報紙單個版面的二十分之一，並不起眼。

3. 廣告缺乏宣傳意識。這一時期的粵劇廣告排版方式一板一眼，讓人很難捕捉其特色，其內容也是簡單告白式。當時的電影廣告卻經常出現精彩的宣傳語，如南京戲院《離恨曲》電影廣告語：“苦命鴛鴦一曲離歌恨！患難夫婦破鏡再重圓！”反觀同時期的粵劇廣告就很少出現宣傳語。宣傳語可以說是一種“劇透”，就像是現代電影、電視劇的預告片，能以較為精煉的表達方式傳達出作品的賣點，吸引觀眾前來一看究竟。與同期的話劇廣告、電影廣告相比，粵劇廣告就顯得有些許遜色。

（二）發展期（1940—1941）

在這一時期，《西南日報》的創刊增加了廣告刊登渠道。隨着香港等地戰事緊張，越來越多的粵劇藝人將眼光投向了澳門，比如“覺先聲”劇團。

“覺先聲”劇團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最有號召力的劇團之一，班主薛覺先也是炙手可熱的名伶。該劇團來澳門清平戲院演出，除了引起澳門戲迷的關注，還會吸引省港等地的觀眾來到澳門，只為一睹其風采。除了清平戲院外，南灣遊樂場和域多利等戲院在這一時期也開始演出粵劇，澳門的粵劇演出市場活躍了許多，粵劇廣告數量也呈上升趨勢，從而進入發展期。

發展時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容量增大。一些廣告會配上插圖，排版也不再是單一的告白式，且重視字體的設計。各家戲院逐漸形成自己的廣告特色。

2. 粵劇廣告數量增多，粵劇廣告聚集效應開始形成。從最初的清平戲院一枝獨秀，發展到一期報紙上最多有兩至三家戲院的粵劇演出廣告。粵劇演出廣告也不再和食品、服飾等廣告混雜在一起，出現了固定的刊登區域。

3. 廣告宣傳意識增強。在這一時期，刊登在報紙頭版的粵劇廣告越來越多，又出現了針對演員、劇情、舞台佈景等進行介紹的文案。這些廣告一般刊有票價、演出時間表等實用性信息，除了告示當天的演出，還預告演出日程。一些廣告更有意識地利用“明星效應”，將主演或劇團的名字放大加粗，與其他普通演員區分開來。

（三）鼎盛期（1942—1943）

1942 至 1943 年間，粵劇的繁榮中心轉移到澳門，澳門粵劇市場亦進入鼎盛時期。當時，

有商人買下舊戲院重新裝修，專供粵劇演出；有娛樂公司入股戲院，與演員組建駐演戲班。那時每日都有兩至四個戲目在澳門上演，“薛馬桂廖白”[14]五大流派齊聚，熠熠生輝。澳門粵劇市場人聲鼎沸，甚至吸引了旅居東南亞、北美等地的粵劇演員來此演出。粵劇舞台上的白熱化競爭也延續到了報刊廣告，使之成為戲院商業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華僑報》和《大眾報》都把報紙的頭版廣告位留給粵劇，粵劇廣告進入鼎盛期。

鼎盛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設計性增強，表現力強。進入鼎盛期後，廣告排版不再拘泥於前期的豎版設計，開始呈現出近似正方形、橫向長方形等多種形態。各家戲院都有了打造自己品牌的意識，他們在廣告字體的選擇、宣傳語的寫作、插圖的繪製等方面，幾乎沒有雷同。尤其是廣告的字體，端正的、潦草的、俊逸的……各種風格都有，很多時候廣告文字為了配合不同粵劇的劇名，還會變化成各種形狀，千奇百怪，幾乎無法統計具體有多少種。

2. 廣告形成了競爭場域。因報紙留給粵劇廣告的版面有限，戲院間免不了要爭奪版面，乃至頭版頭條。大戲院基本都佔領了整張報紙的最佳廣告位置，且基本沒有一天中斷。一張報紙上匯集多家粵劇廣告，就等於“同場打擂台”，有些戲院為了不被對家壓倒氣勢，廣告各項元素都向“大”靠攏（圖 14），設計大型版面、大幅插畫、大字標題，一些標題的字體大小甚至比報名都要大，儼然成為了報紙的焦點。

3. 廣告更具可讀性和趣味性。廣告的文案會用較長的篇幅，對劇情和人物進行介紹，內容文白夾雜，對仗工整，抒情性強，很有感染力。

4. 廣告宣傳語稍顯浮誇。廣告頻繁出現“最”“極”“唯”等字眼，又經常使用感嘆號，甚至一連用四五個。戲院的宣傳語更會不遺餘



圖 14. 鼎盛期的粵劇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1943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力地向人們展現其裝修之豪華，戲班陣容之強大，演員技藝之精湛，服飾道具之精美，吊足了觀眾的胃口。

（四）衰退期（1944—1945）

隨着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一些粵劇演員逐漸返回廣州、香港等地，不再將澳門作為常駐地，因此影響了部分戲院的生意，尤其是那些沒有專屬劇團的戲院。清平戲院亦在 1944 年進行裝修，有一段時間沒有粵劇演出。隨着電影事業的復甦，國華等戲院重新以電影放映業為主業，電影廣告也隨之強勢回歸。大戲院中，幾乎只剩清平戲院和平安戲院在勉力

維持粵劇演出，粵劇廣告進入衰退期。

衰退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回歸簡潔，與發展期類似。這一時期的粵劇廣告只刊登劇名、演出時間、主演這幾條信息，簡化或略去票價、劇情、佈景等信息，插畫基本省略。廣告的設計性大大減弱，同一家戲院刊登在《華僑報》《大眾報》和《市民日報》三家報紙上的粵劇廣告幾乎沒有任何區別，粵劇廣告風格趨於雷同。

2. 戲院的影響力降低，劇團成為廣告的宣傳重心。在此前的粵劇廣告中，基本第一行都是戲院全名，而衰退期的廣告則較多採用“戲院名加劇團名”的組合方式，例如“平安新聲”“清平錦繡”，不知是否有也有減省版面的考慮因素。

3. 廣告的更新率降低，刊登狀況不穩定。在這一時期，有時連續幾期報紙都沒有一則粵劇廣告，有時亦只有一則粵劇廣告，而電影廣告卻有三四則，對粵劇廣告呈圍剿之勢。其中，平安戲院的粵劇廣告更新頻率是最高的，就連專演粵劇的清平戲院也不能與之相比。在當時所有的報刊娛樂廣告中，平安戲院的粵劇廣告和國華戲院的電影廣告可以說是平分秋色。而平安戲院和清平戲院也是堅持經營粵劇演出最久的戲院，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相繼停業。

結語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華僑報》等澳門本地報紙出版發行基本正常，加之陸續有新報紙創刊，使得粵劇廣告得以迅速發展。當時的粵劇商家已經明顯感受到了廣告對於商業的推動作用。隨着本地娛樂市場日益發展，粵劇商家亦加大對廣告的投入，使得越來越多的粵劇廣告佔據報紙上最有利的版面。其時的報業顯然對粵劇廣告有優待，因為除了電影廣告之外，其他種類的廣告幾乎無法與之相較。對於報業而言，廣告費是支撐它們獨立經營的重要收入來源，關係到報業的生存。抗戰時期粵劇廣告的大量刊登，也體現了粵劇商家與報紙之間的穩定合作關係。在這一過程中，報紙是否會因為資金問題，對粵劇廣告在宣傳中的一些虛假、浮誇等問題視而不見，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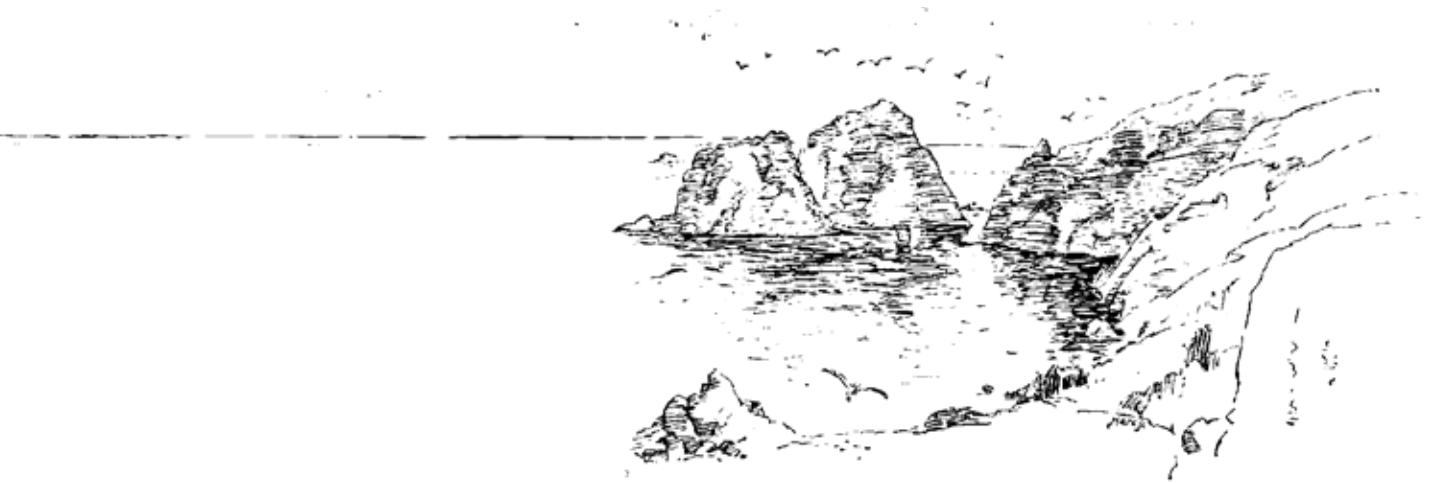
澳門報刊上的粵劇廣告與粵劇產業的興起、衰落過程基本保持一致。長期以來，澳門的工商業並不發達，產業結構以娛樂業為主。澳門本地的商業粵劇戲院起步較早，從而刺激了粵劇廣告的發展。自清末民初以來，粵劇廣告就在報紙上佔據了一席之地。但整體而言，在抗戰全面爆發以前，澳門的粵劇演出主要以神功戲為主，商業演出較少，因而廣告數量有限。抗戰全面爆發後，大批粵劇藝人、劇團移師澳門，粵劇中心向澳門轉移，商業劇場紛紛開演粵劇，報紙上的粵劇廣告呈井噴式發展，佔據了報紙娛樂業廣告的半壁江山。後期隨着戰爭結束，藝人陸續返鄉，澳門粵劇市場亦逐漸回歸平淡，粵劇廣告數量隨之衰落。

最後，抗戰時期的澳門社會局勢較為安定，為粵劇廣告提供了發展空間。林幸慧博士對上海《申報》戲曲廣告的研究表示，淪陷時期的上海娛樂、出版等行業均受到日軍的管制，戲曲廣告數量因此大幅銳減。[15] 澳門的情況正好相反，戰時的澳門並未被日軍佔領，大量人口和資本湧入，導致享樂主義風氣盛行，娛樂業在此期間大肆擴張，畸形繁榮，為粵劇廣告帶來增長的動力。因此，這一時期的粵劇廣告是特殊時期的產物，其曇花一現的繁榮也是無法複製的。



註釋：

1. 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編：《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第 34 頁。
2. 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編：《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第 160 頁。
3. 《華僑報》創辦於 1937 年，首任社長是趙斑斕，其辦報宗旨是“立足澳門，客觀報導，服務社會”。《華僑報》是澳門唯一一份自抗戰初期就開始發行的報紙，它刊載消息快而準，銷路又廣，且始終堅持愛國主義立場，因而廣受讀者歡迎，日銷量破萬，冠絕澳門報刊業，是戰時澳門影響力最大的中文報紙。
4. 《大眾報》創辦於 1932 年，首任社長是陳天心。《大眾報》是澳門現存的創刊歷史最長的中文報紙。1937 年抗戰全面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四界救災會”（“四界”即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由陳少偉出任“四界救災會”主席，救災會的會社也設立在報社內。粵劇演員陳卓瑩、任劍輝、張植華等人都曾加入過“四界救災會”，並曾參與多場義演籌款活動。
5. 《西南日報》創辦於 1941 年，首任社長是“日偽漢奸文人”劉傳能。他早年從事與戰爭有關的倒賣投機活動，因此結識了一批日本政客。後來，劉傳能與在澳的日本勢力勾結，並充當其爪牙，在《西南日報》上鼓吹漢奸言論，美化日本侵略事實。1945 年 9 月抗戰結束後，《西南日報》也隨之停刊。
6. 《市民日報》創辦於 1944 年，首任社長是何曼公，其辦報宗旨是“服務社會，表達市民心聲”。《市民日報》的創辦時間較晚，它以報導澳門本地新聞為主，聚焦澳門社會的民生問題，後期增加了國內外新聞版面。抗戰時期的《市民日報》也是澳門愛國報刊陣線的一員，為抗日救國的宣傳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7. 參見陳喬之主編，《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編：《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年，第 766 頁。
8. 李春：《澳門大眾傳媒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220 頁。
9. 唐思：《澳門風物志》，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 年，第 98 頁。
10. 林發欽、胡雅琳、郭姝伶：《澳門街道的故事（下）》，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9 年，第 62 頁。
11. 朱壽桐主編，張建華編撰：《澳門文學編年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9 年，第 161 頁。
12. 《華僑報》1942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13. 黃純：《晚清民國時期廣州粵劇城市化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228 頁。
14. 分別是薛覺先、馬師曾、桂名揚、廖俠懷、白駒榮五人。
15. 參見林幸慧：《由〈申報〉戲曲廣告看上海京劇發展（1872–1899）》，台北：里仁書局，2008 年。



從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看馬來西亞華商角色的演變

陳妙恩 *

摘　要 1904年成立的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簡稱隆雪中總）是馬來西亞最具政治經濟影響力的商業社團組織之一。它超越方言群的限制，在統籌華人社會的集體力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通過重新審視隆雪中總的歷史，探討馬來西亞華商一個世紀以來的角色演變。早期的商會領袖不僅代表華人商界，還會代表華人社會，成為與地方及國家領導人溝通以謀求福祉的橋樑。經歷過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二戰的洗禮、戰後的重建、國家的獨立、政府政策的改變，以及重大經濟危機帶來的挑戰之後，商會領袖與華商的角色發生了轉變，在促進社會經濟、文化與教育的發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於商會曾經歷戰爭與數度搬遷會所，大部分商會的史料已失，本文主要以早期報章的報導、國家檔案局的檔案資料及後期商會的檔案資料重新建構這段歷史。

關鍵詞 商務局；隆雪中總；馬來西亞華商；李延年；李孝式；陸佑

一、概述

許多學者的研究顯示，海內外包括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中華商會，是在二十世紀初開始成立，並受到當時厲行“新政”的清朝政府大力支持和倡導，是清末政府的產物。[1] 相對於中國商會史豐碩的研究成果，學界長期以來對與中國商會具有深度淵源的海外華人商會，尤其是馬來西亞商會的研究並不充分，僅有小部分成果問世。這包括面向整體華人的商會，[2] 以及個別地方上的商會，例如：詩巫中華總商會 [3]、檳州中華總商會 [4]、和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 [5]。馬來西亞那些幾乎與中國同時期成立的商會組織，如何與海外的華人社會和所處的環境結合，經歷政局動蕩，政權更迭，一直延續到今天，值得學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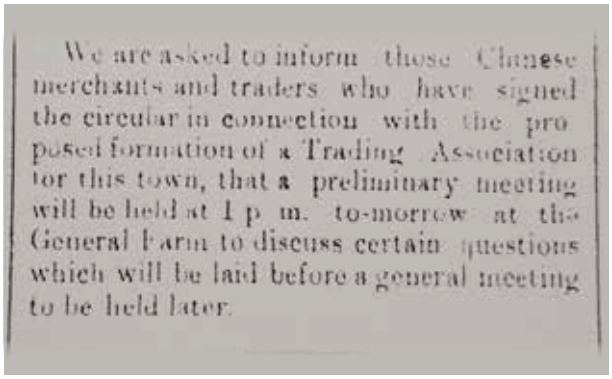
其中，最接近行政中心的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簡稱“隆雪中總”）[6] 是馬來西亞首府吉隆坡最具政治經濟影響力的商業社團組織。它同時扮演着維護中華文化、照顧華人社群福利等角色，且往往超越方言群的限制，在統籌華人社會的集體力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商會領袖不僅代表華人商界，還會代表華人社會，成為與地方及國家領導人溝通謀求福祉的橋樑。經歷過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二戰的洗禮、戰後的重建、國家的獨立、政府政策的改變，以及重大經濟危機帶來的挑戰之後，商會領袖與華商的角色發生了轉變。本文旨在重新審視隆雪中總的成立，並通過回顧歷任會長的領導方向和商會的活動，探討華商角色的演變，了解這些商人如何在不同時期發揮其經濟、政治與社會影響力。本文將分為以下四個部分探討一個世紀以來華商角色的演變：（一）商會的成立；（二）二戰前商會領袖扮演的角色；（三）獨立前後參與建國的過程；（四）以工商經濟作為導向。大部分的相關史料因戰爭與商會數度搬遷會所而丟失，本文只能以早期報章的報導、國家檔案局的檔案資料，以及後期商會的檔案資料為主要文獻，重新建構相關的歷史。

* 陳妙恩，馬來亞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歷史系高級講師。

二、商會的成立（1904—1908）

隆雪中總的成立，與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的發展有很大關係。1894 年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開始重視工商實業，並於翌年議設商務局，但後來不了了之。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採納康有為的建議，在上海、漢口試辦商會，後因變法失敗，擬議中的商會亦隨之流產。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在慈禧的命令下，清政府在上海設立官辦的上海商務總局，又在局下組成一個商務公所。[7] 至於民辦的商會則可以追溯至《辛丑條約》簽署後，各業董事於 1902 年成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為與西方列強修訂商約的參謀機構。[8] 這影響到同時期的馬來亞的華商，他們也陸續在各商埠成立商會。1903 年馬來亞第一所商會——檳榔嶼華人商務局成立，幾個月後又成立了關丹華僑商會，次年成立了雪蘭莪商務局。與檳榔嶼一樣，雪蘭莪華商將商會取名為商務局，這或許是以 1898 年成立的上海商務總局為藍本。同一時期，清政府設立了商部，並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頒佈了《商會簡明章程》26 款，並在各地商埠以及海外華埠勸辦商會。於是，中國各大城市與南洋各地在這股“新政”的浪潮下紛紛設立商會。新加坡的商會就是在 1906 年設立的。

隆雪中總的成立，不但與中國局勢發展有關，而且與吉隆坡本土的發展有關。根據 1904 年《雪蘭岳華人商務局條規》內的“倡設雪蘭岳商務局引”（以下簡稱《商務局引》）所述，組織華人商務局的目的為：（一）提供交流的空間；（二）增廣見聞和啟迪民智；（三）向西方商人看齊。由於籍貫不同，當時的吉隆坡華人社會使用的語言也不相通，導致人們平常鮮少來往。據《商務局引》記載，殖民地政府曾在憲報和報刊上刊登禁止運貨手車停在商店前的公告達四個月之久，卻未被商人們理會。直到禁令正式實施之後，商人們想要反對，卻已經無法改變政府的決策了。這類事件讓商人們意識到團結的重要性。此外，《商務局引》提到“西人經商所到之處皆有商會”，這讓西



We are asked to inform those Chinese merchants and traders who have signed the circula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posed formation of a Trading Association for this town, that a preliminary meeting will be held at 1 p m. to-morrow at the General Farm to discuss certain questions which will be laid before a general meeting to be held later.

圖 1. 1904 年 2 月 18 日，辛亞榮在吉隆坡當時唯一的報章《馬來郵報》刊登啟事，邀請商家出席 2 月 19 日的初步會議。（圖片來源：《馬來郵報》1904 年 2 月 18 日，第 2 版，筆者複製提供。）

方商人有平台可以“齊集詳議”和“閱報取益”，從而導致商務日興。因此，華人成立商務局是一項“略仿西商”的辦法。《商務局引》中提到的西方商會或許是指 1837 年海峽殖民地的西方商人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的商會，這是馬來亞最早的商會組織。不過，西方商人正式在雪蘭莪成立商會的時間是 1908 年，比當地華人成立商會晚了四年。

基於上述內在和外在因素的驅使，當時吉隆坡最有影響力的商人（包括陸佑、陳秀連、辛亞榮等）發出通函，並在吉隆坡當時唯一的報章《馬來郵報》上刊登啟事，邀請各行業的商家出席 1904 年 2 月 19 日的初步會議，以討論組織商會的事宜。該籌備會議在陸佑的“東興隆”號舉行，由陳秀連主持會議，辛亞榮向眾人解釋成立商會的目的，杜南宣讀起草的章程。出席者一致支持成立商務局，並決定盡快召開首次會議。陸佑和 Hop Toh Sang 亦分別捐了 500 元和 100 元，作為商會的啟動基金。[9]

一個月後，商會章程在《馬來郵報》刊出，商會的首次會議也於同年 3 月 27 日在雪蘭莪礦商公會舉行，約有 80 位華商出席。會上經投票一致通過成立商務局的決議，於是隆雪中總的前身——“雪蘭岳華人商務局”成立了。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s the result of the notices sent out for the preliminary meeting of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foundation of a Chinese Merchants' Association, there were assembled yesterday at 1. p. m. at the offices of the General Farm many of the leading Chinese business men, including Towkays Chan Sow Lin, M. C., Loke Chow Kit, Wee Hap Lang, Chin Sin Hee, Kee Hock Cheong, Cheong Yok Choy, Lim Chin Guan, Teh Seow Teng, Soon Kee, Yap Tai Kee, Chia Boon Teat, Wong Wan Fan, Chak Sang, Woug Toke, Fung Swee Chee, Leong Yong, Toh Nam and San Ah Wing, also chops Poh Chong Heng and Kong Hup.

After Mr. Chan Sow Lin had been elected to the chair, Mr. San Ah Wing briefly explained the objects of the meeting and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felt for the formation of an association of merchants and traders. Mr. Toh Nam was then called upon to read the proposed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Criticism was then invited. After some amendments had been passed, the rules were unanimously approved of, and it was resolved that the proposed Association be known as the Selangor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meeting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that Towkay Loke Yew had generously offered a donation of $500 and Towkay Hop Toh Sang one of $100 towards the funds.

It was then resolved to call a meeting of all the merchants and traders to inaugurate the Chamber as soon as the necessary papers were printed.

The meeting concluded with a vote of thanks to the chairman, proposed by Mr. Chow Kit and seconded by Mr. Wee Hap Lang.

圖 2. 1904 年 2 月 22 日的《馬來郵報》報導籌備會議在陸佑的“東興隆”號舉行。（圖片來源：《馬來郵報》1904 年 2 月 22 日，第 2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3. 18 頁的中英版《雪蘭岳華人商務局條規》（圖片來源：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編號：1957/0115476，筆者複製提供）

陸佑（1846—1917）被公推為商務局首屆領袖，時稱總理（Chairman）；其副手為陳秀連及陸秋傑，時稱協理（Vice-chairman）；其下為辛亞榮，時稱司理（Secretary），杜南為總書記；還有其他委員，包括陳春、李廣霖、劉良顏、葉隆興、黃合龍、邱福種、王聚秀、黃雲帆、黃彬三、馮遂知、麥澤生、新就記、陳新禧、馬藹芝、Hoi Guan、Eng Hoh Seong、Seng Soon、Fong On（Hong Onn）、Kan Choon 和 San Kee。商務局首任領袖陸佑是馬來亞的首富，其影響力甚至遍佈東南亞和香港。首屆委員多是陸佑手下班底，如陳秀連曾掌管陸佑的餉碼生意並任其礦場經理；陸秋傑協助陸佑在萬撓、古毛、雙文丹承辦煙酒餉碼；李廣霖擔任陸佑的機要秘書、法律顧問和經理；朱嘉炳初時擔任陸佑的英文秘書，後晉升為經理。此外，辛亞榮、朱晴溪等都曾在陸佑的商鋪“東興隆”號旗下做事。[10]

與中文版的《雪蘭岳華人商務局條規》不同，英語版的條規參考了檳榔嶼華人商務局的章程，提出成立雪蘭莪華人商務與種植局（The Selangor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州內的一般商業利益，收集和分類商業信息，成立仲裁庭以協助調停商業糾紛，以及就影響共同利益的課題與當局溝通。1904 年 4 月 6 日，商務局按《1900 年社團法令》規定，將共 18 頁的中英版《雪蘭岳華人商務局條規》呈交英國殖民政府審查，並申請豁免註冊，後於同月 12 日獲政府覆函批准。商務局在條規裡闡明，凡各商家或代理，不拘來自任何方言群，只要涉及雪蘭莪州的商務及種植的“華人”便可以申請加入商務局，入會費為 10 元，年費為 12 元。商務局在創立初期沒有自己的會所，只能臨時在雪蘭莪錫礦總局裡辦公。

三、二戰前商會領袖扮演的角色（1909—1942）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和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研究泰國



圖 4. 商會早期的辦事處設於羅爺街，會員人數 112 人。（圖片來源：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Durban, Colombo, Perth (W. A.), Singapore, Hongkong, and Shanghai,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08, p. 855. 筆者複製提供。）



圖 5. 十九紀末，全雪蘭莪有 103 座礦廠，華人礦工 26,000 人，在全盛時期，產錫量佔世界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一。（圖片來源：隆雪中總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華人社會時，提出了一種名為“甲必丹系統”（Kapitan System）的華人領袖模式。[11] 這一模式也能十分貼切地描述同處在東南亞的早期馬來亞華人領袖所扮演的角色。[12] 在這種華人甲必丹模式中，新移民通過獲得稅收承包制度（餉碼）的經營權而累積財富，進而獲得當地政府的認可，被委任為“甲必丹”（華人領袖）。一般而言，他們要獲得承包餉碼的經營權，就得向當地政府顯示其能力，所以早期的餉碼承包商大多為幫會的領袖。他們能夠倚仗在秘密會社的影響力或武力，代表政府向華人社會徵收稅務。

顏清湟曾經將早期新加坡華人方言群中的權力結構劃分成三個類型：社會權力（Social Power）、非正式的政治權力（Informal Political Power）和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社會權力主要存在於控制方言群的社團組織，如會館；非正式的政治權力建構於英國殖民地政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之間；而強制權力則依賴秘密會社的勢力。[13] 擁有其中兩種或三種權力的人，就能成為最具有權力的華人社會領袖，而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雪蘭莪。

在英國殖民地政府還未介入雪蘭莪內政時，位於雪蘭莪州內的吉隆坡已經有了華人甲必丹，他們分別是邱秀（1858 至 1861 年在任）、劉壬光（1862 至 1868 年在任）和葉亞來（1868 至 1885 年在任）。英國與霹靂州蘇丹在 1874 年簽署“邦咯條約”之後，就緊接着與雪蘭莪州簽署了條約。雪蘭莪州接受英國委派的參政司，協助蘇丹處理政務。雪蘭莪第一任參政司是大衛遜（James Guthrie Davidson，1875 至 1876 年在任）。英國殖民地政府仍允許華人甲必丹的設立，所以接着委任了葉致英（又名葉亞石，1885 至 1889 年在任）和葉觀盛（1889 至 1902 年在任）為華人甲必丹。這些甲必丹都是客家人，他們既是幫派（海山派）的領袖，又是餉碼承包商。早期的吉隆坡都是客家人的天下，隨着吉隆坡的發展，加上英國人在 1880 年將雪蘭莪的行政中心從巴生遷到吉隆坡，其他籍貫的人士就逐

漸湧現，[14] 這些勢力後來甚至超過客家人，如1894 年成立的大華樓基金會 [15] 和在葉觀盛擔任甲必丹時期斥資成立的培善堂 [16]。1891 年開始讓其他幫群領袖參與領導的同善醫院董事會和大華樓基金會，是吉隆坡最早的兩個跨幫群機構，不過這些合作僅見於福利組織。

當第五任甲必丹葉觀盛於 1902 年逝世後，英國殖民地政府就終止了甲必丹制度，並設置了華民護衛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直接管理華僑的事務。同時，英國殖民地政府又設立了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該局後於 1914 年改名為華民政務局。其時，英國殖民地政府會委派不同籍貫的代表進入華人參事局，為政府提供諮詢服務，但是他們本身並沒有執行權。在上述種種事件的鋪墊下，首個以經濟為主的跨幫群組織——雪蘭莪中華總商會就應運而生了。直到 1936 年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成立之前，雪蘭莪中華總商會一直是雪蘭莪和吉隆坡的最高華人機構。值得一提的是，商會首屆委員會與過往的甲必丹有着密切的聯繫：王聚秀是第三任甲必丹葉亞來主政吉隆坡時的“稅務兼司秤”；葉隆興是吉隆坡第四任甲必丹葉致英的長子；新就記是第五任甲必丹葉觀盛的商號，而黃合龍是其秘書兼助理。[17] 他們成為銜接甲必丹時代與新一代華商的橋樑。

在甲必丹領袖模式之下，馬來西亞華人社群領導人充當了溝通政府和華人社群的橋樑。他們是華人社團的領導者和保護者，同時也是直接或間接代表政府的管理者或代理人。他們通過參與各種社團組織而被推舉為領袖，而這些社團組織亦為那些願意投入時間、精力和財力從事非營利活動以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人提供了制度基礎。根據施堅雅的說法，這是一種“內部權力結構”。任何一個在華人總商會、中華大會堂等“傘形組織”[18] 中擔任委員或理事者，都具有更高的地位，因為他們位於社團網絡的頂端。在施堅雅看來，他們是在經歷了“完全內部合法化”的過程之後，才被自己的社群接受為領導人，才能夠代表其所在的社群“發聲”。例如，馬來聯邦鐵路局在 1904 年初嘗試實施亞洲人與歐洲人座位分隔制度時，陸佑就以商會會長的名義抗議“只准歐人車廂”（Europeans only carriage）的設立，並印發了一千本手冊，向華人說明坐火車應有的禮儀。最終在商會的抗議下，鐵道局變相地妥協，將車廂分為 A 和 B 兩類，但賣票時會限制乘客乘搭特定的車廂，該條例直到 1911 年才被修改。[19] 又例如，黃重吉在 1938 至 1939 年擔任會長期間，曾向殖民地政府提呈修改營業註冊律例，並將律例譯為中文，刊登於《馬華日報》及印發給會友；他為了協助小販營生免遭當局拘捕驅趕，與吉隆坡潔淨局協商，制定出規範章程；又曾代表商會，就中國修改回國護照申請的規定提呈意見，得到中國領事館的接納；他還曾代表華人社群成立慶賀雪蘭莪蘇丹加冕大典委員會，負責在巴生搭建牌樓、宣讀賀詞，並通知華人升旗慶祝。身為商會會長的黃重吉，不僅代表華商，也代表華人社群周旋在殖民地政府、中國政府和雪蘭莪皇室之間。

商會領袖還因為經常被政府要求充當政策執行人及代理人的角色，而被大眾視為“外部當局”。許多商會董事不但被委任為太平局紳，擁有仲裁小型案件的權利，還被吸納到四州府議會（Federal Council）、雪蘭莪州議會、雪州華人咨詢理事會（Selangor Chinese Advisory Council）、吉隆坡潔淨局（Sanitary Board）等官方機構成為非官吏委員（Unofficial Member），從而直接參與州內行政。曾經參與華人咨詢理事會協助政府處理華人重大事務的商會領袖有陳秀連、李廣霖、陸佑、朱嘉炳等人；四州府議會中，有隆雪中總委員黃益堂和朱嘉炳；雪蘭莪州議會中，有會長黎德祿和楊旭齡。此外，商會也負責推薦代表出任吉隆坡潔淨局（現市議會）的成員，如 1911 年提名葉隆興代替請辭的拿督李廣霖。上述委任使他們有機會參與政府的決策工作，從而代表商會和華人社群發聲。雖然他們的聲音經常被政府忽略，但也有成功的例子，如商會曾於 1932 年召開各團體代表大會反對金文泰爵士的地方分權政策；翌年商會又



雪蘭莪商務總會初定章程略述

第一章宗旨

本商會謹遵　奏定章程專爲調和省界維持商務而設

一在固結商業上大小之團體
一在研究商業上貿易之公便
一在維持商業上之營私罔利
一在調和商業上之詿騙紛爭
一在宣佈商業上遷變之利害
一在調和商業上外界之交涉
一在參訂商業上恪守之規則

第二章定名立案

一定名曰雪蘭莪中華商務總會
二在本埠則照英例稟請泰政司署求免註册
三在中國則遵商律稟請　商部立案
四用木質印章三顆一長方式稟請　商部頒給篆曰雪蘭莪中華商務總會關防專爲我中國公牘移文之用一橢圓式由會自刻楷書雪蘭莪中華商務總會字樣另增英字以備出入銀項及一切要件之用是爲商會正印一圓式中篆華英文如上爲通信印其信柬等即另行刻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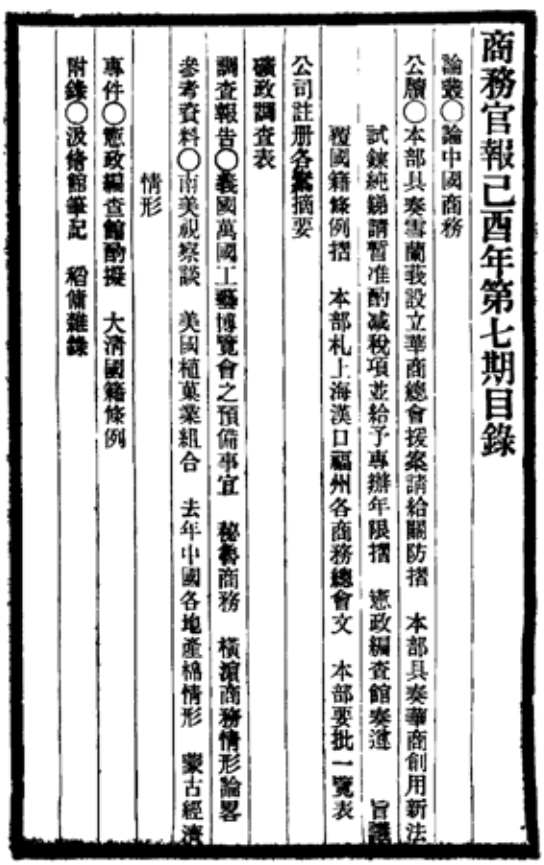
第三章聯絡同志

一凡在埠之華商或貿易家或纏務家或製造家或種植家皆可入會但須遵守本商會章程先將藉貫姓名門牌號數作何商業報名註册
二凡在埠華商於開辦之後有欲入本商會者必經會員中二人一薦一和定三禮拜內集議若經准則由書記函招薦和二人轉爲道達不准即作罷論
三凡附近各埠未設商會之華商與本埠商務原有交涉而欲入會者須有本埠商號兩家保荐一俟議准照函爲實
四凡附近各埠之設有商會願通聲氣共謀公益者請將住址及會員姓字函達本會互相聯絡

五凡中國設有商會之處有關商務者彼此宜互通消息以期互相考察流通貨品

未完

圖 6. 圖為《檳城新報》刊登的《雪蘭莪商務總會初定章程略述》，內文提到改名後的商會將向清朝商部稟請立案，並申請關防（印章）一枚。（圖片來源：《檳城新報》1907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筆者複製提供。）



商務官報己酉年第七期目錄

論叢○論中國商務
公牘○本部具奏雪蘭莪設立華商總會援案請給關防摺　本部具奏華商創用新法試鍊純錫請暫准酌減稅項並給予專辦年限摺　憲政編查館奏遵　旨覆國籍條例摺　本部札上海漢口福州各商務總會文　本部要批一覽表
公司註册各案摘要
礦政調查表
調查報告○義國萬國工藝博覽會之預備事宜　秘魯商務　橫濱商務情形論畧
參考資料○南美視察談　美國植菓業組合　去年中國各埠產棉情形　蒙古經濟情形
專件○憲政編查館酌擬　大清國籍條例
附錄○汲修館筆記　稻畦雜錄

圖 7. 1909 年 4 月 15 日發行的《商務官報》，刊載了《清廷商部具奏雪蘭莪設立華商總會援案請給關防摺》。（圖片來源：《商務官報》1909 年 4 月 14 日，第 7 期，筆者複製提供。）

呈請政府取消入口米稅，結果該稅項於兩年後被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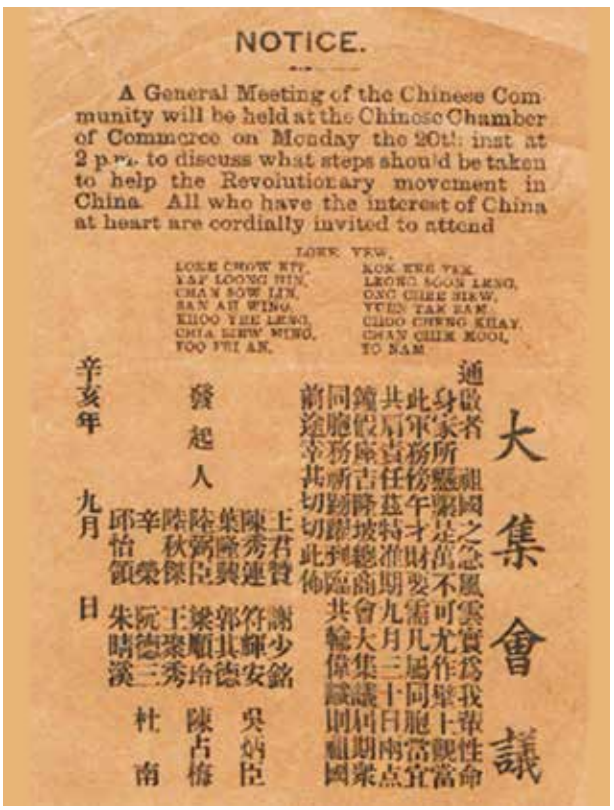
此外，商會還獲得了清政府授予的“關防”，也就是官方印章，方便處理商貿、通關等事務。[20] 在第一位中國駐吉隆坡領事呂子勤上任前，隆雪中總一直扮演着領事館的角色，例如申請護照，發放商照，或者代表華僑直接與中國政府交涉等，其在處理這些事務時都使用了關防。其他總商會如霹靂、新加坡和柔佛州峇株巴轄的商會也曾獲賜關防。早期華人雖然生活在馬來亞，但念茲在茲的是中國原故鄉，因此對中國政局的演變、各種勢力的入侵感到憤慨。1905 年，馬來亞華人就曾響應上海商會發起的抵制美貨運動，以抗議美國的排華法案。[21]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曾致函隆雪中總，呼籲雪州華人參與“救國”。[22] 其時，當地華人在隆雪中總的帶領下成立了“雪蘭莪華僑籌賑會”，積極展開“抗日救亡”運動。時任隆雪中總會長的李孝式，就是“雪蘭莪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的會長。在戰火陰影籠罩下的馬來亞，有許多商會董事為保護家園而加入吉隆坡防空救護隊。

這場戰爭之後，馬來亞華人的國家認同才



州府

圖 8. 1909 年 7 月 22 日的《南洋總匯新報》記載雪蘭莪中華商務總會於宣統元年六月初一（1909 年 7 月 19 日）舉行盛大的啟用關防典禮。（圖片來源：《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7 月 22 日，第 3 版，筆者複製提供。）



NOTICE.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will be held at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n Monday the 20th inst at 2 p.m. to discuss what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help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All who have the interest of China at heart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ttend

大集會議

辛亥年九月日

發起人

通啟者 身家所繫 祖國之急 風雲實為 我華性命 富宜 同胞當 作聲 十觀 不可 尤作 壁上 凡屬 同胞 九月 三十日 南點 集會 期則 組國 議決 議員 大會 共輸 偉識 此軍 務倥 午才 准期 發需 特益 責任 共肩 籌假 座吉 隆坡 總商 會所 開臨 時會 此佈 希

王君贊 陳秀連 符蘅安 謝少銘 吳炳臣 陸佑 陳占梅 郭其德 梁順坤 王聚秀 陸弼臣 陸秋傑 辛棄疾 邱怡顏 朱晴溪 阮德三 杜南

圖 9. 武昌起義爆發後，以陸佑為首的商會各派頭家領袖，在 1911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大集會議”商討時局，支持新政府。（圖片來源：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編號：1957/0162060，筆者複製提供。）

從“落葉歸根”轉變為“落地生根”，逐漸轉向他們居留的地方。

四、華商參與建國的過程

由於華人社群曾大力支持中國和英國政府與日軍作戰，因而在日據期間遭到迫害。為了免遭日軍逮捕，商會領袖被迫逃離馬來亞，如雪蘭莪華僑籌賑會主席兼商會會長李孝式逃至印度，商會委員陳永則去往澳洲。同時，雪蘭莪華人社群（包括富戶、商店、居民等）被迫繳交共一千萬元不同款項的奉納金，以懲罰他們之前曾積極支持抗日運動。為了籌集這筆奉納金，當時的華商成立了“雪蘭莪華僑籌集奉納金借款委員會”（以下簡稱“奉納金委員會”）。雪隆中總至今還收藏着《雪蘭莪華僑籌集奉納金借款委員會議案部（附各種專員會議議案錄）》。這本議案錄顯示，奉納金委員會的成員亦是商會成員，例如黃重吉、張郁才等。此外，華人社群領袖還被日本人強迫組織起來，成立“雪蘭莪華僑協會”；之前擔任過商會會長的楊旭齡，在日據時期則被委任為雪蘭莪高等法庭的法官。

歷史學家王賡武認為，施堅雅採用的甲必丹模式只適合描述二戰前馬來亞的情況，後甲必丹時期被王賡武稱為“商人領袖”時期。[23] 徐威雄則在《移山圖鑑——雪隆華族歷史圖片集》下冊的《政治翻新天》中將後甲必丹時期稱為“頭家（Towkay）政治”，頭家即福建話和客家話裡“老闆”的別稱。光復後，除了像李孝式那樣在日據時期離開馬來亞的領袖得以重新獲得華人社群的支持外，那些在日據時期曾經和日本人合作的商人頭家大多遭到華人社群的唾棄，這就導致華人社群出現權力真空，於是出現了一批取代商人頭家的新興領導者。對於二戰後的華人社群來說，這批新興領導者往往是受過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知識精英。所以，王賡武提出，對這群領導者可用“仕”稱之。[24]

其實在商會內部，早在二戰前就有五任會



圖 10. 1923 年，中華大會堂在美芝路的一片泥淖中開始興建。因前期工程耗費過多，建築費款項不繼，後由商會帶領眾華僑籌集款項才能復工完成。1934 年 10 月 29 日，中華大會堂隆重開幕，邀得雪蘭莪蘇丹蒞臨主持，是當時華人社群最大的盛事。時稱“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的隆雪中總隨即遷入。（圖片來源：筆者收藏圖片）



圖 11.《雪蘭莪華僑籌集奉納金借款委員會議案部》的記錄本至今仍保存完好（資料來源：隆雪中總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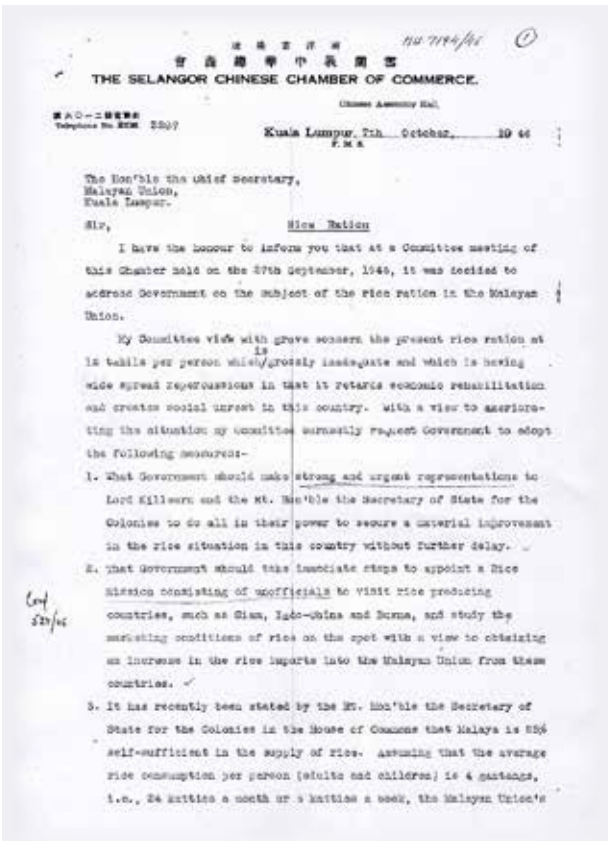
長曾接受過英文教育。他們分別畢業於檳城大英義學、吉隆坡維多利亞書院等以英語為媒介語的學校，楊旭齡與李孝式甚至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不過這二例是非常罕見的。二戰後的商會領袖則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至少也完成了中學教育，如第 17 任會長李潤添是留學歐洲的建築師；第 19 任會長黃琢齊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第 21 任會長顏清文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經濟系和新加坡大學法學院；第 22 任會長林源德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工商學系；第 24 任會長戴良業畢業於馬來亞大學工程系。他們精通中英雙語，乃至中英巫三種語言或以上。

馬來亞光復後，商會積極地參與了戰後的重建工作，如協助政府處理糧食配給，追討戰爭賠款，以及釐定淪陷時期的土地買賣法案等。當時，有更多商會領袖被吸納進政府部門，成為非官方委員；且在商會的領導下，成立了第一個華裔政黨——馬華公會。其時由商會主席李孝式擔任雪蘭莪州馬華公會的主席，進而與“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又譯“巫來由人統一組織”，簡稱“巫統”）結盟，在 1952 年贏得首次大選。李孝式先後擔任立法議員、行政議員、海港鐵道部長和交通部長。卸下會長職務後，李孝式代表馬來亞赴英國爭取獨立，並成為獨立後首屆財政部長。接下來的商會主席皆受到英殖民地政府和獨立後馬來（西）亞政府的認可和重視，分別被賜封爵士、拿督、丹斯里、敦等勳銜；[25] 也有人加入政黨，參與國家政治，擔任議員或上議員。他們既有官銜（仕紳），又涉及商業活動（商人），因此本文套用這兩個詞將這批商會領袖稱為“紳商”（Merchant-gentry）。[26]

表一. 戰後（1946—1975）的商會會長列表

人物	商會職務	擔任政府職務	勳銜
李孝式 （1901—1988）	第 12 任會長（1940—1941） 第 13 任會長（1946—1955）	先後擔任立法議員、行政議員、海港鐵道部長、交通部長和財政部長	爵士、敦
張崑靈 （1893—1962）	第 14 任會長（1955—1959）	吉隆坡市政局議員和馬來亞聯合邦立法院議員（1955—1959）	無
陳光漢 （1909—1978）	第 15 任會長（1959—1965）	吉隆坡市議員、雪蘭莪州議員及國會上議員	拿督
陳東海 （1914—1985）	第 16 任會長（1965—1973）	出任馬華公會執行總秘書及聯盟義務秘書	丹斯里
李潤添 （1905—1977）	第 17 任會長（1973—1975）	吉隆坡市議員和雪蘭莪州議員	拿督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THE SELANGOR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Kuala Lumpur, 7th October, 19 46

The Hon'ble the Chief Secretary,
Malayan Union,
Kuala Lumpur.

Sir, Rice Ration

I have the honour to inform you that at a Committee meeting of this Chamber held on the 27th September, 1946, it was decided to address Government on the subject of the rice ration in the Malayan Union.

My Committee view with grave concern the present rice ration at 14 ozs per person which grossly inadequate and which is having wide spread repercussions in that it retards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and creates social unrest in this country. With a view to ameliorating the situation my committee earnestly request Government to adop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1. That Government should make strong and urgent representations to Lord Killearn and the Rt. Hon'bl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do all in their power to secure a material improvement in the rice situation in this country without further delay.
2. That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appoint a Rice Mission consisting of unofficials to visit rice producing countries, such as Siam, Indo-China and Burma, and study the marketing conditions of rice on the spot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an increase in the rice imports into the Malayan Union from these countries.
3. It has recently been stated by the Rt. Hon'bl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t Malaya is 85% self-sufficient in the supply of rice. Assuming that the average rice consumption per person (adults and children) is 4 gantangs, i.e., 24 kattis a month or 6 kattis a week, the Malayan Union's

圖 12. 日軍投降撤退後，隆雪中總在英國軍方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 管治期間，協助控制米糧分配。（圖片來源：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編號：1957/0620754，筆者複製提供。）

二戰結束後，戰前會長李孝式召集昔日會友和董事，復辦雪蘭莪中華總商會。他也大力促成馬來亞中華商會聯合會（今馬來西亞中總）的成立，該會成為團結華人社群向政府反映民意的重要組織。[27] 此外，商會也積極參與建國的過程，並努力維護華人社群的權益。例如，隆雪中總在 1947 年審閱《馬來亞聯邦憲制建議書》後，要求政府改善相關憲法草案，包括立法會的華人議員應與馬來議員人數相同；土生華人應為當然公民；申請公民權無需受語言資格限制。又如，隆雪中總配合商聯會發動全國休業，抗議新憲制書。雖然最終未能如願，但大總督唐納最終答允將抗議聲音轉達給英政府。儘管雪蘭莪中華總商會反對馬來聯邦憲制，但是當商會接獲時任聯邦總督來函，要求推舉代表為馬來亞聯合邦立法會議員時，該會經討論後決定派邱德意、陳光漢和梁長齡為代表，出任聯合邦立法會議員。還有一個例子，即 1954 年英殖民政府發佈《聯合邦民選白皮書》後，華巫兩族都對其中第 21 條有關選舉的內容不滿意，其後要求英政府派人來馬調查卻遭拒絕。隆雪中總於 1954 年 6 月 18 日舉行緊急會議，議決將兩名代表商聯會出席立法會的議員梁長齡和辜承福撤回，其餘擔任官方各種委員的商會會員，除慈善事業以外一律辭職。當時雪州共有 132 華人團體響應此次行動，最後英



圖 13. 商會積極支持籌辦馬來亞第一所中文大學——南洋大學，並成功籌募 170,000 元。圖為 1955 年南洋大學開幕的盛況。（圖片來源：筆者收藏圖片）



圖 14. 卸任會長李孝式（右一）隨團前往英國倫敦參與馬來亞獨立談判，是當時簽署獨立協議的唯一華人代表。（圖片來源：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筆者複製提供。）

政府同意修正白皮書第 21 條。

馬來亞頒佈緊急法令初期，商會扮演了英殖民政府和華人社群之間的溝通橋樑。1949 年，時任商會會長李孝式也是聯邦立法議會成員，他呼籲英國政府要以道理而勿以武力爭取底層華人社群的效忠。1955 年，當反共青年聯盟警告吉隆坡雜貨商莫販賣任何從共產黨中國進口的產品時，商會亦挺身而出捍衛商家和民眾利益，稱人民其實已經習慣購買來自中國的廉價物品。

1969 年 5 月的馬來西亞第三屆全國大選後，馬來半島幾個主要城市發生了一場持續近半月的街頭暴力事件。在這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中，商會成為協助政府處理善後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解決糧食配給的問題。最後，由商會認購米糧，讓警方護送交付各零售商，並將救濟食品派往各救濟中心。當時擔任副會長的拿督李潤添受邀在電台廣播和電視節目中呼籲商人勿趁機抬高物價。“五一三事件”後，華人在政治上被邊緣化，在商業方面也面對許多不利華商的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提出重整各族群在經濟上所佔份額的“新經濟政策”。由於當時的華裔政黨馬華公會無法為華人繼續發聲，商會也就漸漸脫離政治，將精力更多地投放於商業和經濟活動上。

五、以工商經濟作為導向（1975 年至今）

丹斯里李延年博士（1906—1983）當選隆雪中總的會長可以說是商會發展的分水嶺。和以前的會長相比，李延年不是一名政治人物，但從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他可以說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最有代表性的華人社團領袖。在那將近十年的時間裡，他是多個重要華人社團的最高領導人，其中包括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會長、雪蘭莪中華總商會會長、馬來西亞中華商會聯合會會長、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主席等。

李延年祖籍福建永春，1926 年南渡新加坡，後遷居吉隆坡，創業前曾擔任書記、橡膠買辦等職。二戰後，他的生意從橡膠業擴展至經營橡膠園、房地產建築、礦場工廠等，業務遍佈星、馬、港。

丹斯里李延年接任會長之後，積極革新會務：對內，他力求擴大與健全組織，增聘職員，廣招會員，每月出版會訊，每兩年編印會員行業名冊，購買會所地段，舉辦工商管理課程，設立文教基金及大專助學金，擴充經濟資料室，主催工商研討會，推廣為會員簽署產地證明書事宜，擇譯政府法令與條例，發佈商業詢問與貿易機會的消息；對外，則向政府交涉各項不



圖 15. 1985 年 4 月 4 日，為響應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經濟逆境中的號召，隆雪中總展開“購買國貨運動”。（圖片來源：《隆雪中總會訊》1988 年第 200 期，第 4 頁，隆雪中總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合理條例與限制，及時反映會員心聲，爭取華商應有的公平合理權益。由於各方面的支持合作，會務進展極有成效，使商會會員總數由原有的五百餘名增加至接近一千八百名。他針對政府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帶領華人進行自救和團結運動。這包括號召華人鄉團、工商團體共同推廣講華語運動，以及發動各州華人組織大會堂，並提出成立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華總）的申請。身兼隆雪中總與馬華工商聯合會會長的他，在 1978 年召開了“全國華人經濟大會”。這是華人工商界首次全國性的大會，旨在深入地討論華人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問題。從他接任會長開始，就奠定了商會以工商經濟為主的方向。

1980 年，馬來西亞的經濟受到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政府開始實施樽節措施，私人企業界也深感有未雨綢繆的必要。與此同時，馬來西亞也在追趕民主國家的腳步，走向工業化和全球化時代。隆雪中總不斷思考在這個轉變的年代中能扮演的角色，也經常對國家發展計劃與政策提出建言。1985 年，為了支持政府推動的購買國貨運動，鼓勵人們支持馬來西亞國內工業發展，隆雪中總籌劃了一系列座談會。除了推介本國產品外，也意在探討本國相關行業的前景和面對的難題，且在商家之間搭建良好的互動橋樑。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為了經濟自救，隆雪中總發起“馬來西亞愛國工委會”，主辦“愛馬來西亞國貨展銷會”，鼓勵國民購買國貨，從 1998 年至 2009 年共籌辦了八屆。商會對外也扮演了與國外商界，尤其是與世界各地華商溝通的橋樑。除了主動率領考察團赴海外訪問外，也曾參與舉辦第七屆世界華商大會，並在推動馬來西亞與中國經貿關係方面一直貢獻良多。

隆雪中總角色多重，除了重視工商經濟以外，也積極推動教育和中華文化。1976 年，李延年擔任隆雪中總會長期間，內部已有聲音主張設立教育基金，並在同年第九次董事會議通過接納教育組提呈的“教育基金工作計劃書”。繼任者黃琢齊擔任會長期間，商會推行以工商經濟為主、文教福利為輔的會務方針。在他的帶領下，商會為教育基金設定了百萬籌款目標，不分族群地發放助學金予馬來西亞的中學生和大專生，並在 1995 年設立貸學金。1989 年，商會與其他文教團體發起“馬華文學節”，至今隆雪中總共舉辦了 16 屆馬華文學獎活動。

結語

綜合上文所述，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華商作為華人社群領袖一直是他們與政府溝通的重要橋樑。縱觀隆雪中總成立的歷史，其實商會最初是華商為了應對或回應殖民地與中國政府的政策而成立的一個跨幫群組織。新移民通過商業活動累積了財富，其後通過參與商會被推舉為領袖，進而獲得當地政府的認可，並被

委以官職或勳銜。因其官職或勳銜，這些商人又被華人社群視為領導者和保護者，同時也是直接或間接代表政府的管理者或代理人。通過這樣的循環，這群領導商會的商人被各界視為理所當然的領袖，也就是施堅雅提出的甲必丹領袖模式。

二戰後，僅僅累積財富已不足以讓一個商人獲得成為領袖的資格，其受教育的程度亦受到了重視。同時，由於當時的馬來亞正邁入國家獨立的進程，更加需要政治力量的參與。此時的商會，作為一個非盈利組織，開始與政治切割，商人需要另一個平台以獲得領導權。華商通過其在商界和作為社團領袖的財力和號召力，組織政黨以獲得政治權利，開闢了商人成為領袖的另一條途徑。但在剛開始的過渡期，商會領袖仍舊既當“官”又從“商”，有“以商謀權，以權謀利”的現象。隨着社會的分工逐漸明確，商會開始擺脫政治，實施以工商經濟為主軸、文教福利為輔助的方針。如今，隨着商業已邁入全球化的時代，雪隆華商的着重點，不僅僅是對內，也需要放眼世界，接軌國際，繼續發揮其影響力。

附錄：歷任會長名單（1904—2022）

任期		會長
第 1 任	1904—1907	陸佑（Loke Yew ）
第 2 任	1907—1909	陳秀連（Chan Sow Lin）
第 3 任	1909—1911	朱晴溪（Choo Cheng Kay）
第 4 任	1911—1912	陸秋傑（Loke Chow Kit）
第 5 任	1912—1914	陸秋泰（Loke Chow Thye）
第 6 任	1914—1922	葉隆興（Yap Loong Hin）
第 7 任	1922—1930	陸秋泰（Loke Chow Thye）
第 8 任	1930—1932	劉良顏（Low Leong Gan）
第 9 任	1932—1936	黎德祿（Lai Tet Loke）
第 10 任	1936—1938	楊旭齡（Yong Shook Lin）
第 11 任	1938—1940	黃重吉［Ng Teong (Tiong) Kiat］
第 12 任	1940—1941	李孝式（Lee Hau Shik）
第 13 任	1946—1955	李孝式（Lee Hau Shik）
第 14 任	1955—1959	張崑靈（Chong Khoon Lin）
第 15 任	1959—1965	陳光漢（Chan Kwong Hon）
第 16 任	1965—1973	陳東海（Tan Tong Hye）
第 17 任	1973—1975	李潤添（Lee Yoon Thim）
第 18 任	1975—1983	李延年（Lee Yan Lian）
第 19 任	1983—1987	黃琢齊（Wong Tok Chai）
第 20 任	1987—1991	林玉靜（Lim Geok Chan / Lim Yock Ching）
第 21 任	1991—1995	顏清文（Ngan Ching Wen）
第 22 任	1995—2003	林源德（Lim Guan Teik）
第 23 任	2003—2012	鍾廷森（Cheng Heng Jem）
第 24 任	2012—2021	戴良業（Ter Leong Yap）
第 25 任	2021 至今	吳逸平（Ng Yih Pyng）

註釋：

1. Pek Koon He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8–26; C. 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p. 61–70; 朱英、鄭成林、魏文享：《南洋中華商會研究：回顧與思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7 期，第 108 頁。
2. 參見石滄金：《馬來西亞華人商會組織發展簡析》，《江蘇商論》2005 年第 11 期，第 152–154 頁；[馬] 黃昆福主編：《馬華商會史》，吉隆坡：吉隆坡馬華商聯會，1974 年。
3. 黃露夏：《馬來西亞詩巫中華總商會的發展與前景》，《華僑華人與僑務》1996 年第 1 期，第 31–35 頁。
4. 參見日本學者篠崎香織對 1903 年成立的檳州中華總商會的研究。Shinozaki Kaori,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903: Protecting Chinese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Two State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9, no. 1 (290), 2006, pp. 43–65.
5. Danny Wong Tze Ken et.al., *Lead and Grow: 115 Yea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22.
6. 隆雪中總曾多次更名，曾使用過的名字包括：商務局、中華商務局、雪蘭莪中華商務總會、雪蘭莪華商總會、雪蘭莪中華總商會、吉隆坡中華總商會、雪蘭莪華人總商會、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工商總會（1983—2010）與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2010 年至今）。本文按照不同的歷史時期，使用其對應的名稱。
7. 朱英：《論晚清的商務局、農工商局》，《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74–91 頁。
8. 參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上海工商社團志》編寫組：《上海工商社團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
9. 《歷任會長：先驅》，載“領航館”（KLSCCCI Gallery）網站，historygallery.chinesechamber.org.my/cn/pioneer/，2022 年 9 月 14 日。
10. Danny Wong Tze Ken et.al., *Lead and Grow: 115 Yea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22.
11. 甲必丹是荷蘭語“kapitein”的福建語音譯，意為“首領”，與英語“captain”同源。
12. G. William Skinner,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Paradigm for a Paradox", in Gehan Wijeyewardene eds.,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G. William Skinner,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13. Yen Ching-hwang,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930", in Tay Lian Soo and Chang Chak Yan eds., *Chaozhou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Essay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ochew Studies)*, vol. 2,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94.
14. 這可從各籍貫會館或組織成立的年份窺探一二：最早是惠州公司（1864 年），接着是茶陽（大埔）公司（1878 年）、福建公司（1885 年）、赤溪公館（1885 年）、廣肇會館（1886 年）、海南會館（1889 年）、潮州會館（1891 年）、嘉應會館（1898 年），以及廣西義山（成立於 1898 年，即 1922 年成立的廣西會館的前身）。
15. “大華樓”設立在“平民醫院”（Pauper Hospital）內，主要收容年邁無依的華裔，給予醫藥和生活上的照顧。大華樓基金會由五位委員組成，由葉觀盛出任首任主席。
16. 後於 1895 年正式改名為“同善醫院”。
17. Danny Wong Tze Ken et.al., *Lead and Grow: 115 Yea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22.
18. “傘形組織”是指保護其成員組織的共同利益，並協調它們的活動的大型機構。例如華人總商會，不分行業的代表各個華人業緣團體和企業。有關傘形組織的進一步討論，請參閱 Theresa Chong Carino, *Chinese Big Business in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Chang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19. [馬] 李業霖：《陸佑》，載 [馬] 林水檬編：《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創業與護根》，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3 年。
20. 參見《政治官報》1909 年第 518 期，宣統元年閏二月初八（1909 年 3 月 28 日），第 324 頁；《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7 月 22 日，第 3 版。
21. *Burlington Weekly Free Press*, 6 July 1905, p. 6; *The*

Olneyville Times, 7 July 1905.

22. 《南洋商報》1938 年 6 月 10 日，第 3 版。
23. 進一步討論請參考 Wang Gungwu,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Gehan Wijeyewardene eds.,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p. 208–221.
24. 王賡武套用中國傳統“仕農工商”的社會等級觀察，認為戰後馬來亞的社會等級也可分為“仕商工農”四個層次。最高階是“仕”，包括英裔軍官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亞裔；其次是“商”，即受政府官員青睞的華商和歐籍商人；第三階是由居住在城鎮和新村的文員、教師、工匠、勞工和“棚戶”組成的“工”這個群體；最低一階的是“農”，由馬來農民組成。請參閱 Wang Gungwu,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Gehan Wijeyewardene eds.,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25. 爵士是英國授勳制度中的一種敬稱。丹斯里（Tan Sri）與敦（Tun）是由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頒授，屬於聯邦封銜。各州蘇丹或州元首頒授的則有拿督斯里（Dato' Seri）和拿督（Dato 或 Datuk)。
26. 對於“紳商”一詞的討論，可參考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巨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35 頁。
27. Tan Miau Ing, *Tun Sir Henry Lee Hau Shik, Ahli Perniagaan dan Tokoh Politik*,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18.



南洋研究

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

梁永澤 *

摘　要 歐洲玻璃畫繪製工藝傳入中國後，粵澳外銷玻璃畫蓬勃發展。自十八世紀後期，廣東玻璃畫批量外銷歐美，同時銷往印度、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印尼等亞洲沿海國家。玻璃畫作為時尚室內裝飾品，首先流行於這些國家的宮廷及上層社會，印度、泰國、越南等國的王室多次訂製廣東玻璃畫裝飾宮廷或寺院。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後期，一些廣東玻璃畫師前往印度、越南、緬甸、柬埔寨、印尼等國繪製與售賣玻璃畫，並將玻璃畫繪製技藝傳至所在國，客觀上擔當了西方藝術的傳播者，為推進東西方文明藝術互動與文化交融發揮重要作用。十九至二十世紀，玻璃畫開始在上述國家的民間流行與傳播，題材內容及風格技法等漸趨本土化。

關鍵詞 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印度；東南亞；文化藝術交流

引言

玻璃畫，是以油、蛋類、膠類及蛋彩畫顏料在無色或淺色透明的平板玻璃背面繪畫，從玻璃正面觀賞的工藝美術。[1] 因其反繪正看，故又稱反繪玻璃畫（Reverse Painting on Glass）。該工藝起源於歐洲，伴隨西洋平板玻璃製造技術的發展而演變，並被傳播至世界各地。玻璃畫繪製技藝可能於 1583 年前由歐洲耶穌會士傳入澳門，此後，又經傳教士傳至廣州與蘇州。[2] 廣州畫師自清雍正年間開始繪製玻璃畫，並結合名貴木料製作屏風、宮燈等室內裝飾器物進獻宮廷。[3] 在清前期“廣州貿易”體制下，歐洲諸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往返於廣州與歐洲，廣州口岸外銷工藝品五花八門，玻璃畫憑藉其繪工精湛、售價及出口稅低而備受青睞，吸引來華西方人競相繪製寫真肖像，遠隔重洋的歐洲貴族也頻頻慕名訂購。[4] 當時，澳門是廣東外銷玻璃畫的另一繪製中心，[5] 描繪澳門風光成為外銷玻璃畫的暢銷題材，一些廣州外銷畫師追隨外商的腳步，或前往澳門繪製並售賣畫作，[6] 或將畫作運往澳門發售。[7] 十八至十九世紀前期，各類廣東玻璃畫器物風靡歐美諸國，成為皇宮、城堡、莊園及府邸的時尚裝飾品，大批外商訂單促成清代廣東玻璃畫產業的繁盛。

近年來，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研究備受東西文化藝術交流史領域的關注，海內外學界已基本釐清清代廣東玻璃畫在歐美的銷售情況，[8] 但對其在亞洲沿海國家的傳播情況缺乏應有的關注。對於此部分內容的挖掘與梳理，有助於拓展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的研究範疇，突破以往廣東外銷玻璃畫僅銷往西方的單一認識。目前，在此領域僅見三位學者的個案研究：2016 年，派特森（Jessica L. Patterson）發表《泰國寺院中的中國玻璃畫》一文，以泰國曼谷佛教寺院現存十九世紀中國玻璃畫實物為研究對象，指出暹羅國王拉瑪三世（Rama III）主張中暹貿易，中國外銷玻璃畫遂被貿入並懸掛於寺廟，對此後泰國本土玻璃畫及壁畫繪製產生重要影響；[9] 2017 年，達拉皮柯拉（Anna L.

* 梁永澤，2013 年畢業於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2017 年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獲理學碩士學位；2021 年畢業於暨南大學文學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方向為明清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史、民族學。



圖 1.《黃埔錨地》，廣東外銷玻璃畫，約繪於 1784 至 1785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The Anchorage at Whampoa Island* (about 1784–1785). CMoG 2002.6.5.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Dallapiccola）的《印度玻璃畫》圖冊出版，述及印度半島西部沿海地區自十八世紀後期已有中國玻璃畫師客居，他們以繪製印度題材的玻璃畫為業，促成中國玻璃畫藝術對印度的影響；[10] 2019 年，阮氏碧柳的《越南歷史文化交流中的順化宮廷玻璃畫》一文，對越南順化皇宮現存各類玻璃畫進行調研，指出這些作品均由阮朝皇室自中國訂購。[11] 2020 年 2 月，瑞士蘇黎世大學東亞藝術史部與羅蒙彩繪玻璃博物館聯合舉辦“中國與西方：對中國玻璃畫的再認識”國際研討會，將“其他東亞國家的反繪玻璃畫傳統”定為當前國際玻璃畫研究領域的 13 個核心議題之一。[12] 鑑於此，筆者在充分搜剔耙梳中外相關圖文史料的基礎上，系統考察清代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及影響，並對其本土化進程展開探討，以冀推進研究。

一、廣東畫師與印度玻璃畫

十六至十七世紀，伴隨新航路的開闢，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為擴大海外貿易市場，先後在印度沿海地區建立貿易據點。為“與亞洲各個富有的王國開展貿易”[13]，英國成立了東印度公司，自十七世紀下半葉，該公司逐漸演變為集商貿、政治、軍事及司法性質於一體的綜合組織。[14] 至十八世紀中期，



圖 2.“滿大人”鏡子畫之一，廣東外銷玻璃畫，約繪於 1750 至 180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Pair of Reverse-Painted Mirrors* (about 1750–1800). CMoG 2019.6.15 A.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圖 3.“滿大人”鏡子畫之二，廣東外銷玻璃畫，約繪於 1750 至 180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Pair of Reverse-Painted Mirrors* (about 1750–1800). CMoG 2019.6.15 B.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英國已憑藉經濟及軍事實力，將葡萄牙、荷蘭、法國等殖民勢力逐出印度。在英國的操縱下，日趨衰落的莫臥兒帝國對印度僅僅維持着名義上的統治。[15] 海上貿易的發展，使西洋平板玻璃被舶至印度。1618 年，一位駐印度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在書信中寫道：

> 雖然在上次遠洋貨運到了一箱嵌窗玻璃，但我找不到任何玻璃製造師，他們都去了波斯。[16]

可見平板玻璃在當時的印度尚屬稀罕。此後，進口商品深得印度王室喜愛，他們不僅購買玻璃、玻璃鏡、枝形吊燈、鐘錶等西洋製品，還從中國廣東訂製玻璃畫。[17] 十八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最後的 25 年，歐洲中部大量玻璃畫銷往波斯、印度、印尼、中國、日本等國，對亞洲國家本土玻璃畫的繪製產生重要影響。[18] 然而，從印度現存的早期玻璃畫實物來看，這些玻璃畫及其繪製技藝似由中國傳入。

現藏康寧玻璃博物館的鏡子畫《印度莫臥兒貴族坐像》（*Reverse-painted Portrait on Mirror Glass Depicting a Mughal*

Nobleman）[19]，由廣東佚名畫師繪於 1760 至 1780 年。該作以中式描金漆框鑲嵌，畫面諸多細節表明，此為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一位貴族畫像的複製品。畫中人物身穿莫臥兒時代的服飾，腰際佩戴一把腰刀，半持着左手平視前方，側身跪坐在露台的席位上，身旁席墊上放置一柄長劍，他或為西孟加拉邦的納瓦布沙哈馬特・章（Nawab of Shahamat Jang）。另一現藏於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印度細密畫《沙哈馬特・章與侄子、養子及官員在露台上》（*Shahamat Jang with His Nephew and Adopted Son Ikram al-Daula on a Terrace with an Official*）[20]，繪於 1750 至 1755 年。畫中人物酷似上述鏡子畫人物，據此推知，早期印度玻璃畫當由中國畫師複製此類作品，再以中式漆框裝裱舶至印度銷售。

十八世紀後期，印度西海岸形成活躍的中國玻璃畫市場，一批定居於此的中國廣東玻璃畫師創作了大量作品，這些畫作現今分佈在卡奇（Kutch）、印多爾（Indore）、邁索爾（Mysore）的賈甘穆罕宮（Jaganmohan Palace）、薩拉達（Satara）的宮殿、孟買及印度西海岸城鎮，繪製時間可追溯至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當時王室及貴族聘請中國玻璃畫師繪製玻璃畫裝飾宮殿。[21] 這一時期，廣東外銷歐美的玻璃畫主要在透明平板玻璃上複製西方畫作的銅版畫印刷品，這種風格的玻璃畫同時也銷往印度。現藏皮博迪埃塞克博物館的全彩玻璃畫《奧德納瓦布舒賈—烏德—道拉及諸子肖像》（*Portrait of Shuja-ud-daula, Nawab of Oudh, and His Sons*）[22]，約繪於 1796 年，由廣東畫師複製英國肖像畫家蒂伊・基特爾（Tilly Kettle）的油畫鐫刻版畫而成，奧德里克（Thierry Audric）根據該畫黑色內框上的星星圖案，推測其繪製時間為 1800 年前後，繪製者或是廣州畫師發呱，[23] 促成該訂單者可能是在華經商的印度港腳商。[24]

十八世紀，印度王室及貴族視玻璃畫為奢侈藝術品，當時玻璃畫一方面由中國或歐洲進口，另一方面由定居印度的廣東玻璃畫師繪製。廣東玻璃畫師的到來，對印度本土玻璃畫的興起無疑產生重要影響。筆者認為，印度畫師掌握玻璃畫繪製技藝有兩條途徑：其一是由廣東玻璃畫師傳授，其二是臨摹中國或歐洲的玻璃畫作品。為滿足國內社會各階層對玻璃畫的需求，印度玻璃畫師繪製的作品“在畫面細節刻畫、精心繪製及深入程度等方面差別很大”[25]。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印度玻璃畫師已在印度各地開設玻璃畫坊，主要集中在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古吉拉特邦（Gujarat）和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絕大多數玻璃畫師的姓名及生平無考，他們以微薄的收入維持生活，有的活躍於鄉村社區及行會，有的為王室、貴族及宗教團體服務。[26] 至十九世紀中葉，印度玻璃畫已形成南、北、西三個風格鮮明的地域流派：

（一）南部風格。這一風格主要流行於當時英屬馬德拉斯總統府（Madras Presidency）管轄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特倫甘納邦（Telangana）、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喀拉拉邦（Kerala）、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及奧里薩邦（Orisha）等印度南部地區。當時最受歡迎的題材是印度神祇與英雄，這類作品是印度玻璃畫中最多產且最具視覺表現力的，例如繪於十九世紀末的玻璃畫《馬希沙蘇拉》（*Mahishasura*），以清晰對稱的構圖描繪印度教水牛惡魔馬希沙蘇拉被難近母降服，圖像用黑色輪廓勾勒，敷色鮮艷且貼飾金箔，人物造型及裝飾均呈現鮮明的印度傳統繪畫特徵，畫中的彩色玻璃燈體現出對當時外來文化元素的吸收。[27] 此外，印度南部玻璃畫師也繪製國王、貴族、藝伎、音樂家等人物肖像，[28] 這類世俗題材的作品繪製風格不同於宗教神祇題材，畫面出現大量西洋風格裝飾元素，如繪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佇立梳妝枱旁的藝伎》（*"Courtesan" Standing near a Dressing Table*），畫中佇立一位穿戴傳統服飾的印度藝伎，其身旁為維多利亞風格的桌椅、梳妝鏡支、羅馬柱及窗簾等西洋陳設，反映出殖民統治下英國文化對印度上層社會室內裝飾的影響。[29]



圖 4.《講授〈聖經〉》，據法國畫家讓—巴蒂斯特・格勒茲油畫作品所鐫刻的銅版畫印刷品複製，廣東外銷玻璃畫，繪於 1760 至 180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La lecture de la bible*, after Jean-Baptiste Greuze (1760–1800). CMoG 83.6.3.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二）北部風格。該風格以印度北部奧德土邦（Oudh）女子肖像題材的玻璃畫為代表，[30] 如繪於十九世紀後期的《吸水煙的藝伎》（*"Courtesan" Smoking a Huqqa*），人物手指被染成紅色，這是北部玻璃肖像畫的顯著特徵之一，女子身穿緊貼胸圍的緊身衣，與印度南部玻璃畫對女子乳房的避諱截然不同，體現出北部玻璃畫師受歐洲繪畫時尚服裝的影響。這種緊身衣也出現在十九世紀中國仕女題材的玻璃畫中，但奧德土邦以繪製印度傳統細密畫（miniature）為主，該地區玻璃畫產量遠不及南部與西部。[31]

（三）西部風格。其多為十八至十九世紀定居印度西海岸的廣東玻璃畫師繪製的玻璃畫。[32] 這些廣東玻璃畫家應定居於古吉拉特邦海岸，該邦因此成為印度玻璃畫的繪製中心之一。這些中國畫師的作品色調與風格非常獨特，



圖 5.“微型玻璃畫”，廣東外銷玻璃畫，繪於 1783 至 181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Miniature Reverse Painting (1783–1810). CMoG 2005.6.2.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通常以藍、紅、白及灰色（趨於紅或藍）為主色調，由於明暗光影對比較弱，畫面空間感及人物立體感均不顯著，對人物五官尤其眼神的刻畫極具中國特色，與同時期中國的玻璃畫風格如出一轍，較之其他印度玻璃畫流派截然不同。畫師雖然注重對人物頭部及服飾的精緻描繪，但對人物手足的刻畫略顯粗陋，這也是此類作品的特徵之一。[33] 在圖冊《印度玻璃畫》中，有 22 幅玻璃畫是由中國畫師繪於十九世紀中期，畫技遠不及十八至十九世紀初期的廣東外銷玻璃畫。按其畫面內容可大致分為世俗與宗教兩類題材，世俗題材的玻璃畫多為肖像畫，既有印度王室、貴族、藝伎、樂師等人物肖像，又有根據歐洲版畫複製而成的作品。描繪印度王室及貴族的肖像畫，如《庫納什國王肖像》（*Portrait of the Raja of Kunash*）與《帕西紳士肖像》（*Portrait of a Parsi Gentleman*），這類作品大多複製細密畫頭像而成，委託人的出價決定畫作繪製的精緻程度。[34] 與當時中國情況相似，描繪休閒場景中的美女也成為印度玻璃畫的暢銷題材，筆者發現該題材的兩幅玻璃畫構圖彼此對稱重合，由此可知兩幅作品採用同一繪製摹本。[35] 這類作品還體現出印度與異國（中國、西洋）元素的有機結合，如《坐着吸水煙的藝伎》（*Seated "Courtesan" with Huqqa*）描繪了在鋪有花紋地毯的露台上，一位頭戴西洋寬簷帽的印度藝伎坐在中式圈椅上吸印度水煙，背景僅為露台圍欄、一排樹及天空，這類春宮畫性質的作品也是同時期清代廣東玻璃畫的常見題材。[36] 另外，中國畫師還根據歐洲版畫印刷品複製玻璃畫，以滿足印度社會各階層的異國情調，如繪製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喬治三世肖像》（*Portrait of George III*）似複製於英國畫家湯瑪斯•弗萊（Thomas Frye）的版畫印刷品，另一幅《荷蘭酒館場景》（*Dutch Tavern Scene*）則可能是據荷蘭風俗畫或版畫粗略複製而成。[37]

除世俗題材外，廣東玻璃畫師還嘗試複製與創作印度宗教題材的玻璃畫，但因中國畫師對印度繪畫及宗教背景理解有限，許多細節處理是按照中國人的理解自行發揮，反而使此類作品別具趣味。如繪於十九世紀中期的玻璃畫《象頭神迦尼薩》（*Ganesha*），該作描繪了印度教的智慧之神迦尼薩，其構圖設色酷似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收藏的一幅紙本水彩。[38] 該水彩畫約繪於 1830 年，為印度卡利格特繪畫（Kalighat painting）風格，顯然玻璃畫是複製於這幅水彩作品，但又與原作不盡相同。中國畫師在畫面細節處理上進行了發揮：將迦尼薩的頭飾畫成類似中國摺扇的樣式，三隻眼睛的刻畫凸顯中國人物特徵，以一片類似的“芭蕉葉”替代多圈項鍊，添畫類似中國夔龍的紋樣作為裙飾，並在原作基礎上添加山峰、

草叢等風物作為背景，如此較之原作更為生動有趣。[39] 再如繪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玻璃畫《瓦西希塔馬哈希崇拜卡瑪德亨努》（*Vasishtha Maharishi Worships Kamadhenu*），描繪了印度教聖牛女神卡瑪德亨努接受賢哲瓦西希塔崇拜的場景，該畫可能是受同題材的如坦賈武爾（Tanjore）等南印度傳統繪畫的啟發而作。畫中的賢哲瓦西希塔坐在須彌座上，廣東玻璃畫師或許因不了解印度高冠髮式，故將一頂中式“瓜皮帽”戴在賢哲瓦西希塔頭上，並一改印度繪畫中瓦西希塔坐於鹿皮上的形象，擅將鹿皮覆蓋在他的膝蓋上。[40]

十九世紀的廣東外銷玻璃畫大批銷往印度。美國傳教士兼外交官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曾於 1833 至 1876 年間居住於中國，他在 1848 年首版的《中國總論》中提及：

> 印度教徒大批量購買繪有該教神祇與女神的玻璃畫。[41]

可見，當時印度雖然已有玻璃畫師繪製玻璃畫，但仍然從中國廣東大批訂購宗教題材的玻璃畫。另外，福克蘭夫人（Lady Falkland）1848 年在印度旅遊，曾於薩塔拉（Satara）宮廷內見到大批中國玻璃畫：

> 這些牆壁上掛滿玻璃畫，顯然是從普通的英國版畫複製的。這些玻璃畫是在中國繪製的，它們被一幅挨着一幅地擺放，以致非常擁擠。這些畫被不分主題地擺放在一起：現代的國王和英雄，來自希臘和羅馬的古代神靈和女神以及印度諸神，都被混在一起了。[42]

作者明確指出“這些玻璃畫在中國繪製的”，而並非由此時定居印度的廣東玻璃畫師所繪，這說明十九世紀中期的印度是廣東玻璃畫的重要外銷市場。晚清西洋攝影術東傳，衝擊着包括玻璃畫在內的廣東外銷畫產業，攝影術能直接記錄影像，較之請畫師寫真留念更為客觀真實，因而頗受來華西方人喜愛。隨着“先進的照相技術出現和推廣應用，廣州外銷畫原有的重要的圖像記錄功能逐漸被取代”[43]，導致廣東玻璃畫在歐美市場日趨衰落，而此時印度王室卻仍然大批購買並陳設宮中。

二、泰國寺院中的廣東玻璃畫

早在十七世紀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就將本國生產的平板玻璃鏡作為“廣告禮物”贈予與之交好的暹羅大城王朝的那萊王（Narai the Great）的特使，促成日後那萊王室從法國聖戈班（Saint-Gobain）訂製 400 面（一說 4,264 面）玻璃鏡。[44] 此後“那萊王被一場政變推翻，法國人 1688 年逃離暹羅國時，三個法國鏡子工匠被捉住做了人質”[45]，可見暹羅曾想藉助法國工匠引進製鏡工藝，但未能實現，期間也未見關於玻璃畫的文獻記述。十九世紀上半葉，廣東玻璃畫在泰國盛行，完全得益於暹羅曼谷王朝國王拉瑪三世。拉瑪三世是一位中國文化愛好者，他在 1824 至 1851 年在位期間奉行親華政策，鼓勵中暹貿易，粵海關特設“本港行專管暹羅貢使及夷客貿易、納餉之事”[46]，廣東外銷玻璃畫等商品被貿至十九世紀的暹羅。與此同時，拉瑪三世大力提倡中式寺廟建設，並將大量廣東玻璃畫懸掛在寺廟中。據派特森統計，曼谷至少有臥佛寺（Wat Pha Chetuphon）、蒂達拉姆寺（Wat Thephidaram）、那濃寺（Wat Nangnong）、帕齊尼那寺（Wat Phakhininat）、甘拉耶納密佛寺（Wat Kanlayanamit）、鄭王廟（Wat Arun）、蘇旺那潤寺（Wat Suwannaram）等佛教寺院的戒堂掛有廣東玻璃畫，這些寺院均由拉瑪三世及朝廷官員捐資興建或修繕。[47]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曼谷臥佛寺的廣東玻璃畫，該寺毗鄰曼谷大皇宮，是泰國久負盛名的寺院，寺內現存 45 幅廣東玻璃畫（見表一）。在戒堂的 15 根內柱上，每根柱都呈品字形掛置三幅一組的場景類玻璃畫，每組頂端均為表現《三國演義》戰鬥的場景畫，下方兩幅均為廣州口岸風光畫，這些圖像被用以裝飾佛教寺廟本不協調，但充分體現拉瑪三世鼓勵對華貿易與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表一. 臥佛寺藏廣東玻璃畫統計表

類型	數量	具體內容
三國戰鬥場景	15 幅	8 幅（4 對，每對構圖相同）複製品；3 幅為一套作品；4 幅獨立作品。
廣州口岸風光	30 幅	8 幅繪有運河中懸掛丹麥國旗的小船；6 幅為廣州十三行；6 幅繪有各種船隻，大多為英國船，其中 2 幅是裝帆的早期蒸汽機船；3 幅為遠眺澳門南灣風光；3 幅為從地峽[48]瞰澳門景致；2 幅為廣州珠江荷蘭炮台；1 幅或為澳門海濱的中國廟宇；1 幅是描繪神話動物歡躍場面。

資料來源：Jessica L. Patterson, "Chinese Glass Paintings in Bangkok Monaster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66, no. 2 (2016), pp. 165–168.

除現存實物外，當年赴泰國的外國使節也曾見曼谷寺院的廣東玻璃畫，並留下珍貴文獻記述。如英國外交官約翰・克勞福（John Crawfurd）於 1821 年以印度總督使者身份出使暹羅，受到拉瑪三世接見，並有幸參觀曼谷宗通寺（Wat Phrathat Si Chom Thong Worawihan），目睹懸掛於寺院的中國玻璃畫，對此他記錄道：

> 我們不費任何困難就被允許參觀各個房間。前輩自己的一些裝飾物，即使放在正確的位置，亦令我們感到奇怪。這些都是用鍍金畫框裝裱的中國複製的西方圖畫。例如，一幅畫展示了一次獵狐活動，另一幅畫則展示了鄉村生活的魅力，第三與第四幅畫是著名的英國美女肖像畫。這些複製品中許多都是我們最好的印刷圖案，而中國人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設法將它們廣泛傳播。在暹羅，它們很常見，我相信旅行者也會在柬埔寨、老撾或中國本土發現它們。[49]

該寺位於曼谷吞武里府西岸宗通區（Chom Thong），為拉瑪三世的專屬佛寺。雖然克勞福並未說明這些“中國複製的西方圖畫”畫在玻璃上，但該寺現存此時期同題材繪畫均為玻璃畫，故克勞福記述的應該就是玻璃畫。除了寺院，泰國大皇宮也有這類複製西方作品的廣東玻璃畫，1825 年英國外交官亨利・伯尼（Henry Burney）出使暹羅，在大皇宮獲拉瑪三世接見時，他注意到宮殿內柱上的中國玻璃畫：

> 每根柱子上都掛着一幅巨大的繪有歐洲官員或女士的中國玻璃畫。[50]

不僅寺廟與皇宮懸掛廣東玻璃畫，曼谷一些華人家庭也以廣東玻璃畫裝飾室內，如曼谷中國城小市場社區的蘇恒泰老厝，為拉瑪三世時期著名華商蘇氏族人的住宅，始建於 1782 年，是閩南風格的庭院，其祖先於大城王朝以從事中國福建至暹羅的絲綢和乾貨貿易起家。蘇恒泰老厝的祖先堂祭台上方屋頂樑懸掛了五幅玻璃畫，中央為一套三幅，左右兩側各一幅，均為博古圖題材的鏡子畫。[51]

由此可見，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廣東玻璃畫在歐美市場日趨衰落，但其在亞洲國家卻傳播開來，在拉瑪三世時期的暹羅上層社會流行。但廣東玻璃畫的繪製技藝似乎未傳入暹羅，僅限於部分繪畫內容（如博古圖）及鏡框裝幀形式被泰國寺廟壁畫吸收借鑑。[52] 十九世紀中葉，中暹貿易日趨衰落，1851 年拉瑪四世（Rama Ⅳ）繼位，其酷愛西方文化並採取親西方的政策，與西方國家簽訂一系列開放通商條約，[53] 歐洲藝術在這一時期引領時尚，逐漸替代中國玻璃畫。

三、越南皇室與廣東玻璃畫

1672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試圖在越南東京（今河內）設立辦事處，贈予越南皇室及貴族一箱玻璃鏡（looking glass），其中包括獻給越南國王一面做工精湛的鏡子，送給王子一幅尺寸稍小的鏡子，但此後並未見關於越南皇宮出現鏡子畫或透明玻璃畫的記述。[54] 直至



圖 6. “四大洲”系列之《美洲》，歐洲中部外銷玻璃畫，繪於 1775 至 1799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America*, from the series "Four Continents" (1775–1799). CMoG 2012.3.6.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廣東外銷玻璃畫師應越南阮朝皇室的訂單要求，為其批量繪製中式風格的玻璃畫。這些畫作均以透明平板玻璃為繪製基體，畫心多為藍、青等冷色調，並鑲嵌以雕花鍍金的中式畫框，作品大致可分為純繪畫、繪畫配紹治帝詩歌、書法銘文等三種形式，主要分佈於越南阮朝都城順化的皇城宮殿及皇家陵寢的某些殿堂。[55]

順化皇城許多重要宮殿都懸掛了廣東玻璃畫。據越南順化古跡保護中心最新統計，現存於宮中的玻璃畫約一百餘幅，其中有 90 幅具有較高藝術價值。[56] 這些畫作或懸掛於殿中立柱，或懸掛在殿間遊廊與殿前門廊，懸掛方式以底框為固定點向前轉 45 度角，均以中式雕花鍍金鏡框鑲嵌。如位於皇城西麓的阮朝皇太后居所延壽宮，其殿內即懸掛數幅玻璃畫。又如順化宮廷文物博物館的主展廳隆安殿裡懸掛了六幅廣東玻璃畫，該殿為紹治帝（1807—1847）所建，原為阮朝皇宮的一部分，殿內當心間兩根立柱上懸掛的畫作，每組兩幅以“呂”字形雕花鍍金鏡框鑲嵌，上部分為書法銘文，下部分為歷史故事題材的玻璃畫作。

除皇宮外，越南順化皇陵一些殿堂立柱上也懸掛了廣東玻璃畫，如越南阮朝第四任國君嗣德帝（1829—1883）的行宮及陵墓——謙陵的和謙殿、良謙殿、沖謙榭等處，共懸掛從廣東訂製的玻璃畫二十餘幅。在皇帝生前起居及處理政事的重要殿堂中，一些玻璃畫配有阮朝第三任國君紹治帝的御製詩，如懸掛在和謙殿正中開間右側柱子上的一幅玻璃畫，鑲嵌以雕刻投壺、葡萄、蝙蝠、祥雲等圖案的中式鍍金鏡框，其中一幅描繪紹治帝在順化宮中與群臣宴飲的場面，畫面右上方以金粉書寫紹治御製漢詩《御製・春詠》，[57] 全詩錄下：

三始椒觴

舉觴孫子喜春來，家長堂前壽席開。
陳氏敷言千歲頌，成公高捧萬年杯。
肯推柏葉連斟酌，爭與屠蘇久醱醅。
從此香濃浮晉殿，原由禮意自釣台。

——紹治乙巳恭錄

與《春詠》懸掛一處的另外三幅玻璃畫，分別配以紹治帝御製詩《夏詠》《秋詠》《冬詠》，四首詩落款均為“紹治乙巳”（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四幅畫構成一套四季題材的組畫。1844 至 1845 年，紹治帝曾命內閣以多種形式整理他的詩歌，玻璃畫上的詩作即為一種整理形式，如描繪順化風光的組詩《神京二十勝景》均被製成玻璃畫。[58] 這些玻璃畫從中國廣東訂購，或許是將越南畫師的畫作與紹治帝御製詩一併交由廣東玻璃畫師複製到玻璃上，再經阮朝使節帶回順化。由於受歐洲攝影術東傳的衝擊，廣東外銷玻璃畫在歐美市場日趨衰

落，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遂成為晚清廣東玻璃畫的主要銷售市場。除上述玻璃畫外，還有一類繪有中國題材的作品，如紹治帝的陵墓昌陵表德殿內的兩幅博古圖玻璃畫，均以中式雕花鍍金鏡框鑲嵌，畫面上無題詩落款，從畫面題材及畫框風格可大致推斷為十九世紀中期作品，與嗣德陵內玻璃畫年代相近。從三種類型玻璃畫在越南宮廷流行的情況看，屬“東亞文化圈”內的越南深受中華文化濡染，這與同時期廣東玻璃畫在泰國宮廷及寺院的流行背景截然不同。現今越南宮廷及皇室陵寢仍保存許多十九世紀中期的廣東外銷玻璃畫，可見其當時僅作為奢侈裝飾品為皇室所享用，尚未在越南民間流行與傳播，在這方面則與廣東玻璃畫在泰國的傳播情況相似。此後直至二十世紀初，第一批廣東玻璃畫師移居越南，為阮朝皇室繪製玻璃畫，隨後陸續有數批廣東玻璃畫師前往越南謀生，並聚居形成專門繪製玻璃畫的村莊。[59] 由於玻璃畫繪製成本及售價低廉，此後數十年間自北向南傳播，逐漸成為一種流行於越南南部城鄉的藝術形式，人們通常將玻璃畫作為祈福裝飾物，不僅懸掛於門廊中門框上方，還懸掛在寺廟和寶塔內，畫作題材包括越南古代神話、民間故事、佛教及風景等。[60]

四、緬甸、柬埔寨、印尼的玻璃畫繪製傳統

除泰國、越南外，中國玻璃畫還銷往東南亞的緬甸和柬埔寨，其間可能有僑居兩國的廣東玻璃畫師將繪製技藝傳授給當地畫師。由於兩國人民多信奉佛教，故其玻璃畫內容多為佛教題材。[61] 緬甸玻璃畫可追溯至貢榜王朝中期（1782 至 1859 年），起初屬宮廷藝術，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流行於民間，主要用於描繪佛教功德及對佛陀的崇拜。據美國北伊利諾大學緬甸研究中心的凱薩琳・雷蒙德（Catherine Raymond）調研，位於泰國北部夜豐頌府（Mae Hong Son）的春甲鈴寺（Way Chong Klang）佛殿內的三面牆壁共鑲嵌 185 幅正方形玻璃畫，用以描繪佛本生故事，其中有過百幅畫面附有緬甸文字與數字組成的簡短標題，有人認為這些畫作由緬甸曼德勒（Mandalay）撣族畫師繪於 1857 年，可見緬甸與泰國民間玻璃畫的密切聯繫。[62] 關於柬埔寨的玻璃畫，英國外交官約翰・克勞福認為：“中國人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設法將它們廣泛傳播……我相信旅行者也會在柬埔寨、老撾或中國本土發現中國玻璃畫。”[63] 此番話或能反映其與廣東外銷玻璃畫的密切聯繫。柬埔寨玻璃畫在形制上與緬甸相似，用以描繪佛陀的生活並附有簡短標題，但在老撾與菲律賓卻沒有繪製玻璃畫的傳統。[64]

早在 1681 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曾以“廣告禮物”的形式將本國王家製鏡廠生產的“水晶鏡框大型馬鏡”贈予印尼國王，[65] 但此後未見印尼有關於玻璃畫的記述。直至十九世紀後期，可能由歐洲或中國的畫家將玻璃畫繪製技藝傳至印尼。截至目前，在印尼發現最早的一幅玻璃畫繪於 1884 年，由一名中國畫師繪製，現藏於丹麥博物館，該畫作是一印尼華人女子與一丹麥男子的結婚紀念肖像，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華人在玻璃畫傳入印尼過程中的媒介作用。[66] 奧德里克發現，在他見到的印尼玻璃畫中，有些是繪於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玻璃畫，它們屬於印尼華人社區成員。[67] 二十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是印尼玻璃畫的“黃金時代”，繪畫主題趨於本土化與現代化，融合了爪哇傳統人物形象、伊斯蘭主題及荷屬東印度時期的現代生活方式。[68]

結論

除泰國外，十八至十九世紀廣東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越南、緬甸、柬埔寨、印尼等亞洲國家的傳播，大都遵循一條相似的發展路線：起初作為宮廷藝術或貴族藝術在上層社會流行，此後伴隨各國畫師對玻璃畫繪製技藝的掌握，玻璃畫在當地的流行及傳播範圍逐漸擴展。在此過程中，各國畫師繪製的玻璃畫在內容題材及風格技法等方面均趨本土化：或將外來工藝與本土美術有機結合，如印度北部的玻璃畫；或依託本國社會文化背景，大批繪製特定題材的作品，如緬甸與柬埔寨的佛本生故事系列繪

畫；或以玻璃畫這一新工藝美術形式來表現本國繪畫母題，如越南皇宮與印度南部的玻璃畫。綜上可見，藝術傳播者與受傳者雙方“很難分出誰是純粹主動的傳播者，誰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在雙向交流、傳播的過程中，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分別以自身的需要為準則吸收對方的文化元素，不斷發生改變”[69]。

晚清西洋攝影術的發明與東傳，導致廣東外銷玻璃畫在歐美的銷售市場衰落，印度與東南亞轉而成為玻璃畫對外銷售的重要市場：印度王室從中國訂製各類題材的玻璃畫陳設於宮中，泰王拉瑪三世大量訂製廣東玻璃畫裝飾佛寺及皇宮，越南皇帝批量訂製廣東玻璃畫懸掛於皇宮及陵寢。其間，一些廣東玻璃畫師為尋找商機，前往印度、越南、緬甸、柬埔寨、印尼等國繪畫謀生，促成一個良性的美術交流過程。廣東玻璃畫師的創作既受制於居住國的社會文化藝術，同時深刻影響着居住國玻璃畫繪製傳統的根植，某些國家的玻璃畫繪製很可能始於廣東玻璃畫師的傳授。在此過程中，廣東玻璃畫師客觀上充當了西方藝術的傳播者，在不同文明藝術互動與文化交融中發揮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歐洲中部巴伐利亞等地繪製的玻璃畫也銷往亞洲，[70] 但其影響力遠不及中國玻璃畫。十九至二十世紀，玻璃畫逐漸在上述亞洲國家民間傳播，成為流行的平民藝術。

附：本研究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2 年度嶺南文化項目《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研究（1720—1820）》（GD22LN01）階段性成果；受中山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2qntd5601）。



註釋：

1. Sandra Davison,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Glas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3, p. 56.
2. 梁永澤：《最早傳入中國的玻璃畫在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2022 年總第 114 期，第 32–33 頁。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 冊）第 726 頁、（第 2 冊）第 43 頁、（第 4 冊）第 467 頁。
4. 梁永澤：《清代廣州外銷玻璃畫的商業性探究》，《藝術史研究》第 27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22 年，第 188–191 頁。
5. 穆家麒：《劉榮夫玻璃油畫展觀後感》，《國民雜誌（北京）》1943 年第 3 卷第 5 期，第 24 頁。
6. Charles Toogood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p. 91.
7. [美] 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番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0–91 頁。
8. 西方學者對此關注較早，1950 年，佐丹（Margaret Jourdain）與傑寧斯（R. Soame Jenyns）最先關注並介紹清代銷往英國的玻璃畫，此後，克勞斯曼（Carl L. Crossman）、沙進（William R. Sargent）、曹美琪等學者對外銷美國的清代玻璃畫進行梳理，孔佩特（Patrick Conner）、梅儒佩（Rupprecht Mayer）、奧德里克（Thierry Audric）等學者則將研究範圍擴展到清回流西方的各類玻璃畫。內地學者的關注相對較晚，萬青力在 1993 年首先對此進行宏觀常識性的介紹，隨後，胡光華、李超、莫小也、江瀅河、李世莊等學者則在綜合借鑑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試挖掘相關史料進行論述。
9. Jessica L. Patterson, "Chinese Glass Paintings in Bangkok Monaster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66, no. 2 (2016), pp. 153–185.
10.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11. [越] 阮氏碧柳：《越南歷史文化交流中的順化宮廷玻璃畫》，《河內開放大學科學學報》2019 年第 57 期，第 33–40 頁。
12. Elisa Ambrosio, Francine Giese, Alina Martimyanova and Hans Bjarne Thomsen, *China and the West: Reconsidering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Berlin: De Gruyter, 2022.
13. [美] 弗蘭克・薩克雷、[美] 約翰・芬德林主編，閆傳海譯：《世界大歷史：1571—1689》，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年，第 97 頁。
14. David Ludden and Gordon Johnso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1–114.

15. [英]H. G. 基恩著，趙秀蘭譯：《莫臥兒帝國：從奧朗則布大帝時代到萊克勳爵佔領德里》，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 年，第 340 頁。
16. "Letter from John Browne of 10 February 1618", in William Foster, *The 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1618–1621, Lond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6, p. 11.
17.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 12.
18. Sandra Davison,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Glas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3, p. 57.
19. *Reverse-painted Portrait on Mirror Glass Depicting a Mughal Nobleman*,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Museum number: 8B06AB2F-7AE4-441B-AB2D-017B24A2C48D.
20. *Shahamat Jang with His Nephew and Adopted Son Ikram al-Daula on a Terrace with an Official*, miniature painting of the court of the Nawab of Bengal, Alivardi Khan, by a Murshidabad artist, ca. 1750–1755, 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 Museum number: V.2021.33.
21. 卡奇是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轄縣；印多爾是印度中央邦西南部城市；邁索爾是印度西南部卡納塔克邦的城市，賈甘穆罕宮為邁索爾王宮，建成於 1861 年；薩拉達是印度西海岸馬哈拉斯特拉邦的城市。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13.
22. *Portrait of Shuja-ud-daula, Nawab of Oudh, and His Sons*, Peabody Essex Museum, Museum number: 1996 AE85329. 奧德（Oudh），是印度北方邦的一部分。納瓦布（Nawab），是莫臥兒帝國時代各邦總督的稱號。
23.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ic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rn, Berli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Peter Lang S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20, p. 153.
24. 到 1790 年時，港腳商（即在印度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許可而由散商經營的商號）已向東擴展到中國。參見 [美]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第 159–160 頁。
25.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 16.
26. Aruni Sunil, "Reverse Glass Paintings of India: A Forgotten Artistic Treasure", *Art West*, 9 October 2019. www.artisera.com/blogs/expressions/reverse-glass-paintings-of-india. Accessed 22 July 2022.
27.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162–163.
28. Tamalia Alisjahba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with Lia Sciortino: Indonesian Reverse Glass Paintings", *Independent Observer*, 18 October 2019, observerid.com/through-the-looking-glass-with-lia-sciortino-indonesian-reverse-glass-paintings/. Accessed 22 July 2022.
29.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162–163.
30. 奧德土邦，又名阿瓦德（Awadh），位於今印度北方邦。
31.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19, 136–137, 196–197;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ic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rn, Berli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Peter Lang S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20, p. 67.
32. Tamalia Alisjahba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with Lia Sciortino: Indonesian Reverse Glass Paintings", *Independent Observer*, 18 October 2019, observerid.com/through-the-looking-glass-with-lia-sciortino-indonesian-reverse-glass-paintings/. Accessed 22 July 2022.
33.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18, 182.
34.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16, 220–223.
35. 筆者發現，書中的玻璃畫《戴紅帽的藝伎》（*"Courtesan" in a Red Hat*）與現藏於印度西部桃莉絲・杜克伊斯蘭藝術基金會的一幅玻璃畫形象可對稱重合。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16, 184–185.
36. 具有春宮畫性質的玻璃畫，如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有兩幅約繪於十九世紀的仕女圖，或為廣東畫師繪製，筆者亦在廣州西關見過此類題材的清代玻璃畫。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178–179, 208–209.
37.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208–209, 232–233.

38. *Ganesha*, opaque watercolour on paper, ca. 1830,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useum number: IS.208-1950.
39.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36–37.
40.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p. 126–127.
41.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pp. 175–176.
42. Anna L. Dallapiccola,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India*, New Delhi: Niyogi Offset Pvt. Ltd., 2017, p. 13.
43. 李遇春：《關於清代廣州外銷畫作研究中需引起關注的問題》，載廣東省博物館編：《異趣・同輝：清代外銷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4 年，第 167 頁。
44. [法] 薩比娜・梅爾基奧爾—博奈著，周行譯：《鏡像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61 頁。Mei Rupprecht, *BOLIHUA: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from the Mei Lin Collection*, Munich: Hirmer Publishers, 2018, p. 13.
45. Mei Rupprecht, *BOLIHUA: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from the Mei Lin Collection*, Munich: Hirmer Publishers, 2018, p. 13.
46. [清] 梁廷枏撰，袁鐘仁點校：《粵海關志》卷 25《行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00 頁。
47. Jessica L. Patterson, "Chinese Glass Paintings in Bangkok Monaster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66, no. 2 (2016), p. 160.
48. “地峽”指連接澳門半島與中國內地的澳門關閘馬路（葡萄牙語：Itsmo de Ferreiro do Amaral），又稱亞馬喇土腰、蓮花莖。
49. 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China; Exhibiting a View of the Actual State of Those Kingdoms,* vol.2,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0, pp. 202–203.
50. "Excerpted from a letter of December 22, 1825", in Henry Burney, *The Burney Papers*, vol. 5, Bangkok: The Committee of the Vajiranana National Library, 1910–1914, p. 47.
51. Jessica L. Patterson, "Chinese Glass Paintings in Bangkok Monaster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66, no. 2 (2016), p. 174.
52. Jessica L. Patterson, "Chinese Glass Paintings in Bangkok Monaster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66, no. 2 (2016), pp. 176, 179.
53.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8, pp. 667–671.
54. British Library, MS Factory records G/12/1, pp. 93–96.
55. [越] 阮氏碧柳：《越南歷史文化交流中的順化宮廷玻璃畫》，《河內開放大學科學學報》2019 年第 57 期，第 34 頁。
56. [越] 潘青海：《獨特的玻璃畫》，《順化報》2020 年 11 月 15 日。
57. 該詩係筆者根據嗣德陵和謙殿內一幅玻璃畫上的題詩摘錄，具體出處待考。
58. [越] 阮氏碧柳：《越南歷史文化交流中的順化宮廷玻璃畫》，《河內開放大學科學學報》2019 年第 57 期，第 34 頁。
59. [越] 潘青海：《獨特的玻璃畫》，《順化報》2020 年 11 月 15 日。
60. Dana McNairn, "Reflecting Tradition: Artist Bridging Past and Future with Reverse Glass Painting", *Oi Vietnam*, 19 November 2019. oivietnam.com/2019/11/reflecting-tradition/. Accessed 22 July 2022.
61. Catherine Raymond, "Seeking the Origins of a Buddhist Tradition of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n Myanmar and Thailand",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Paris, 6–10 July 2015.
62. "Vanishing Art from Myanmar: The Buddhist Reverse Glass Painting Tradition",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NIU) Art Museum*, DeKalb, 15 November 2018–15 February 2019; Catherine Raymond, "Reverse Glass Paintings: From Mandalay to Mae Hong Son and Back Again", *SEA Junction*, Bangkok, 6 August 2017.
63. 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China; Exhibiting a View of the Actual State of Those Kingdoms*, vol.2,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0, p. 203.
64. Buddhistartnews, "Framing the Sacred: Cambodian Buddhist Painting",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UC Berkeley*, Berkeley, 20 November 2013–20 March 2014; Tamalia Alisjahba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with Lia Sciortino: Indonesian Reverse Glass Paintings", *Independent Observer*, 18 October 2019, observerid.com/

through-the-looking-glass-with-lia-sciortino-indonesian-reverse-glass-paintings/. Accessed 22 July 2022.

65. 馬鏡，即不帶抽屜、鏡面尺寸較大、鏡架下有四條鏡腿的大型鏡。英國人對其名稱由來的解釋為“因為鏡子有四條腿”，美國人解釋為“因為鏡面大到幾乎可以攝入一整匹馬”。參見 [日] 由水常雄著，孫東旭譯：《鏡子的魔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第 84–85、88 頁。
66. Panel Discussion, "Glimpses of Southeast Asia in Reverse Glass Paintings", *SEA Junction*, 16 June 2019, seajunction.org/event/panel-discussion-glimpses-of-southeast-asia-in-reverse-glass-paintings/. Accessed 22 July 2022.
67.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ic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rn, Berli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Peter Lang S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20, p. 155.
68. Jérôme Samuel, "Semina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tomans in Java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Singapore, 4 November 2016.
69. 陳瑞林：《中國美術的現代性轉變：陳瑞林藝術史論文集（上）》，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8 年，第 56 頁。
70. Sandra Davison,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Glas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3, p. 57.



南洋研究

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對老撾的探索和記錄

張晨 *

摘　要 老撾是東南亞地區唯一的內陸國。因為地理條件的限制，外部世界對老撾的了解一直比較有限。1642年，耶穌會傳教士喬瓦尼・馬里亞・萊里亞克服諸多困難，終於成功到達老撾。他被認為是第一個到達老撾的西方傳教士。之後，他在老撾傳教五年，直到1647年離開。他留下了一批關於老撾的報告，這些材料是當時西方人對老撾最詳細的記錄。因為關於古代老撾地區的史料十分稀缺，他的記錄對理解古代老撾地區的歷史狀況非常有幫助。本文以他的活動為中心，挖掘了一些關於老撾古代歷史的重要史料，展示了十七世紀的西方人如何利用東方舊有的網絡在當地立足，同時也揭示了澳門與東南亞的早期聯繫，為深入理解大航海時代澳門的角色提供幫助。

關鍵詞 耶穌會；老撾；澳門；喬瓦尼・馬里亞・萊里亞；喬瓦尼・菲利普・德馬里尼

引言

老撾是東南亞地區唯一的內陸國，其地形又以山地為主。炎熱的氣候和致命的熱帶疾病更是讓試圖踏足老撾的人望而生畏。雖然有湄公河貫穿老撾南北，但湄公河的上游水流湍急，通航能力有限，下游又有孔恩瀑布（Khone Falls，今老撾和柬埔寨交界處）截斷航運，因此湄公河並未能改變老撾對外交通不便的面貌。長期以來，外部世界對老撾的了解都非常有限。老撾本國的史料並不豐富，周邊各國對老撾的記錄也大都語焉不詳。[1] 相比東南亞的其他國家，海外和國內的東南亞史學界對老撾古代史的研究也比較薄弱。[2] 1642 年到達老撾的耶穌會傳教士喬瓦尼・馬里亞・萊里亞（Giovanni Maria Leria, 1595–1665）[3] 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位到達老撾並留下詳細記錄的西方傳教士。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了在萊里亞神父之前的西方傳教士在東南亞的傳教活動，當時的老撾是東南亞最難到達的地區之一；第二部分簡要介紹了十七世紀老撾的一般情況；第三部分介紹了耶穌會士對老撾的早期探路活動，他們的探索為萊里亞神父成功到達老撾打下了基礎；第四部分介紹了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揭示了當時老撾與越南之間的關係；第五部分介紹了德馬里尼神父據萊里亞神父的記錄寫成的著作及其對老撾史研究的價值。

* 張晨，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一、西方傳教士在東南亞各地的早期傳教活動

1510 年，葡萄牙印度總督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攻佔印度果阿（Goa），次年又佔領了馬六甲（Malacca）。[4] 從此，葡萄牙以及歐洲各國、各教會的勢力在亞洲不斷擴展開來。葡萄牙人利用馬六甲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周邊的東南亞政權展開了接觸。歐洲各修會的傳教活動亦伴隨而來。

1511 年，阿豐索進攻馬六甲時遇到了幾艘前來馬六甲貿易的中國商船。於是他就派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Duarte Fernandez）為使者搭乘中國商船前往暹羅京都阿瑜陀耶（Ayutthaya），希望能和暹羅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費爾南德斯受到暹羅王的熱烈歡迎，暹羅王拉瑪鐵菩提二世（Ramathibodi II, 1473–1529）



圖 1. 塔鑾，老撾的象徵，約建於十六世紀六十年代。（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18 年 12 月）

愉快地接受了他帶來的阿豐索尋求和平的信和禮物（一把金劍）。費爾南德斯返程時，暹羅王也派出使者隨行。暹羅使者帶了致葡萄牙國王的信，並送上一枚紅寶石戒指、一頂王冠和一把金劍。暹羅王在信中表示接受葡萄牙佔領馬六甲（阿豐索對此感到意外）。當暹羅使者離開馬六甲時，阿豐索派出了美蘭達・阿澤維多（António de Miranda de Azevedo）和杜阿爾特・科爾賀（Duarte Coelho）再次出使暹羅。他們此行的目的是打開和暹羅的貿易通道。[5] 此後，暹羅和葡萄牙遠東當局多次互派使節，雙方維持着良好的關係。

1567 年，馬六甲的代牧（Vicar）瑪利亞（Fernando de Santa Maria）派出兩名多明我會的傳教士熱羅尼莫・克魯斯（Jerónimo da Cruz）和塞巴斯蒂昂・坎托（Sebastião do Canto）到暹羅，這是現有明確記載的天主教傳入暹羅之始。兩人很快學會了暹羅語，並成功發展了 1,500 名信徒，其中包括一些本來信仰佛教的大臣。此外，他們還在當地建立了三座教區教堂（Parish Churches）。然而，他們後來和當地的穆斯林群體（Mohammedans）發生了衝突，一人被刺死，另一人被迫逃離暹羅。[6]

1513 年，柬埔寨國王的使者來到馬六甲，見到了阿豐索。1555 年，多明我會的傳教士伽

斯帕爾・克魯斯（Gaspar da Cruz, O. P.）從馬六甲出發到了柬埔寨。[7] 據說是因為柬埔寨國王主動要求馬六甲派遣傳教士到柬埔寨，以幫助他了解關於創造天地的學說和聖托馬斯（St. Thomas）的福音。克魯斯神父是有明確記載的第一個到柬埔寨傳教的歐洲傳教士。但是，他在柬埔寨的傳教活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只成功讓一名信徒受洗。於是，克魯斯神父在 1556 年的冬天去了廣東，但是也沒有成功傳教。之後，他從澳門又返回了馬六甲。他後來從馬六甲又去了霍爾木茲，並在那裡工作了 12 年。1570 年，他在葡萄牙去世。[8]

1549 年，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us Xavier, 1506–1552）在一位日本人的引介下自馬六甲出發來到了日本九州的鹿兒島，成為第一位到達日本的歐洲傳教士。沙勿略等人在日本的傳教活動發展迅速，但日本官方很快就開始限制和打擊天主教信仰。1587 年，豐臣秀吉頒佈了《伴天連追放令》，勒令所有傳教士必須在 20 日內離開日本。之後，日本又多次重申了禁教令。1639 年，幕府發佈了第五次鎖國令，江戶時代禁制鎖國的體制最終形成。[9] 在這幾十年中，日本不斷地限制和打擊天主教信仰。

1557 年，葡萄牙人在廣東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租居澳門。[10] 澳門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主要基地，大批在日本傳教的歐洲傳教士與日本教徒逐漸聚集到澳門。這些湧入到澳門的天主教人才也促進了越南和東南亞其他地區天主教傳教事業的發展。

1533 年，越南後黎朝舊臣阮淦扶持新君對抗莫朝。1593 年，後黎朝成功推翻莫朝，史稱“中興黎朝”。然而，此後直到西山朝時期（1778 至 1892 年），越南一直處在南北分裂的狀態。起初是北方莫朝殘餘勢力與南方中興黎朝對峙；後來是北方鄭主 [11] 與南方阮主（被稱為 Cochinchina，交趾支那）的對峙。根據越南史家陳重金的研究，西方人依尼樞（具體信息不詳）於 1533 年到達越南北方的南真縣（今越南南定省南直縣）傳教。[12] 這名傳教士也被認為是最早到達越南的西方傳教士。同時，對峙中的越南南北各方為了爭取西方的政治軍事支持而積極拉攏傳教士，但這些早期的傳教活動的影響都很有限。自日本避難而來的天主教力量到來以後，越南各地的傳教事業在十七世紀初開始快速發展。[13] 耶穌會士依靠越南、柬埔寨等地的天主教傳播的基礎，最終在 1642 年成功進入到當時被認為是最難到達的國家——老撾。

二、十七世紀老撾的狀況

1353 年，老撾國王法昂（Fa Ngum，約 1353 至 1371 年在位）統一了湄公河中游地區，在琅勃拉邦（Lung Prabang）建立了瀾滄國。[14] 到法昂之子桑森泰（Samsenethai，中文史料稱刀線歹）在位時期，老撾與中國明朝建立了朝貢關係，但明朝史料對老撾的記載也非常簡略。到十六世紀初，瀾滄國進入到強盛時期，其疆域北到明朝雲南的車里土司（治所在今西雙版納），南到高棉（今柬埔寨），東部與越南接壤，西部與蘭納和暹羅接壤。然而，老撾並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國王對各地的統治力量十分薄弱。居住在都城的老撾王更像是一個區域盟主，而非專制君主，加之老撾沒有建立起明確的王位繼承制度（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並行），王位繼承紛爭頻繁，造成老撾國內的政治局面一直不太穩定。

十六世紀後半期，緬甸東籲王朝崛起，並開始向周圍地區擴張。老撾的塞塔提臘王（Setthathirath，約 1548 至 1571 年在位）為了躲避緬甸的進攻將首都從琅勃拉邦遷到了南方的萬象。雖然緬甸曾三次攻打老撾，但老撾一直不屈服。塞塔提臘王死後，緬甸扶持之前俘虜的塞塔提臘王之弟登上王位，短暫控制了老撾。十七世紀初，老撾又恢復了獨立。1638 年，蘇里亞旺薩王（Surinyavongsa，約 1638 至 1695 年在位）繼位，開始了長達 57 年的統治。老撾歷史進入到較長的穩定時期。[15]

在宗教方面，法昂從高棉迎娶的公主給

老撾帶來了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信仰，但當時可能並沒有普遍流行起來。1502 年，維蘇納王（Visoun，約 1500 至 1520 年在位）將勃拉邦佛迎入琅勃拉邦城。[16] 從此，該尊佛像逐漸成為了老撾的象徵。他的兒子波提薩拉臘王（Photisarath，約 1520 至 1550 年在位）下令將老百姓信仰的非佛教的鬼神廟宇改建為佛寺。[17] 這說明當時非佛教的信仰仍然有很多信眾，但從此以後再沒有類似的記載，可見佛教在老撾的地位基本穩固了。

老撾本土的史料主要是宮廷和寺院中流傳的《坤博隆傳》（*Nidan Khun Borom*，意為“坤博隆的傳說”）抄本。“坤博隆”即傳說中古代老撾王室的始祖，一般認為《坤博隆傳》最早由維蘇納王命僧人編撰，後經歷代不斷續修，主要記載的是國王世系和老撾大事。[18]《坤博隆傳》沒有官方定本，有眾多抄本被流傳下來，且作者和書寫年代大都不清楚，因此考訂困難，為學界研究老撾史帶來很多問題。1996 年，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一篇博士論文對不同版本的《坤博隆傳》進行了系統的考證，[19] 但《坤博隆傳》不同手稿間的矛盾頗多，老撾史的很多問題仍待解決。加上《坤博隆傳》內容簡略，提供的信息有限，因此外部史料對老撾史研究的意義很大。儘管明代史料對老撾也有一些記載，但大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不成體系。因此，挖掘西方早期有關老撾的記錄，有助理解古代老撾地區的歷史狀況。

三、耶穌會士針對老撾的探路活動

現在所知最早到達老撾的歐洲人是一群葡萄牙人。大約在 1545 年，九名葡萄牙人跟隨緬甸使節從勃固（今緬甸勃固）到達了當時老撾的首都琅勃拉邦。其中一個葡萄牙人巴內托（Fernão Mendes Pinto）後來寫下了他此行的遊記。雖然他在遊記中並沒有使用“Lao”來稱呼他到達的王國，而是稱之為“Calaminham”，但後世學者根據各種資料推測他到達的地方就是老撾。可惜他記錄的很多地名都無法考證，學者們認為他的記錄混合了很多從緬人和孟人那裡得到的道聽途說的內容，因此這些記錄的學術價值有限。[20]

1596 年，葡萄牙人比羅索（Diego Belloso）和西班牙人岡薩雷斯（Blas Ruiz de Hernán Gonzáles）一起從越南中部穿過安南山脈到達了老撾。他們在信中向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報告了此次旅行，該信後來在 1609 年被出版，是當時西方人對老撾最早的可靠記錄。[21] 在他們的記錄中，兩人見到了當時的老撾國王。[22] 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流亡到老撾的柬埔寨國王薩塔一世（Satha I, 1539–1596），可惜當他們二人到達老撾首都萬象時，薩塔一世已經去世。1597 年，他們支持薩塔一世的兒子巴龍列謝二世（Barom Reachea II, 1579–1599）回到柬埔寨國內繼承王位。[23] 他們注意到當時老撾萬象城的人口很少，有人認為這與老撾當時一直遭到緬甸的劫掠有關，也有學者對他們是否真正到達老撾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當時完全沒有提到老撾南部的占巴塞。[24]

1641 年，荷蘭商人吉巴德・范・伍伊索夫（Gerrit Van Wuysthoff）從柬埔寨當時的首都洛韋（Lovek）出發，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到達老撾首都萬象，並見到了當時老撾的國王蘇里亞旺薩。[25] 伍伊索夫在其出版的遊記中稱呼老撾為“Lauwenlandt”，[26] 可惜伍伊索夫在老撾停留的時間不長，留下的記錄也比較簡略。

此時，耶穌會士也在嘗試打通到老撾傳教的通道。1616 年，澳門耶穌會開始考慮向老撾地區傳教，並派遣了佩德羅・馬克斯（Pedro Marques）到柬埔寨做準備，但是他沒能從柬埔寨到達老撾。[27] 之後，安東尼奧・嘉爾定（António Cardim）神父開始尋找從暹羅到老撾的辦法，但是暹羅王拒絕該計劃，嘉爾定神父只好回到澳門。[28] 1631 年，澳門耶穌會派遣譚瑪爾（Gaspar de Amaral）、安東尼奧・馮特斯（António de Fenttes）和嘉爾定三位神父搭乘當年赴越南貿易的商船前往越南中

興黎朝（鄭主控制區）傳教。[29] 嘉爾定神父希望找到從越南北部到老撾的道路，但是他不久後又染病，只好放棄到老撾的計劃。[30]

1634 年，譚瑪爾神父和老撾派到越南中興黎朝的使者取得了聯繫，使者（可能已經秘密受洗）答應神父帶一封信給老撾國王。當年秋天，這封信成功被帶到了老撾。老撾王（疑為維柴王，Vichai，1633 至 1638 年在位）給譚瑪爾神父回了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的哥哥（疑為通坎王，Tone Kham，1627 至 1633 年在位）曾經寫信給葡萄牙神父和商人，希望葡萄牙人到老撾經商和傳教，但是他的信未收到回應。於是，老撾王利用此次機會再次邀請傳教士和派到越南的老撾使者奈猛（Nai Mon）一起返回老撾。[31] 但是在越南中興黎朝的耶穌會此時缺乏人手，於是譚瑪爾神父轉而向巡視神父（Visitator）李瑪諾（Emmanuel Dias Sénior）尋求幫助。[32]

1637 年，譚瑪爾神父被指派到老撾傳教。由於他健康狀況惡化，耶穌會決定派另外兩名神父代替他去老撾，但最終也未能成行。於是，耶穌會士博內利（John Baptis Bonelli）表示自願前往老撾。當時有一個由老撾王的岳父率領的老撾使團正好身在越南中興黎朝，博內利就設法取得了老撾王的授權和越南的通關文書。1638 年 8 月 12 日，博內利神父帶領 17 名隨從和返程的老撾使團一起出發。[33] 到了 11 月，博內利神父在途中病死，他當時還身在越南境內（Tin-Hoa，疑為清化省）。後來，他的屍體被帶回昇龍（位於今河內），老撾使團繼續攜帶博內利神父準備的禮物返回老撾。在這種情況下，耶穌會的萊里亞神父被指派繼續完成博內利神父未竟的老撾傳教事業。

四、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

萊里亞於 1595 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熱那亞（Genova）。1622 年，他來到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傳教。1639 年，由於當地禁教，他不得不逃到占婆和柬埔寨活動。1639 年，他被指派去老撾完成博內利未竟的老撾傳教事業。萊里亞起初打算從暹羅進入老撾，於是他來到了暹羅當時的首都阿瑜陀耶，見到了當時澳門派往暹羅訪問的使者，得到了澳門使者的授權，但是當萊里亞到達彭世洛（Phitsanulok）後，彭世洛當地守衛拒絕他穿過邊境。因此，萊里亞只好返回到阿瑜陀耶，並在那裡結識了馬修・塞布里安（Mateo Cebrián）神父。之後，他們決定嘗試從柬埔寨到老撾的方法。1642 年春，他們在柬埔寨乘上了兩艘準備返程的老撾商船，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最終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到達老撾首都萬象城。

萊里亞神父在老撾見到了當時的老撾國王蘇里亞旺薩，並被賞賜了居所。萊里亞神父和老撾的首相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然而，此前由博內利神父準備的給老撾國王的禮物被老撾國王的一位妃子（Mrs. Vrancaya，她是當時出使中興黎朝的老撾使者的女兒）霸佔了。她擔心萊里亞神父討要這批禮物，因此十分敵視他。最終，萊里亞神父在國王的干預下討回了這批禮物。同時，萊里亞神父的傳教活動也引起了很多佛教僧人的敵視，他們甚至在國王面前指控萊里亞神父傳播的是佛陀的敵人的思想，但是萊里亞在國王和幾位大臣的支持下，並沒有被驅逐。[34]

1643 年，與萊里亞同行的馬修・塞布里安在老撾國王蘇里亞旺薩的授意下返回了馬尼拉，希望能够尋求老撾和西班牙之間的合作，但是這個想法並未被實現。其後，馬修・塞布里安又去了馬魯古群島（Moluccan Islands，今印度尼西亞馬魯古省）傳教，未再返回老撾。1645 年底，意大利傳教士烏蘭多（Jacinto Urando）也來到了老撾。他給萊里亞帶來了一封耶穌會澳門總部的信，信中要求萊里亞繼續留在老撾傳教，但附錄又讓他返回澳門，讓烏蘭多留在萬象城接替他。萊里亞選擇了繼續留在老撾，而烏蘭多則嘗試尋找一條從老撾直接穿過安南山脉到交趾支那的路。但是很不幸，他迷失在一片叢林中，並在 1647 年去世了。[35]

1645 年，萊里亞神父用老撾語編寫了一本宣揚天主教的小冊子，並把它獻給了國王。在國王閱讀這本小冊子的時候，老撾的一位大臣試圖刺殺國王。雖然這位大臣沒有成功，但人們將這種“壞運氣”歸結於萊里亞神父的這本小冊子。於是，國王下令驅逐萊里亞神父。在萊里亞神父準備離開老撾，等待去往柬埔寨的船隻的這段時間中，形勢又有了一些變化：萊里亞神父在朝中主要的敵對大臣因為試圖發動叛亂而被國王處死了，而先前反對他的僧侶也不再發聲；那位仇視萊里亞的王妃因為不堪忍受病痛而向萊里亞神父求救，神父最終原諒了她，並施以援助。在經歷了一系列事件之後，萊里亞重新得到國王和首席大臣（首相）的信任。為了減少可能的麻煩，萊里亞神父選擇住到城外，將主要精力花費在撰寫一部老撾語的天主教教義問答上。後來，他將這部書呈給了國王，國王也允許他在老撾自由地宣揚傳播這本書。[36]

1647 年，萊里亞神父在老撾國王的指派下離開萬象出訪越南中興黎朝。他在昇龍獲越南國王接見（應是中興黎朝的傀儡皇帝黎真宗）。據說，越南中興黎朝表示願意支持老撾。此後，萊里亞順利回到了老撾，老撾王對他的出使行動很滿意，派他在 1648 年再次出使中興黎朝。萊里亞後來因健康原因滯留在越南，同時，他希望耶穌會能夠再派一位神父和他一起到老撾傳教，但是這一提議沒有被實現。老撾國王也邀請他返回老撾，萊里亞神父趁機提出要在老撾修建一所教堂，而且禁止老撾的佛教僧侶干擾他的傳教活動，但是亦未達成。之後，老撾國王一再邀請他返回老撾，萊里亞感到自己年事已高（53 歲），無力再繼續老撾的傳教事業，於是他從中興黎朝去了柬埔寨，但也遇到了很多困難。1659 年，他離開柬埔寨返回了澳門。1661 至 1664 年間，他擔任耶穌會日本省會長，1665 年，萊里亞神父在澳門去世，被安葬在大三巴。[37]

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傳教事業並不算成功。直到他 1648 年離開老撾為止，並沒有太多教徒受洗，他也沒能將老撾政府中的任何高級官員發展為信徒。主要的原因是老撾當地南傳佛教的傳統非常深厚，僧侶在老撾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因此，老撾人大多對萊里亞神父宣傳的天主教內容不感興趣。[38]

五、喬瓦尼・菲利普・德馬里尼和他的著作

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和他對老撾的觀察主要通過喬瓦尼・菲利普・德馬里尼（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1608–1682）神父的著作而為人所知。根據榮振華的研究，德馬里尼神父於 1608 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熱那亞。1625 年，他進入羅馬的聖・安德雷亞修院，成為一名耶穌會士。1640 年，他乘船來到亞洲，同年的 11 月 2 日到達果阿，1641 至 1642 年間逗留於暹羅。德馬里尼神父或許是在暹羅時第一次了解到耶穌會士的老撾傳教計劃。1647 年，德馬里尼神父身在越南中興黎朝，他應是在此時通過萊里亞神父的年報了解到他在老撾的活動，也有可能見到了萊里亞神父本人。1649 年，德馬里尼神父回到澳門任澳門的司庫，後於 1656 年成為澳門學院的區本堂神父。[39]

1659 年，德馬里尼作為教省代表回到羅馬參加第 11 次耶穌會常規會議（The 11th General Congregation of the Jesuits）。為了向西方大眾宣傳他們的傳教活動，募集更多的資金及招募更多的傳教士，他在 1663 年出版了意大利語的《關於耶穌會士在日本教省的傳教活動，尤其是東京》一書。[40] 在這本 548 頁的書中，他花了專門的篇幅來介紹老撾。一般認為，這本書中關於老撾的內容主要來自於萊里亞神父（年信或者是直接的交談），當然也可能混雜了從其他途徑得到的信息。這些關於老撾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老撾的基本介紹；第二部分是關於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41] 萊里亞神父的活動此前已經述及，本節主要討論德馬里尼書中關於老撾基本情況的記載。

德馬里尼書中最有價值的資料是關於老撾

政治情況的介紹。雖然老撾在名義上是明朝的土司地區，但明朝對老撾並沒有事實上的影響力，明朝史料對老撾的描述也都語焉不詳，甚至對老撾當時的基本政治情況都缺乏記載。景泰《雲南圖經志書》中記載：

> 其［老撾］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化。而為宣慰者即招木弄也，居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至之地，各為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42]

這段非常簡要的描述基本上就是明代對老撾國內政治情況的唯一記載。景泰之後的歷代雲南志書也基本沿襲了這一說法，而德馬里尼神父提供的資料卻豐富得多。老撾本土史料的記載是圍繞事件展開的，並沒有對老撾政治制度的描述，因此德馬里尼在書中對老撾的記錄就顯得非常寶貴。他描述老撾國王為世上最有權力的君主，甚至老撾也不向中國稱臣納貢，[43]但是關於一些重要的事，老撾也會通過中介（intermediary）同中國溝通。為了贏得臣民的尊重，老撾的國王並不經常出現在公眾面前，像一位神秘的神而不是人類。

關於老撾的社會等級制度，德馬里尼在書中稱不同等級的官員可以通過隨身用具（Paraphernalia）上的金銀裝飾作出區分。大總督（Great Viceroy，應該是指首相）是除了國王以外唯一可以乘象出行的人，其他等級的官員只能乘坐轎子或者步行。[44]關於老撾當時的行政制度，德馬里尼在書中記載老撾最高級的官員有八名，地位最高的是負責全面事務的大總督（Viceroy-general，應該也是指首相），他全面協助國王處理國家的各項事務。當國王意外去世時，大總督也負責召集貴族會議提名新的國王繼承人。在新國王就任之前，他是實際上的攝政王。老撾整個國家被分為七個省，管轄這七個省的七個總督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們經常住在首都服侍國王，因此這七個總督也像是國王的官員和顧問。這七個總督會各自派出自己的代表到各自的省份行使統治權，同時，在這七個總督之下還有負責內政和軍事的其他部門。[45]

作為一個傳教士，德馬里尼對老撾當時的信仰情況（尤其是佛教）也有很多記載。德馬里尼認為當時的老撾人很迷信，他們會將釀成的第一滴酒塗到大象的頭上，認為會讓大象更勇敢和強壯。[46]老撾的女人剛生完孩子後會在屋子裡呆一個月不出門，同時整個家庭會聚集起來縱情唱歌跳舞，以嚇走魔鬼，防止他們危害母親和嬰兒。[47]老撾人也相信水具有某種神聖力量，因此會把水送給病人。[48]作為天主教傳教士，萊里亞和德馬里尼對老撾佛教的印象是比較負面的，德馬里尼就曾記載一個僧侶貪圖財物刺死姐妹的故事。[49]德馬里尼認為老撾的佛教是從暹羅傳入的，當時佛陀（德馬里尼稱為 Xaca）的教義在老撾非常流行，老撾境內充滿了大大小小的佛寺，並且僧人（德馬里尼稱為 Talapoi）享有很高的地位，[50]老撾的學校也會教授佛陀的教義。[51]德馬里尼在書中專門介紹了老撾的寺廟和僧侶，比如老撾的僧侶早上要出門托缽化緣，之後再返回寺廟分享食物給僕人和家禽家畜，而且老撾的僧侶也吃肉。[52]同時，老撾的國王宣稱自己是佛教的保護者，也是僧團的領袖（Chief of the monks），又會擔心僧侶們煽動人民反對他。[53]老撾的僧侶會使用各種魔法和咒語，[54]一個患病的官員為了治療自己的疾病而選擇住在寺院中，他為此不得不向寺院佈施大量財物，但是病情卻未見好轉。如果是窮人患病，他就會用禮物換取僧人穿過的僧衣穿在身上。老撾人相信僧衣具有某種神秘的力量可以治療疾病。[55]雖然德馬里尼對老撾佛教的描述帶有一定的偏見，但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從他的記錄中可以看出，當時佛教已經融入了老撾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證明了當時的南傳佛教中實際上混合了大量的非正統佛教的內容。

結論

天主教隨着葡萄牙人在遠東的開拓一起到

達了遠東，暹羅、柬埔寨、澳門、日本和越南很快都被納入到天主教的全球網絡當中。因為交通閉塞，西方傳教士到達老撾的時間相對較晚。耶穌會士在老撾周邊各國的不斷經營為最終到達老撾創造了條件，尤其是耶穌會士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在地網絡最終幫助耶穌會士成功地到達了老撾。博內利神父藉助出使越南的老撾使團和老撾建立起了聯繫；萊里亞神父也利用了柬埔寨和老撾之間的商業往來，才得以到達老撾。

耶穌會士在十七世紀對老撾的探索也提供了關於東南亞交通路線和外交活動的重要信息。通過諸位神父的探索活動可以知道當時的暹羅到老撾的通道並不暢通。在萊里亞神父之前，耶穌會就嘗試了從暹羅到老撾的道路，但均未成功。萊里亞神父最初的計劃也是從暹羅向北經彭世洛進入老撾。這就證明當時從暹羅東北部經陸路往老撾的道路尚未開通（或者說這條路比較難走）。大致到暹羅吞武里王朝（1767 至 1782 年）之後，暹羅直通老撾地區的東北部通道才大致開通，現在泰國鐵路系統的東北線是連接泰國和老撾的最主要通道。當時耶穌會士進入老撾主要由越南和柬埔寨兩條道路實現：經越南的道路應該是從越南的清化、乂安一帶經老撾的川壙進入老撾，這條路要穿越安南山脉大片的叢林地帶，因而比較兇險；經柬埔寨到老撾的道路應該是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根據十九世紀法國安鄴（Francis Garnier）考察團在湄公河的考察，這條水路險灘眾多，也很兇險，而且還有老撾南部的孔恩瀑布阻隔。[56] 同時，萊里亞神父也兩次充當使者訪問越南中興黎朝。他的經歷說明當時老撾和越南的使者往還是很頻繁的。這兩次出使都未見於越南和老撾的史料，耶穌會士的記錄為後世提供了兩國間外交關係的重要信息。

此外，當時的澳門是耶穌會在遠東的主要基地，在耶穌會探索老撾的過程中，澳門發揮了重要作用。最早嘗試到老撾的佩德羅・馬克斯神父和後來的嘉爾定神父以及最終到達老撾的萊里亞神父都和澳門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萊里亞神父最終就葬在了澳門。他們的事跡充分證明了澳門在遠東天主教網絡中的中心地位。

附：感謝周孝雷博士在資料上的幫助。

註釋：

1. 關於越南史料對老撾的記錄參見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4 年；中文史料對老撾的記錄參見景振國：《中國古籍中有關老撾資料匯編》，鄭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緬甸史料對老撾的記錄參見李謀等譯：《琉璃宮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2. Nicholas Tarl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From Early Times to C.1800,* Volume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梁志明：《東南亞古代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賀聖達：《東南亞歷史重大問題研究（東南亞歷史和文化：從原始社會到十九世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申旭：《老撾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陳鴻瑜：《寮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7 年。
3. 榮振華記載萊里亞的姓名為 João Maria Leria，耿昇將此名譯為約翰・馬里亞・萊里亞。參見［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07 頁。
4.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3–16 頁。本文中出現的部分人名未見有通行的中文翻譯，本文自行翻譯為中文。同時，所有翻譯成中文的外文姓名都附了外文原文或外文的拉丁化寫法。
5. Manuel Teixeira,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pp. 55–56.《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對此也有記載，細節略有不同。
6. Manuel Teixeira,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pp. 59–61.
7. 此人著有歐洲第一本專門介紹中國的書《中國志》（*Tra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usas da China*）。參見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32–333 頁。

8. Manuel Teixeira,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pp. 37–41.
9. 輝明：《“禁制”時期澳門的日本天主教徒及其在東南亞的活動》，《廣東社會科學》2016 年第 6 期，第 90–92 頁。
10.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2–113 頁。
11. 當時的北方鄭主政權在名義上仍是中興黎朝，西方人稱為 Tonkin，漢譯為“東京”。
12. [越] 陳重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第 272 頁。
13. 陳文源：《17—18 世紀西洋傳教士在安南的活動》，《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4 期，第 123–124 頁。
14. 瀾滄國（Lan Xang），老撾語意為“百萬大象”，中文音譯為“瀾滄”，明代史料記載為“老撾”。
15. See Martin Stuart-Fox, *The Lao Kingdom of Lān Xāng: Rise and Decline*,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1998.
16. [泰] 姆・耳・馬尼奇・瓊賽著，廈門大學外文系翻譯小組譯：《老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98 頁。
17. [泰] 姆・耳・馬尼奇・瓊賽著，廈門大學外文系翻譯小組譯：《老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00 頁。
18. [泰] 姆・耳・馬尼奇・瓊賽著，廈門大學外文系翻譯小組譯：《老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99 頁。
19. Souneth Phothisane, "The Nidan Khun Borom: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6.
20. Mayoury and Pheuiphanh Ngaosrivathana, "Early European Impressions of the Lao", in Mayoury Ngaosrivathana and Kennon Breazeale eds., *Breaking New Ground in Lao History: Essays on the Sev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pp. 95–96.
21. Mayoury and Pheuiphanh Ngaosrivathana, "Early European Impressions of the Lao", in Mayoury Ngaosrivathana and Kennon Breazeale eds., *Breaking New Ground in Lao History: Essays on the Sev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p. 96.
22. 按照時間推測應為諾蒙王（Noh Muang，1591 至 1598 年在位）。
23. Milton Osborne,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0, pp. 49–50.
24. Brian A. Zottoli, "Reconceptualizing Southern Vietnamese History from the 15th to 18th Centuries: Competition along the Coasts from Guangdong to Cambod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1, p. 182.
25. Milton Osborne,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0, pp. 54–55.
26. Juliette van Krieken-Pieters , "Introduciton to the Van Wuysthoff", in Juliette van Krieken-Pieters eds., *Van Wuysthoff and the Lan Xang Kingdom: A Dutch Merchant's Visit to Laos in 1641*, Leiden: Ginkgo Publishers, 2010, pp. 2–3.
27.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 Luigi Bressan 在該書的序言中並沒有說明 Marques 神父的全名。此處的 Marques 神父應該就是佩德羅・馬克斯（Pedro Marques）神父。他在 1577 年生於葡萄牙埃武拉教區的莫朗（Mourão）。1609 至 1614 年間，他在日本傳教，後因日本禁教，於 1614 年來到澳門。1616 年，他在柬埔寨為避難的日本教徒建立了傳教區。1619 年，他又去了交趾支那。因此，他嘗試到老撾的事情應該發生在這一時期。相關情況參見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07–408 頁。
28.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xx–xxi. 根據榮振華的研究，嘉爾定在 1626 至 1629 年間在暹羅，參見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06 頁。
29.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33–434 頁。
30.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xx–xxi.
31.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i.
32. 關於李瑪諾的情況，請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86 頁。
33.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ii.
34.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xix.

35.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vii.
36.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xl–xli.
37.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viii. Luigi Bressan 在本書序言中並未說明萊里亞是日本省會長，但榮振華指出一個名為 João Maria Leria 的神父在 1661 至 1664 年任日本省會長，參見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06–407 頁。
38.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42.
39.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75 頁。
40.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Delle missioni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nella Prouincia del Giappone, e particolarmente di quella di Tumkino*, Rome: N. A. Tinassi, 1663.
41.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xi.
42. 景泰《雲南圖經志書》，載方國瑜：《雲南史料叢刊》卷 6，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00 頁。
43. 十七世紀中後期，老撾和明朝政府的關係已經中斷。
44.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22.
45.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21.
46.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14.
47.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17.
48.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59.
49.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65.
50.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34.
51.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35.
52.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54–55.
53.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57.
54.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63.
55.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69.
56. Milton Osborne,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0, pp. 73–96.



文史研究

胡漢聯姻與北朝皇權政治

張雲華 *

摘　要 拓跋鮮卑由一個比較落後的部族逐步發展壯大，到建立一個強大政權的過程，同時也是它的婚姻形態由較原始過渡到較文明的過程。從拓跋貴族的情況看，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政治形態的演變，拓跋部逐漸擺脫了部落通婚的風習，轉而與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進行通婚。其實，拓跋鮮卑的婚姻轉型，是以北魏政治形態的變化為前提的，即隨着貴族政治向皇權政治的轉化，國家權力由分散走向集中，相應地，王朝所依賴的社會基礎也必然發生變化。婚姻作為北朝統治者鞏固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理所當然地要為王朝政治服務。北魏宗室婚姻形態的演變為北魏皇權政治的建立和鞏固提供了必要條件。孝文帝改革後，胡漢上層的大規模聯姻，就是北魏加強皇權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 北魏；皇權；宗室；婚姻

世家大族濫觴於東漢，定型於西晉，自永嘉南渡後分屬南北兩域。留居北方的世家大族以曲事胡族為參政之要途，其隨政權的更迭而奔走於不同的權門。接受胡族政權的統治，是北方世家大族得以存息的重要前提，北朝時亦不例外。但在北朝胡漢通婚的問題上，人們普遍認為，孝文改制前，主要由於“非我族類”的心理和文化制約，世家大族不願與茹毛飲血的胡族結以婚姻。在“宦”上仰異族之鼻息，而在“婚”上卻彰顯自身的文化優勢，這對視婚宦為生存根本的世家大族來說，似乎不合常理。我們認為，北魏前期的漢族大族並非因自命清高而在婚姻上有意疏遠拓跋貴族，當時胡漢不通婚，主要是拓跋統治者尚未完全脫離貴族政治的形態，其聯姻的重點對象是胡族貴族而非漢族大族；只有在皇權政治亟需強化時，北魏才轉而尋求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婚姻依舊是彼此聯絡的感情紐帶。換句話說，北朝胡漢通婚的主動權不是取決於世家大族的文化認同，而是取決於鮮卑政權的政治形態。這就有必要對世家大族的婚媾標準進行說明，否則我們就無法正確地理解北魏孝文改制後胡漢上層的大規模聯姻。

一、世家大族對胡漢通婚的態度

我們知道，構成“世家大族”的要素有三，即政治上累世高官、經濟上貲財雄厚、文化上家學著世。[1] 無疑地，在這三個要素中，政治上累世高官應是世家大族賴以立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說，這是世家大族得以延續的最基本的憑依。因此，世家大族對外交往的核心，也必然以政治利益為依歸，確立婚姻關係亦當遵循這個標準。但資料顯示，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世家大族的宦婚兩途極不協調：世家大族出仕胡族政權的人物不在少數，而與胡族的通婚卻鮮見史籍。這就容易給人造成當時胡漢不婚的印象，進而影響到對北魏前期胡漢婚姻關係的判斷。從表面看，五胡十六國時期與北魏前期胡漢通婚的確不普遍，但導致這種情況的因素卻有實質性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說，前者是源於資料闕載，而後者則是因

* 張雲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史學部編輯，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在《史學集刊》《社會科學戰線》《鄭州大學學報》《文化雜誌》等期刊發表多篇論文，並獲《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專案“北朝婚姻形態與皇權政治”（17FZS058）。

統治重心長期偏處塞外和貴族政治形態所致。在此，我們先對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胡漢通婚情況作一說明，然後再具體討論北朝世家大族的婚媾標準。

但由於資料匱乏，對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婚姻狀況，即便是大致的輪廓我們幾乎都難以勾勒成形。具體到胡漢通婚，直接的資料更是寥寥無幾。可問題是，縱然十六國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不可能使胡漢上層保持穩定的、大規模的通婚狀態，但也絕不至於如史料所反映的那樣胡漢懸隔，幾至於無。其實，某些跡象表明，十六國時期胡漢上層通婚還是存在的。這可從三個側面進行說明：

第一，世家大族既已出仕胡族政權，表明其家族利益仍是第一位的，文化差異應不會成為胡漢交往的主要障礙，包括通婚。在十六國時期，世家大族集中的地域，如河南、河北、河東、關中等，這也是“五胡”競相建立政權的地區，出現過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秦（氐）、前燕（慕容鮮卑）、後秦（羌）、後燕（慕容鮮卑）、北魏（拓跋鮮卑）、南燕（慕容鮮卑）等民族政權。這些政權雖對有些世家大族進行過遏制和打擊，但主要還是合作。如滅掉西晉的匈奴劉氏，周圍就麇集着很多漢族大族；劉聰時，貴顯者有“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中常侍王沈……，尚書令王鑑、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2] 在石趙政權裡，河東裴憲、范陽盧諶、勃海石璞、北地傅暢、潁川荀綽、滎陽鄭略以及清河崔悅、崔遇等都位居高職，[3] 而安定皇甫氏、胡氏、梁氏，京兆杜氏、韋氏，隴西辛氏等 17 姓大族則被免兵役，“一同舊族”。[4] 前燕慕容氏則“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5] 類似情況在其他政權中也普遍地存在着。這說明，世家大族與胡族政權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礎。在這個基礎面前，婚姻非但不是發展關係的絆腳石，有時還是鞏固關係的凝結劑。如太原王浚於晉末都督幽州諸軍事，“於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6] 從常理推斷，這種以婚姻結交異族的情形絕非個例，因為婚姻從來都是世家大族進行利益博弈的重要籌碼。

第二，十六國時期有些部族已發育得相當成熟，漢化程度很深，文化的趨同縮小了民族的心理差距，這也使胡漢上層通婚成為可能。如前趙的匈奴貴族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7] 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8] 同樣，鮮卑慕容部諳習漢文化的貴族也很多。前燕的慕容皝“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9] 皝子慕容俊儁“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10] 慕容德“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11] 皝孫慕容寶“及為［後燕］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12] 而建立前秦的氐族貴族苻堅“八歲請師就家學”，“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13] 堅子苻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14] 堅族孫苻登亦“頗覽書傳”。[15] 後來代苻秦而立的姚秦，本羌族之屬，其有些重要人物也精通漢文典籍。姚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16] 姚興為皇太子時，“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17] 其子姚泓亦“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18] 所有這些情況表明，十六國時期有些少數族已深受中原文化的薰染，這對胡漢通婚應該能起到某種促動作用。

第三，零星的婚姻史料也隱約透露出了胡漢通婚的端倪。雖然有關十六國時期的婚姻史料極少，且多囿於最高統治者的範圍，但我們

從中還是能披撿出有關胡漢通婚的散金碎玉。《資治通鑑》“永嘉六年”條載：

> 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為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19]

王育、任顗、王彰、范隆、馬景、朱紀之屬雖族別難稽，但考慮到劉聰善用漢人治政，從這些漢人常用的姓氏猜測，其中當有漢人。如果這種猜測不錯，則劉聰與漢人聯姻的範圍着實很廣。劉聰的繼任者劉曜也心儀漢族大族女，建興四年（316 年）他進軍關中，捕殺晉官梁緯等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但辛氏“義不獨生”，誓死守節。此辛氏當出自隴西大族辛氏。劉曜甚至以漢族大族女為皇后，《晉書》第 103 卷《劉曜載記》說：“立其妻羊氏為皇后。”[20] 羊氏名獻容，本晉惠帝皇后，出自聲名煊赫的泰山羊氏家族，祖瑾、父玄之均官至尚書右僕射。

> 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偽諡獻文皇后。[21]

與匈奴劉氏相似，羯族首領石勒也注意到與漢族大族的聯姻。他為子石虎（季龍）“娉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22] 清河崔氏是北方第一流大族，崔悅、崔遇曾效力於石趙。石氏與崔氏的聯姻，顯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婚姻作為統治階級擴展政治利益的重要媒介，有時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十六國時期，“五胡”紛紛逐鹿中原，其與漢族的接觸空前頻繁。從上面的分析看，胡漢上層之間的通婚應該不會寥然無幾。當然，我們強調世家大族以政治利益為婚媾的主要標準，並不是否定其內在的族別意識。實際上，世家大族有時對華夷之別也是很在意的。渤海高瞻被迫降於慕容廆後，拒受官職，廆勸曰：

> 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23]

慕容廆的這種說法，道出了許多漢族大族的心病。但當時北方世家大族的命運已被操控於胡族之手，不論內心願意與否，漢族大族要想生存，必須向胡族政權靠近，婚姻就是彼此聯結的重要紐帶。晉末劉琨投奔鮮卑後，其首領段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24] 這明顯是用婚姻鞏固雙方的政治關係。後涼呂纂被其堂兄呂超等殺死後，其妻楊氏“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 [楊] 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諡曰穆后”。[25] 楊氏“賣女圖富貴”的說法雖屬激憤之辭，但未嘗不是當時大族較普遍的一種心態。

在繁紛擾攘的十六國時期還能見到胡漢通婚的蹤跡，但從北魏統一北方到孝文帝漢化改革前的這段時期，胡漢通婚似又銷聲匿跡，尤其與中原世家大族的通婚似乎更顯寂寥。這種情形的出現，固然有漢族大族自命清高的成分在內，但問題是，同屬胡族政權，世家大族為甚麼接受“五胡”而獨排斥拓跋鮮卑？我們認為，孝文帝改革前難見拓跋鮮卑與中原世家大族通婚之例，並不是世家大族的婚媾標準有所改變，而是主要與下列因素密切相關。

首先，北魏前期的統治中心平城偏處塞上，與世家大族集中的地域相對僻遠，這對胡漢通婚必然會產生影響。自道武帝拓跋珪於天興元

年（398 年）奠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 年）遷都洛陽，在近百年的時間裡，北魏的統治中心都遠離中原的核心區域。這種情況，當時的人就已有所體察，所謂“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26] 主張遷都的孝文帝對此亦有清醒的認識，他反駁不願遷都的人說：“今代在恒山之北，為九州島之外，以是之故，遷於中原。”[27] 因此，當李韶說“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時，孝文帝“稱善”。[28] 這些都反映出平城作為都城確實有孤懸塞上的意味。毋庸置疑，這對胡漢通婚是一種自然的障礙。因為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人們通婚多以近距離為主。在平城時，拓跋貴族多與臨近的部族通婚，而遷都洛陽後與世家大族大規模地聯姻，其姻戚也多去洛陽不遠。據統計，北魏孝文帝由代遷洛後，拓跋宗室與漢人聯姻約見160例，其中很多大族的族望，如滎陽鄭氏、河內司馬氏、長樂馮氏、清河崔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頓丘李氏、弘農楊氏等，與都城洛陽的交通都比較方便；即使范陽盧氏、勃海高氏、隴西李氏等大族族望距洛陽較遠，但由於任職京城等原因，許多聯姻家庭相距也比較近。以此反觀北魏平城時代，就可以看出地理位置應是影響胡漢聯姻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拓跋鮮卑長期徘徊在北方草原，部族發育比較遲緩，從北魏前期的情況看，它與漢族的融合並不和洽，[29] 對中原文化也相對冷淡。[30] 與建立十六國的“五胡”相比，拓跋魏在漢化的道路上可謂步履蹣跚。北魏早期的拓跋貴族雖也注意任用漢人，但猜疑頗多，漢族大族人物遭戮甚至夷族的情形並不鮮見，如崔浩被誅時，“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31] 因此，拓跋貴族“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32] 以至太武帝拓跋燾時“東方罕有仕者”，就連普通漢人也“不樂入平城”，並把赴京出仕稱為“試禍福”。[33] 同樣，對於漢文化，北魏初期的拓跋貴族也比較淡然，太祖拓跋珪就以本族“國俗敦樸，嗜欲寡少”[34] 為榮，故而當他見到被姚秦扣留在長安的賀狄干“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時，竟忿而殺之。[35] 迨至孝文帝時，許多拓跋貴族對中原仍乏嚮往之情，強大的反遷都勢力就是明證。孝文帝為此歎曰：

> 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36]

孝文帝所說的“風俗”，應指富含草原文化底蘊的鮮卑風俗。其對中原大族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抱有這種態度，拓跋貴族缺乏與漢族大族通婚的熱情也就不難理解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北魏前期的政治形態具有鮮明的貴族政治特徵。這種脫胎於部落聯盟時期的政治形態，其突出表現是貴族乃左右王朝政治的重要力量，而婚姻作為中古時期鞏固政治關係的主要因素，當然也會體現這一特徵。拓跋鮮卑約在東漢末世重新劃分了部落，獻帝拓跋鄰“七分國人”，命諸兄弟攝領，外加宗屬兩部，共九姓，“凡與帝室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國之喪葬祠禮，非十族不得與也”。[37] 十族之外，“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38] 這些勳舊貴族也是拓跋宗室聯姻的重點對象；如再加上北魏與其他少數族的聯姻，則北魏前期拓跋宗室的聯姻多與草原民族有關。據統計，在道武帝至太武帝時期，北魏宗室女性的婚姻得見 18 例，[39] 其中內嫁鮮卑、外嫁其他少數族的共 15 例，達83%；而漢人僅 3 例，佔 17%。這充分反映出在貴族政治形態的制約下，北魏前期拓跋貴族的通婚範圍仍以草原民族為主，與漢族的通婚或許更具象徵意義，因為魏晉以來傳統的世家大族基本未被納入拓跋貴族的通婚範圍。

通過分析十六國時期和北魏前期世家大族與胡族上層的通婚情況，可以看出世家大族在北魏前期未與拓跋貴族大規模地通婚，主要不是世家大族在文化上居高自傲的結果，而是拓跋魏自身尚未發展到與世家大族聯姻的階段。



圖 1. 北魏石雕孝文帝禮佛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圖片來源：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2707）

因為世家大族主要靠政治地位來維繫自身的利益，不論何種政權，只要有可能，他們都不會輕易地放過與該政權合作的機會。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拉開了鮮卑與世家大族聯姻的帷幕，北方世家大族爭相攀緣，以與宗室聯姻為榮。僅從宗室女性的角度看，待嫁者自不必說，即使寡居者也是世家大族覬覦的目標。清河張彝和勃海高肇為爭奪陳留公主就謗訟不已。

> 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40]

降至東魏時，這種情形尚見其例。《北齊書》卷 18《孫騰傳》載：



圖 2. 北魏石雕文昭皇后禮佛圖，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rocession_of_the_Empress_as_Donor_with_Her_Court,_Chinese,_from_the_Binyang_Cave,_Longmen,_Henan_Province,_Norther_Wei_Dynasty,_about_522_-_Nelson-Atkins_Museum_of_Art_-_DSC09118.JPG）

> ［孫騰］入為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41]

孫騰族望不顯，而封隆之卻出自勃海的名門望族。這些世家大族號稱家學傳世，男清女貞是其所標榜的重要婚姻道德，但在宗室的光環下，寡居的公主亦變成了炙手可熱的求婚對象。這種現象似乎只能用一個原因來解釋：政治利益的驅動。這進一步揭示了世家大族的主要婚媾標準是最大限度地為家族爭取政治利益。

二、北朝政治形態的轉變與胡漢聯姻

拓跋鮮卑由一個比較落後的部族發展成一

個強大的政權的過程，同時也是它的婚姻形態由較原始過渡到較文明的過程。從拓跋貴族的情況看，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政治的變遷，拓跋部逐漸擺脫了部落通婚的風習，轉而與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進行通婚。學界對這種轉變已有所關注，但卻多以門第婚姻為線索來討論。其實，拓跋鮮卑的婚姻轉型，是以北魏政治形態的變化為前提的，即隨着貴族政治向皇權政治的轉化，國家權力由分散走向集中，相應地，王朝所依賴的社會基礎也必然有變。婚姻作為北魏統治者鞏固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理所當然地要為王朝政治服務。孝文帝改革後，胡漢上層的大規模聯姻，就是元魏加強皇權的必然結果。

（一）政治形態的轉變與北魏宗室婚姻的轉型

北魏前期的政治形態具有鮮明的貴族性特徵，宗室貴族之外，鮮卑異姓王公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可與皇族相埒。[42] 有些異姓貴族位居要津，累朝貴寵，成了名副其實的鮮卑“大族”。長孫氏與拓跋宗室有血緣淵源，屬“百世不通婚”的同宗十姓之一，像這樣只拜官爵而不通婚的鮮卑貴族，在王朝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雖號為“不世之神武”，[43] 但“末年內多釁隙”，顯然是受貴族掣肘所致。繼任者拓跋嗣“抱純孝之心，逢梟鏡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44] 算是勉強穩住了局勢，但皇權不張仍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且不說拓跋嗣臨死前立君長這樣的王朝大事須由長孫嵩“定策禁中”，[45] 即使拓跋嗣執政時，就連統馭地方的權貴都敢蔑視皇權，是謂“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46] 太武帝拓跋燾是推動北魏發展的關鍵人物，史書說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47] 不過對異姓王公，太武帝有時同樣莫之奈何。太武帝征赫連昌時，司空、宜城王奚斤竟違班師之詔，“抗情固請”，領兵窮追赫連昌，結果損失慘重。奚斤為此雖受到處罰，但太延初即恢復王爵，“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48] 這些都說明，北魏前期皇權對異姓貴族的控制還是比較弱的。

既然異姓貴族在王朝政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則拓跋宗室的聯姻對象必然重點傾向於異姓貴族，因拓跋“十姓”“百世不通婚”，“八姓”勳舊當然是首選。作為“八姓”之首，穆氏與拓跋宗室的通婚最具典型性。穆氏世代效忠拓跋鮮卑，拓跋珪出居獨孤部時險遭劉顯暗算，幸而穆崇及時告難，拓跋珪才得以逃奔賀蘭部。拓跋珪建國後，穆崇“甚見崇待”，官至太尉。[49] 穆崇早在追隨拓跋珪輾轉各部時就已結婚，妻于氏，故貴寵後不可能再娶拓跋宗室。但他的後代與拓跋宗室的通婚卻非常頻繁，至北魏遷洛前，穆氏有 15 人娶拓跋宗室女，其中竟有 13 人尚公主，[50] 從婚姻的角度看，這可說是北魏前期最顯貴的鮮卑家族。因這種牢固的婚姻關係，穆氏子弟入掌樞機，出為方伯，政治地位隆寵無比。《魏書・穆崇傳》評價穆氏人物時說：

> 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鼎；……顗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弼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51]

穆氏人物累代崇盛，與帝室的聯姻當是極其重要的保證。

但貴族權力的無限膨脹，必然會與皇權產生內在的緊張。“十姓”貴族如此，“八姓”有些勳舊因有與帝室通婚的背景，也同樣不例外。孝文帝遷都終於使貴族與皇權的矛盾集中爆發，其中拓跋宗室的姻親貴族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穆泰“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當初文明太后謀廢孝文帝時，穆泰切諫而止，“高祖德之，錫以山河，寵待隆至”。但因穆泰“不願遷都”，太和二十年（496 年），他“乃

與［陸］叡及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鎮北將軍、樂陵王思譽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52]圖謀叛亂，最後被鎮壓。以此為標誌，北魏貴族政治受到很大遏制，皇權得以伸張。與此相適應，北魏宗室的婚姻也基本告別了貴族時代，轉向了漢族大族。煊赫一時的穆氏家族自此幾乎斷絕了與宗室通婚，就是一個具體而微小的證明。

當然，拓跋統治者的婚姻受漢族的影響並非不明顯。約從文成帝拓跋浚時起，拓跋統治者的婚姻觀念開始有意識地向漢族靠近。和平四年（463 年），拓跋浚下詔曰：

>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令。[53]

談婚以禮，這對拓跋鮮卑來說，無疑是婚姻方面的進步。這個關於“禮”的規定，具有嚴格的等級特徵，目的是使婚喪貴賤有別，上下有序，故而與漢族傳統的婚喪禮儀並無軒輊。這在拓跋浚的另一詔書中體現得更明顯：

> 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54]

鮮卑統治者三令五申地強調援禮入婚，主要是想扭轉鮮卑貴族等級失倫的原始婚俗，這明顯是受了西晉以來漢族門第婚姻的影響。

但婚俗與其他風俗一樣，行之既久，改變為難。拓跋浚的幾紙詔令，並未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直到孝文帝太和二年（478 年），朝廷仍在發佈類似的詔書：

> 迺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準。犯者以違制論。[55]

可見，到孝文初期，鮮卑貴族仍罔顧“先帝”（即拓跋浚）的科禁，不別貴賤，“下與非類婚偶”。為改變宗室婚姻“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的狀況，孝文帝藉其長弟咸陽王元禧娶“隸戶”而重申婚禁，下詔曰：

> 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56]

孝文帝為六個弟弟所娉的六女，分屬四姓，其中穆氏乃鮮卑勳舊“八姓”之首，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和范陽盧氏乃北方漢人第一流高門。這個詔令的強制推行，標誌着北朝胡漢上層的大規模通婚正式開始展開。

關於北朝宗室與漢族大族的通婚，以往的研究基本都集中於幾個漢人著姓。這裡，我們從更廣的範圍着手，盡可能把史料所見的所有與宗室通婚的漢人家族都列為考察對象。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們先把北朝宗室與漢族大族的通婚情況製成簡表，然後再進行具體討論。

表一．北朝皇室與長樂馮氏通婚情況簡表（王族後裔）[57]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世祖拓跋燾	長樂馮氏	左昭儀	兄（弟）馮朗秦、雍二州刺史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高宗拓跋濬	長樂馮氏	文明皇后	父馮朗秦、雍二州刺史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高祖元宏	長樂馮氏	廢皇后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高祖元宏	長樂馮氏	幽皇后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高祖元宏	長樂馮氏	昭儀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156 頁
高祖元宏	長樂馮氏	昭儀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156 頁
廢太子元恂	長樂馮氏	／	父馮誕司徒	《魏書》卷 22《廢太子恂傳》
安哀王元悅	長樂馮季華	王妃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155 頁
南平王元纂	長樂馮氏	王妃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156 頁
安豐王元延明	長樂馮氏	王妃	姊文明皇后	《彙編》第 376 頁
任城王元澄	長樂馮氏	王妃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156 頁
元誘	長樂馮氏	命婦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42 頁
元延	長樂馮氏	夫人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167 頁
元崢	長樂馮氏	王妃	父馮熙太師、昌黎王	《彙編》第 216 頁
元謐	長樂馮氏	王妃	長樂馮修女	元謐墓誌 妃馮氏墓誌
博陵長公主	長樂馮熙	昌黎王	／	《魏書》卷 83《外戚傳上》
安樂長公主	長樂馮誕	南平王	／	《魏書》卷 83《外戚傳上》
元楚華	長樂馮顯	光祿大夫	父馮誕侍中、南平王	《墓誌》第 149 頁
順陽長公主	長樂馮穆	光祿大夫	父馮誕侍中、南平王	《魏書》卷 83《外戚傳上》
元氏	長樂馮邕	輔國將軍	／	《彙編》第 129 頁
元孟容	長樂馮孝纂	／	父元聿黃門侍郎	《彙編》第 167 頁
高歡	長樂馮氏	娘	兄馮子昂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表二. 北朝皇室與隴西李氏通婚情況簡表（王族後裔）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高祖元宏	隴西李氏	夫人	父李沖司空	《魏書》卷 53《李沖傳》
肅宗元詡	隴西李氏	世婦	父李瓚司徒參軍事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魏書》卷 39《李寶傳》
莊帝元子攸	隴西李氏	／	父李延寔光、青二州刺史	《魏書》卷 83《李延寔傳》
元勰	隴西李氏	王妃	父李沖司空	《魏書》卷 21《彭城王傳》
元禧	隴西李氏	王妃	父李輔潁川太守	《魏書》卷 21《咸陽王傳》
元超	隴西李氏	／	父李輔潁川太守	《魏書》卷 14、卷 39
元澄	隴西李氏	王妃	隴西	元澄墓誌 澄妃李氏墓誌
城陽王元徽	隴西李氏	王妃	祖李沖司空	《彙編》第 300 頁
元子訥	隴西李氏	王妃	父李休纂太子舍人	《彙編》第 149 頁
元季海	隴西李稚華	妻	兄李延寔光、青二州刺史	《彙編》第 148 頁
元某	隴西李豔華	夫人	父李該濟、廣二州刺史	《彙編》第 348 頁
元始俊	隴西李孟宜	妻	父李超沁水縣宰	《彙編》第 161 頁
元繼女	隴西李挺	吏部尚書	／	《彙編》第 352 頁
元季聰	隴西李挺	吏部尚書	／	《彙編》第 352 頁
莊帝妹豐亭公主	隴西李彧	廣州刺史	父李延寔光、青二州刺史	《墓誌》第 149 頁
高歡	隴西李氏	娘	從兄李延寔光、青二州刺史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表三. 北朝皇室與河內司馬氏、彭城劉氏、蘭陵蕭氏通婚情況簡表（王族後裔）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元譚	河內司馬氏	王妃	父司馬纂南青州刺史	元譚及妃司馬氏墓誌
河內公主	司馬楚之	朔州刺史	父司馬榮期晉梁、益二州刺史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
臨涇公主	司馬彌陀	／	父司馬休之荊州刺史	《魏書》卷 37《司馬休之傳》
華陽公主	司馬朏	散騎常侍	父司馬悅豫州刺史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
趙郡公主	司馬躍	朔州刺史	父司馬楚之朔州刺史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
西魏襄城郡公主	司馬裔	刺史	／	《周書》卷 36《司馬裔傳》
東魏博陵長公主	司馬慶雲	膠東刺史	／	《北齊書》卷 39《祖珽傳》
廢太子元恂	彭城劉氏	孺子	父劉長文	《魏書》卷 22《廢太子恂傳》
元詳	彭城劉氏	王妃	父劉昶丹陽王	《魏書》卷 21《北海王傳》
魏武邑公主	彭城劉昶	丹陽王	父劉義隆	《魏書》卷 59《劉昶傳》
魏建興公主	彭城劉昶	丹陽王	父劉義隆	《魏書》卷 59《劉昶傳》
魏平陽公主	彭城劉昶	丹陽王	父劉義隆	《魏書》卷 59《劉昶傳》
魏彭城長公主	彭城劉承緒	駙馬都尉	父劉昶	《魏書》卷 59《劉昶傳》
魏蘭陵長公主	彭城劉輝	員外常侍	父劉昶	《魏書》卷 59《劉昶傳》
元德隆	蘭陵蕭氏	妻	父蕭寶夤齊王	元爽墓誌
元寶月	蘭陵蕭氏	嬪	父蕭子賢太子詹事	元寶月墓誌
南陽長公主	蘭陵蕭寶夤	刺史、齊王	父南齊蕭鸞	《魏書》卷 59《蕭寶夤傳》
建德公主	蘭陵蕭烈	駙馬都尉	父蕭寶夤	《魏書》卷 59《蕭寶夤傳》
壽陽長公主	蘭陵蕭贊	齊州刺史	叔蕭寶夤	《魏書》卷 59《蕭寶夤傳》

表四. 北朝皇室與范陽盧氏通婚情況簡表（傳統大族）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高祖元宏	范陽盧氏	嬪	父盧敏議郎	《魏書》卷 47《盧玄傳》
肅宗元詡	范陽盧氏	世婦	父盧道約光祿大夫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元亮	范陽盧氏	妻	父盧元聿太尉司馬	《彙編》第 184 頁
元壽安	范陽盧蘭	王妃	父盧延集幽州主簿	《彙編》第 492 頁
元略	范陽盧真心	王妃	父盧尚之濟、青二州刺史	《彙編》第 238 頁
元融	范陽盧貴蘭	王妃	父盧延集幽州主簿	《彙編》第 371 頁
元雍	范陽盧氏	王妃	父盧神寶中書博士	《魏書》卷 21《咸陽王傳》
元某	范陽盧令媛	充華	父盧道約光祿大夫	《彙編》第 128 頁
元魏樂浪長公主	范陽盧道裕	涇州刺史	父盧淵秘書監	《魏書》卷 47《盧玄傳》
元魏濟南長公主	范陽盧道虔	幽州刺史	父盧淵秘書監	《魏書》卷 47《盧玄傳》
元魏義陽長公主	范陽盧元聿	太尉司馬	父盧昶雍州刺史	《魏書》卷 47《盧玄傳》
元彧女	范陽盧柔	／	／	《北史》卷 30《盧柔傳》
高孝瑜	范陽盧氏	王妃	父盧正山	《北史》卷 52《河南王傳》
高湝	范陽盧氏	王妃	父盧臣客太子中庶子	《北齊書》卷 42《盧叔武傳》

表五. 北朝皇室與滎陽鄭氏通婚情況簡表（傳統大族）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高祖元宏	滎陽鄭氏	嬪	父鄭胤伯東徐州刺史	《北史》卷 35《鄭羲傳》
高祖元宏	滎陽鄭氏	嬪	父鄭羲中書令	《魏書》卷 56《鄭羲傳》
廢太子元恂	滎陽鄭氏	孺子	父鄭懿中書令	《魏書》卷 22《元恂傳》
元範	滎陽鄭氏	王妃	滎陽鄭寶女	元範墓誌
元羽	滎陽鄭氏	王妃	父鄭平城東平原太守	《魏書》卷 56《鄭羲傳》
元詳	滎陽鄭氏	王妃	父鄭懿吏部郎中	《魏書》卷 21《北海王傳》
廣平王元悌	滎陽鄭大車	王妃	父鄭嚴祖通直常侍	《北史》卷 14《皇后傳》
元雍女	滎陽鄭幼儒	司州別駕	父鄭胤伯東徐州刺史	《魏書》卷 56《鄭羲傳》
元延明女	滎陽鄭伯猷	南青州刺史	父鄭平城東平原太守	《魏書》卷 56《鄭羲傳》
元魏平陽公主	滎陽鄭文寬	開府	／	《北史》卷 35《鄭羲傳》
元徽妹	滎陽鄭氏	妻	／	《墓誌》第 300 頁
高歡	滎陽鄭大車	太妃	父鄭嚴祖通直常侍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文宣太子	滎陽鄭氏	良娣	父鄭雛尚書郎	《北史》卷 35《鄭羲傳》
高叡	滎陽鄭氏	王妃	父鄭述祖兗州刺史	《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
高叡	滎陽鄭氏	王妃	父鄭道蔭	《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
高氏	滎陽鄭熙	卷縣令	子鄭術	《疏證》第 261 頁
宇文諧	滎陽鄭氏	妻	父鄭術始、遂二州刺史	《疏證》第 261 頁
宇文談	滎陽鄭氏	妻	父鄭術始、遂二州刺史	《疏證》第 261 頁
宇文弘	滎陽鄭氏	妻	父鄭術始、遂二州刺史	《疏證》第 261 頁

表六. 北朝皇室與太原、琅邪王氏及京兆韋氏等通婚情況簡表（傳統大族）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高祖元宏	太原王氏	嬪	父王瓊光、兗二州刺史，尚書令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
元倪父	太原王氏	／	／	《彙編》第 169 頁
元諧	太原王氏	王妃	父王叡尚書令	《彙編》第 169 頁
高建	太原王氏	妻	父王安祖馮翊太守	《彙編》第 460 頁
世宗元恪	琅邪王氏	夫人	父王肅尚書令	《魏書》卷 63《王肅傳》
肅宗元詡	琅邪王氏	嬪	父王紹中書侍郎	《魏書》卷 63《王肅傳》
元淵	琅邪王氏	王妃	父王肅尚書令	《彙編》第 358 頁
元湛	琅邪王令媛	王妃	父王翊侍中司空	《彙編》第 358 頁
元揚	琅邪王氏	王妃	／	《彙編》第 72 頁
陳留長公主	琅邪王肅	尚書令	／	《魏書》卷 63《王肅傳》
寧陵公主	琅邪王某	／	／	《墓誌》第 57 頁
元貴妃	琅邪王誦	通直散騎常侍	／	《墓誌》第 92 頁
元僧兒	琅邪王子建	／	父濟州刺史	《墓誌》第 184 頁
元澄女	琅邪王翊	侍中司空	／	《墓誌》第 358 頁
高洋	琅邪王氏	嬪	／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高祖元宏	京兆韋氏	充華嬪	京兆韋崇女	《魏書》卷 45《韋閬傳》
西魏文帝女	京兆韋世康	／	／	《周書》卷 31《韋孝寬傳》
元氏	京兆韋孝寬	／	／	《周書》卷 31《韋孝寬傳》
元均	京兆杜氏	／	／	元均及妻杜氏墓誌
北魏新豐公主	京兆杜瓚	京兆	／	《周書》卷 39《杜果傳》
元超女	河東裴子通	趙州刺史	父裴良太府卿	《疏證》第 408 頁
北魏太原長公主	河東裴詢	／	平南將軍、郢州刺史	《魏書》卷 45《裴駿傳》

表七. 北朝皇室與清河、博陵崔氏通婚情況簡表（傳統大族）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高祖元宏	清河崔氏	嬪	兄崔休刺史、度支尚書	《魏書》卷 69《崔休傳》
世宗元恪	清河崔氏	嬪	父崔亮尚書右僕射	《魏書》卷 66《崔亮傳》
元稚舒	清河崔氏	妻	父崔休刺史、度支尚書	《魏書》卷 69《崔休傳》
元嶷長子	清河崔氏	妻	弟崔休刺史、度支尚書	《魏書》卷 69《崔休傳》
元雍第二女	清河崔仲文	散騎常侍	父崔休刺史、度支尚書	《魏書》卷 69《崔休傳》
元魏晉寧公主	清河崔夤	太子舍人	兄崔休刺史、度支尚書	《魏書》卷 59《蕭寶夤傳》
元魏琅邪公主	清河崔括	黃門郎	／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元魏襄城長公主	清河崔瓚	尚書左丞	父崔暹瀛州刺史、都督	《魏書》卷 89《崔暹傳》
元寶建	清河崔氏	妻	父崔悛徐州刺史	《彙編》第 342 頁
高濟	清河崔氏	王妃	兄崔悛徐州刺史	《北齊書》卷 23《崔悛傳》
高祖元宏	博陵崔氏	嬪	父崔挺光州刺史	《北史》卷 32《崔挺傳》
肅宗元詡	博陵崔氏	世婦	父崔孝芬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元雍	博陵崔氏	王妃	兄崔顯	《魏書》卷 21《高陽王傳》
元氏	博陵崔孝芬	荊州刺史 吏部尚書	父崔挺光州刺史	《北齊書》卷 18《孫騰傳》
高慎	博陵崔氏	妻	兄崔暹度支尚書	《北齊書》卷 30《崔暹傳》
北齊安樂公主	博陵崔達拏	司農卿	父崔暹度支尚書	《北齊書》卷 30《崔瓘傳》

表八. 北朝皇室與趙郡李氏通婚情況簡表（傳統大族）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世宗元恪	趙郡李氏	嬪	父李續寶殿中將軍	《彙編》第 184 頁
元鑑	趙郡李氏	王妃	父李憲兗、揚二州刺史	《魏書》卷 36《李順傳》
元義興	趙郡李氏	妻	／	《魏書》卷 19《南安王傳》
北魏滄水公主	趙郡李安世	相州刺史	父李祥淮陽太守	《魏書》卷 53《李孝伯傳》
元孟和	趙郡李長鈞	開府參軍	父李憲兗、揚二州刺史	《墓誌》第 331 頁
元世鐸	趙郡李氏	妻	父李祖牧	／
孝靜帝元善見	趙郡李氏	嬪	父李叔讓	《北史》卷 14《皇后傳》
齊文宣帝高洋	趙郡李祖娥	皇后	父李希宗上黨守	《北齊書》卷 9《皇后傳》
齊廢帝高殷	趙郡李氏	王妃	父李祖勳侍中、光二州刺史	《北史》卷 33《李順傳》
齊武成帝高湛	趙郡李氏	夫人	父李叔讓	《北史》卷14《后妃列傳下》
齊後主高緯	趙郡李氏	左昭儀	父李祖欽衛尉卿	《北史》卷14《后妃列傳下》 《北史》卷 47《陽休之傳》
齊後主高緯	趙郡李氏	夫人	父李孝貞博陵太守	《北史》卷14《后妃列傳下》 《隋書》卷 57《李孝貞傳》
齊琅邪王高儼	趙郡李氏	王妃	父李祖欽衛尉卿	《北齊書》卷12《琅邪王傳》 《北史》卷 47《陽休之傳》
齊安德王高延宗	趙郡李氏	王妃	父李祖牧	《疏證》第 217 頁
齊南安王高思好	趙郡李氏	王妃	父李叔讓	《北史》卷 14《皇后列傳》
齊南安王子世才	趙郡李氏	王妃	父李琮功曹	《彙編》第 467 頁
齊永安王高茂則	趙郡李氏	王妃	父李君榮司空府刑獄參軍	《疏證》第 224 頁

表九. 北朝皇室與河東薛氏、弘農楊氏等通婚情況簡表（傳統大族）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元愉	弘農楊氏	王妃	父楊次德蘭陵太守	元寶月墓誌
元尰父	弘農楊氏	／	兄（弟）司空	《彙編》第 301 頁
元和妹	弘農楊某	／	兄楊椿刺史、僕射、行台	《魏書》卷 58《楊播傳》
元氏	弘農楊保元	汾州刺史	／	《彙編》第 385 頁
北齊太原長公主	弘農楊愔	尚書令	父楊津并州刺史	《北齊書》卷 32《楊愔傳》
周宣帝宇文贇	弘農楊麗華	皇后	父楊堅隋文帝	《周書》卷 9《皇后傳》
元崇智	河東薛氏	妻	父薛和南青州刺史	《彙編》第 167 頁
元煥	河東薛伯徽	／	父尚書三公郎中	《彙編》第 174 頁
北魏河西長公主	河東薛洪祚	南豫州刺史	父薛謹秦州刺史	《魏書》卷 42《薛辯傳》
元雍女	安定皇甫瑒	／	／	《魏書》卷 71《裴叔業傳》
元阿耶	范陽祖氏	／	／	《墓誌》第 339 頁
饒安公主	勃海刁宣	／	／	《魏書》卷 38《王慧能傳》

表十．北朝皇室與安定胡氏、勃海高氏、頓丘李氏通婚情況簡表（新貴家族）

宗室	漢人大族			資料來源
	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世宗元恪	安定胡氏	靈皇后	父胡國珍司徒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肅宗元詡	安定胡氏	皇后	父胡盛冀州刺史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肅宗元詡	安定胡氏	昭儀	父胡樂世并州刺史	《彙編》第 209 頁
元叉（乂）	安定胡氏	郡君	父胡國珍司徒	《魏書》卷 16《元繼傳》
元亶	安定胡氏	王妃	父胡寧岐、涇二州刺史	《魏書》卷 83《外戚傳下》
元邵	安定胡氏	王妃	父胡僧洸侍中	《彙編》第 223 頁
長安縣公主	安定胡祥	中書監	父胡國珍司徒	《魏書》卷 83《外戚傳下》
齊武成帝高湛	安定胡氏	皇后	父胡延之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齊後主高緯	安定胡氏	皇后	父胡長仁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世祖元宏	勃海高氏	昭皇后	兄高肇司徒公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世宗元恪	勃海高氏	武皇后	伯高肇司徒公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元舉	勃海高氏	王妃	父高聿夏州刺史	《彙編》第 216 頁
元諶	勃海高氏	／	父高信幽、瀛二州刺史	《彙編》第 169 頁
元魏高平公主	勃海高肇	司徒公	／	《魏書》卷 83《外戚傳下》
元魏長樂公主	勃海高猛	幽州刺史	叔高肇司徒公	《魏書》卷 83《外戚傳下》
元舉姑	勃海高聿	夏州刺史	／	《墓誌》第 216 頁
世宗元恪	頓丘李氏	婕妤	父李彪度支尚書	《魏書》卷 62《李彪傳》
文成帝拓跋濬	頓丘李氏	皇后	兄李峻太宰	《魏書》卷 83 上《李峻傳》
元逸	頓丘李氏	妻	父李平司空	元erase 墓誌
元爽	頓丘李氏	妻	父李平司空	元爽墓誌
元顥	頓丘李元姜	王妃	父李奇頓丘公	元顥墓誌 李元姜墓誌

表十一. 北朝皇室與其他漢族通婚情況簡表（新貴家族）

宗室	漢族族望	地位	近親地位	資料來源
明元帝	魏郡杜氏	皇后（貴嬪）	杜超妹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南安長公主	魏郡杜超	／	／	《魏書》卷 83《外戚傳》
獻文帝拓跋弘	中山李氏	皇后（夫人）	中山李惠女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北魏武威長公主	中山李蓋	／	／	《魏書》卷 83 上《外戚傳上》
孝文帝	平原林氏	皇后	平原林閻姪女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北魏陳留長公主	清河張彝	／	光祿大夫	《魏書》卷 64《張彝傳》
元氏	東平畢元賓	／	／	《魏書》卷 61《畢眾敬傳》
元願平	樂浪王氏	／	樂浪王道岷女	王氏墓誌
元魏宗室女	義興平氏朱修之	／	雲中鎮將	《魏書》卷 43《朱修之傳》
東魏廣陽王妹	丹陽徐之才	／	／	《北齊書》卷 32《徐之才傳》
東魏河南長公主	潁川崔祖昺	／	／	《墓誌彙編》第 342 頁
元繼女	安定張顯明	／	高平鎮將	《魏書》卷 94《閹官傳》
元恭女	弘農劉懿	／	／	《墓誌》第 337 頁
高歡	游京之女	太妃	／	《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高澄	廣平宋氏	太妃	祖宋弁	《北齊書》卷 11《文襄六王傳》
高紹義	封孝琬女	王妃	勃海	《北齊書》卷 12《范陽王傳》
北齊淮陽公主	廣漢燕子獻	／	／	《北齊書》卷 34《燕子獻傳》
北齊義安長公主	遼東李輝	／	／	《周書》卷 15《李弼傳》
宇文泰女	中山劉昶	／	／	《周書》卷 17《劉亮傳》
宇文邕	李姿娥	皇后	楚人	《周書》卷 9《皇后傳》
宇文贇	朱滿月	皇后	吳人	《周書》卷 9《皇后傳》

在正式討論北朝宗室與漢族家族的通婚情形前，首先說明兩點：第一，皇室與漢族大族的通婚我們在“北朝皇室的婚姻關係”中已說明，此處的討論主要以宗室人員為主，但為了從整體上分析元氏與漢族家族的通婚概貌，必要時對皇室仍有涉及。第二，東、西魏時元氏雖成為高氏、宇文氏的附庸，但名義上仍是宗室，我們在考察元魏的情況時把北魏、東魏、西魏三者合而為一，然後再分別對北齊、北周的情況進行闡釋。

（二）元魏宗室與漢族大族的聯姻

根據前述表格的統計，在整個元魏時期，元氏宗室與大約 34 個漢人家族進行過約 160 次通婚。這些漢人家族可分為三類：王族後裔、傳統大族和新貴家族。王族後裔是指五胡十六國時期建立過政權，或者南北朝對峙時南方北奔的王族之後裔。這類家族及其與元魏宗室通婚的次數是：長樂馮氏 21 次、隴西李氏 15 次、河內司馬氏 7 次、彭城劉氏 7 次、蘭陵蕭氏 5 次，共 55 次，約佔全部通婚次數的 34%。傳統大族是指魏晉時期就已形成的漢族大族。這類家族與元氏宗室聯姻的情況是：范陽盧氏 12 次、滎陽鄭氏 11 次、琅邪王氏 10 次、清河崔氏 9 次、趙郡李氏 7 次、弘農楊氏 4 次、博陵崔氏 4 次、太原王氏 3 次、河東薛氏 3 次、京兆韋氏 3 次、京兆杜氏 2 次、河東裴氏 2 次，安定皇甫氏、范陽祖氏、勃海刁氏各 1 次，共 73 次，約佔通婚總數的 46%。新貴家族主要是指少數民族入據中原後崛起的漢人家族，這類家族與宗室通婚的情況為：安定胡氏 7 次，勃海高氏 7 次、頓丘李氏 5 次、中山李氏和魏郡杜氏各 2 次，平原林氏、清河張氏、東平畢氏、樂浪王氏、義興平氏朱氏、丹陽徐氏、潁川崔氏、安定張氏各 1 次，共 32 次，約佔通婚總數的 20%。下面對這三類家族與元魏宗室的通婚情況分別進行說明。

1. 王族後裔

這類漢人家族數量雖少，只有五個，但與宗室的通婚次數卻很多。從 34% 這個比重來看，可說拓跋統治者在聯姻時，對建立過政權而後歸順北魏的王族後裔確實有種特殊的偏好。

在這些家族中，馮氏不但是五個王族後裔之一，同時也是全部 34 個漢人家族中與元魏宗室通婚次數最多的家族，達 21 次。但雙方最初的通婚，卻是因政治鬥爭而起。北魏永興元年（409 年），由長樂徙於遼西的馮跋建立北燕，馮跋於神䴥二年（429 年）死，其弟馮文通自立，交通劉宋。太武帝拓跋燾親討北燕，馮文通“遣其尚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58] 這位馮氏女，後為世祖左昭儀，也是光耀馮氏門楣的關鍵人物。北燕被拓跋燾討平後，馮文通之子馮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59] 馮朗之子馮熙避入氐羌，女“入宮”，被其姑、世祖左昭儀馮氏“教訓撫養”，“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60] 她就是文明皇后。高宗死後，文明皇后相繼被尊為皇太后、太皇太后，“臨朝專政”十餘年，馮氏家族亦由此暴得富貴。早在當皇后時，她就訪得其弟馮熙，徵赴京師，令“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61] 進爵昌黎王，官至太師，可謂極盡青紫。馮熙“有子女數十人”，[62] 文明太后為“欲家世貴寵”，[63] 姊弟倆互為表裡，全面地與宗室進行通婚。

據統計，在元魏時期，馮氏女性前後共出三位皇后、四位昭儀、九位王妃；男性娶公主三人、其他宗室女三人。以這樣的通婚規模，說長樂馮氏是北朝皇室最顯赫的姻戚家族並不為過。但這裡有個問題：如果說文明太后生前因威權在握而能使馮氏風光無限，那麼在她死後，不但孝文帝親政後未觸及馮氏的家族利益，就是終北魏之世馮氏家族亦安然無險，這對開始就因政治恩怨而結為姻親的元馮二氏來說，確是有些匪夷所思。何況，馮太后與孝文帝還沒有血緣關係。我們知道，北魏素以嚴刑峻法著稱，“蹉跌之間，便至夷滅”，[64] 僅孝文帝時以“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65] 並且，孝文帝時就有人

對馮氏命運有所擔憂，黃門崔光對馮聿說：“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66]但孝文帝對馮氏家族始終未採取過激措施，甚至幽皇后馮氏趁孝文帝出征而“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孝文帝都試圖為“馮門”掩過，他臨死時對彭城王元勰說：“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67]這樣處置幽皇后雖說殘忍，但對馮氏家族也算仁至義盡了。

那麼，以孝文帝為代表的元魏統治者對馮氏家族如此信任和寬恕的原因何在？持續而頻繁的通婚，當然是馮氏比較可靠的護身符，但除此之外，這些因素也不可忽視：其一，馮氏是鮮卑化的漢人。馮氏由安樂徙至慕容鮮卑控制的遼西後，“既家昌黎，遂同夷俗”。[68]習俗上由夏入夷，這使兩者之間的距離容易拉近。其二，孝文帝“性寬慈”，[69]“雅性孝謹”，[70]對有撫養之恩的馮太后，他始終心存感念。馮太后死，孝文帝悲痛不已，“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71]甚至馮太后對他施以杖刑，孝文帝“亦不以介意”。[72]這種情感對馮氏家族當然有利。其三，馮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73]她利用政治手腕，剪除了諸多威脅馮氏家族利益的勢力。較明顯的事例是：孝文帝的生母中山李氏，即獻文思皇后，就是馮太后以夷族的方式鏟除的。雖然孝文帝直到馮太后死後才知道生母之死的真相，但因事過境遷，加之李氏倖存者關係較遠，故而孝文帝仍舊“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敘用”。[74]馮太后通過類似措施，為保證馮氏家族的平安奠定了基礎。

與安樂馮氏相比，隴西李氏與元魏宗室通婚較晚，至孝文帝初期雙方才開始結為姻親，但在通婚次數上卻不落下風，居於第二位。在北魏為隴西李氏開基的李寶，是十六國時期的西涼國主李暠之孫。西涼被沮渠蒙遜滅掉後，李寶亡入柔然，後降北魏，位至高官。但隴西李氏的貴寵，還有個偶然因素，即李寶第六子李沖“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75]“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76]李沖和文明太后的這種特殊關係，為隴西李氏與元魏宗室的通婚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前面提到，孝文帝下詔為六個弟弟娉娶大族女，隴西李氏得佔其二，即咸陽王元禧娉李輔女，始平王元勰娉李沖女。這個詔書發佈於文明太后依舊掌權之時，“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77]對於宗室聯姻這樣的大事，馮太后當然不會放過，隴西李氏被選為皇族之戚，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樣，“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為夫人”，這也應是馮太后操縱的結果。李沖也盡量利用這種優勢，通過婚姻積極為家族爭取利益。根據統計，隴西李氏共 12 女嫁給北魏皇族，這基本是由李沖奠定的基礎。

李沖死後不久，隴西李氏在宣武帝初期就遭到打擊。咸陽王元禧在高祖崩後“受遺輔政”，“為宰輔之首”。元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78]景明二年（501年），“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79]元禧之妃兄李伯尚即李輔長子。這次謀反失敗後，元禧被誅，李伯尚、李仲尚兄弟坐死，餘被徙邊，李輔一房幾遭滅頂之災。但這次變故，並未對隴西李氏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如李沖長子李延寔在世宗時襲父爵，官至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及“爾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80]《魏書・外戚傳》裡，李延寔是惟一出自漢族大族的人物。這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隴西李氏在元魏宗室婚姻圈中的地位之獨特。

元魏宗室不但對北方王族情有獨鍾，對南方北奔的王族，它也積極聯姻。這樣的聯姻，基本都是隨着南方政局的動蕩而發生的。最早的是東晉的司馬氏家族。東晉末年，劉裕控制了東晉朝政，“誅夷司馬戚屬”，[81]司馬氏紛紛渡河而北，尋求庇護。東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攜家輾轉投向北魏，得到拓跋貴族的重用，後其孫司馬彌陀襲爵，並“選尚臨涇公主”。[82]

梁益二州刺史司馬榮期之子司馬楚之則潛至河南，聚眾陰圖劉裕。北魏略有河南後，楚之降魏，“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83]司馬金龍的婚姻也與北魏宗室有關，“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84]司馬金龍弟司馬寶龍則“尚趙郡公主”。[85]後來，司馬悅之子司馬朏又“尚世宗妹華陽公主”。[86]直至東、西魏時，司馬氏與元魏宗室的姻親關係仍可見諸史籍。司馬楚之曾孫司馬裔因功被宇文泰“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為襄城郡公主”，[87]可見司馬裔妻乃元氏，而司馬慶雲妻則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88]

宋魏對峙時，劉氏宗室避難歸魏的也不乏其人，劉昶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劉昶是劉義隆第九子，宋孝武帝劉駿時任徐州刺史，“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89]劉昶被迫叛宋入魏，時在和平六年（465年）。北魏對劉昶的歸降非常“嘉重”，不但賜以王爵，還令“尚武邑公主”，“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90]一人三尚公主，這在北魏宗室的婚姻中是絕無僅有的現象，由此亦可見北魏對這個落魄王族人物的重視。不僅如此，就連劉昶的“少而虺疾”的嫡子劉承緒，也“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91]但他先昶而卒。劉昶於是以子劉輝“為世子，襲封”。正始初（504年），劉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92]劉昶父子三人前後計尚五位公主，這也算是一奇。此外，劉昶之女還是北海王元詳妃。元詳因與安定王元燮妃高氏亂倫，被朝廷治罪。元詳母為此切責劉氏說：“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93]這裡所謂的“門戶匹敵”，當指雙方都是王族之故。因婚姻生活經常出現不和諧的情況，劉氏與北魏宗室的聯姻終因劉輝毆死公主而結束，正光四年（523年），劉輝死，“家遂衰頓，無復可紀”。[94]

蕭齊末年，蕭氏內部因爭位而致亂，鄱陽王、南徐州刺史蕭寶夤為避蕭衍迫害，渡江奔魏，甚見禮重，得“尚南陽長公主”。“寶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長子蕭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永安三年（530年）以蕭寶夤謀反坐誅。次子蕭權早卒。少子蕭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圜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95]蕭寶夤之外，蕭氏另一北奔人物是蕭贊。蕭贊是蕭寶卷遺腹子，深得梁武帝蕭衍寵愛，但“為衍諸子深所猜疾”，蕭贊遂北投蕭寶夤，莊帝時“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96]爾朱之亂中，壽陽長公主“守操被害”，蕭贊棄官為沙門，蕭氏在北人物遂盡。

總體來看，在與元魏宗室聯姻的漢人王族後裔中，北方的土著士族因根基深厚，人物殷阜，即使遭到打擊也不會輕易凋零。而南方歸魏的王族後裔卻因家勢單薄、人物單鮮而經不起挫折，劉氏、蕭氏逐漸淡出宗室婚姻圈之外，即與此有一定關係。不過，從北魏宗室的角度來說，它與這些漢人“貴族”聯姻似乎並未有厚此薄彼，不論南北，它都積極建立婚姻關係。這種現象，除了現實政治的因素外，可能還與拓跋鮮卑對“貴族”的迷戀有關。前面提到，拓跋鮮卑由部落向國家過渡的過程中，留有濃厚的貴族制殘餘，北魏前期元魏宗室多與部落貴族通婚，就是一種直接反映。這種傳統其實並未完全被擯棄，而是部分地移植到了漢人“貴族”這裡。

2. 傳統大族

北朝時期的傳統大族雖中經“五胡亂華”的衝擊，但經過調適與整合，大約在北魏統一北方後，它在胡族的翼護下逐漸恢復元氣。這些大族既有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又是當時文化思想的淵源所在，因而備受胡族統治者的重視。拓跋貴族開啟與漢族大族的通婚之門後，迎進的姻戚主要就是這些大族的成員。據前面的統計，元魏宗室結以婚姻的傳統大族約有15

個，佔全部漢人家族的 44%；共聯姻 73 次，佔全部通婚次數的 46%。這兩組數字充分體現了傳統大族在元魏聯姻家族中的分量，也說明傳統大族依舊是各族統治者無法忽視的社會力量。

因漢人的傳統大族有高下之分，北魏統治者的籠絡力度當然也有輕重之別，聯姻即是這樣。《資治通鑑》卷 140 齊明帝建武三年（496 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正月條：

> 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婭，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97]

可見，至北魏孝文帝末期，盧、崔、鄭、王四姓已是“衣冠所推”的一流大族，隴西李氏亦由“當朝貴重”而與四姓相提並論。四姓之外，還有五姓之說。上引《資治通鑑》同年月條記：“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胡註：“盧、崔、鄭、王並李為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群從子姪，皆趙李也。”[98] 可見，所謂“五姓”，只是四姓之外多個趙郡李氏，可知趙李也是當時公認的名門望姓。另，河東薛氏也入上述《資治通鑑》所列大姓，但卻頗具戲劇性。

> 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孝文］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99]

可見，《資治通鑑》所記的這六姓七望，當是北魏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漢人大姓，也是元魏宗室重點通婚的漢族大族。隴西李氏已如前敘，這裡主要對其餘大族與元魏宗室的通婚情況進行論列。

據前面的統計，這六姓大族與元魏宗室共通婚 45 次，佔傳統大族與宗室通婚總次數的 62%。不過，這六姓與宗室的通婚也有多寡之別。首先是河東薛氏。薛氏經過自己的爭取雖得到皇帝的首肯而勉強成為郡姓，但實際上北魏宗室似乎始終未認可這個“蜀薛”，這從它與宗室通婚次數較少這點上或可得到印證。河東薛氏之先祖本蜀人，徙至河東汾陰後仍保持部族組織，“善綏撫，為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薛氏後相繼仕姚秦、劉宋、拓跋魏，是個典型的奉迎時勢的家族。[100] 在北魏最早彰顯的薛氏人物是拓跋嗣時歸魏的薛辯，他死後，其子孫多以功致顯。其長孫薛洪祚頗具時望，拓跋燾曾賜名初古拔，“皇興三年［469 年］，除散騎常侍。尚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101] 這是正史中薛氏與元魏宗室通婚僅見的一例，且時間還在孝文帝之前。孝文帝廣泛地推行胡漢聯姻的政策後，正史中未見薛氏與宗室通婚的情形。在墓誌資料中卻發現三例，一是南青州刺史薛和女嫁參軍元崇智，[102] 另兩例是薛洪祚孫女薛慧命、從孫女薛伯徽分別嫁廣陽王元湛和中山王元英之子元誘，[103] 但區區之數與這個人物繁多的大族顯得不甚匹配。聯想到薛宗起反駁孝文帝的“蜀薛”之說，看來北魏宗室非但不待之以漢人一流高門，反而有歸諸胡族之意。因此，河東薛氏與宗室聯姻不暢，亦合乎情理。墓誌稱元誘因“欽重門胄”而與薛伯徽結為伉儷，這個“門胄”恐怕與郡姓關係不大，倒可能是“伯祖親西河長公主”增高了它的門檻。[104]

但六姓中與元魏宗室聯姻較少的不止河東薛氏一姓，還有一姓竟是“衣冠所推”的四姓之一太原王氏。太原王氏自魏晉以來即為北方名族，永嘉亂後隨晉室南遷，東晉末掌控江左朝政，但很快就被激烈的門閥傾軋所淹沒，[105] 劫餘而存的王慧龍孤身北奔胡族，輾轉至拓跋魏才得以安身立命。而北魏對這位南來的士族人物並不信任，“慧龍請效力南討”，可終因

“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而“停前授”，[106]後雖經司徒崔浩極力援引而“得南垂自效”，但也是“功高而位不至”。北魏這種提防的態度，令王慧龍無所適從。作為太原王氏在北魏的奠基人，王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王氏香火亦由此而微若殘燭，“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107]子嗣乏少，又有被猜疑的前科，太原王氏與北魏宗室聯姻無多，幾乎是必然的結果。據我們的統計，太原王氏與宗室聯姻，正史只見一例，即孝文帝納王瓊長女為嬪。[108]墓誌資料中見兩例，一為南安王之妻“太原王氏”，[109]其家世不明；一為“自云太原晉陽人”[110]、因緣見幸於文明太后的王叡嫁女於元諧，其家世又可疑。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太原王氏都堪稱是元魏宗室的邊緣性姻親。

但事實卻是，太原王氏既入四姓，且得“納其女以充後宮”，說明這個人物單弱的大族仍被選入北魏宗室的最高婚姻圈，這肯定另有緣由。太原王氏初顯於北魏時，只有王慧龍的血肉之軀，既無家族勢力可依，又無文治武功可恃；[111]三世單傳的血胤，更與傳統大族的人丁興旺形成強烈的反差。它最終與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並為可與帝室通婚的四姓，應該說，它憑藉的主要不是自身實力，而是衣冠士族長期“提攜”的結果。早在東晉時，太原王氏就以“盛德”“德譽”著於江左，[112]深受衣冠士族的推戴。王慧龍入魏雖受到拓跋貴族的冷落，卻受到有北方士族領袖之實的清河崔氏、范陽盧氏的特殊照顧。王慧龍奔魏之初，質疑四起，清河崔氏卻及時伸出援手，與之結以婚姻，這對王慧龍擺脫困境是最直接的幫助。王慧龍死後，其獨子寶興又得崔浩安排，與范陽盧氏結為姻親：

> 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113]

在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長期扶植的基礎上，至寶興子瓊時，經過李沖的極力推薦，北魏皇帝“直信李沖吹噓之說”，[114]總算把這個“真偽未辨”的南來士族歸入四姓，並申以婚姻。

與太原王氏相比，趙郡李氏未進入與帝室有通婚優先權的四姓，但無其名卻有其實，趙李與宗室的通婚足可與四姓相頡頏，最起碼比太原王氏要活躍得多。趙李與元魏宗室的通婚，我們統計到七次，五女嫁元氏，二男娶元氏。女性中入宮二人，即北魏宣武帝嬪和東魏孝靜帝嬪。前者是“使持節冠軍將軍安州刺史固安侯趙郡李靜之孫，殿中將軍領齋師主馬左右續寶之女也”，[115]後者是“趙郡李叔讓女也”。[116]從李續寶女“應帝命”而“作配皇家”[117]這點看，趙郡李氏還是很受“皇家”青睞的。特別是前引《資治通鑑》所提到的“李靈、李順、李孝伯群從子姪”，史籍中不時見到他們與宗室結為二姓之好。李孝伯從姪李安世以推動實施均田制而著稱於時，其“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118]李順孫李憲歷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出將入相，屢受重用，其女也因之貴為王妃，《李憲墓誌》云：“第四女季嬪，適司空公安樂王［下殘］銓尚書左僕射武康王。”[119]文中安樂王即元鑑，《魏書・李順傳附李憲傳》說“［孝昌］三年秋，憲女婿安樂王鑑據相州反”，[120]可證。碑文殘缺部分當有“元鑑”二字，可能因其謀反而被故意鑿缺。“銓”應是元鑑父元詮，官至尚書左僕射，諡號曰武康，《魏書》卷 20 有傳。綜合上述情況可說，趙郡李氏與元魏“皇家”的通婚是符合它的“五姓”地位的。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趙郡李氏不僅“人物尤多，各盛家風”，[121]又“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122]甚至與帝室的聯姻也不遑多讓，為甚麼它被排斥在朝廷欽定的“四姓”聯姻大族之外？這和太原王氏得入四姓同樣令人感到意外。揆諸原因，從某種程度上說，王李二姓的一升一降，都與“衣冠士族”的態度關係匪淺，但不同的是，太原王氏一直為某些重要士族所

“提攜”，而趙郡李氏似乎與某些士族存在着很深的隔閡。比如，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儼然為士族領袖的崔浩就不顧姻親而排斥李順。《魏書》卷 36《李順傳》：

> 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123]

崔浩“頗輕順”，主要是爭寵所致。但聯繫到崔浩對拓跋燾曾說過“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124]的話，可能李順的某些行為也確為士林所鄙。趙郡逸士眭誇對李順就鄙夷不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誇拒而不許”。[125]這些對趙郡李氏後來的聲譽可能都有影響。從前引文知道，要進入四姓，“衣冠所推”這個條件有時很重要，趙郡李氏可能缺乏士林之望，相比之下，太原王氏則素負“德”名，久為南北士林所推。因此，太原王氏入選而趙郡李氏未入選四姓，就都不足為奇了。

當然，北魏欽定的宗室聯姻四姓，也不全然以士族的好惡為根據，家族勢力有時還是起主要作用的。四姓中的河南鄭氏，自鄭羲起貪賄不絕，穢聞不斷，他的五位兄長“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仇”，從這種情形看，即使鄭羲“文學為優”，恐怕河南鄭氏也不會給衣冠士族留下好印象。但鄭氏是河南的傳統大族，素著民望，“為州郡所信”，鄭羲藉此步入仕途，開創了河南鄭氏在北魏的基業，其地方勢力不容小覷。尤其是北魏遷都洛陽後，滎陽鄭氏成了距離新都最近的傳統大族，其受重視的程度自然非比尋常。我們注意到，也正是從孝文帝遷都前後起，元魏宗室和鄭氏的通婚才驟然增多。馮太后在世時，即太和十四年（490 年）之前，鄭羲藉着與李沖的“姻好”關係，曾與宗室進行過聯姻，即“文明太后為高祖納其女為嬪”。[126]大約在遷都前後，孝文帝不僅納鄭羲姪鄭胤伯之女為嬪，還為太子元恂娉鄭羲長子鄭懿之女為孺子。此外，在孝文帝為六個弟弟強娉大族女的詔書中，滎陽鄭氏亦居其二，即鄭平城女嫁廣陵王元羽，鄭懿女嫁北海王元詳。[127]可見，遷都前後，滎陽鄭氏有四女入元氏，且對象不是皇帝就是太子、宗室諸王。這種高密度、高規格的通婚，應該說絕非偶然，它和孝文帝的遷都之舉必有關聯。因為延興初（471 年）滎陽陽武人田智度“妖惑動眾，據亂京索”時，鄭羲僅“宣示禍福，重加募賞”，便收“旬日之間，眾皆歸散”之效，[128]這種影響力，想必志欲遷都的孝文帝不會陌生。因此，以滎陽鄭氏為通婚四姓，應是北魏統治者着眼於現實政治的結果。自太和年間至魏亡，滎陽鄭氏與宗室的通婚達 11 次，且絕大部分都在遷都之後，這就清楚地表明：元魏宗室與滎陽鄭氏結為經常性的通婚關係，目的是想與這個毗鄰新都的傳統大族結成利益同盟，以免後顧之憂。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清河崔氏和范陽盧氏都有資格入選四姓。先說清河崔氏，與有些大族主動投靠北魏不同，清河崔氏是以被逼無奈的高姿態出現在拓跋開國史上的。其代表人物崔玄伯少有“冀州神童”之譽，及長，“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仕慕容寶時，遭拓跋珪逼迫，“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大受信用。可以說，北魏初期的制度設計，崔玄伯實居首功，拓跋珪“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為永式”，甚至拓跋國號由代改魏，也出自崔玄伯之議。[129]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崔玄伯長子崔浩更具影響，《魏書》評價他“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130]可見無論是漢族的文化還是胡族的權力，崔浩兩得其高，實屬罕見。可惜崔浩不容於時，最後不但慘遭拓跋燾夷族，且又殃及姻親，太原郭氏、河東柳氏可能尚在復甦就遭此重創，因而北魏時這兩族並不興旺；只有范陽盧氏因族大支廣而又重新崛起，這點留待後敘。

現在我們關注的是，崔浩既被夷族，清河崔氏何以成為四姓？眾所周知，太和年間入選四姓的清河崔氏不是崔浩之後，而是由南入北的崔逞之後。但這種區分對我們認識作為大姓

的清河崔氏意義不大。因為北魏朝廷認定的四姓，不是針對某一支，而是針對整族的。假如沒有崔玄伯、崔浩父子在北魏初期的聲望，清河崔氏能否成為公認的大姓也很難說。何況崔逞在拓跋珪時即“以言悖君臣之體”而被賜死，至孝文帝初其孫崔叡被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門盡矣”。[131] 也就是說，崔逞一支也未能始終如一地獨立支撐起清河崔氏的門楣。但清河崔氏屢被誅殺而屹立不倒，且最終得入四姓，這應是整個清河崔氏長期積累的合力效應，並不是某一支的功勞。這從它與宗室的聯姻中也可獲得證明。在我們的統計中，清河崔氏與元魏宗室聯姻約九次，其中六次與崔逞玄孫崔休有關。崔休之父就是四姓中領銜清河崔氏的崔宗伯，但從宣武帝初才被追贈為清河太守、其子崔休“少孤貧”[132] 這兩點判斷，崔宗伯生前肯定不達於世。以這樣一位籍籍無名之輩代表清河崔氏（范陽盧敏也如此），並與四姓中分別領銜滎陽鄭氏、太原王氏的鄭羲、王瓊並列，這本身就是不倫不類。因此，四姓後的人名並非特指，而是代表整族。而且，在其餘三次與宗室的聯姻中，至少有一次與崔逞後人無關，即崔亮女被選為宣武皇帝嬪。[133] 這亦可說明宗室與清河崔氏聯姻時並未局限於崔逞一支。

在北魏，范陽盧氏是堪與清河崔氏齊名的傳統大族，其代表人物盧玄以“儒俊”出仕北魏。“神䴥四年，辟召儒俊，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但盧玄官位並不顯達，且因受姻親崔浩的牽連，險遭滅族之禍。後經其子盧度世的經營，特別是度世四子淵、敏、昶、尚之的規復，至孝文帝時，范陽盧氏終於乘時崛起，高官顯宦佈列朝野。尤其是盧淵，“與僕射李沖特相友善。沖重淵門風，而淵祇沖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沖”。[134] 並且，盧氏與宗室的聯姻，也以盧淵一門為多。據統計，范陽盧氏與宗室聯姻十二次，盧淵一門即佔三次，其子盧道裕、盧道虔分尚樂浪長公主和濟南長公主，孫女（盧道約女）為肅宗元詡世婦。而盧淵的三個弟弟與宗室共有四次通婚，即盧敏女為孝文帝嬪、盧昶子元聿尚義陽長公主、[135] 盧尚之女嫁武獻王第四子元略 [136] 以及盧元聿女嫁平原郡開國西元亮。[137] 需說明的是，《元乂墓誌》說元亮妻父為盧聿，應為盧元聿，當避“元”諱而改。因為墓誌裡“駙馬都尉、太尉司馬”的說法，[138] 與《魏書》所載完全吻合。且盧元聿“無他才能”，[139] 職位卑微，即使有公主的招牌，他也未必受宗室的重視。

從上面的情況看，盧玄一支與元魏宗室共通婚七次，另外四次則別有所屬。如盧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為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140] 而盧玄從祖兄盧溥的五世孫盧柔，“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141] 時當北魏末。可見盧神寶、盧柔均與盧玄別為支系。此外，墓誌所見的盧延集也是如此。據《元壽安妃盧蘭墓誌》：“太妃諱蘭，幽州范陽涿縣人也。……祖興宗，范陽太守。父延集，幽州主簿。”[142]《元融妃盧貴蘭墓誌》：“祖巘，燕太子洗馬，魏建將軍良鄉子。……父延集，幽州主簿。”[143] 這表明，盧蘭和盧貴蘭都是盧延集之女，但奇怪的是，姊妹倆竟同父不同祖，一為“祖興宗”，一為“祖巘”。對此，逯耀東先生考證認為：“《貴蘭墓誌》稱妃是魏司空毓九世孫，而且貴蘭之祖亦仕於燕，則巘與玄應是同輩，興宗可能是巘字，其官職相異，或一是生前的官職，一是其死後的贈諡。”[144] 甚是。既然盧巘、盧玄是同輩，則盧延集當然不屬於盧玄一門。這些情況進一步印證了我們前面提到的觀點，即《資治通鑑》所列四姓雖有具體人名出現，但並不代表某一支，而是代表全族。范陽盧氏與宗室的通婚就不限於盧敏所在的盧玄一支，而是也包括盧氏其他支系。

《資治通鑑》所提到的六個大族固然是元魏宗室聯姻的重點，但拓跋統治者並非不重視與其他傳統大族聯姻，琅邪王氏、勃海高氏、博陵崔氏以及弘農楊氏也是元氏的重要姻戚。琅邪王氏原是北方的世家大族，永嘉亂時隨司馬睿南渡，是左右東晉初期政局的主要勢力，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諺。[145] 江左的琅邪王

氏出現在北魏政壇時，上距南渡已近 180 年，時在北魏孝文帝末、蕭齊初，北來人物是王導的後代王肅。南齊武帝時，王肅“父奐及兄弟並為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孝文帝“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王肅由此而步入了北魏政治的核心階層。孝文帝死後，“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王肅的權勢達到極致。也正在這時，北魏宗室向王肅拋出了繡球，“詔肅尚陳留長公主”。[146] 但這段婚姻為時甚暫，景明二年（501 年），王肅死於壽春，年三十八。

不過王肅的身後並不淒涼，不但有子紹襲爵，且王氏與宗室的關係通過頻繁的聯姻而更加緊密。“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為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為嬪。”[147] 據《元湛墓誌》，湛“父諱淵……母琅邪王氏，父肅，尚書令司空宣簡公”，[148] 可見王肅另一女也嫁給了元氏。不僅如此，王肅在元魏顯達後，宣武帝初，王肅弟王秉“攜兄子誦、翊、衍等入國”，[149] 琅邪王氏在北又粗具規模。他們也相繼加入了與元魏宗室通婚的隊伍，致使王氏後來居上，通婚次數居傳統大族的前列。據《魏徐州琅耶郡臨沂縣都鄉南仁里通直散騎常侍王誦妻元氏志銘》：“祖高宗文成皇帝。父侍中太尉安豐圍王。主名貴妃，河南洛陽人也。”[150] 這個王誦，應是隨其叔王秉入魏的王誦。因為據墓誌，元貴妃亡於“歲次丁酉二月”，“年廿九”，而北魏經過兩個丁酉年，即文成帝太安二年（457 年）和孝明帝熙平二年（517 年），元貴妃顯然死於後一個丁酉年，這樣她的生年為太和十三年（489 年）。據本傳，王誦“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151] 則王誦生於太和十六年（492 年），卒於武泰元年（528 年）。兩人年齡僅差三歲，此其一。其二，碑銘中王誦之所以僅為“通直散騎常侍”而未見高級官職，是元貴妃死後立碑時其夫王誦尚未發達。王誦曾任過通直常侍、散騎常侍、幽州刺史、黃門侍郎等職，元貴妃死時他 26 歲，所就當為低職。從這兩點判斷，此王誦應是王肅之姪。另外，和王誦同“入國”的王翊與宗室也有過兩次聯姻，據《廣陽文獻王妃墓誌銘》：“妃姓王，諱令媛，琅邪臨沂人，齊尚書僕射奐之曾孫也”。此前介紹家世云：“父翊，魏侍中司空孝獻公。母河南元氏，父澄，假黃鉞太傅任城文宣王。”[152] 可見，王翊父女倆一娶任城王元澄女，一嫁廣陽文獻王元湛。綜合算來，王肅之後南來的琅邪王氏和宗室至少聯姻五次。另有三次琅邪王氏與宗室的通婚之例，因情況難明，存疑。

與南來的琅邪王氏相比，博陵崔氏具有深厚的土著根基；與土著的傳統大族相比，博陵崔氏也堪稱伯仲，如神麚四年遍徵郡望時，博陵崔鑑就和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同徵入朝。但事實卻是，從與宗室聯姻的情況看，博陵崔氏和它的名望很不相符。據統計，博陵崔氏在北魏與宗室僅聯姻四次，即孝文帝以崔挺女為嬪、孝明帝以崔孝芬女為世婦、高陽王元雍以崔顯妹為妃、以及崔孝芬娶元氏。揆諸原因，這應和北魏宗室對博陵崔氏的態度有關。《魏書》卷 21《高陽王傳》：

> 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153]

北魏自孝文帝起對宗室與漢族大族的聯姻有較明確的規定，無論從哪方面看，博陵崔氏都未進入“皇家”選親的核心範圍，世宗元恪“地寒望劣”的說法，應是北魏宗室排斥博陵崔氏的重要原因。元氏由此而衍生出對博陵崔氏的輕視，也就不難理解了。上引元雍頗費周折“納博陵崔顯妹”後，很快又移情別戀。

> 延昌已後，多幸妓侍，近百許人，而疏棄崔氏，別房幽禁，不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啟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之也。[154]

無獨有偶，據《北齊書》卷 18《孫騰傳》：“初

博陵崔孝芬養貧家子賈氏以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155] 綜上可說，元魏宗室人物對“東崔”這個姻親，或“毆殺”，或“更適”，明顯不夠尊重，這或許是博陵崔氏與宗室聯姻相對較少的重要緣由。

和博陵崔氏一樣，弘農楊氏也屬於與宗室通婚較少的著族。北魏末，司徒公、弘農人楊椿“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156] 儘管有如此顯赫的家世，弘農楊氏與宗室通婚僅見四次。其中楊椿弟“舒妻，武昌王和之妹”，“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匆匆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157] 弘農楊氏與北魏宗室的通婚，這是正史中僅有的一例，卻還是悲泣相雜。據《魏故司空府參軍事元君墓誌銘》：

> 君諱馗，字孝道，恭宗景穆皇帝之玄孫也。……司空楊公雅稱其才，徵為參軍事。……君楊氏之甥也。[158]

司空楊公即楊椿。這說明，元馗母是楊椿姊或妹。此外，據《楊保元妻華山郡主元氏誌銘》中楊保元和元氏“同窆於華陰潼鄉”這點判斷，楊保元也屬弘農楊氏，只是不知其詳情。值得注意的是，墓誌中有元寶月者，“高祖孝文皇帝之孫，臨洮王愉之元子也”，“皇妣楊妃，恒農人”。[159] 這是說，寶月母楊氏也是弘農人。但據《魏書・京兆王傳》：

> 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160]

如此看來，這位楊氏先冒充過趙郡李氏，後來又以本姓棄東郡而就弘農，顯然是為了自抬身價。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弘農楊氏在當時確實是個令人欽羨的大族。它之所以與宗室聯姻無多，可能與其家風有一定關係。楊椿說其族自“國家初”，“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161] 可能也不全是粉飾之辭，其中也許蘊含着一定的真實性。

根據統計，與前述各家傳統大族相比，京兆韋氏、京兆杜氏、河東裴氏等與宗室通婚的次數很少，只有三兩次左右，這與他們當時的地位基本相符。京兆韋氏“世為三輔冠族”，[162] 但在北魏，韋氏極少名世人物，為官多為地方守宰。不過，韋氏在京兆的影響非常大，西魏時韋瑱“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163] 即可看出這是一個極具潛能的地方家族。相信北魏對這樣的大族也不會置之不顧。因此，孝文帝納韋崇女為充華嬪，[164] 是很自然的事情。魏分東、西後，京兆成為西魏的核心地域，韋氏家族因此而受到重視，當權人物也不稀見，韋孝寬就深為西魏所倚重。韋孝寬共三妻，分別是弘農楊氏、滎陽鄭氏和河南拓跋氏。[165] 韋孝寬“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妻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世康”。[166] 顯然，這是西魏在刻意籠絡京兆韋氏。同在京兆的大族杜氏，元魏也沒有忽視。早在北魏初期，拓跋燾“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為美”。[167] 但與宗室的通婚，京兆杜氏既晚且少。據《元均墓誌》：“夫人京兆杜氏，漢御史大夫周之後。”元均生卒年為 478 至 529 年，年五十二；杜氏生年不詳，卒於 535 年。杜氏“年甫初笄”（即 15 歲）嫁給元均，兩人共“誕育七男六女”，這表明兩人年齡相仿。[168] 據此推算，則杜氏嫁給元均最早已是孝文末。《周書》記載的一例更晚，京兆杜瓚“仕［北］魏為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台，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孝武帝乃北魏末帝，永熙三年（534 年）西奔關中，被宇文泰鴆殺，時年二十五。因此，杜瓚與新豐公主的結合亦當在魏末，這也是京兆地區在魏末政局中地位日益凸顯的一個表徵。

元魏宗室偶與聯姻的傳統大族還有河東裴氏。這支大族早在北魏初就以實力為拓跋貴族所矚目。拓跋珪時，關中、河東作亂者不絕，裴氏祖地聞喜亦遭擾，地方官束手無策，幸而“鄉里宗敬”的裴駿率鄉豪拒賊，方轉危為安。拓跋珪進兵關中時曾引見裴駿，對崔浩讚賞有加，“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169] 直至北魏分裂時，河東裴氏依舊保有強大的宗族勢力，西魏大統三年（537 年），“東魏來寇，［裴］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170] 但縱觀北魏，河東裴氏與宗室的通婚卻很稀少，直到孝明帝時才見其例。裴駿孫裴詢“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解。……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肅宗仍詔詢尚焉”。[171] 這種因“私姦”而致通婚，顯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另有一例出自《裴子通墓誌》。裴子通死於隋開皇十年（590 年），年八十一，“夫人元氏，魏安定王超之女也”，[172] 則兩人結為夫妻應在魏末。河東裴氏這樣有實力的大族在魏末成為元魏宗室的姻親，應該說不是偶然的，它是元魏宗室在風雨飄搖中為尋求幫助而實施的重要措施。

3. 新貴家族

這類家族驟起於胡族當政時期，因根基和聲望所限，他們在胡族統治者心中的分量必然有所降低，故而在與元魏宗室聯姻的漢族大族中，這類家族所佔比例最小，亦屬正常。但就單個家族而言，有的家族因緣際會，也成了元魏重要的皇親國戚，勃海高氏、安定胡氏和頓丘李氏就是如此。

安定胡氏大約在姚秦時期開始顯達，《魏書》所傳的該族人物，如胡方回、胡國珍等，均上溯兩代至此。安定胡氏以學聞名，胡方回“涉獵史籍，辭彩可觀”，被拓跋燾召為中書博士，參與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173] 約與胡方回同時的胡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174] 入魏後很受拓跋統治者的賞識。同樣，胡國珍亦謂好學之士，也是安定胡氏揚名北魏的關鍵人物，但他憑藉的既非學識，亦非治功，而是其女胡太后。胡太后初入宮，《魏書・胡國珍傳》說是“以選入掖庭”，但據《胡皇后傳》：

> 后姑為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為承華世婦。[175]

可見，胡氏入宮，其姑起了關鍵的作用。因當時北魏仍行子貴母死之制，“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而胡氏卻甘冒風險，誕下肅宗，“後來胡氏以皇帝生母居太后位而擅權，成為北魏一朝惟一憑血緣關係擅權的母后”。[176] 安定胡氏亦因此而權傾朝野，婚連宗室，成為北魏繼長樂馮氏之後又一隆盛的外戚集團。

安定胡氏與元魏宗室的通婚，我們統計到七次，均為胡國珍近親，而胡靈太后居間運作，顯然起着向宗室輸送本族人物的紐帶作用。肅宗身邊就有兩位胡氏，一為皇后，一為左昭儀。肅宗胡皇后乃“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為皇后”。[177] 肅宗胡昭儀是“宣武皇帝崇訓皇太后之從姪”，墓誌說她“以懋德充選掖庭”，[178] 顯為託辭，其實也是胡太后“欲榮重門族”的結果。胡國珍除靈太后外，還有兩女也嫁給了元氏。《魏書》卷 16《元繼傳》：“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妹。”即元叉亦娶胡國珍女。《元乂墓誌》：“妃安定胡氏。父珍，相國太上秦公。”元乂是“太師京兆王之世子”，孝昌二年（527 年）死。元乂即元叉，小字夜叉。墓誌說其妃父曰胡珍，實為胡國珍，因為胡國珍死後，靈太后追崇其父，職有“相國”，“號太上秦公”，志、書正相吻合。胡國珍唯有一子，名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179] 胡祥為後生，之前胡國珍以兄子僧洗為後，位侍中，封濮陽郡公。僧洗“女為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180] 關於元亶的婚姻情況，《元邵墓誌》說元亶“妃胡氏。父僧洸，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濮陽郡開國公”，可知僧洗、僧洸應為同一人。綜合上述可見，安定胡氏通過聯姻，

與元魏宗室建立起了錯綜複雜的關係，這對北魏後期的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勃海高氏是北朝時極其特殊的一個家族，成分非常複雜。早在拓跋珪時，其代表人物高湖就棄慕容氏而投拓跋氏，官至涼州鎮都大將，據說高歡就出自這一支。高湖之外，其姪高允以儒被徵，歷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四朝，俱受重用，也是高氏在北魏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勃海高氏跟元魏宗室的通婚，卻和高湖、高允關係不大，而主要與遲至孝文帝時才從高麗歸魏的高揚一支有關。高揚“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孝文帝初，舉室西歸，止於遼西，仕途凝滯。高揚有女“德色婉豔，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181]“是為文昭皇后，生世宗”。[182] 不過高揚並未因此而發跡，其女文昭皇后因馮氏欲專寵宮掖而被害，《魏書》卷 13《皇后列傳》：

> 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高]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183]

高氏遂沉寂無聞。世宗元恪繼位後，“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高氏“數日之間，富貴赫弈”。[184] 高肇兄弟因此而飛黃騰達，和宗室的聯姻也活躍起來。

高肇以皇舅之尊被徵後不久，“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成為“當衡軸”的權臣。以此為契機，高肇還大營婚姻：其長兄琨子高猛“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琨弟偃，字仲遊。太和十年卒。……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185] 可見，高揚四子已有三子之家與宗室進行了聯姻。此外，據《元舉墓誌》，舉“妻勃海高氏，父聿，為黃門郎武衛將軍夏州刺史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母即君姑也”。[186] 這說明，元舉和高聿是親上加親。高聿何屬不詳，但墓誌說元舉“春秋廿五”死於“孝昌三年”，則其生卒年為 504 至 528 年。如果元舉與其妻高氏年齡相仿，則其妻出生時，也正是高肇設法與元氏聯姻之時。類似的情況墓誌還有一例，據《元煥墓誌》：煥“父諶……親勃海高氏，父信，使持節鎮東將軍幽瀛二州刺史衛尉卿惠公”。[187] 高信除屬勃海高氏外，其餘資訊不明。其婿元煥死於孝昌元年，年廿一，生卒年當為 506 至 526 年。這和元舉的情況如出一轍。因此，高聿、高信與高肇有某種較近的關係，也並非不可能。

但關於這支高氏的族望，《魏書》有所懷疑。《魏書・高肇傳》說他“自云本勃海蓨人”，其意不言自明。的確，高揚在孝文帝初舉室西遷時，上距四世祖高顧東入高麗已約 150 年，歷時不謂不遠；且高揚娶妻蓋氏，明顯為高句麗族，[188] 其後代有異族血統也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些不足以作為懷疑高揚族望的證據，原因有二：一，永嘉之亂時，高顧與其弟高撫同走高麗，北魏獻文帝初（466 年），撫孫高潛歸魏，僅比高揚早幾年，但同“出自夷土”，[189] 高潛就被認定是勃海蓨人，而高揚則被懷疑，於理不通；二，“五胡亂華”掀起的政治風暴打亂了原有秩序，漢族大族與胡族通婚並不鮮見，即使在北魏時，傳統大族與宗室之外的胡族通婚亦屬常事。推測而言，高肇族望被疑，多半和他行事醜惡有關。高肇以外戚驟顯後，結黨營私，濫殺宗王，“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高肇被殺後，“下詔暴其罪惡”，[190] 這支高氏聲名必然受損。《魏書》暴揚高肇之惡，可能連其族望也被歸於“夷土”，而不願承認其與勃海著姓高氏有關。

與元魏宗室通婚較多的另一新貴家族是頓丘李氏，其代表人物有兩位：李彪和李峻。李彪“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舉孝廉而至京師，“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但與李沖反目後，李彪先被除名為民，繼又“白衣修史”，無甚作為。不過，李彪對子女期望不淺，“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

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但李彪生前望女興家的夙願並未完全實現，“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世宗崩，為比丘尼”。[191] 繼其女為尼後，李彪子志亦於“建義初，叛入蕭衍”，[192] 李彪之門在北魏猶如曇花一現，很快凋落。頓丘李氏另一門則不然。拓跋珪統一中原時，頓丘李峻妹被掠，輾轉被“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後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及生顯祖，拜貴人”。[193] 但她很快即死，謚曰元皇后。顯祖繼位後，“峻與五弟誕、嶷、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194] 多位居王公，李峻甚至官至太宰，這為李氏兄弟與宗室聯姻奠定了基礎。據《元悛墓誌》：“父諱逸……母頓李。父平，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武邑郡開國公。”[195] 李平乃李嶷之子，《魏書》卷 65 有傳。他的另一女亦嫁給元氏，《元爽墓誌》：“妻頓丘李氏，儀同三司彭城文烈公平之女。”[196] 兩通墓誌中李平官爵有別，是因前者用的是生前官爵，後者用的是死後贈謚。墓誌資料中還有李元姜嫁給元顥之例，從她是“太宰宣王之孫，頓丘公奇之第二女也。曾姑元恭皇后，伉儷高宗”[197] 來看，李元姜乃李峻的孫女。這樣，頓丘李氏前後與宗室的通婚也有五次之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魏郡杜氏和中山李氏。這兩個家族與宗室聯姻雖少，但因分別是太武帝和孝文帝的舅家，所以也曾煊赫一時。魏郡杜氏初非望族，這從明元密皇后杜氏“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198] 即可看出來。就連拓跋燾後來營葬外祖杜豹時，都選擇京兆杜氏的人來為之裝潢門面。[199] 密皇后生下拓跋燾後，死於泰常五年（420 年），拓跋燾繼位後，“思念舅氏”，始光年間（424 至 428 年）以密皇后兄杜超“為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後又“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200] 杜超諸子也得以高官顯爵。但不到 30 年，魏郡杜氏就因謀反被拓跋浚誅殺殆盡。與此相仿，中山李氏與元魏宗室的親密關係也為時甚短。中山李蓋“少知名”，很受拓跋燾賞識，“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李蓋棄妻尚主，確也為家族的發跡創造了條件，其子李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201] 長女即孝文帝生母獻文思皇后。但好景不長，文明太后為使馮氏專寵宮掖，不但利用子貴母死之制除掉了思皇后，[202] 且誣以“南叛”罪名盡誅李惠之門。中山李氏遭此橫禍，遂不顯於世。

三、北齊宗室與漢族大族的聯姻

北魏末六鎮鮮卑舉兵南下，北方地區的政治版圖又開始重新劃分，各實力集團幾經整合，最後匯集為兩股左右政局的勢力：以高氏為代表的關東集團和以宇文氏為核心的關隴集團。經過東魏、西魏的過渡，高氏和宇文氏終於撇開元氏而自建尊號，先後於 550 年和 557 年建立北齊和北周。政權的更迭往往給社會造成劇烈的變動，具體到北朝的婚姻狀況而言，由北魏孝文帝開啟的胡漢聯姻進程，又不約而同地為高氏和宇文氏所打斷，胡漢通婚的範圍急遽萎縮；只有極少數大族得以登堂入室，成為齊、周宗室聯姻的座上賓。[203] 這裡，我們先對齊、周宗室與漢族大族的聯姻情況作一說明，然後着重分析胡漢上層通婚重又萎縮的主要因素。

從高歡“信都建義”到北齊滅亡，在四十多年的時間裡，高氏家族約與 11 個漢族大族進行了 27 次通婚。其中通婚次數最多的是趙郡李氏，達 10 次；其次是滎陽鄭氏，計 5 次；再次是范陽盧氏、博陵崔氏和安定胡氏，各 2 次；最後是廣平宋氏、長樂馮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琅邪王氏和弘農楊氏，各 1 次。這些大族，除廣平宋氏外，其餘也都曾是元魏宗室的重要姻親。不過，各大族在新主宰者的婚姻圈中位次有所變化，趙郡李氏、滎陽鄭氏似乎是高齊宗室聯姻的重點，與兩個家族的通婚次數約佔總次數的 56%。這是由兩個家族在高氏集團中的地位所決定的。

魏齊易代之際，漢族大族在選擇政治靠山

時各盡其能，趙郡李氏和有些河北大族一樣，走的是聚眾待機的路子，只不過在這方面趙李做得更加出色，最後終於成為高歡所倚重的漢族大族，這是高氏與趙郡李氏頻頻聯姻的最重要基礎。北魏普泰元年（531 年），爾朱兆下屬高歡率部由并入冀，坐家觀望的趙郡李元忠“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當然，高歡看重的未必是李元忠的“從橫之策”，而是趙郡李氏的實力。李元忠父“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204] 李元忠“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李元忠曾於永安初（528 年）任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高歡進入河北，為他“舉義”提供了契機。“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眾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205] 李元忠主政殷州，標誌着趙郡李氏完全被納入了高氏的利益集團。更重要的是，李元忠之外，趙郡李氏尚有多人以實力為高歡所用。李元忠族弟李密，“少有節操，屬爾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渤海高昂為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後歷任并、建、襄等州刺史。[206] 李元忠宗人李湛“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俠，以為徒侶”。魏末兵起，李湛率部遊移於各種勢力之間，羽翼漸豐，“高祖建義，以書招湛，湛奉書，擁眾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令湛率本眾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湛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為壘，徵糧集兵，以為聲勢”，[207] 曾任相州、南荊州、東荊州等地刺史。同樣，李元忠族叔李景遺亦以俠聞名，“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為劫盜，鄉里每患之”，“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爾朱羽生”，[208] 後官至潁州刺史。可見，高歡在河北擴展勢力和與爾朱氏較量的過程中，趙郡李氏頻出豪雄之士而助之，這對高歡建立霸業當然是有力的支持。趙郡李氏後來成為高齊宗室最親密的通婚對象，可謂淵源有自。

《北史》卷 33《李順傳附李孝貞傳》：

> 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為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娥英，一為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迭。

趙郡李氏與高齊“帝室姻媾重迭”，這是史料中最集中的表述。昭信皇后即李希宗女，名祖娥，生太子高殷，被文宣帝高洋立為皇后，天保十年（559 年）失寵，讓位可賀敦皇后。廢帝即高殷，繼位不久就被廢為濟南王，其叔高演“入纂大統”，[209] 故李祖勳女被稱為“廢帝濟南王妃”。後主即高緯，武成帝高湛之子，是北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高緯“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陽休之所制”。[210] 娥英在宮中地位較高，“比左右丞相”，並“降昭儀比二大夫”，[211] 可見娥英在級別上要高於昭儀，僅次於皇后。琅邪王高儼是高湛第三子，安德王高延宗是文襄帝高澄第五子，他們都是宗室諸王中的顯耀分子。另據《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

> 弘德夫人李氏，趙郡李叔讓女也。初為魏靜帝嬪，武成納焉。生南陽王仁盛，為太妃。姊為南安王思好妃，坐夫反，以燒死。太妃聞之，發狂而薨。[212]

這說明，趙郡李叔讓有兩女嫁給了高齊宗室，一為武成帝弘德夫人，一為南安王高思好妃。根據“河清新令”，“弘德、正德、崇德為三夫人，比三公”，[213] 位在昭儀後。弘德為三夫人之首，地位也不低。南安王高思好本浩氏子，為高氏所養，得封王爵。武平五年（574 年）反於朔州，兵敗被殺，“並其妻李氏”，[214] 此即上面所說“坐夫反，以燒死”的趙郡李叔讓女。此外，墓誌資料顯示，趙郡李祖牧“第四女齊世宗文襄皇帝第五子太尉公安德王延宗

妃”，[215] 說明高延宗兩納趙郡李氏為妃。從上面的敘述看，趙郡李氏與北齊六個皇帝中的三個有婚姻關係，還與地位較高的三位宗室諸王結成了姻親，這足見趙郡李氏在高齊宗室婚姻圈中的地位之高。

與趙郡李氏相比，滎陽鄭氏更具特殊性：它是在東西對峙時與齊、周宗室都有較頻繁通婚關係的漢族大族。鄭氏的這種際遇，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即它長期積累的地方影響。如：南北朝時期，青齊一直是南北勢力交相染指的地區，當地豪強素稱難制，局勢非常複雜，[216] 但滎陽鄭氏在這一地區似乎有相當的影響力。鄭述祖是北魏中書令鄭羲之孫，其父道昭曾任職兗州，又繼任光州、青州刺史，“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217] 北齊天寶初，鄭述祖任兗州刺史，治政著績，“境內無盜”，人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218] 這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鄭氏在地方所具有的聲望。另從《北史・鄭羲傳》可看出，高歡進入河北時，滎陽鄭氏官佈朝野，人物尤多。相信高歡在考慮與漢族大族的通婚問題時，斷不會忽略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家族。東魏遷鄴後，高歡即納鄭嚴祖姊鄭大車，“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219] 鄭氏與高氏聯姻之快，這在當時的漢族大族中是不多見的。

高歡之外，高氏與滎陽鄭氏的聯姻不時見諸史籍。《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

> 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220]

高叡兩次娶鄭氏女，當然都與鄭述祖“貴重宿舊”的地位有關。《北史》卷 35《鄭羲傳》附《鄭述祖傳》：“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皇太子納其女為良娣。”皇太子即高殷，是高洋和趙郡李祖娥所生，但由於高洋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221] 因此“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222] 這個插曲，其實與上面高叡拜鄭述祖而不拜鄭道蔭一樣，隱約地透露出了高齊宗室和漢族大族因識禮不同而產生的矛盾問題，這裡暫置勿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願不願意，滎陽鄭氏都是高齊宗室無法忽略的重要家族，從上述雙方的不斷通婚就能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四、宗室姻親家族與北朝皇權政治

北朝宗室與漢族大族聯姻的目的，主要是想通過血緣的結合而拉近胡漢上層的距離，從而使漢族大族更好地為皇權政治服務，這已是學界的共識。但這些與宗室聯姻的漢人家族，對北朝的皇權政治究竟有哪些影響？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概括而言，因為和宗室的通婚關係，漢族大族在這條感情紐帶的作用下，更加積極地向皇權靠近，為王朝政治盡心竭力地提供各種支援；但同時，由於頻繁的通婚使胡漢上層日漸緊密，漢族大族參與皇權政治的程度也隨之加深，以致不時出現破壞皇權的現象。由此可見，胡漢聯姻就像一把雙刃劍，既可加強皇權，有時也會威脅皇權。這裡我們即對這種關係進行闡述，以便從更深的層次來理解北朝的胡漢聯姻。

（一）參與制度建設

北朝的皇權政治是以漢族傳統的中央政治體制為參照的，因此它的實施和完善，必然要有漢人的參與。早在北魏立國初，拓跋統治者就開始延引漢人參與王朝政治的建設。由於當時拓跋鮮卑剛從部落聯盟轉為“國家”形態，因而新王朝亟需新的規劃和設計，這就需要漢人實任其事，名士大儒當然是首選。故“博綜經史”的燕鳳“不應聘”時，拓跋珪不惜以屠城相要挾；[223] 號為“冀州神童”的崔玄伯東走海濱時，拓跋珪竟“遣騎追求”。[224] 拓跋珪羅致的這些大儒，或“參決國事”，[225] 或“決策

幃幄”，[226] 體現了早期拓跋統治者對漢儒某種程度的重視。不過，拓跋珪任用漢儒的最主要目的，應是利用他們制定相關制度，以為新王朝奠定組織上的基礎。崔玄伯任黃門侍郎後，“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並且，“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因此，北魏在“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時，由“玄伯總而裁之，以為永式”。[227] 另一大儒鄧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228] 可以說，正是像燕鳳、張兗、崔玄伯、鄧淵這樣的漢人大儒，為早期拓跋國家進行了初步的制度設計，這些制度為加強北魏皇權無疑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但在馮太后執掌朝政之前，漢人參政畢竟有限，特別是崔浩被拓跋燾夷族，牽連甚廣，北方大族為此噤若寒蟬，輕易不敢過深涉政。“猜忍多權數”[229] 的馮太后自獻文帝時開始染指朝政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出於控制元魏朝政的需要，她籠絡了一批漢族大族的代表人物參與朝政。而在馮太后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230] 對漢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史書稱他“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231] 也正是在馮太后“臨朝聽政”和孝文帝執政期間，北魏的漢化進程才驟然加快，而宗室與漢族大族的廣泛通婚，則是推動這個進程的關鍵因素之一。孝文帝時期是北魏各制度趨向成熟的階段，而宗室的漢人姻親家族積極參與其中，竭忠盡智，功不可沒。如李沖之姪李韶，“學涉，有器量”，“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232] 韶弟彥，“頗有學業”，“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考定，號為稱職”。[233] 孝文帝對制度的建設非常重視，他認為“典者，為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234]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孝文帝依靠李沖改革舊制，“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235] 甚至從南入北的劉昶，也在“改革朝儀”中盡心竭力，“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236]

在漢人姻親家族參與制定的制度中，均田制和三長制對加強皇權最具影響。這兩種制度得以施行，馮太后、李沖、李安世三人是關鍵人物，而他們恰恰都來自元魏宗室重點聯姻的漢族大族：安樂馮氏、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從統計的資料看，在元魏時期，這三個家族都是宗室聯姻的重點對象，其中安樂馮氏、隴西李氏與宗室的通婚次數分佔第一、第二位，趙郡李氏也居於前列。並且，除馮太后外，在推行均田制、三長制之前，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已與元魏宗室結成了姻親。據《魏書・咸陽王傳》，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為諸弟納“清修之門”即漢族大族女為妃，其中咸陽王元禧納李輔女，始平王元勰納李沖女。不過，從常理推斷，孝文帝“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李］沖女為夫人”，[237] 時間當早於太和九年。關於李安世與宗室聯姻的時間，《魏書》本傳未涉及，只說“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238] 但同書《李謐傳》說謐“延昌四年［515年］卒，年三十二”，[239] 則其生年為太和八年（484年），也就是說，李安世與滄水公主結婚不會晚於太和八年。而均田制和三長制的制定和實施，是在太和九年之後，因此可說，北魏這兩種具有全域意義的經濟、政治制度，與宗室的漢人姻親家族有着直接的聯繫。

北魏統治者決定推行均田制和三長制，原因很複雜，但這兩項制度的目標指向都非常明確，即調整社會關係，加強中央集權，這對當時日益漢化的北魏政權來說，可謂恰逢其時。事實上，這些制度的倡議者也確實是以遏制地方豪強、穩定社會秩序為初衷的。李安世的均田疏中處處體現了尖銳的社會對立：一方是“雄擅之家”“強宗豪族”“豪右”或“虛妄之民”，另一方是“單陋之夫”“州郡之民”“細民”或“守分之士”。前者獨佔膏腴，肆其侵淩；

後者難有頃畝，屢遭佔奪。李安世建議行均田之制，目的就是想使“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而這即可穩定民心，又可打擊豪右，當然會受到北魏最高統治者的歡迎。太和九年（485 年）十月，孝文帝下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北魏均田制的推行被正式提上日程。

同樣，三長制也是李沖基於原有的宗主督護制蔭庇戶口、逃避賦役而提出的。在宗主督護制度下，“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240]“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241] 大“宗主”由於掌握着大量的人口和雄厚的貲財，儼然一方霸主，甚至組織武裝公然與官府對抗。[242] 為把戶口和賦役的控制權收歸“國家”，李沖建議“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243] 由三長為國家檢查戶籍、徵發賦役。李沖的這個建議，許多人表示反對，而文明太后則認為“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244]“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245] 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說：

> 三長制和均田制一樣，在北魏當時條件下，對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權，是有積極意義的。[246]

而行均田、立三長這樣的大政，從創議到施行都有北魏宗室的漢人姻親積極參與，這表明北魏奉行的胡漢聯姻政策深得大族之心，他們顯然已成為皇權的積極維護者。

（二）領兵征戰平亂

北魏前期，漢官多掌文翰，任守宰，領兵多不預焉。這多半是由民族隔閡所致。約從孝文帝時期開始，由於漢化程度的加深，特別是由於胡漢通婚的益愈廣泛，漢人受信任的程度也日漸提高，連領兵出征平亂這樣敏感的事務都多有漢人參與，而宗室的姻親家族又是首選。因為，與普通漢族大族相比，宗室的漢人姻親家族畢竟因多層婚姻關係而更加可靠。孝文以後，領兵征戰平亂的漢人許多都出自宗室姻親家族，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胡漢通婚後所產生的一種必然結果。

南北對峙時，雙方頻啟戰端。孝文帝遷洛之前，北魏再攻淮漢。太和十八年（493 年），孝文帝欲藉南伐遷都，他所倚重的重要力量就是宗室的姻親家族，盧淵和薛胤即是這次軍事行動的重要統帥，史書謂：

> 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盧］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勒眾七萬將出子午。[247]

由於其時元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薛］胤假節，假平南將軍，為幹副軍”。[248] 薛胤出自河東薛氏，其父初古拔（洪祚）早在皇興三年（469 年）即“尚西河長公主”。[249] 而盧淵所出的范陽盧氏在孝文帝遷都前也已是宗室姻親。任用他們擔此重任，姻親關係當是重要保證。不過，盧淵等人是否具有帥才，很值得懷疑。因為這次軍事行動意在為遷都做掩護，未及開戰就草草收場，因此盧淵等人領軍出征，只是徒具虛名而已；其實盧淵自己也承認他不嫻軍旅。此後蕭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詐降時，孝文帝又命盧淵領兵前往接洽。

> 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祖不許。[250]

繼而盧淵轉攻赭陽，“淵素無將略，為賊所敗，坐免官爵為民”。[251] 這個事例表明，連“素無將略”的盧淵都被倚為軍旅信臣，這只能說孝文帝對范陽盧氏姻親家族太信任了。

范陽盧氏不習將略而行武職的不止盧淵，還有淵弟盧昶。宣武帝時，盧昶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屢上表請求朝廷增兵進攻梁軍事重鎮朐山。於是朝廷先發“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繼“發虎旅五萬”，歸盧昶統領。盧昶

雖攻克朐山，但“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後盧昶防守不利，引軍先退，結果“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為甚焉”。朐山之敗，對北魏打擊很大。不過，可能由於其子盧元聿“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的緣故，魏廷雖“推始究末，罪鍾元帥”，但對盧昶僅處以免官的處罰。[252] 而以前的中山王元英本有赫赫戰功，只因正始四年（507 年）在鍾離遭洪水而使“士眾沒者十有五六”，結果“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民”。[253] 兩相比較，盧昶這個宗室姻親受到的待遇還是比較高的。

魏廷給予宗室的漢人姻親以統兵之權，當然希望他們能馳騁疆場，報效朝廷，盧淵、盧昶兄弟雖屢次敗北，但只是能力所限，他們效力皇權的忠誠還是無可否認的。何況，北魏宗室的漢人姻親也不是全無將略，許多人都在疆場上為北魏出過力，有些人甚至還相當出色。頓丘李崇是“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屢任南部沿邊諸州刺史，曾多次化解蕭衍的進攻，深為魏廷所倚重。《魏書》說他“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254] 著名的硤石之戰，就是包括李崇在內的元氏漢人姻親共同創造的軍事傑作。孝明帝初，蕭衍在淮河一線發起進攻，連克北魏的沿淮重鎮。李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並頻請朝廷增援。魏廷先遣鎮南將軍崔亮、鎮東將軍蕭寶夤馳援，繼又派尚書李平持節節度，居間協調，合兵攻擊梁軍的重要據點硤石。李平“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眾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255] 有趣的是，這次戰役的主要將領李崇、崔亮、蕭寶夤和李平等人都是北魏宗室的漢人姻親，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這些姻親家族已成為維護北魏政權重要力量的具體象徵。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自南奔北而成為北魏宗室姻親的漢人，往往被北魏用來對付南軍。入魏後三尚公主的劉昶“好犬馬，愛武事”，[256] 蕭道成代宋後，魏廷經常把這個姻親置於前線，名為助其復國，實則是南侵的幌子。蕭寶夤被蕭衍逼至北魏後，積極配合魏軍南伐，很受器重，甚至攻鍾離時魏軍被洪水吞噬大半，身為主將的他不但僅受“免官削爵”的處分，且不久即“尚南陽長公主”。此後蕭寶夤以宗室之親，多次沿淮抗拒梁軍，為保衛北魏政權做出了很大貢獻。而蕭賾尚書左僕射王奐之子王肅奔魏後，很得孝文帝賞識，多次授之以領兵之權。“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257] 北魏宗室的這些南來姻親，不管“南伐”時其主觀目的如何，但客觀上對北魏政權的鞏固肯定能起些作用。

與對外征戰相比，在消弭內亂、維護皇權方面，宗室的漢人姻親往往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從上文的統計看，北魏宗室的有些漢人姻親，在朝廷位居要津，在地方獨當一面，他們參與平定宗室內訌和鎮壓地方反叛勢力，是北魏皇權政治得以延續的重要力量。

北魏自孝文帝後，宗室內訌不斷，這對皇權提出了直接的挑戰。宗室的漢人姻親雖也有附和謀反的人，如宣武帝時元禧謀奪帝位，其妃兄、李沖之姪李伯尚就是參與者；但這畢竟是少數。在多數情況下，這些姻親還是站在維護皇權的立場上幫助平息宗室內訌。正始三年（506 年），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以反對外戚高肇為名，據信都反，“即皇帝位”。[258] 宣武帝把“總督之任”交給時任尚書的宗室姻親李平，“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259] 經過激戰，“斬首數萬級”，李平率領的朝廷軍隊取得了最後勝利。正光元年（520 年），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以反對宦官劉騰、領軍元叉擅權而舉兵，魏廷“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

師”。[260] 盧同乃盧玄族孫，而盧玄一門是北魏比較顯赫的姻親家庭，因此盧同即使黨附元叉，他的行為也有阻止皇權旁落的意味。孝昌元年（526 年），“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台高諒，自稱宋王”，繼而又降蕭衍。魏廷令元彧、元延明、李憲和李崇“俱討徐州”，[261] 這四人不是宗室就是其姻親。孝昌三年(528 年)，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鑑“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262] 魏廷“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263]“神軌”即李神軌，李崇之子。總地來說，元氏內部出現紛爭時，漢人姻親多數還是忠心耿耿地維護皇室的利益，原因很簡單：共同的利益加上感情的基礎，這雙重因素決定了宗室的大部分漢人姻親不可能不竭忠盡職，保衛皇權。

對鎮壓地方的反叛勢力，宗室的漢人姻親也同樣毫不手軟。正始三年（506 年），秦州屠各胡王法智推呂苟兒為主，建號置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也聚眾稱王。魏廷詔元麗領兵征討，而副以西道都督李韶和別駕楊椿。李韶是李沖之姪；楊椿乃恒農華陰人，其弟楊舒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夫。[264] 由族望屬於隴西和京兆的宗室姻親參與平定這次秦、涇之亂，魏廷首先考慮的當然是這兩個大族在當地的影響。結果，“李韶破苟兒於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265] 北魏“王師”取得了勝利。永平四年（511 年），冀州沙門法慶自號“大乘”，“聚眾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吏人”。[266] 魏廷以李沖之姪、長樂太守李虔“以本官為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267] 建義初（528 年），“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逼兗州”，朝廷命崔孝芬、刁宣等人前往征討。崔孝芬出自博陵崔氏，其女為孝明帝元詡世婦；刁宣亦屬勃海大族，妻饒安公主。[268] 他們和其他有些宗室姻親一樣，在魏末風雨飄搖的環境中仍為維護皇權而做着最後的努力。

在眾多維護皇權的宗室姻親中，值得特別提及的人有兩位：李崇和蕭寶夤。李崇是文成元皇后的姪子，歷仕四朝，基本都在為北魏征戰平亂。孝文帝後期，“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時任兗州刺史的李崇設計斬郭陸，“賊徒潰散”。李崇任梁州刺史時，氐人楊靈珍反，襲破武興，交通南齊。孝文帝“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數萬討之”，大敗靈珍和蕭齊軍隊，以至孝文帝讚歎道：“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宣武帝初，魯陽柳北喜、魯北燕“聚眾反叛，諸蠻悉應之”，朝廷任李崇為都督征蠻諸軍事前往征討，“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稍後，東荊州樊安又“聚眾於龍山，僭稱大號”，與蕭衍共為唇齒。李崇連戰連捷，“諸蠻悉降”。李崇長期征戰，很有威名。六鎮起兵後，朝廷的軍隊屢遭敗績。孝明帝“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令他總督三軍，北討桓朔。但此時李崇畢竟年已七十，加之軍隊戰鬥力低下，最終他也沒能阻擋住六鎮鮮卑南下的步伐。[269]

蕭寶夤是南來漢人中比較具有軍事才能的宗室姻親。他和南陽長公主感情甚篤，兩人“相遇如賓”，很得宗室好感。因此，蕭寶夤比以前更受朝廷的信任和重用。蕭寶夤早就以能征善戰著名，成為宗室姻親後，他經常被派往兵亂地區進行征討。正光五年（524 年），“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官軍莫能擋其兵鋒。“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夤開府、西道行台，率所部東行將統，為大都督西征”。蕭寶夤在隴右“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矣”。但當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蕭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深恐被朝廷治罪，因而“僭舉大號”，據雍州而反。不過蕭寶夤很快就失敗了，永安三年（530 年）被朝廷處死。[270] 蕭寶夤這位宗室姻親從效忠到反叛的事實表明，婚姻這條感情紐帶有時也是很脆弱的，它並不總能起到凝結劑的作用。蕭寶夤的反叛還從側面說明，北魏皇權此時已不值得有些宗室姻親的留戀，它馬上就要到了壽命的盡頭。

魏分東西後，出自北方六鎮的高氏和宇文氏集團分別控制了東魏和西魏，繼而又分別建立了北齊、北周政權。總地來看，雖然高氏和宇文氏也通過婚姻拉攏漢族大族，但由於這兩個集團的漢化程度較低，胡漢之間存在着很大的隔閡，因此這些漢族大族並未像北魏孝文帝以後那樣全面地參與到皇權政治中去。可以說，缺少包括姻戚在內的漢族大族的鼎力支持，北齊、北周政權在發展上都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限制。最後北周外戚楊堅通過“禪讓”的方式自建隋朝，不妨看作是漢族大族整體背離宇文氏的結果。

註釋：

1. 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89 頁。
2. 《晉書》卷 102《劉聰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667、2676 頁。
3.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44 頁。
4. 《晉書》卷 106《石季龍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770 頁。
5. 《晉書》卷 108《慕容廆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06 頁。
6. 《晉書》卷 39《王沈附王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46 頁。
7. 《晉書》卷 102《劉聰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657 頁。
8. 《晉書》卷 103《劉曜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683 頁。
9. 《晉書》卷 109《慕容皝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15 頁。
10. 《晉書》卷 110《慕容儁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31 頁。
11. 《晉書》卷 127《慕容德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161 頁。
12. 《晉書》卷 124《慕容寶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093 頁。
13. 《晉書》卷 113《苻堅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84 頁。
14. 《晉書》卷 115《苻丕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941 頁。
15. 《晉書》卷 115《苻登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947 頁。
16. 《晉書》卷 116《姚襄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962 頁。
17. 《晉書》卷 117《姚興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975 頁。
18. 《晉書》卷 119《姚泓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007 頁。
19. 《資治通鑑》卷 88，永嘉六年正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1629 頁。
20. 《晉書》卷 103《劉曜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685 頁。
21. 《晉書》卷 31《后妃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967–968 頁。
22. 《晉書》卷 106《石季龍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761 頁。
23. 《晉書》卷 108《慕容廆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13 頁。
24. 《資治通鑑》卷 89，建興四年十二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2839 頁。
25. 《資治通鑑》卷 112，隆安五年二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3520 頁。
26. 《魏書》卷 35《崔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08 頁。
27. 《魏書》卷 14《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59 頁。
28. 《魏書》卷 39《李寶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86 頁。
29.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49 頁。
30.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44–50 頁。
31. 《魏書》卷 35《崔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26 頁。
32. 《魏書・目錄敘》，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065 頁。
33. 《魏書》卷 94《閹官・仇洛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013 頁。
34. 《魏書》卷 33《公孫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82 頁。
35. 《魏書》卷 28《賀狄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第 686 頁。逯耀東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一文中論述了拓跋君主對中原文化的態度，參見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44 頁。

36. 《魏書》卷 19 中《任城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64 頁。
37. 《魏書》卷 113《官氏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006 頁。
38. 《魏書》卷 113《官氏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014 頁。
39. 謝寶富：《北朝婚喪禮俗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211–212 頁，書後“附表二”。
40. 《魏書》卷 64《張彝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28–1429 頁。
41. 《北齊書》卷 18《孫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34 頁。
42. 對此，陳爽在《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中說：“受到草原民族原始部落制和軍事民主制的影響，北魏前期的政權體制具有濃厚的貴族政治色彩，這主要表現在鮮卑異姓王公在法律上具有同皇族相埒的政治經濟特權，並在王位繼承、軍事征討等軍國大政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一時期，皇權處在貴族的包圍之中，並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貴族利益的代表。”這比較準確地說明了北魏前期的政治形態。參見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96 頁。
43. 《魏書》卷 2《太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5 頁。
44. 《魏書》卷 3《太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4 頁。
45. 《魏書》卷 25《長孫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44 頁。
46. 《魏書》卷 3《太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5 頁。
47. 《魏書》卷 4 下《世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9 頁。
48. 《魏書》卷 29《奚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00 頁。
49. 《魏書》卷 27《穆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61 頁。
50. 謝寶富：《北朝婚喪禮俗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8–19 頁。
51. 《魏書》卷 27《穆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78 頁。
52. 《魏書》卷 27《穆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63 頁。
53. 《魏書》卷 5《高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2 頁。
54. 《魏書》卷 5《高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2 頁。
55. 《魏書》卷 7 上《高祖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5 頁。
56. 《魏書》卷 21 上《咸陽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35 頁。
57. 表中“資料來源”一欄中，“《彙編》”指趙超編的《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疏證》”指羅新、葉煒編著的《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58. 《魏書》卷 97《海夷馮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128 頁。
59. 《魏書》卷 83 上《外戚・馮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18 頁。
60.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28 頁。
61. 《魏書》卷 83 上《外戚・馮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19 頁。
62. 《魏書》卷 83 上《外戚・馮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19 頁。
63. 《魏書》第 13 卷《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3 頁。
64. 《魏書》卷 46《許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43 頁。
65.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0 頁。
66. 《魏書》卷 83 上《外戚・馮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23 頁。
67.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4 頁。
68. 《魏書》卷 97《海夷馮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126 頁。
69. 《魏書》卷 7 下《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6 頁。
70.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29 頁。
71.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0 頁。
72. 《魏書》卷 7 下《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6 頁。
73.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29 頁。

74. 《魏書》卷 83 上《外戚‧李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25 頁。
75.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29 頁。
76. 《魏書》卷 53《李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80 頁。
77.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29 頁。
78. 《魏書》卷 21 上《咸陽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37 頁。
79. 《魏書》卷 21 上《咸陽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38 頁。
80. 《魏書》卷 83 下《外戚・李延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37 頁。
81.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54 頁。
82. 《魏書》卷 37《司馬休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54 頁。
83.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57 頁。
84.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57 頁。
85.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59 頁。
86. 《魏書》卷 37《司馬楚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59 頁。
87. 《周書》卷 36《司馬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 年，第 645 頁。
88. 《北齊書》卷 39《祖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14 頁。
89. 《魏書》卷 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07 頁。
90. 《魏書》卷 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07–1308 頁。
91. 《魏書》卷 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11 頁。
92. 《魏書》卷 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11 頁。
93. 《魏書》卷 21 上《北海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63 頁。
94. 《魏書》卷 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12 頁。
95. 《魏書》卷 59《蕭寶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24–1325 頁。
96. 《魏書》卷 59《蕭寶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25 頁。
97. 《資治通鑑》卷 140，建武三年正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4393 頁。
98. 《資治通鑑》卷 140，建武三年正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4395 頁。
99. 《資治通鑑》卷 140，建武三年正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4395 頁。
100. 《魏書》卷 42《薛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941 頁。
101. 《魏書》卷 42《薛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942 頁。
102.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67 頁。
103.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74 頁。
104.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7 頁。
105.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106.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75 頁。
107.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78 頁。
108.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78 頁。
109.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35 頁。
110. 《魏書》卷 93《王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988 頁。
111. 關於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陳爽在《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中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了詳細研究。
112.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261 頁。
113.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77 頁。
114. 《魏書》卷 64《郭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27 頁。
115.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84 頁。

116.《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23 頁。
117.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84 頁。
118.《魏書》卷 53《李孝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1177 頁。
119.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31 頁。
120.《魏書》卷 36《李順傳附李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35 頁。
121.《資治通鑑》卷 140，建武三年正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4395 頁。
122.《魏書》卷 36《李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43 頁。
123.《魏書》卷 36《李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29 頁。
124.《魏書》卷 36《李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29 頁。
125.《魏書》卷 90《逸士列傳・眭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930 頁。
126.《魏書》卷 56《鄭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39 頁。
127.《魏書》卷 21 上《咸陽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35 頁。
128.《魏書》卷 56《鄭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38 頁。
129.《魏書》卷 24《崔玄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20–621 頁。
130.《魏書》卷 35《崔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27 頁。
131.《魏書》卷 32《崔逞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59 頁。
132.《魏書》卷 69《崔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525 頁。
133.《魏書》卷 66《崔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77 頁。
134.《魏書》卷 47《盧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50 頁。
135.《魏書》卷 47《盧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51–1060 頁。
136.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38 頁。
137.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84 頁。
138.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84 頁。
139.《魏書》卷 47《盧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60 頁。
140.《魏書》卷 47《盧玄傳附盧神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63 頁。
141.《北史》卷 30《盧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88 頁。
142.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92 頁。
143.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71 頁。
144.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23 頁。
145.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1 頁。
146.《魏書》卷 63《王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10 頁。
147.《魏書》卷 63《王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12 頁。
148.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58 頁。
149.《魏書》卷 63《王肅傳附王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12 頁。
150.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92 頁。
151.《魏書》卷 63《王肅傳附王誦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12 頁。
152.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82 頁。
153.《魏書》卷 21《高陽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57 頁。
154.《魏書》卷 21《高陽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57 頁。
155.《北齊書》卷 18《孫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35 頁。
156.《魏書》卷 58《楊播傳附楊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89–1291 頁。
157.《魏書》卷 58《楊播傳附楊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92 頁。

158.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01 頁。
159.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78 頁。
160. 《魏書》卷 22《京兆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89–590 頁。
161. 《魏書》卷 58《楊播傳附楊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89 頁。
162. 《魏書》卷 45《韋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09 頁。
163. 《周書》卷 39《韋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 年，第 694 頁。
164. 《魏書》卷 45《韋閬傳附韋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12 頁。
165. 羅新、葉煒編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315 頁。
166. 《周書》卷 31《韋孝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 年，第 544 頁。
167. 《魏書》卷 45《杜銓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18 頁。
168.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60–361 頁。
169. 《魏書》卷 45《裴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21 頁。
170. 《周書》卷 37《裴文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 年，第 668 頁。
171. 《魏書》卷 45《裴駿傳附裴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21–1022 頁。
172. 羅新、葉煒編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315 頁。
173. 《魏書》卷 52《胡方回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49 頁。
174. 《魏書》卷 52《胡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49 頁。
175.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7 頁。
176. 田余慶：《北魏後宮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收入氏著《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第 61 頁。
177.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40 頁。
178.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10 頁。
179. 《魏書》卷 83 下《外戚・胡國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34 頁。
180. 《魏書》卷 83 下《外戚・胡國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36 頁。
181.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5 頁。
182. 《魏書》卷 83 下《外戚・高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29 頁。
183.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5 頁。
184. 《魏書》卷 83 下《外戚・高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29 頁。
185. 《魏書》卷 83 下《外戚・高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31–1832 頁。
186.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16 頁。
187.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69 頁。
188.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第 163 頁。
189. 《魏書》卷 83 下《外戚・高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30 頁。
190. 《魏書》卷 83 下《外戚・高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30–1831 頁。
191. 《魏書》卷 62《李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99 頁。
192. 《魏書》卷 62《李彪傳附李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99 頁。
193.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31 頁。
194. 《魏書》卷 83 上《外戚・李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24 頁。
195.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31 頁。
196.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32 頁。
197.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65 頁。
198. 《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26 頁。
199. 《魏書》卷 45《杜銓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第 1018–1019 頁。

200.《魏書》卷 83 上《外戚・杜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15 頁。

201.《魏書》卷 83 上《外戚・李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24 頁。

202. 田余慶：《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第 53 頁。

203. 毛漢光：《中古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龍年間五姓著房之婚姻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6 本第 4 分冊，1985 年，第 619–698 頁。

204.《北史》卷 33《李靈傳附李顯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02 頁。

205.《北齊書》卷 22《李元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14 頁。

206.《北齊書》卷 22《李元忠傳附李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16 頁。

207.《北齊書》卷 22《李元忠傳附李湛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17–318 頁。

208.《北齊書》卷 22《李元忠傳附李景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18 頁。

209.《北齊書》卷 5《廢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5 頁。

210.《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26 頁。

211.《北史》卷 13《后妃列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88 頁。

212.《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23 頁。

213.《北史》卷 13《后妃列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87 頁。

214.《北齊書》卷 8《後主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8 頁。

215. 羅新、葉煒編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220 頁。

216. 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士民》，《魏晉南北朝史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04–107 頁。

217.《魏書》卷 56《鄭羲傳附鄭道昭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42 頁。

218.《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97–398 頁。

219.《北史》卷 14《后妃列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19 頁。

220.《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98 頁。

221.《北齊書》卷 5《廢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3 頁。

222.《北齊書》卷 37《魏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90 頁。

223.《魏書》卷 24《燕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09 頁。

224.《魏書》卷 24《崔玄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20 頁。

225.《魏書》卷 24《燕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09 頁。

226.《魏書》卷 24《張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13 頁。

227.《魏書》卷 24《崔玄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20–621 頁。

228.《魏書》卷 24《鄧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35 頁。

229.《資治通鑑》卷 134《宋紀》元徽四年（476 年），北魏延興六年二月，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4188 頁。

230.《魏書》卷 7 下《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7 頁。

231.《魏書》卷 7 下《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87 頁。

232.《魏書》卷 39《李寶傳附李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86 頁。

233.《魏書》卷 39《李寶傳附李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88 頁。

234.《魏書》卷 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10 頁。

235.《魏書》卷 53《李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81 頁。

236.《魏書》卷 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09 頁。

237.《魏書》卷 53《李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81 頁。

238.《魏書》卷 53《李孝伯傳附李安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77 頁。

239.《魏書》卷 90《逸士列傳・李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937 頁。

240.《魏書》卷 53《李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80 頁。

241.《魏書》卷 110《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55 頁。
242. 李憑：《論北魏宗主督護制》，《晉陽學刊》1986 年第 1 期，第 27–34 頁。
243.《魏書》卷 110《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55 頁。
244.《魏書》卷 53《李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80 頁。
245.《魏書》卷 110《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56 頁。
246. 周一良：《從北魏幾郡的戶口變化看三長制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1980 年第 4 期，第 140–146 頁。
247.《魏書》卷 47《盧玄傳附盧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49 頁。
248.《魏書》卷 42《薛辯傳附薛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943 頁。
249.《魏書》卷 42《薛辯傳附薛初古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942 頁。
250.《魏書》卷 47《盧玄傳附盧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49 頁。
251.《魏書》卷 47《盧玄傳附盧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49 頁。
252.《魏書》卷 47《盧玄傳附盧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059–1060 頁。
253.《魏書》卷 19 下《南安王楨傳附元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01 頁。
254.《魏書》卷 66《李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69 頁。
255.《魏書》卷 65《李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54 頁。
256.《魏書》59《劉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08 頁。
257.《魏書》卷 63《王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11 頁。
258.《魏書》卷 22《京兆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90 頁。
259.《魏書》卷 65《李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52 頁。
260.《魏書》卷 19 下《元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04 頁。
261.《魏書》卷 9《肅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39 頁。
262.《魏書》卷 20《元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26 頁。
263.《魏書》卷 66《李崇傳附李神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75 頁。
264.《魏書》卷 58《楊播傳附楊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92 頁。
265.《魏書》卷 19 上《元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49 頁。
266.《魏書》卷 19 上《元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45 頁。
267.《魏書》卷 39《李寶傳附李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90 頁。
268.《魏書》卷 38《刁雍傳附刁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74 頁。
269. 此段引文均見《魏書》卷 66《李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66–1474 頁。
270. 以上所引均見《魏書》卷 59《蕭寶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322–1324 頁。



文史研究

《歷代神仙通鑑》中《耶穌傳》的文本來源

姚達兌 *

摘　要 道教神怪小說集《歷代神仙通鑑》(1712年)中包含了一篇《耶穌傳》,此傳自十九世紀被新教傳教士發現,其文本來源至今未有人給出定論。經過一系列的考證和文本比對,可確認《耶穌傳》的內容源自明末耶穌會士費奇規著《誦念珠規程》(《聖母玫瑰十五端經》)和龐迪我著《天主耶穌受難始末》。此兩種文獻,合併為《天主聖教念經總牘》一書,出版於1628年。《歷代神仙通鑑》的編者取材自《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而雜糅該書所含兩種文獻,製造出了《耶穌傳》。

關鍵詞 《歷代神仙通鑑》;《耶穌傳》;《誦念珠規程》;費奇規;龐迪我

一、緣起

《歷代神仙通鑑》(下簡為"《通鑑》"),又名《神仙鑑》《神仙演義》等。該書初次刊刻於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共 22 卷,前 17 卷為徐道編撰,後幾卷則由程毓奇續補。[1] 兩人皆為道教信徒。這是一部道教神仙故事集,也可當成神怪小說讀,從中可看出道教比儒釋或其他教門/教派更加相容並包的一面。此書內封印有"仙真衍派,佛祖傳燈,聖賢貫脈"字樣,表明了其宗旨乃是三教(多教)同源,皆歸於"道"——這是以道教為中心的三(多)教合一的模式。因而,該書所收錄的故事,還包括了許多位宗教領袖或著名人物,比如儒家的孔子、佛教的釋迦牟尼、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穌和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等。

這一篇《耶穌傳》的文本來源,學界至今未有定論。筆者曾於 2020 年發表論文,專門討論晚清傳教士如何翻譯和理解《通鑑》及其中的《耶穌傳》。[2] 該文未曾解釋《耶穌傳》的文本來源問題。這一個問題極為重要,而過去限於資料所缺,文獻難以徵考比對,故而難作圓滿的解答。筆者近期因得友人襄助,又從歐美的圖書館借得相關文獻,故另撰此文作進一步的考證和分析。[3]

二、學術史回顧和線索

最早發現《通鑑》中收錄《耶穌傳》的正是十九世紀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據筆者考證,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編輯的《印中搜聞》(*Indo-Chinese Gleaner*)上有一封讀者來信(1818 年)首開其端,指出該傳的各種問題。[4] 此後有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斯皮爾(William Speer, 1822–1904)[5] 等德國、美國傳教士於 1839 年和 1849 年在《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上撰文進一步討論。三種文獻,前後三十餘年,對這篇《耶穌傳》的諸多討論,也反映出當時西方人對於中國宗教和文化的看法。[6] 現當代學者中討論這篇《耶穌傳》的,有中國學者徐景賢(1927 年)、戴不凡(1980 年)、邢東田(1999 年)等人。[7] 挪威傳教士艾香德牧師(Rev. 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在 1934 年的論文也

* 姚達兌,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現任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民主同盟海南省委文化專委會委員、海南省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會副秘書長、中山大學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員、西學東漸文獻館研究員。曾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員、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學者。著有《現代的先聲:晚清漢語基督教文學》等專著。

有論及。[8] 中國學者中，最早發現《通鑑》中摻入《耶穌傳》的是徐景賢（1901—1947）。由於此前戴不凡、邢東田等學者，皆未曾提及徐景賢的文章，而且徐氏文章較為關鍵，所以筆者有必要在這裡重新梳理一下徐氏文章所涉及的相關內容。

徐景賢出生於天主教家庭，於 1928 年入讀清華國學院，後從學於陳垣、馬相伯等傑出學者。1927 年，年僅 16 歲的徐景賢在《聖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天主教與天師道》的論文，指出明末士大夫如徐光啟等多慕“天學”，與來華耶穌會士親近，並沒有像如今那樣排斥基督教。徐文後附有一段較長的按語，徐氏於其中憶起此前讀過的《兩般秋雨盦隨筆》（梁紹壬著）中的一則札記：

> 《清淨法行經》稱孔子為光淨童子，《造天地經》以孔子為儒童菩薩，《酉陽雜俎》以孔子為玄宮仙，《真靈位業圖》以孔子為太極上真君，援儒入墨，殊屬可笑，然侮聖亦甚矣。[9]

這裡是指宋明以降的佛道典籍，將孔子另易一名，也收入其宗教的神聖人物圖譜當中，因而儒者梁紹壬稱其為“侮聖”，即侮辱聖賢（孔子）。同於此理，天主教教徒徐景賢則認為《通鑑》將耶穌、聖母瑪利亞皆列入道家仙譜中，也是一種“侮聖”之舉。因而，徐氏指出：

> 不意康熙年代時之龍虎主人張繼宗氏，竟襲故智，訂所謂“千古奇觀”之《歷代神仙通鑑》，而將《天主母瑪利亞之行實》摻入！卷首神仙鑑像，四十九頁繪一老者與一幼童，題為“如德亞”及“耶穌”；五十二頁繪一少婦與少女，題為“西河少女”及“瑪利亞”。嗚呼！殆真所謂“千古奇觀”。正教中人視此，豈止“殊屬可笑，然侮聖亦甚矣！”再《通鑑》二集，《佛祖傳燈》卷九二節中，“瑪利亞貞產耶穌”之紀載，大都摭取明季正教經文輯成。[10]

此段之後，徐氏還抄錄了《耶穌傳》，並附上一段按語：

> 按：多抄自《玫瑰經》，間有因顛倒次序而謬誤者，亦有篡改處，如謬言“聖師”，又渴以醋膽，當係“口渴與以醋膽”，再升天後十日，乃聖神降臨。諸如此類，悉教中人所習聞，故不置辯。[11]

徐景賢的文段中提及該書的《耶穌傳》來自《天主母瑪利亞之行實》，或其謂“明季正教經文”。《天主母瑪利亞之行實》一書，筆者遍尋無獲，無法確知是否有此書。後者“明季正教經文”，則是指明末的天主教漢語文獻。按語中還提及《玫瑰經》，這是指《聖母玫瑰十五端經》一書。[12] 這一條線索，與另一線索正好相關。1849 年，斯皮爾在《中國叢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以學術論證的方式探尋早期基督教在東亞乃至在中國傳播的痕跡，在該文中他推測這一篇《耶穌傳》應該是來自於天主教文獻。[13] 斯皮爾指出其文本來源是 *Roman Breviary* 一書。筆者查詢比利時魯汶大學漢語基督教文獻資料庫（The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後發現：這一部著作的漢語書名為《日課撮要》，1837 年出版於北京。所謂“撮要”者，其實就是《天主聖教日課》的簡要版。無論是《日課撮要》，還是《天主聖教日課》，都收錄了《聖母玫瑰十五端經》。現今可考的《天主聖教日課》一書，初刊於 1637 年，由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費奇規（Gaspar Ferreira, 1571–1649）、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等耶穌會士同訂，後由利類思（Ludovico Buglio, 1606–1682）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重訂出版於 1665 年。筆者經過比對，發現《耶穌傳》的文字與該書中《聖母玫瑰十五端經》的幾節經文非常接近。[14] 這些線索給筆者非常有益的啟示，也是本文得以完成的關鍵。

徐景賢文中提及的所謂“正教”即是天主

教，“侮聖”則是指這種做法本身是侮辱其教神聖人物耶穌或聖母瑪利亞。然而，徐景賢將編者的姓名弄錯了，因為編者並非張繼宗，而是徐道和程毓奇。張繼宗是徐、程兩人同時代的道士，是道教正一派第五十四代天師，所以被邀請來助陣背書的，雖然書內扉頁寫有“龍虎山張大真人、包山黃堂綸先生同訂”，但實際上主要編者是明清之際的徐道和程毓奇。張繼宗在序言中提及《通鑑》一書的編纂時段是在 1645 至 1647 年之間，因而，《耶穌傳》之文本來源必在此段時間之前。出版於 1637 年的《天主聖教日課》一書，有可能是《通鑑》中《耶穌傳》的來源。但是，這一部《耶穌傳》的內容，包括了耶穌出生、傳教、受難、復活等部分，而《聖母玫瑰十五端經》（包含了“歡喜五端”“痛苦五端”“榮福五端”）一書包含了《耶穌傳》的大部分內容，獨獨缺少“受難”這一部分內容。因而問題是，有沒有相關書籍，出版在《通鑑》編輯時段之前，又包含了《耶穌傳》的所有內容呢？

三、文本及其來源

《通鑑》所收的《耶穌傳》是本文討論的關鍵，故而不避贅衍，在此重新標點並抄錄全文如下。

> 是冬，羌人入寇，馬援大破之。遠西國人云：去中國九萬七千里，經三載，始抵西羌界。彼國初有童貞瑪利亞，於辛酉歲（實漢元始元年），天神嘉俾阨爾恭報天主特選爾為母，已而果孕降生，母極喜敬，裹以常衣，置於馬槽，群天神奏樂於空。後四十日，母抱獻於聖師罷德肋，取名耶穌。方十二齡，隨母往謁聖殿，歸時相失，母心痛苦。三日夜後，覓至殿中，見耶穌上座，與耆年博學之士，講論天主事理。見母忻喜同歸，孝敬事奉。至三十歲，辭母、師遊，行如德亞，傳教淑人，所行聖蹟甚多。其國中巨家及在位者，極傲惡，嫉其眾歸附，謀欲殺之。耶穌十二徒中，名茹答斯者，素有貪行，揣知本國眾意，因以攫利，夜深，引眾捕縛，送於亞納斯。在比剌多衙內，褫衣繫石柱，鞭五千四百有奇，全體剝傷，默不置辨如羔羊。惡黨以棘刺冠，箍於其額，以絳敝袍披其身，偽拜如王。造一重大十字架，逼令肩荷，一路壓跌難堪。被釘手足於架上，渴以醋膽。終命時，天昏地震，石相觸碎，時年三十三。死後三日復活，身極光美，先見母以解憂。四十日後，將欲升天，面諭宗徒百二十人，分行天下訓誨，與領聖水，洗罪入教。諭畢，古聖群從隨躋天國。後十日，天神降臨，迎母升舉，立於九品之上，為天地之母皇，世人之主保。徒眾分巡化教。[15]

筆者按：此前《藏外道書》（巴蜀書社影印）重印版、[16]近人整理本或當代學者的論文（包括筆者 2020 年的文章）中引此段，有一些抄錄詞彙或斷句標點方面的錯誤。比如“攫利”一詞誤作“攖利”，又如人名“茹答斯”誤作“茹達斯”。以上此段，是筆者對照幾個版本確定的最終版，以康熙年間初版（1712 年）為標準，並以繁體字抄寫（以便後人知曉前人早已抄錄有誤）。筆者已知有學者使用此段文獻時，直接抄錄此前幾種文獻而不自去查核清初原版，前後因襲，此其自誤也。

我們確知《通鑑》初版出版於 1712 年，而大體的編輯時間在1700年及其此前的三年，在此年限之前的明季天主教文獻是筆者主要的核對對象。經過一番查證和比對之後，筆者認為這篇《耶穌傳》的文本來源是 1628 年出版的《天主聖教念經總牘》（以下簡稱為《總牘》）一書。《總牘》共有兩卷，收錄有費奇規著《誦念珠規程》和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著《天主耶穌受難始末》兩書。

《誦念珠規程》，又名《聖母玫瑰十五端經》，其著者曾有爭議。王喜亮認為著者應是費奇規。[17]該書在明末有多種版本，目前可見至少有三種，分別為：《聖經玫瑰經十五端》（BNF Chinois 7353，以及另一版 BNF

Chinois 7357）、《誦念珠規程》（BNF Chinois 6861），以及《誦念珠規程》（R. G. Oriente. III. 214.5-6）。[18] 前兩者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後者則來自梵蒂岡圖書館藏本《天主聖教念經總牘》。[19] 最後一書出版於明崇禎元年（1628 年）。三書是同一書的不同版本，內容僅有數字之差，比如《誦念珠規程》（BNF Chinois 6861）將“天使”音譯為“諳若”，而其他兩本則多數時意譯為“天神”（也有少數幾處得到保留）。

筆者把相關文獻的版本情況製作為簡表（表一），下文再作詳釋。

表一.《耶穌傳》文本來源相關文獻表

著者及書名	出版時間	藏館和編號	備註說明
費奇規著《聖母玫瑰十五端經》	未確	收入《天主聖教日課》（BNF Chinois 7353）一書中。	“天使”（Angelus），意譯為“天神”。
費奇規著《聖母玫瑰十五端經》	未確	收入《天主聖教日課》（BNF Chinois 7357）一書中。	“天使”，意譯為“天神”。該書與 Chinois 7353 內容相同，是不同版次。
費奇規著《誦念珠規程》	未確	與其他書籍合訂為《聖教啟蒙》（BNF Chinois 6861）一書。	“天使”，音譯為“諳若”。
費奇規著《念珠規程》（內文作《誦念珠規程》	未確	BNF Chinois 7382	此書與 BNF Chinois 6861 所收內容完全相同。
費奇規著《誦念珠規程》	1628 年	G. Oriente. III. 214.5-6	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1628 年）一書。天使意譯為“天神”。
龐迪我著《天主耶穌受難始末》	1628 年或之前	／	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一書。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表一中的文獻，有幾點需要注意。（1）表一中前四本書，未能確知出版時間，但與第五本內容上幾乎相同，僅有個別詞彙使用之別。（2）出版於 1628 年的《總牘》是為定本，藏於梵蒂岡，其出版要比《天主聖教日課》（1637 年）更早。（3）龐迪我卒於 1618 年，故而《總牘》所收其《天主耶穌受難始末》一書，應在 1618 年之前就已經完成或出版。（4）《天主聖教日課》一書並未收龐迪我《天主耶受難始末》一書。筆者綜合判斷，認為《通鑑》的編者主要是參考《總牘》中的兩種材料——《誦念珠規程》和《天主耶受難始末》。

四、文本比較分析

《通鑑》中的《耶穌傳》的文本來源於《總牘》中包含的兩卷書，即費奇規著《誦念珠規程》和龐迪我著《天主耶穌受難始末》。為證明這一觀點，筆者在這一節會提供一系列的文本比對，並且說明前後文本的雷同或者相似之處。

下文使用如下三種略稱代表三本書：[通鑑]，即《通鑑》中所載的《耶穌傳》；[規程]，即費奇規著《誦念珠規程》；[受難]，即龐迪我著《天主耶穌受難始末》。而[評論]，則為筆者的評論和發現。三書所錄文段皆已斷句讀，加入現代標點符號，原文為繁體，悉作原貌。下文的文段比較，以《通鑑》中《耶穌傳》的文句為順序，原文與比對文非常接近或完全重合處以加黑強調，比對文段與原文完全重合或非常接近處，使用下劃線和加黑強調。

［通鑑］是冬，羌人入寇，馬援大破之。遠西國人云：去中國九萬七千里，經三載，始抵西羌界。

［評論］未有對應文段。此段為接入介紹。編者將《耶穌傳》接入中國故事中，這裡的“是冬”（這一年冬天）和“撫平羌亂”的馬援將軍，並沒有其他特別意義。當中的“遠西國人”一詞，因利瑪竇等明末耶穌會士自稱來自“極西”，故而“遠西國人”對應的應該就是來自西洋的耶穌會傳教士。《聖教日課》責任頁署著作者時也寫有“極西耶穌會士”等字。這裡的“遠西國”（與下文“彼國”同），也是虛擬一國，實際上對應的是“極西”或“西洋”，即歐洲／西洋。

［通鑑］彼國初有**童貞瑪利亞**，於辛酉歲（實漢元始元年），**天神嘉俾阨爾恭報天主特選爾為母**，已而**果孕降生**，**母極喜敬**，**裹以常衣**，**置於馬槽**，**群天神奏樂於空**。

［規程］極有德、極有福、**童貞瑪利亞**。……昔日**天神嘉俾阨爾**奉**天主**命，來報於爾。……又奉報於爾，說道：“天主費略，**選爾為母**，將**降孕**於爾最淨最純的聖胎，為人救世。”[20]……爾子耶穌誕生於爾至淨至貞之胎，以救世人。爾**以至歡喜、至恭敬，裹以舊衣，置在馬槽**，俯身拜他，是真實的天主。此時**許多諳若奏樂於空中**，讚美天主，慶賀世人。……[21]

［評論］前後兩段相同之處頗多。“至歡喜、至恭敬”被縮寫為“極喜敬”。“舊衣”被改為“常衣”（後有抄錄本作“裳衣”）。“許多諳若”被改為“群天神”。大天使“嘉俾阨爾”被稱為“天神”，這也是當時文獻常見的稱謂。有的文獻（如 BNF Chinois 6861）中“天神嘉俾阨爾”一詞作“諳若嘉俾阨爾”。“諳若”，即“天使”拉丁詞“angelus”的音譯。奇怪的是，《規程》一書中上引段，卻保留了後一處“諳若”一詞，而《通鑑》則作“群天神”（許多天使）。編者將中西方紀年作了換算。這一段中的時間“辛酉歲（實漢元始元年）”，即西漢平帝元年，是為西元 1 年，即耶穌降生之年。

［通鑑］後四十日，母**抱獻**於聖師**罷德肋**，取名耶穌。

［規程］爾後恭**抱**往入聖殿，**獻**他與天主**罷德肋**。[22]

［評論］這一句在詞彙上很接近，但意思上有比較大的差別。《通鑑》中，前文已出現“天主”一詞，故而此處的“聖師罷德肋”並非指天主，而是一般的聖殿上的聖師。筆者此前的論文已指出 1818 年《印中搜聞》的讀者來信中，“作者已指出‘罷德肋’可翻譯為拉丁文‘Pater’，即是英文‘Father’。筆者認為，根據文本判斷，這位聖師是為教堂中的神父，一如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聖師，而非‘三位一體’中的聖父”[23]。因而，這裡“聖師”是《通鑑》編者的誤讀或創造。《通鑑》的《耶穌傳》中雖出現“天主”，但並未出現其時此類文獻的常見詞彙，如“費略”（聖子，即拉丁文 Filius）、“斯彼利多三多”（聖靈，即拉丁文 Spiritus sanctus）等漢字。由此可知，《通鑑》之編者未識基督宗教中“三位一體”之義。從《規程》中“天主罷德肋”一詞可知這裡是指天主，而非一般的神甫，所以《通鑑》的編者在這裡把“天主”故意或誤作“聖師”。《耶穌傳》後文“至三十歲，辭母、師遊……”，也是同理，“師”或“聖師”是為聖殿中神甫——這是編者錯誤的理解。

此處還有兩點有問題：第一，《路加福音》（2：21）：“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聖經》（和合本）所講的是：耶穌在出生八天之後，接受割禮，獲得耶穌之名——這是在耶穌在其母親腹中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字。也即是說，耶穌獲得名字是在其滿八天之後，而非四十天後。第二，《路加

福音》（2：22—38）陳述了耶穌的父母帶他來到了耶路撒冷的聖殿，在那邊兩位先知西面（Simeon）和亞拿（Anna）道出了耶穌後面要做甚麼事情。《路加福音》（2：22）：“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他們帶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這裡“滿了潔淨的日子”是指婦女產後滿四十天，《利未記》（12：2—4）有提及，並說：“她潔淨的日子未滿，不可摸聖物，也不可進入聖所。”也即是滿四十天後，方可進入聖所／聖殿。這一句中“把他獻與主”，是指獻給天主，而非聖師（即後文提及的兩位先知）。《路加福音》（2：27）：“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句中的“他”是指先知西面。故而，《聖經》裡是說耶穌出生四十天後，父母抱着他，進入了聖殿，要把他獻給天主。這部分的內容，被《通鑑》編者改寫為“後四十日，母抱獻於聖師罷德肋，取名耶穌”，此句中的“聖師罷德肋”並非指天主，而是聖師西面。這是編者錯誤的理解。

［通鑑］**方十二齡，隨母往謁聖殿，歸時**相失，**母心痛苦**。三日夜後，**覓至殿中，見耶穌上座，與耆年博學之士，講論天主**事理。**見母忻喜同歸，孝敬事奉**。

［規程］爾子耶穌**年方一十二歲**，**隨爾**至於**聖殿**，爾**歸**之時，不見耶穌。**三日三夜**，**爾心痛苦**，及至**三日之後，尋至殿中**，及**見耶穌坐在上位**，與**年老有學之士講說天主**降生之事。**爾見**之不勝**忻喜**。耶穌**同爾歸家**，**孝順事爾**，至於三十歲。[24]

［評論］《通鑑》是更為文言化的表達，簡扼而平整，各分句多是四六字。“謁”更為恭敬，“歸時相失”“耆年博學之士”“忻喜同歸”等詞句，更為文言化，有雅化追求，而《規程》則屬較為平白淺顯的敘述。“天主事理”一句的意思，並不與“天主降生之事”相同，《通鑑》的寫法似乎更勝一籌。至此，以上所有內容，在《規程》中屬於“歡喜五端”部分，下文涉及猶大出賣耶穌部分內容在《規程》中並未出現。

［通鑑］至三**十歲**，辭母、師遊，**行如德亞，傳教淑人，所行聖蹟甚多。其國中巨家及在位者，極傲惡，嫉其**眾歸附，**謀欲殺之。耶穌十二徒中，名茹答斯者，素有貪行，揣知本國**眾意，**因以攫利，夜深，引眾捕縛，送於亞納斯**。

［受難］耶穌降生**三十年**後遊**行如德亞，傳教淑人，所行聖蹟甚多**，向善者，無不信從。惟協露撒棱（**如德亞國**京城名）**巨家及在位**者，崇邪自是，**極**為**傲惡**，**嫉其**德盛，不任受其直言，故皆憎厭**謀欲殺之**。……[25]**時有耶穌十二徒中，名茹答斯者，素有貪行**……**揣知本國**貴人巨室厭惡耶穌，遂欲**因以攫利**。……[26]及晨，彼人聚謀，**復縛耶穌**，而輸之般雀彼辣多。……[27]

［規程］至**夜深**時，惡**眾捕**捉，綁**縛**拖推**送於亞納斯**。[28]

［評論］《通鑑》這一段整合了《規程》和《受難》兩種文獻的相關表述，其所用地名“如德亞”“亞納斯”及人名“茹答斯”等皆相同。“如德亞”，即為“Judaea”，今譯“猶太”或“猶太地”，在今巴勒斯坦。“茹答斯”，今譯“猶大”（Judas）。“攫利”一詞此前數種文獻都抄錄錯誤為“攖利”，包括本人此前的論文也抄錄錯誤。現今核對多種文獻之後，才確知是為“攫利”。般雀彼辣多，今譯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羅馬帝國在猶太行省總督。《規程》中則作“比剌多”，與《通鑑》所用相同（請參下一節比對文），可再證《通鑑》編者是以《規程》為準。

另，《規程》中這一段接入“痛苦一端”，開始敘述耶穌受難的痛苦經歷。因而，《規程》這樣寫道：“痛苦一端。耶穌受難前一夕，在山口，苦禱天主父三次，渾身出流血汗，念亞

物十遍，在天一遍。……痛苦爾子耶穌三十三歲，見受難之時已到。要救贖人的罪，忽於一夜，前往山園，祈求天主罷德肋三次，苦懇至極，遍身都流血汗，叩拜天主罷德勒，迄赦人罪。”[29] 此段錄入於此，意在說明《規程》中的此處內容，被《通鑑》編者刪去。

［通鑑］**在比剌多衙內，褫衣繫石柱，鞭五千四百有奇，全體剝傷，默不置辨如羔羊。**

［規程］今在**比剌多衙門內**，被人盡剝衣裳，露出貞潔盛美的聖體，恥羞**毒打至五千餘下，遍身**破裂，血流不止，苦痛如是。爾子**不出一語，如羔羊一般**。[30]

［評論］兩段頗為相似。《規程》的敘述更為詳盡，更具感染力，而《通鑑》在耶穌被鞭打次數上更加確切。“毒打至五千餘下”，是五千多下；“鞭五千四百有奇”，是五千四百多下。根據瑞典聖布里奇特（Saint Bridget of Sweden, 1303–1373）的靈修祈禱詩《十五頌》（“Fifteen Oes”），虔誠的基督徒每天回憶耶穌為世人救贖而受難所遭到的鞭打，要讀《天主經》和《聖母經》15 次，每一次代表耶穌所受的一次鞭打。這種讀經需要持續一年之久，按一年 365 天算，則總數為 5,475，即耶穌受到鞭打次數為 5,475 次。[31] 這種演算法來自中世紀的修院傳統和聖布里奇特的著作，雖有爭議，但也被許多信徒接受。“鞭五千四百有奇”提及的數目與之更為接近。這一句表明，《通鑑》編者有可能看到了其他的漢語文獻，但筆者所知有限，暫未能查到。

［通鑑］**惡黨以棘剌冠，箍於其額，以絳敝袍披其身，偽拜如王。**

［規程］痛苦爾子耶穌我等主，被**惡人以棘剌冠箍他聖額**，聖血通流。又以王者所穿之破衣**披在他身，假意朝拜如王**。如此侮辱之甚。[32]

［評論］《通鑑》此句可算是《規程》一句的縮寫。“絳袍”為尊者所穿，也代稱官服；“敝”，即破舊，破爛。“絳敝袍”與“王者所穿之破衣”，意義相似。“偽拜”，也近“假意朝拜”。

［通鑑］**造一重大十字架，逼令肩荷，一路壓跌難堪。被釘手足於架上，渴以醋膽。終命時，天昏地震，石相觸碎，時年三十三。**

［規程］惡黨**造一重大的十字架，逼他自己肩荷**，到那受死之地。負十字時，**一路壓跌難當**，爾在後隨之，極苦極哀，泣涕無已。……[33] 耶穌至於受死之地，被人剝盡衣裳，將其**手足釘在十字架上**，口極乾**渴**，卻只與以**酸醋苦膽**。到**終命之時，天昏地震**，日月無光，**石塊自相觸撞而碎**……[34]

［評論］相似語彙頗多。《通鑑》編者將《規程》文段濃縮成文言，然而太過於簡扼。耶穌死時“時年三十三”，符合漢語古典小說的敘事方式：在敘述人物逝世之時，點明其享年多少。“時年三十三”，這幾字在《規程》中，是放在受難故事開始之時。

［通鑑］**死後三日復活，身極光美，先見母以解憂。**

［規程］爾極愛的子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身體極光、極美，先往見爾，與爾解憂**……[35]

［評論］兩段的詞彙和意思幾乎完全相同。

［通鑑］**四十日後，將欲升天，面諭宗徒百二十人，分行天下訓誨，與領聖水，洗罪入教。諭畢，古聖群從隨躋天國。**

［規程］爾子耶穌我等主，既已復

> 活，到**四十日後，將欲升天**之時，囑付**宗徒**與眾弟子，**分行天下**，以天主正教**訓誨萬民，與領聖水，洗罪入教**。囑付已畢，即時自**舉升**天。前日地獄取出無數的聖人及天上無數的天神，都皆隨送已到天堂。[36]

［評論］內容相同，所用詞彙也近似。《規程》中後文“無數的聖人”和“無數的天神”，在《通鑑》中被稱為“古聖群眾”。“自舉升天”與下一段的“升舉”相近。這裡《規程》中“天堂”一詞被改為“天國”。《通鑑》中“百二十人”，在《規程》對應句中是“宗徒與眾弟子”，而《規程》後續文段緊接着點明是“一百二十人”，故而應是從後文截取。

> ［通鑑］**後十日，天神降臨**，迎母升舉，**立於九品之上，為天地之母皇，世人之主保**。徒眾分巡化教。

> ［規程］爾子耶穌升天之**後十日**，爾與宗徒眾弟子**一百二十人**共聚一堂，念經祈望天主。……[37] 爾子耶穌遣**天神**嘉俾阨爾下來報爾，天主要提爾身，與爾聖靈魂齊登天國，受安樂榮福。[38]……天主**立聖母在於九品天神之上，以為天地之主母，及世人之主保**。[39]

［評論］《規程》中這一節相鄰的幾處內容，被整合為一，語句幾乎完全相同。傳教士郭實臘認為在《通鑑》的《耶穌傳》中，“九品”一詞是古代中國官僚體系“九品中正制”的品級（“九種品級的官員的頭兒”／the head of nine grades of mandarins）——這是明顯的錯誤。[40] 此前筆者已經指出，“基督教《聖經》裡並無談及天使的等級，但中世紀天主教信眾將天主教的天使，按其地位和能力的高低評定出等級的高低，分出了三部九品。[41] 九品為最高級別的一類天使，《耶穌傳》中預報瑪利亞感靈受孕的嘉俾厄爾（Gabriel）即是地位崇高的九品天使。郭實臘在批評中國的佛道兩教或人間秩序之外的世界時，曾說中國人按照中國的官僚體系，創造了靈界的官僚體系。故而，筆者認為郭實臘在此種觀念的影響之下，導致他將‘九品’等同於中國官僚體系九品中正制中的‘九品’，而忽略了該文中天主教的意涵”[42]。這也說明了郭實臘屬於德國新教路德宗，對天主教傳統中天使品級不太理解，或不太重視。

通過以上文本比對，已可證明《通鑑》中的《耶穌傳》來自《總牘》中的兩種文獻，即費奇規的《誦念珠規程》和龐迪我的《天主耶穌受難始末》。

五、小結

從以上的文本比較中，筆者得出如下結論：（1）《耶穌傳》編者主要取材於費奇規著《誦念珠規程》和龐迪我著《天主耶穌受難始末》兩書。此兩書皆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一書，出版於 1628 年，後寄往羅馬梵蒂岡圖書館，存為定本。《通鑑》編者，應是讀到《總牘》這一部書，方較易將這兩種文獻的內容抄錄並改寫，雜糅為一，製造出《耶穌傳》一文，混入道教神仙系譜當中。（2）《規程》又名《聖母玫瑰十五端經》，原是以第三人稱敘述，《規程》文中的“爾”，即為“聖母”，故而《通鑑》易以“母”字稱之。《規程》的第二人稱敘述，在《通鑑》的耶穌傳中被改為客觀化描述。（3）《規程》與《天主聖教日課》的版本內容一致，皆屬於“日課”，可以念誦，使用的語言較為口語化。與此不同，《通鑑》使用文言，是較為書面化的寫作方式。（4）《通鑑》所錄《耶穌傳》，間有錯漏。徐景賢早已指出，《通鑑》編者在改編之時，產生了一些錯誤。徐氏說：

> 間有因顛倒次序而謬誤者，亦有篡改處，如謬言“聖師”，又渴以醋膽，當係“口渴與以醋膽”，再升天後十日，乃聖神降臨。諸如此類，悉教中人所習聞，故不置辯。[43]

至於編者何以將《耶穌傳》摻入於《通鑑》之中？這雖屬另一問題，但筆者不妨在此作一簡扼的推測。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入華，在清初達到鼎盛，其時印刷的天主教漢文文獻頗多，一般文人也較易獲得。徐道等人雖是道教信徒，但他們堅持認為“仙佛同源”“三教同源”“道無二致，理有同歸”。這種相容並包的態度，使得他們將外來宗教作了本地化的處理，並將外來宗教或異域的名人都收入神仙譜系當中。《通鑑》前附編者《說義十則》，便指出：“集中所主者，仙也，而何以佛與神聖雜出其間……可知仙佛同源。……夫神則正氣所鍾，亦仙之亞也。道無二致，理有同歸。五常充備，仙也、佛也、聖也、神也，即其人也。”[44] 換言之，《通鑑》所收神仙，雖然是以道教的“仙”為主，也兼收古今中外的神聖人物。最後，《通鑑》是以中國朝代時間為編排順序，即是其謂“編年紀月”，而不詳的紀傳則盡量“詳推年月”，比如把耶穌出生的時間推定在漢平帝元始元年，以便編入中國故事中。

附：本文是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古代神怪小說的近代英譯和域外影響研究”（17CZW036）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1700 年（康熙庚辰冬），張繼宗為《歷代神仙通鑑》作序時提及，該書為徐道所撰，程毓奇所續——此時該書未刊刻。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乙酉），編者在其序中說：“乙酉歲，得探林屋，孰謂緣憂患中，忝與珠樓之選。雖藉《龜》《鑑》為本，皆逐節傳記，命道貫繹成帙。”但是 1705 年也非《通鑑》初刻時間。清康熙五十一年冬（1712 年），《三教同原錄》自序中又說：“壬辰冬，委送大士像於南海，挈拙刻請定於別庵、嶧堂二禪師，即蒙賜序。”由此可知，《神仙通鑑》的初版時間為 1712 年，1722 年以《三教同原錄》一名重刊。前後版本，只是名稱有異，後出本序言有增，內容基本不變。具體討論見文革紅、文青松：《〈歷代神仙通鑑〉刊刻時間、地點考》，載吳兆路、甲斐勝、林俊相主編：《中國學研究・第 8 輯》，濟南：濟南出版社，2006 年，第 366–371 頁（尤其是第 369 頁）。
2. 姚達兌：《晚清傳教士如何翻譯和理解〈神仙通鑑〉及其中的耶穌傳》，《世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53–60 頁。
3. 中山大學梅謙立教授、南昌大學王喜亮老師、肇慶學院汪聶才老師和美國華盛頓大學石裕華為筆者提供了相關資料和有益的建議，特此致謝。筆者的文獻主要來自於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及師友相贈的資料。特此向這些圖書館和相關師友致謝。筆者核對了北京大學圖書館 1712 年 22 卷本《歷代神仙通鑑》、遼寧古籍出版社的點校本，以及收入王秋桂、李豐楙主編的《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匯編》第一輯（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 年）的版本。2019 年 12 月，筆者曾受邀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做講座，曾講及此題相關論點。當時評議人和提問者為筆者提了一系列建議，也對本人的後續改寫有幫助，特此致謝。
4. 這封來信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馬禮遜本人所撰。作為主編之一的馬禮遜在該雜誌上匿名或用筆名刊載了不少文章。這篇《耶穌傳》出自《歷代神仙通鑑》，而同一時段馬禮遜對《歷代神仙通鑑》和《搜神大全》等書頗有興趣，並有相關的譯作。若非馬禮遜，則有可能是米憐或英華書院中的同事所作。
5. 兩者皆匿名，此為筆者核對考證結果。學界已對郭實臘有深入的研究，此處不作介紹。相對來說，斯皮爾知者甚少。據偉烈亞力的記錄，斯皮爾是美國來華傳教士，1842 年獲醫學博士，1846 年攜夫人和花璉治（John Booth French）等牧師一起來到澳門。1847 年 4 月，其夫人逝世於澳門，葬於新教徒公墓中。此後，斯皮爾赴廣州傳教，1949 年回美國，1851 年後至美國舊金山向當地華人傳教。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156–157.
6. 詳細討論請參姚達兌：《晚清傳教士如何翻譯和理解〈神仙通鑑〉及其中的耶穌傳》，《世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53–60 頁。三種文獻出處：（1）Anon：《中國神話作家對耶穌的敘述》（*A Chinese Mythological Writer's Account of Chris*），見重印本 [英] 馬禮遜、米憐編：《印中搜聞 1817—182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第 109–113 頁；（2）A Correspondent, "Review of *The Shin Seen Tung Kee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 10 (February 1839), pp. 505–525; vol. 7, no. 11 (March 1839), pp. 553–568；（3）Anon., "Notice of the Ancient Intercourse with China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the Facilities It Afforded for Propagating Christianity;

Account of Jesus Christ Given in *The Shin Sien Tung Kien, or Records of Gods and Genni*",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September 1849), pp. 485–503.

7. 徐景賢：《天主教與天師道》，載趙中亞選編：《徐景賢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39–241 頁；戴不凡：《小說見聞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8 頁；邢東田：《〈三教同源錄〉及其所描述的耶穌事蹟》，《中國文化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06–108 頁。
8. 參見 [挪] 艾香德：《論神仙通鑑所記耶穌事蹟》，《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1934 年第一卷第二期，第 11–13 頁。
9. [清] 梁紹壬撰，莊葳校點：《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兩般秋雨盦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42 頁；趙中亞選編：《徐景賢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40 頁。
10. 趙中亞選編：《徐景賢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40 頁。
11. 趙中亞選編：《徐景賢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41 頁。
12. 《聖母玫瑰十五端經》，正式名稱為《聖母聖詠》，又簡稱為《玫瑰經》，於十五世紀由聖座正式頒佈，是天主教徒用於敬禮聖母瑪利亞的禱文。“玫瑰經”一詞來源於拉丁語詞彙“Rosarium”，意為“玫瑰花冠”或“一束玫瑰”。詞根“Rosa”，即玫瑰。“玫瑰經”一名是比喻連串的禱文如玫瑰馨香，敬獻給天主和聖母。
13. Anon., "Notice of the Ancient Intercourse with China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the Facilities it Afforded for Propagating Christianity; Account of Jesus Christ Given in *The Shin Sien Tung Kien, or Records of Gods and Genni*",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Sept 1849), pp. 485–503.
14. [葡] 費奇規：《聖母玫瑰十五端經》，請參考 [意] 郭居靜等編著：《天主聖教日課》（BNF Chinois 7353）上卷，1665 年，第 31–44 頁。
15. [明] 徐道、程毓奇編：《歷代神仙通鑑》第九卷第二節，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本。
16. 胡道靜等主編：《藏外道書》第 32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4 年，第 375–376 頁。
17. 王喜亮：《晚明首部天主教版畫〈誦念珠規程〉考》，《哲學與文化》2021 年第 48 卷第 7 期，第 93–108 頁。
18. “BNF” 為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簡寫，其藏明清耶穌會漢文書籍已編號，據編號搜索便可獲得全文。
19. 《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
20.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36–137 頁。
21.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41–142 頁。
22.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43 頁。
23. 姚達兌：《晚清傳教士如何翻譯和理解〈神仙通鑑〉及其中的耶穌傳》，《世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56 頁。
24.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45–146 頁。
25. [西] 龐迪我：《天主耶穌受難始末》，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97 頁。
26. [西] 龐迪我：《天主耶穌受難始末》，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98 頁。
27. [西] 龐迪我：《天主耶穌受難始末》，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11 頁。
28.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48 頁。
29.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47–148 頁。
30.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

文史研究

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50 頁。

31. Clifford Davidson, "Sacred Blood and the Late Medieval Stage", *Comparative Drama*, vol. 31, no. 3 (1997), p. 443; Rosemary Woolf, *The English Religious Lyric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 204; Rebecca Krug, "The Fifteen Oes", in Thomas H. Bestul, Anne Clark Bartlett ed., *Cultures of Piet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07–117.
32.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51–152 頁。
33.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53–154 頁。
34.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55 頁。
35.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57 頁。
36.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



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60 頁。

37.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62 頁。
38.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64–165 頁。
39. [葡] 費奇規：《誦念珠規程》，收入《天主聖教念經總牘》，載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1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166 頁。
40. A Correspondent (Karl Gützlaff), "Review of *The Shin Seen Tung Kee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 10 (Feb 1839), pp. 505–525; vol. 7, no. 11 (Mar 1839), p. 556.
41. 鄒保祿：《談九品天使》，《中國天主教》2008 年第 5 期，第 45–48 頁。
42. 姚達兌：《晚清傳教士如何翻譯和理解〈神仙通鑑〉及其中的耶穌傳》，《世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58 頁。
43. 趙中亞選編：《徐景賢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41 頁。
44. [明] 徐道、程毓奇編：《歷代神仙通鑑》第一卷，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刊，第 2–3 頁。



文史研究

“中興業，須人傑”——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育與英語教學

黃萍萍 *

摘　要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曾在抗戰的艱苦時期培養出許淵沖、楊振寧等學貫中西、心懷家國且具有通識之能的國之棟樑。儘管當今的高等教育學府設施條件更加優越，但英語教學卻普遍存在人文素養滲透不足，學生只注重對英語國家的單向理解，對非英語國家的認知與評判不夠客觀等問題。本文聚焦於西南聯大的英語教學情況，旨在剖析其教學理念、內容、方法與教材是如何服務於其人才培養理念，總結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鑑的教育經驗。

關鍵詞 西南聯大；高等教育；英語教材；英語教育；民國

引言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下文簡稱“西南聯大”）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的一所聯合大學。1937 年三校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1938 年從長沙遷至昆明，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西南聯大遂於 1946 年結業。[1] 雖然抗戰期間條件艱苦，西南聯大仍然培養出王佐良、許國璋、許淵沖等學貫中西的外語大師，同時在其他學科領域也培養出了如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等具有深厚英語素養的棟樑之才。當今的中國高等教育學府雖然設施條件更加優越，卻再難創造西南聯大的教育奇跡，培育出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既見長於專業領域又具通識之能，同時心懷家國的有識之士。當前有關西南聯大英語教學的研究大多從宏觀的角度對該校的外語教育 [2] 或文學學科發展 [3] 進行概述，本文旨在聚焦英語教學一項，通過呈現和分析西南聯大英語教學的細節（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等），探索西南聯大英語教學的可取之處。

* 黃萍萍，北京外國語大學專用英語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語教育、教材研究、課程、教學法與語言測評。

筆者認為當前的大學英語課程弊端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在工具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許多人將英語教學的目的狹隘地理解為“能用英語與外國人交流”，忽視了交流只是語言學習的目標之一，而非全部。[4] 英語語言教學並不局限於語言技能上的培養，其中滲透的人文思想也是語言的核心所在。雖然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英語課程都宣導人文主義的理念，但大多只是流於形式而並沒有落到實處。[5] 第二，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的強勢地位往往導致英語教學在宣導跨文化交際時，通常僅強調非英語國家對英語國家單向的對於文化和價值觀的理解，使學生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以及對自己國家的認知產生不客觀的評判。因此，西南聯大如何教導出具有深厚中、英文素養積澱，既放眼世界又以報效國家為己任的人才，十分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鑑。

一、西南聯大教學概況

西南聯大在教學方面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大師上基礎課”，各系主任基本上都會教授基礎課。西南聯大校友鄒承魯院士也曾表示：“西南聯大的傳統就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高級老師教……”[6] 這一點得到了其他校友的證

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王漢斌認為西南聯大能造就一批人才，得益於一流的教師，大師教授基礎課能夠增廣學生的視野；郝詒純院士表示地質學都是系主任和最有名的教授親自帶隊到野外實習。[7] 得益於此，西南聯大的教育成效顯著。

除此之外，西南聯大的教學管理以“教授治校”和“教授立校”為核心，給予教授極大的自由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擅長的領域講課。例如，不同教授講授同一課程，其教學內容和側重點各不相同，也沒有統一的教材，學生要自行閱讀許多相關的著作深入學習。校內學術與教學自由之風也是教授們共同努力爭取的結果。

彼時，民國教育部曾訓令西南聯大須遵守教育部規定開設相應的課程，並統一教材、考試等。[8] 此舉遭一眾西南聯大教師反對，後由馮友蘭執筆《西南聯合大學教務會議就教育部課程設置諸問題呈常委會函》上呈。呈函部分內容如下：

> ……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
>
> 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
> ……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
> ……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育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
> 師嚴而後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後師嚴。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
> ……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號等訓令之例外。蓋本校……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9]

馮友蘭從個性化教學、權能分職、教育成效需長年累月堅持，以及尊重師道等角度，闡述統一化教學不利於學術的發展與推陳出新，指出教學是大學與教授的應盡之責，教育部應予以一定的自由空間，大學教育亦應避免受政局動蕩之影響，而教授的師道之尊需盡力維護，若教授有如政府科員一般，則師道不存，將難以肅學生之視聽，堅其心志。在教授們的努力下，西南聯大秉持兼容並蓄、學術自由的教學風氣，沒有遵照要求統一課程、教材與考試。[10]

雖然西南聯大反對遵照要求統一教材，但聯大的教授並非一味否定教育部審定的教材，而是在考察教材品質及教學需求後再決定取用與否。各專業課程亦並非僅以一本教材進行教學，而是在取用各教材的優點之上，增編新教材或講義以補不足。例如，西南聯大文學院曾編《西南聯大語體文示範》一書作為部定教材的補充，書內選用了胡適、魯迅、徐志摩、宗白華、朱光潛、梁宗岱、謝冰心、林徽因與丁西林的文章，其《卷頭語》道：

> 自部定大學大一讀本頒佈後，我們放棄了我們以前選有部分語體文的大一課本，遵用部定課本。部定課本中所選擇的文章，無疑地都有學術的或文藝的甚高價

> 值。教得了，可使學生瞻仰吾國舊日學術的風光與欣賞舊日文藝的古雅；但不能很適合的幫助學生習作……大一國文的目的，不應單是幫助學生讀古書，更重要的是養成他們中每一個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敢於以現代人的語言表示現代人的思想與情感……為了以上三種目的，我們選下這本參考小書……[11]

由此可見，西南聯大的教授在對比原先的大一課本與部定課本後，認為部定課本有更高的學術與文藝價值，因此棄用原教材，改選部定教材。同時，考慮到部定課本不利於學生學習現代漢語習作，因此他們又增編《西南聯大語體文示範》一書，以提高學生現代漢語能力。

上述大一國文讀本的選定並非只針對文學院的學生，事實上國文及英文是各院學生的必修課程。[12] 西南聯大堅持要所有專業的學生都必須修讀國文，因為這是身為一個中國人必須打好的教育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學生也要學好英文，以了解外國的政治、歷史、地理、文化等知識，做到學貫中西。反觀當前一些高等院校往往僅將英語列為各專業學生必修課程，且多注重聽、說、讀、寫等技能上的培訓，因此許多大學生的國文素養還停留在高中水平。這些學生對英語的掌握更多地是作為一種語言工具服務於日常生活與學習，缺乏對語言的審美能力，故難以積累深厚的中外文學素養。

二、西南聯大英文課程與教材

如前所述，大師雲集是西南聯大教學的一大特色。主持西南聯大校務的梅貽琦校長就認為大學貴在大師，而不在大樓。西南聯大校歌《滿江紅》言道：

> 千秋恥，終當雪，
> 中興業，須人傑。
>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大師是培養能振興中華的國之棟樑必不可少的要素。西南聯大外國語文系也匯集了當時中外最優秀的一批學者。西南聯大著名校友許淵沖曾評價道：

> ……而聯大卞之琳講莎士比亞，也比［哈佛大學］吉特勒基更有新意。至於《詩經》，哈佛根本無人能講，更無人能譯成英文。還是聯大柳無忌去美後，為美國培養了許多漢學家，包括哈佛的海濤樂（Hightower）和歐文（Owen），但比起聯大人來，相差甚遠……外國語言文學系的名師則有二十歲在美國出版英文詩集，得到美國桂冠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讚賞，並與英國諾貝爾獎詩人艾略特（T. S. Eliot）交流的葉公超……全世界第一個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的大師吳宓……使文學通俗化、散文政治化的則有陳福田……而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的是錢鍾書，他講的課能化科學為藝術，使散文有詩意，是年輕一代的學術大師……[13]

從許淵沖的敘述可知西南聯大學生對其時的教師和教育水平的高度認可。楊振寧也曾如此評價：

> 我那時在西南聯大本科所學到的東西及後來兩年碩士學所到的東西，比起同時美國最好的大學，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14]

可見，當時西南聯大學生對自身在中國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表現出充分的自信。反觀近年，許多大學仿效國外體系，以國外標準衡量、評價自身的現象值得反思。

（一）西南聯大英文課程概況

西南聯大的英文教學是在清華大學的基礎上建立而來。清華大學在英語教學方面成效卓著，受到西南聯大教授們的一致認可，且清華學生的英文水平也是三校中最好的。抗戰前，

清華將英文課分為課本與作文兩組，旨在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以及加強學生對國外歷史、社會、文化的認識，因此西南聯大的英文教學沿用了清華的教學模式，[15] 分為讀本和寫作兩項。西南聯大的英文課程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針對外國語專業的學生，另外則是面向全校各專業學生的必修或選修英文課程。其中大一英文課是面向全校一年級學生開設的必修課，[16] 學校採用分班（組）方式，每班（組）約 20 人，[17] 在分組（班）教學時並未體現出對外語專業和非外語專業學生的差別要求，比如當時外語系學生許淵沖與物理系學生楊振寧就曾為同班同學。大一英文讀本課由教授授課，部分大一作文由助教批改。[18] 除了大一英文外，西南聯大還開設了讀寫類的大二英文、大三英文和大四英文課，文學類的莎士比亞、英國詩等課，以及語言學類的語音學、語義學等課。表一匯總了西南聯大歷年所開設英文類課程及其任課教師，內容豐富，共有 79 門必修或選修課程供學生修讀。[19]

表一. 西南聯大歷年開設的英文課程及授課教師 [20]

英文課程	西南聯大授課教師	英文課程	西南聯大授課教師
綜合類（讀本、作文）			
一年級英文讀本／英文壹（讀本）	陳福田、邱漢森、朱木祥、莫泮芹、毛玉昆、徐錫良、錢鍾書、潘家洵、廖福、楊西昆、柳無忌、黃國聰、鮑志一、張振先、莫泮芹、葉公超、梁祖蔭、陳嘉、謝文通、葉楚傖、羅孝超、姜桂儂、練北勝、蘇冰心、王佐良、李田意、楊周翰、周榆瑞、李賦寧、卞之琳、張堯年、薛誠之、劉世沐、王慶祓、查良錚、歐陽採薇、吳納蓀、區偉昌、顏錫嘏、陳比德、王森棠、李鯨石、胡毅、林鑫、楊琇珍、王還、錢學熙、陳祖文、金隄	一年級英文作文／英文壹（作文）	徐錫良、劉榮恩、邱漢森、朱木祥、毛玉昆、陳福田、廖福、張振先、楊西昆、姜桂儂、曹鴻昭、鮑志一、葉楚傖、李振麟、周玉瑞、羅孝超、梁祖蔭、楊周翰、王還、王佐良、李田意、練北勝、周榆瑞、查良錚、李賦寧、薛誠之、王慶祓、張堯年、陳比德、吳納蓀、區偉昌、俞銘傳、林同梅、劉世沐、顏錫嘏、王森棠、黃炯華、李鯨石、錢學熙、林鑫、徐璋、夏濟安、趙全章、顧元、金隄
		英文作文壹（本系）	陳福田
二年級英文／英文貳	陳福田、莫泮芹、徐錫良、毛玉昆、葉公超、錢鍾書、潘家洵、吳可讀、孫家琇、黃國聰、陳嘉、謝文通、柳無忌、卞之琳、練北勝、凌達揚、袁家驊、蘇冰心、馬葆練、黃炯華、李賦寧、賈思培、劉世沐、王佐良、薛誠之、錢學熙、張紹桂	英文作文貳	莫泮芹
三年級英文／英文叁	燕卜蓀、莫泮芹	英文作文叁	葉公超、吳宓
四年級英文／英文肆	燕卜蓀	英文補習班	王佐良、姜桂儂、周玉瑞、李田意
文學類			
西洋文學概要	吳宓	印歐語系語文學概要	葉公超、袁家驊

文史研究

英文課程	西南聯大授課教師	英文課程	西南聯大授課教師
歐洲文學史	吳宓	英國文學史	柳無忌、曹鴻昭、李賦寧（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英語系）
歐洲名著選讀／歐洲名著	吳宓、溫德	英國文學選讀	柳無忌
歐洲名著壹／上	葉公超、吳宓、莫泮芹	英文名著選讀	無（師範英語系）
歐洲名著貳／下／歐洲文學名著貳	溫德、吳宓、葉公超、陳福田	文藝復興時代文學	錢鍾書
英國小說	羅皚嵐、陳福田	短篇小說	羅皚嵐、莫泮芹
西洋小說	陳福田、王佐良	現代小說	錢鍾書、白英
西說小說	陳福田	現代小說選讀	陳福田
小說藝術 (The Art of the Novel)	卞之琳	現代西洋戲劇	陳嘉
莎士比亞研究／莎士比亞壹／莎士比亞	燕卜蓀、謝文通、陳福田、陳嘉、溫德	英國戲劇	柳無忌
西洋戲劇	柳無忌、趙詔熊（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英語系）	現代戲劇	陳銓、潘家洵、陳嘉
英國十八世紀文學／十八世紀文學／十八世紀英國文學 (1750—1800)	翟孟生、葉公超、謝文通、凌達揚、馬葆練（師範）	英國十九世紀文學	莫泮芹
現代英國文學	柳無忌	歐洲古代文學／古代文學	吳宓
英國散文／英文散文	莫泮芹、徐錫良	英文散文及作文壹A、B	陳福田、莫泮芹、趙詔熊、胡毅、徐錫良
英文散文及作文貳A、B	莫泮芹、陳嘉、趙詔熊	英文散文及作文叁A、B	袁家驊、白英、徐錫良
英文散文及作文壹(散文)	莫泮芹、陳福田	英文散文及作文壹（作文）A、B、C	趙詔熊、胡毅、徐錫良
英文散文選讀及作文A、B	徐錫良（師範學院英語系）	維多利亞散文	劉世沐
英詩選讀／英國詩	燕卜蓀、溫德	現代詩／現代英詩	燕卜蓀、謝文通、溫德、莫泮芹、白英
英文詩／英詩	謝文通、溫德、莫泮芹（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英語系）	浪漫詩人	莫泮芹
中西詩之比較	吳宓	維多利亞詩	溫德
十九世紀英國詩人	陳嘉	英詩史	白英
查叟（Chaucer）	袁家驊、趙詔熊	米爾敦（Milton）	陳福田
亨利詹姆士／詹姆士（Henry James）Old and Middle	卞之琳	班瓊生 (Ben Jonson)／屈萊登 (Dryden)	趙詔熊
Elizabethan 文學	白英	文學理論	錢學熙

英文課程	西南聯大授課教師	英文課程	西南聯大授課教師
文學批評	葉公超、錢學熙、陳銓、楊業治	人文主義研究	吳宓
文學與人生理想／文學與人生	吳宓		
語言學、翻譯、文法、修辭、哲學等類目			
英漢對譯	吳宓、葉公超	翻譯	吳宓、袁家驊、卞之琳（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英語系）
英語語音學	潘家洵、袁家驊（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英語系）	英語學 Old English	袁家驊、趙詔熊
English Philosophy	袁家驊	英語史	袁家驊
語言與哲學	洪謙（非英語）	語言的邏輯研究	洪謙（非英語）
英文文法及修辭學／英文文法及修辭／文法與修辭	袁家驊、練北勝（代）、凌達揚、黃炯華、薛誠之（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學院英語系）	英語修辭學	凌達揚（師範英語系）
文學與修辭學	張紹桂（師範英語系）		
應用、教學類			
英語教學法	張紹桂（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英語系）	英語教材及教法研究A／英語教材及教法研究壹、貳	凌達揚、王般（師範英語系）
英語會話演講及辯論A／英語會話演說及辯論 A／英語會話演說及辯論壹	徐錫良、馬葆練、張靈新（師範英語系）	英語會話演說及辯論B	馬葆練（師範英語系）
演說及會話／英語演說及會話	張紹桂（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英語系）	應用英文／應用英文壹、貳	凌達揚（師範英語系）
英語教學實習／教學實習壹、貳	凌達揚、王般（師範英語系）	英國會話等式	張靈新（師範英語系）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17–401 頁。

西南聯大共兩個學院開設英語類課程，分別是文學院的外國語文學系和師範學院的英語學系。外文系的課程以英語和英國文學為主，其他外語有法、德、俄、日四種供學生選修第二外語，以法、德語為主。此外，聯大還開設過梵文、拉丁文、希臘文選修課。[21] 西南聯大各個學系的教授既承擔教書育人的職責，又肩負重要的社會責任，事務繁忙，因此院系行政事務常由教授接替負責，而非長期由一人管轄。根據 1937 年 10 月頒佈的《長沙臨時大學關於各學系名稱及各系教授會主席名單的箋函》，西南聯大外國語文系教授會主席為來自北京大學的葉公超。其後，葉公超因事請假，1940 年 10 月西南聯大常委會議決由柳無忌暫代外國語文學系及英語學系系務。[22] 不久後，柳無忌赴重慶中央大學任教。[23] 1940 年 11 月，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議決聘請陳福田為外國語文學系主任兼師範學院英語學系主任，[24] 但陳福田因教務繁忙，無法擔任該職位，因此於同年 12 月，西南聯大改聘陳福田在葉公超返校前暫代系務。[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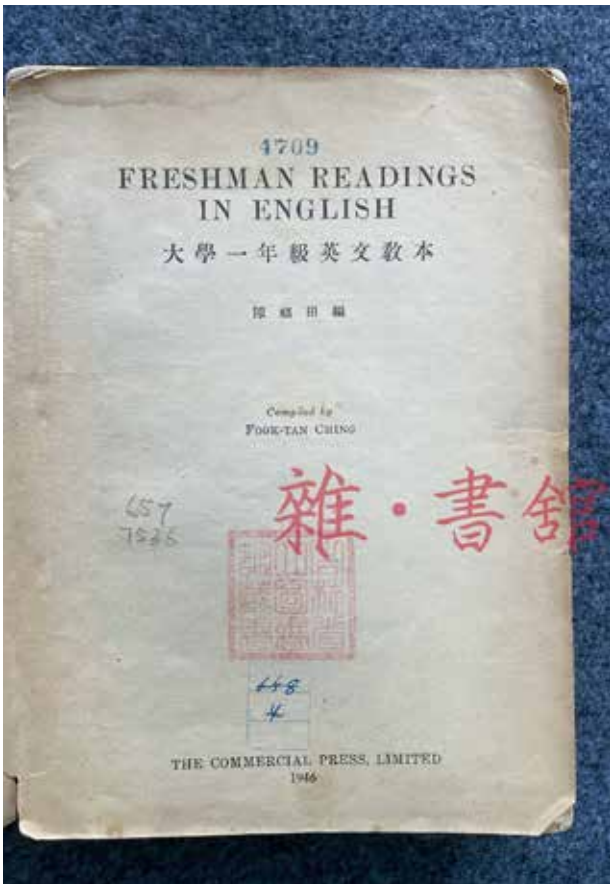


圖 1. 1946 年《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扉頁（圖片來源：北京雜・書館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1941 年 6 月，在陳福田離校期間，外國語文學系及師範學院英語學系系務由莫泮芹暫代。[26] 1944 年 10 月，莫泮芹因事離校赴美，由吳達元暫代兩系主任一職，[27] 陳福田返校後仍繼任系主任。

（二）陳福田與《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

大一英文選用的教材為時任西南聯大外國語文學系主任陳福田（Fook-Tan Ching）編寫的《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Freshman Readers in English*）。[28] 該教材初版於 1939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1942 年再版，共收錄 43 篇課文，全英文編寫，匯集中外名家的英文選文，引導學生了解東西差異，思考“學之根本”，培養家國情懷。羅選民總結了這部教材的三個特色：第一，課文選材扎根於中國社會的土壤；第二，教材所選範文立足於教育之上；第三，課本由經典構成。這些課文具有跨學科的特色，涉及文學、教育學、政治學、哲學等，且選文類型多樣，包括小說、散文、論說文、傳記等，作者包含中外大家，如胡適、林語堂、毛姆、賽珍珠、梭羅等，體現了西南聯大“通識為本，培養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29] 該課本收錄的課文可劃分為八個不同的主題類別：修身、正心、致知、名人、吾國、吾民、世界、文學，每個類別涵蓋若干篇課文，討論青年人如何修養自身（修身）；正確認識自由、民主、科學、文明等理念（正心）；探討何謂大學，何謂教育，大學教育及英語學習的目的（致知）；介紹名人軼事（名人）；認識中國與中國社會文化（吾國）和勞苦大眾之艱難（吾民）；認識英國與美國（世界）及外國短篇文學作品（文學）。

這些選文的內容頗具思辨性，既有中國作者分析中國國情與西方文明，也有外國作者分析中國文化與西方世界，既呈現知識分子等中產階層與上流人士的狀態，也描繪貧苦大眾的生活窘境。例如，胡適在《樂觀看中國》（“An Optimist Looks at China”）一文分析了中國廢除纏足、推翻君主專制、女性合法權益等等積極的變化；[30] 林語堂在《生活的目的》（“The End of Life”）一文闡述了中國人生活的藝術在於將精神價值與物質價值合一等；[31] 劍橋大學哲學家高茲沃斯・洛斯・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在《聖山》（“A Sacred Mountain”）一文提及中國人與西方人的不同：

> Where the Chinese have written poems in exquisite calligraphy, they will cover the rocks with advertisements. Where the Chinese have built a series of temples, each so designed and placed so as to be a new beauty in the landscape,

they will run up restaurants and hotels...The West talks of civilizing China. Would that China could civilize the West! [32]

［筆者譯：中國人用雅緻的書法在山石上寫詩，而西方人則在上面貼廣告；中國人在山上修建寺廟，每一處都為景觀添彩，但西方人卻經營餐館和旅店……西方總是宣稱要啟蒙中國，而我願中國也能啟迪西方。］

可見，陳福田在選文時，會將不同的視角、立場與觀點的文章都納入課本中，並非一味選取讚揚西方制度與理念或貶低中國傳統弊病的內容。這些文章往往能對某個問題提出有洞見的解析，富有思辨性。在《自由與約束》（“Liberty and Discipline”）一文中，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阿伯特・勞倫斯・洛維爾（Abbott Lawrence Lowell）認為美國大學教育的可貴之處在於人人都可從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個性發展和智性的強化，這種精神雖能讓自由原則被人尊崇，但卻未能彌補學生在學業中的懶散和鬆弛。[33]當時能考入西南聯大的學生都是各省市的精英，而該教材除了關注像辜鴻銘這樣的上層名流（第36章，毛姆《哲學家》，“The Philosopher”），也不乏描述底層貧苦人民的生活，比如農民（第1章，賽珍珠《貧瘠的春天》，“Barren Spring”）、苦力（第2章，毛姆的《負重的牲口》，“The Beast of Burden”）和縴夫（第3章，毛姆《河之歌》，“The Song of the River”）等。受工具主義影響，當前大學英語教材閱讀選文主題普遍關於自然、科技、動物、外國人文地理、環保、求職等話題，並以科普文和短篇故事為主，內容極少上升至哲學與意識形態方面的思考；教材中的人物大多是社會的中產階層人士，如教師、醫生、律師、工程師等，[34]普通勞苦大眾在英語教材中處於失語狀態。這也從側面解釋了為甚麼如今的教材內容難以為培養思辨思維和家國情懷提供土壤。

《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的結構極為簡單，僅由目錄（Contents）、文章正文、註釋與問題（Notes and Questions）三個部分構成（表二）。所有內容僅以文本形式呈現，不附圖片說明，且大部分內容只以英文書寫，僅註釋部分含極少量中文註解。它不包含現代教材中常見的前言、單元學習目標、語言活動任務、語法解析、語言練習等內容，自然也沒有“教師用書”可供參考。同時，註釋與問題並非緊附相應文章正文之後，而是置於所有課文之後，促使學生脫離對註釋的依賴，進行流暢的英文閱讀。這樣的結構設定既為任課老師提供了巨大的發揮空間和自由度，同時又對任課老師的知識儲備與教學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表二.《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內容結構

組成部分	詳細內容	形式
目錄 (pp. i–ii)	文章標題 文章作者 頁碼	僅文本（英文）無圖片
文章 (pp. 1–228)	標題 作者 全文	
註釋與問題 (pp. 229–349)	文章出處來源 文章作者介紹 文章生詞／句註釋（英文為主，少量中文） 閱讀問題	僅文本 （英文為主，少量中文註解） 無圖片

資料來源：陳福田編：《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年。

從英文要求來說，《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的難度高於當前內地大一學生普遍使用的英語教材，更接近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的C1、C2等級。鑑於大一英文是全校學生必修課程，學生的專業方向在西南聯大並不構成降低英文水平要求的理由。總體而言，大一英文的教學效果良好，各學系學生經過大一的訓練後，能借助字典閱讀本專業的英文著作，用英文撰寫實驗報告，能聽懂外籍教師英文授課課程，比如英國教師白英（Robert Payne）開設“造船工程”課，德國教師米士（P. Missh）開設“普通地質學”課，俄國教師噶邦福（J. J. Gapanovitch）開設“戰爭史”“俄國史”等課，劍橋大學生物教授李約瑟（Joseph Needham）來校演講也無需翻譯。[35]

《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並非只專注於詞句、語法知識的積累，大一英文課成為學生展開對西方思想（如自由等）思考的根源。[36]許淵沖先生在日記中總結大一學年時稱：

> 最大的收穫是人生觀的樹立。從大一英文課中，我學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從馮友蘭先生等的演講中，我又學到了東方以理化情及中和之道。把東西方結合起來，我認為自由應該是做好人好事的自由，民主應該是智者和能者的統治，人能各得其所，物能各盡其用，那就是中和之道，也就是自由民主。[37]

其在大一階段便能有如此見地，得益於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善於啟迪學生思考。

三、西南聯大英文課程教師與教學

西南聯大英文課程大師雲集，除了葉公超、吳宓、陳福田、錢鍾書、卞之琳等中國學者，也不乏知名外國學者，如前述的白英、溫德(Robert Winter)、燕卜蓀(William Empson)、吳可讀(A. L. Pollard-Urquhart)等。許多西南聯大的優秀畢業生也獲得了留校任教的機會。大師們除了教授自己擅長領域的課程外，也負責大一英文等基礎課程。

英文教師教學的風格與內容各異。葉公超先生上課說中文比英文多，對學生很嚴格，時常批評學生，喜歡提問，卻不太講解。[38]例如，某次講解詞彙的用法時，楊振寧問為甚麼有的過去分詞前用be不表示被動？葉先生不回答，反問道：“Gone are the days為甚麼用are不用have？”[39]他上課經常要求學生朗讀課文，學生念一句便能準確判斷學生來自哪個省份，同時還能通過朗讀精準指出學生的問題，例如許淵沖雖然能流利地朗讀，但葉公超指出他無法扼要點明朗誦的內容，這便是形式主義。[40]許淵沖因此認為葉先生的評價一語中的，有知人之明。除了上課，葉公超對學生的作文也十分挑剔，[41]英文考試要求同樣嚴格，一個小時考核50個生詞，5個句子，回答5個問題，同時要寫1篇英文短文，而且給分較低。[42]

錢鍾書的教學風格與葉公超十分不同。他上課只說英文，不說中文，側重課本講解，卻不提問題。[43]例如，錢鍾書講大一英文課文《一對啄木鳥》時，能用戲劇化、擬人化的方法，繪聲繪色地講述一個故事，使文章有詩意，教學富有藝術。[44]有關錢鍾書對語言藝術性的重視，許國璋曾評價：“蓋一次講課，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45]除了藝術性，錢先生不滿足於僅分析文章的表層內容，而是致力於思想上的升華，授課內容注重深度，講解時能旁徵博引，貫古通今，[46]妙語驚人，有助於提高學生的眼界。[47]比如，大一英文課講到民主時，錢鍾書提出民主的原則不適用於文學批評，文學作品的高低不能根據讀者的數量來衡量；講到“自由與紀律”一課時，錢鍾書認為自由是相對的，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了壞事，就要受到紀律制裁。錢鍾書的英文考試僅要求寫一篇英文作文，看似比葉公超簡單，卻難在題目上，如以“世界的歷史是模式的競賽”為題寫作。可見，葉公超與錢鍾書授課的側重各有不同，前者善於通過提問引導

學生思考，而後者樂於分享自己對某個問題的思考來引導學生。[48]

陳福田出生於夏威夷，畢業於哈佛大學，英語說得比中文更好，比美國教授溫德更流利，這在華人教授中十分罕見。與錢鍾書相比，他上課最重語言，注重解釋詞義，而次重內容，善用圖解分析課文，簡單明瞭。他在批改作文時，語言流利、優美、地道而內容深度不夠的作文往往得分比語言不夠流利但內容深刻的文章更高。陳福田曾評價王佐良作文“能用日常英語詞彙寫得生動活潑，既敘事，又抒情，給人以新鮮感覺”[49]。陳福田並不善於講注重內容的文學小說課，常將文學課變為語言課，佈置作業時只要求提交讀書報告，總結小說內容，而不需進行評論。[50] 他在課上也樂於向學生分享英美文化知識，在學習課文時，他要求學生先讀課文進行分析後，再對照註解，如果個人意見與註解不同，也不要盲目相信別人。[51] 陳福田對學生為人處世產生的影響更多體現在課外，例如他熱心公益，了解聯大同學生活艱苦，他便回美國募捐，設立檀香山獎學金。學生聽領導人講話沒有鼓掌時，他則批判不懂禮貌。陳福田與錢鍾書的授課方式並不能通過評判優劣而一言以蔽之，對於培養語言人才來說，語言與內容不論缺少哪一項，都無法成就許淵沖、許國璋、王佐良等語言學和翻譯界大師。他雖然是出生在美國的華僑，但十分愛國，關心時事，上課時會用英文講時事，比如中國的戰略是持久戰等等。從上述《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的編寫可知，即使他上課時側重語言勝過內容，但在教材內容的選取和編輯上面傾注了許多巧思。

吳宓的教學風格屬於一絲不苟型，寫的英文字也十分端正，許淵沖在英文書寫上深受吳宓影響。吳宓上課非常認真，甚至連學生的座位都要按學號排好。他講歐洲文學史時，通過對比拼音字和象形字解釋為甚麼不贊成中國文字拉丁化。[52] 他樂於把自己讀過的好書、見聞、對問題的思考及生活經驗與學生分享。他鼓勵學生勤於背誦，包括英詩、名著等等，講大四英文時要求學生先背一篇名著，再模仿寫一篇評論。[53] 吳宓這種鼓勵學生背誦課文的教學方式在當前英語教學語境下是不被提倡的，究其原因在於這種方式被批評太過於機械，不被歐美主流所採納，但從另一角度說，背誦本身有助於學生將一門外語內化，倘若無法將名著背誦，又何能對名著旁徵博引，如數家珍？此外，除了背誦，翻譯法也並非當前主流外語教學所提倡的教學方法，但潘家洵先生講大一英文時用翻譯法，最受學生歡迎，上課時教室裡外都擠滿了學生。[54]

除了上述幾位教師，其他英文課程的任課教師也各具特色。莫泮芹與一絲不苟的吳宓對比鮮明，偏愛散體詩，而非韻體詩，講散文從容不迫，寫英文字有如行雲流水。謝文通先生授課時側重格律知識與問題理解，但是考試卻考查學生評論能力，與授課內容關聯度小。美國教授溫德注重詩歌鑑賞，考試時通過一首學生沒讀過的詩，要求學生判斷作者是誰及為甚麼，並要求指出該作者還寫過其他哪些類似的詩句進行論證，對學生的鑑賞能力和知識面提出極高的要求。陳嘉上戲劇課時注意表情朗誦，而趙詔熊關注對戲劇結構、任務、情節、語言的分析。燕卜蓀講解莎士比亞以及大三、大四英文時，作文批改詳細，評語精闢，對作文要求嚴格，包括言之有物，觀點鮮明等，忌用華麗辭藻堆砌。[55]

由此可見，西南聯大的英文教授專長各有不同，授課風格也各有特色，其難能可貴之處是學校並沒有限定怎麼樣的教學是好的教學，因此學生能夠通過接觸不同的教授汲取不同的營養。例如，從葉公超處學會反求諸己，從錢鍾書處學會升華思想內容；從陳福田先生處提升英語語言水平；從吳宓處學得對知識一絲不苟的態度等等。同時，從上述教師的授課方式可知，只要運用得當，傳統的詩詞名著背誦、模仿及翻譯法等方法也能產生良好的效果，這也引導我們思考是否應將西方應用語言學界主流認定的標準為唯一的評判參考。

結語

本文通過梳理西南聯大英文課程內容、教材與授課方式，旨在呈現更多具體的教學細節，從中總結對今人可借鑑之處，並非為西南聯大加諸更多光環。從授課內容可知，西南聯大的英文課程，如大一英文，並不止步於對詞彙、句法的講解和拓展，其教材內容的選用以及教師的授課都注重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修身、正心、致知，正確認識中國，認識西方世界，通過文學作品感受英語語言的妙處等。教師在授課時，也不局限於文章表層內容含義，而是通過旁徵博引，引導學生思考其他問題，比如錢鍾書討論的民主是否能運用於任何情境，吳宓討論的中國文字是否應拉丁化等。這與當前大學英語選文關心環保、求職等話題的維度截然不同。此外，不同教授在平時和考試時對學生的能力考查也頗具新意，比如通過識別學生的口音讓其認識到自己發音的不足；通過增加限時內完成的任務量讓學生在提高準確率的同時也確保速度；通過一個有深度的話題考查學生的思辨和舉一反三能力；通過一首未讀過的詩，考查學生是否能從中總結出特徵推敲其作者等等。這些考查方式能從不同側面、維度和深度評測學生的能力，而當前大學英語測試雖在題型上變化多樣，比如選擇題、填空題、改錯題等等，但僅限於在形式上發生改變，其考查的維度仍然停留在淺層的認知。

此外，西南聯大的許多英文教授都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知名院校的精英人士，甚至有的是出生於美國的華僑（如陳福田），他們在祖國抗日戰爭的危難時刻仍選擇回國奉獻，而非留在國外躲避戰亂。況且彼時聯大的條件十分艱苦，教室漏雨，教授需要變賣物品、做許多兼職來維持生活。作為留學學者，他們並不倡導“全盤西化”，而是通過帶領學生認識到東西方的不同，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聯大校友的訪談、日記中可知，聯大的畢業生對西南聯大的教育充滿自信，認為這所扎根於中國土壤的大學其師資與辦學不亞於西方任何一所大學，這與近年許多學子認為的“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思想大相徑庭。作為一所“教授治校”，以教授為核心的大學，因教授們有着一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愛國之心，反映到其教材設計、教學內容、方法等方方面面，才能培養出學貫中西、心懷家國的國之棟樑。

附：本研究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材研究中心資助，同時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批准號：252500121002）。

註釋：

1.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序》，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一：總覽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 頁。
2. 常海潮：《博而返約，通而入專——西南聯大外語通識教育模式及其當下啟示》，《外語教育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20–25 頁。
3. 劉偉：《西南聯大文學學科發展史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雲南師範大學高等教育與區域發展研究院，2019 年。
4. Vivian Cook, "The Goals of ELT: Reproducing Native-speakers or Promoting Multicompetence among Second Language Users?", in Jim Cummins and Chris Davison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New York: Springer, 2007, pp. 237–248.
5. David Nunan, "The Impact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o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ESOL Quarterly*, vol. 37, no. 4 (2003), p. 589.
6. 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增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年，第 209 頁。
7. 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增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年，第 209 頁。
8. 宗璞：《馮友蘭先生與西南聯大（代序）》，載馮友蘭：《我與西南聯大》，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8 年，第 I–XVI 頁。
9.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13–114 頁。
10. 宗璞：《馮友蘭先生與西南聯大（代序）》，載馮友蘭：《我與西南聯大》，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8 年，第 I–XVI 頁。

11. 西南聯大文學院：《卷頭語》，載《西南聯大語體文示範》，重慶：作家書屋，1944 年，第 1–3 頁。
12. 《西南聯大三十四年度各院系修訂課程意見書》（1945 年 6 月），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14–115 頁。
13. 許淵沖：《序曲》，載《許淵沖：永遠的西南聯大》，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第 1–3 頁。
14. 轉引自許淵沖：《楊振寧和我》，載《許淵沖：永遠的西南聯大》，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第 250 頁。
15. 湯晏：《錢鍾書》，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 年，第 127–150 頁。
16. 李賦寧：《代序》，載 [美] 富蘭克林・斯各特（Franklin William Scott）、雅各布・謝特林（Jacob Zeitlin）主編：《西南聯大英文課：大二英文讀本》，北京：中譯出版社，2020 年。
17. 湯晏：《錢鍾書》，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 年，第 127–150 頁。
18. 參見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
19. 按：表格內容包括文學院外國語言文學系及師範學院英語系課程，不含非英語外文語種及其相關課程；部分相似課程在不同學年度名稱有所不同；若將同類課程 A、B 或上、下階段記為兩門課，總課程數量超過 80 門。
20. 參見《長沙臨時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學程表》（1937 年至 1938 年度）、《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法學院各學系必修選修學程表》（1937 年至 1938 年下學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學程表》（1937 至 1946 年度），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17–401 頁。
21.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22. 《西南聯大常委會關於柳無忌代理外國語文學系及英語學系系務的箋函》（1940 年 10 月 24 日），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教職員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6–27 頁。
23. 參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24. 《西南聯大關於聘陳福田為外國語文學系兼英語學系主任的佈告》（1940 年 11 月 16 日），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教職員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7 頁。
25. 《西南聯大關於陳福田暫代外國語文學系兼英語學系系務的佈告》（1940 年 12 月 2 日），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教職員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8 頁。
26. 《西南聯大關於莫泮芹暫代外國語文學系兼英語學系主任的佈告》（1941 年 6 月 2 日），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教職員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0 頁。
27. 《西南聯大常委會關於暫代外國語文學系及英語學系函吳達元》（1944 年 10 月 6 日），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教職員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47–48 頁。
28. 陳福田編：《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 年。
29. 羅選民：《序》，載陳福田編：《西南聯大英文課》，北京：中譯出版社，2019 年，第 1–6 頁。
30. 胡適：《樂觀看中國》，載陳福田編：《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 年，第 14–15 頁。
31. 林語堂：《生活的目的》，載陳福田編：《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 年，第 16–19 頁。
32. [英] 高茲沃斯・洛斯・迪金森：《聖山》，載陳福田編：《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 年，第 23–24 頁。
33. [美] 阿伯特・勞倫斯・洛維爾：《自由與約束》，載陳福田編：《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 年，第 86–97 頁。
34. John Gray and David Block, "All Middle Class Now? Evolving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Neoliberal Era: The Case of ELT Textbooks", in Nigel Harwood ed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45–71.
35.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36. 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
37. 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
38. 湯晏：《錢鍾書》，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 年，第 127–150 頁。
39. 許淵沖：《許淵沖：永遠的西南聯大》，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
40. 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41. 羅選民：《序》，載陳福田編：《西南聯大英文課》，北京：中譯出版社，2019 年，第 1–6 頁。
42. 許淵沖：《許淵沖：永遠的西南聯大》，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
43. 湯晏：《錢鍾書》，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 年，第 127–150 頁。
44. 陳福田編：《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商務印書館，1942 年。
45. 湯晏：《錢鍾書》，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 年，第 127–150 頁。
46. 李賦寧：《序》，載《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97 年。
47. 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
48. 許淵沖：《許淵沖：永遠的西南聯大》，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
49. 羅選民：《序》，載陳福田編《西南聯大英文課》，北京：中譯出版社，2019 年，第 1–6 頁。
50. 許淵沖：《許淵沖：永遠的西南聯大》，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
51. 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
52. 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
53. 許淵沖：《許淵沖：永遠的西南聯大》，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
54. 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
55. 羅選民：《序》，載陳福田編：《西南聯大英文課》，北京：中譯出版社，2019 年，第 1–6 頁。



文史研究

“Archaeology”之含義、翻譯與現代學術

范楨 *

摘　要 宋代金石學家已使用考古一詞，而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用“考古”翻譯Archaeology，實際暗示了來自金石學的影響。“考古”與“Archaeology”在中國與歐洲原本均指一般的歷史研究，但近代中西學術發展的不同步，導致了現代考古學從西向東的傳播。本文通過研究Archaeology的含義和翻譯的變遷，梳理我國考古學“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西根源，以及中日兩國現代考古知識的形成。

關鍵詞 考古學；金石學；翻譯；學術史；中西交流

1927年，王國維的演講《宋代之金石學》被譯成英文，[1]以“Archaeology in the Sung Dynasty”為題發表在傳教士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主編的《中國雜誌》（*The China Journal*）上。[2]該文譯者是研究歐洲史和美國史的學者劉崇鋐（1897—1990），標題中的核心詞“金石學”被譯為“Archaeology”（圖1）。譯稿出版在王國維投湖前一個月，筆者不確定這個翻譯是否得到通曉英語的王氏本人的首肯，但今天Archaeology一般被譯作“考古”和“考古學”，“金石學”則用Antiquarianism（古物學）對譯。[3]

《宋代之金石學》的翻譯，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考古學進入中國時面臨的局面，傳統金石學觀念根深蒂固，國人將二者等同。金石學的證經補史傳統，為中國考古學打下深刻的史學烙印，成為今天“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學術傳統之一。[4]學者們已注意到清末民國考古學與金石學的複雜關係，[5]但從語言角度回顧中國歷史語彙中的“考古”，尋找“考古”最初的翻譯語境，仍然有助於理解民國時期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的學術史，挖掘被遺忘的金石學遺產，加深對中國考古學的理解。

一、中國古代的“考古”一詞

《說文》釋“考”為“老也”，“古”為“故也”。二字都含有過去、古老之義。那麼“考”是何時變成動詞的？“考古”二字相連在東漢即有出現，如《漢書・郊祀志》有“考古制，而以為不宜”[6]；《太平經》有“以吾書考古今之天文地神書與人辭”[7]；《諸葛武侯文集・八陣總論》有“臣通考古今陣法”[8]；《三國志・魏書》有“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9]；杜預《春秋釋例》有“並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10]；《抱朴子外篇》有“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11]。以上均以“考”為動詞，“古”為名詞，是與“今”相對和連用的一個概念，“考古制”和“考古今之書”已類似於今天“考古”的用法。

“考古”形成一個獨立的詞語或者詞組，首先[12]出現在《水經注》中，酈道元註《水經》常常依靠實地踏查，“考古”一詞被他固定之後也多用於地理方位的考訂。如他在徵引了《史記》及應劭《地理風俗志》，並經過實地考察得出帝堯唐都的正確位置之後，評價道：

* 范楨，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宗教美術與考古。



LITERATURE & ART

ARCHAEOLOGY IN THE SUNG DYNASTY*

By Prof. WANG KUO-WEI (王國維)
(Tsing Hua College.)
Translated By MR. C. H. LIU (劉崇鋐).

Sung scholarship is notable for the quality 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of its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there we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dynasty, scholars like Liu Ch'ang (劉敞) and Ou-yang Hsiu (歐陽修), who,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the shackles of old Han and T'ang commentaries, applied new ideas to explain the classics. Later in time came the group of great thinkers, Chou Tun-i (周敦頤), Ch'êng Hao (程顥), Ch'êng I (程頤), Chang Tsai (張載), Shao Yung (邵雍), and Chu Hsi (朱熹), who made a distinctive era in philosophy. In the realm of science, men like Shên Kua (沈括), Li Chieh (李誡) and others contributed discoveries in astronomy,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technology. History was represented by Saû-ma Kuang (司馬光), Hung Mai (洪邁), Yüan Shu (袁樞), each with his monumental works. Painting was, since the time of Tung Yüan (董源), changed from the work of mere craftsmen to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scholars. In poetry there was a new emphasis on technique which distinguished it from the purely natural beauty of T'ang poetry. Similarly, archæological study, which the Sungs originated, also reached a high level of excellence in this dynasty. Thus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House of Chao reigned over China was not equalled in intellectual activity and in the variety of its manifestations by the dynasties of Han or T'ang which preceded it, nor by the dynasties of Yüan and Ming which followed it.

In many fields of modern scholarship, the Sungs sowed the first seed. Archæology is one of the subjects the beginning of which we may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Peking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222 —

圖 1.“Archaeology in the Sung Dynasty”（《宋代之金石學》英譯版）首頁（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 考古知今，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里，距中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為唐城。[13]

“驗途推邑”似乎就是酈道元“考古”的過程。同樣，考察宛城南三十里之三公城：

> 余按淯水左右舊有二溠，所謂南溠、北溠者，水側之潰。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14]

“考古”與“推地”並列同義。酈道元同樣考察了古文獻中所說的辟雍：

> 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台太學，並無辟雍處。[15]

但這裡的“考古”考察的還是古文獻，將實地考察與文獻記載相對照。他評價《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伐齊之事的註解之優劣時同樣如此：

> 左氏舍近舉遠，考古非矣。杜預之言，有推據耳。[16]

在酈道元這裡，“考古”無論是文獻考據還是實地調查，都是一種邏輯化的推理，推演古代事件或地理方位的真實情況，但他第一次將“推地”納入了“考古”的範疇中，便具有了現代考古學田野考察的部分屬性。酈道元在《水經注・序》指出：“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途之所躔，訪讀搜渠，緝而綴之。”不僅實踐了田野考察的方法，還將之與文獻考據的“考古今之書”一視同仁。於是，“考古”從《水經注》開始就變成了一個固定詞組，被頻繁使用。[17]

“考古”一詞的下一個重要發展階段是北宋。金石學的興起是北宋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隨着國家匡正禮制的需要逐漸注意到了地下出土的上古銅器和飄落野外的秦漢石刻。他們從這些吉金碑版中試圖尋找他們理想中的“三代”，其對題銘、器形、紋飾的研究，被稱之為“考古”；收錄古器物及其銘文的書則被命名為“考古圖”。除了流傳至今的呂大臨《考古圖》，據《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等記載存目，宋代以“考古”命名的書籍，還有榮氏《考古錄》十五卷、李公麟《考古圖》五卷、張孝祥《考古圖》等。[18] 但在“考古”之外，還有“博古”“集古”“稽古”“學古”“復古”“資古”等詞用作書名，它們與“考古”一樣都是動賓結構的詞組。正如呂大臨在其著作的序言《考古圖記》中所言：“觀其器，訟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19] 整篇序言稱“稽古”“好古”，而隻字未提“考古”，可見“古”的概念被強化，“古”成為一種文化想像，被文人士大夫以“考”“稽”“好”等方式建構。這也是宋代及以後金石學的普遍狀況，“古”成為一個

含有豐富文化意義的概念，而“考古”直至現代考古學傳入以前都未能形成完整的概念，只被視作“雅好”而不是“學術”。

通過以上簡單梳理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考古”一詞，大體涵蓋了文獻考據、實地考察、銘文研究、紋飾研究、器形研究等方面，而由於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一向重視文字，故以銘文研究為重。這在宋代以後的金石學尤為明顯，除呂大臨和李公麟的兩部《考古圖》和宋徽宗宮廷編纂的《宣和博古圖》以外，絕大多數的金石學著作僅收錄銘文拓片，這些傳拓甚至只是摹抄的金石學著作，與書法、印章等中國傳統藝術的創作和收藏共同構成了長達千年的學術傳統。以至於到了清代末年，羅振玉於《古器物學研究議》稱：

> 宋人作《博古圖》，收輯古器物，雖以三代禮器為多，而範圍至廣。逮後世變為彝器款識之學，其器限於古吉金，其學則專力於古文字，其造詣益精於前，而範圍則隘矣。[20]

可見，當時人們普遍忽略古文字以外的金石學。那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前輩學者是如何將西方的現代考古學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考古”，又是如何看待這兩種概念背後的學術傳統和研究方法的呢？

二、歐洲 1830 年以前的“Archaeology”

“Archaeology”一詞最早源於希臘文的“αρχαίολόγί”。該詞由“αρχαίος”（意為古代、古物或古人，事物最初的狀態）和“λόγος”（意為科學）組成，在古希臘時期泛指古代史的研究。英文的 Archaeology 大概轉換自拉丁語的“Archaeologia”或者法語的“Archéologie”，前綴“Archaeo”意為“ancient, olden, primitive, primeval, from the beginning”，其與後綴“logos”組合，意即關於古代的、原始的、最初的人和物的科學。[21] 自十八至十九世紀古物學、考古學相繼在歐洲興起之後，Archaeology 逐漸開始專指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和考古學的方法、目標和理念。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指出柏拉圖的《大希庇亞篇》最早提到了“Archaeology”的概念，希庇亞發明這個詞用來指“英雄和人的系譜、古代城邦建立的故事，簡單說來也就是那些古代傳說”，[22] 以區分“相對於歷史敘述的古代研究”；到希臘化和古羅馬時代則“被用來表示一部古代歷史作品或追溯源流的歷史”；[23] 在古羅馬學者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 116–27 B. C.）那裡和文藝復興時期，才被用來涵蓋“與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歷史觀所強調的政治與戰爭不想關的歷史題目”。[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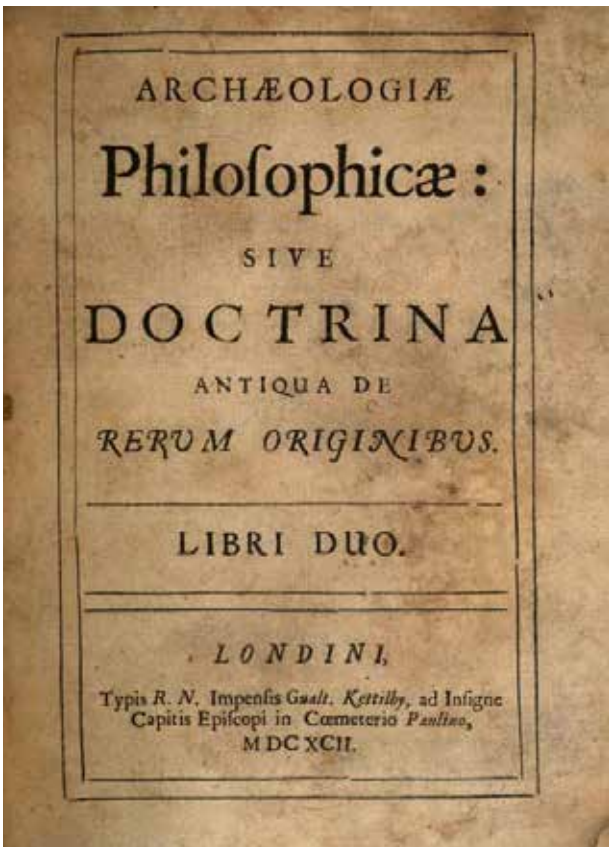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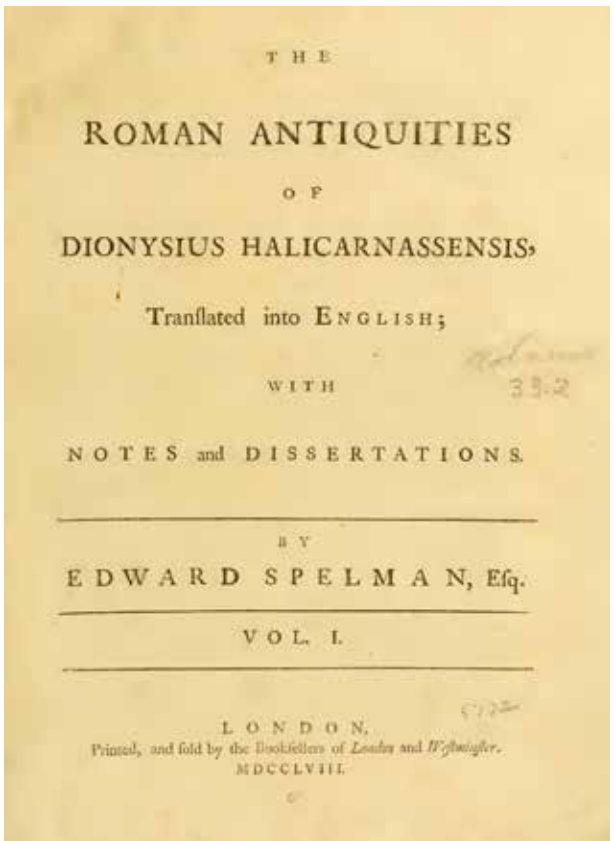

ARCHÆOLOGIÆ
Philoſophicæ :
SIVE
DOCTRINA
ANTIQUA DE
RERUM ORIGINIBUS.
LIBRI DUO.
LONDINI,
Typis R. N. Impenſis Gualt. Kettilby, ad Inſigne Capitis Epiſcopi in Cœmeterio Paulino, MDCXCII.

圖 2. 1692 年出版的《哲學考古》扉頁（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1692 年，英國神父、學者托馬斯・伯內特


THE

ROMAN ANTIQUITIES

OF

DIONYSIUS HALICARNASSENSIS,

Tranſlated into ENGLISH;

WITH

NOTES and DISSERT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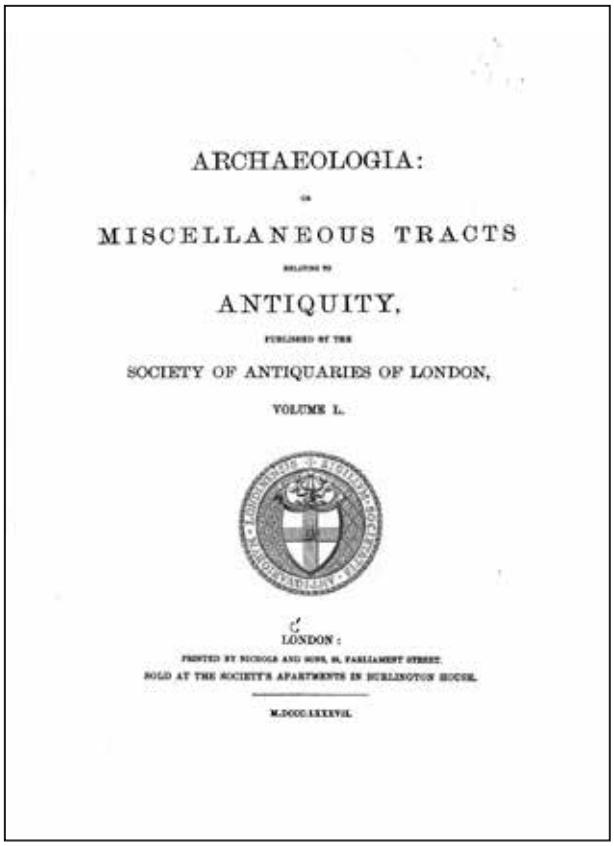
BY

EDWARD SPELMAN, Eſq.

VOL. I.

LONDON,
Printed, and ſold by the Booksellers of London and Weſtminſter.
MDCCLVIII.

圖 3. 1758 年出版的《羅馬史》英譯本扉頁（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ARCHAEOLOGIA:

OR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ANTIQUITY,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VOLUME I.

LONDON:

PRINTED BY NICHOLS AND SON, 25, PARLIAMENT STRE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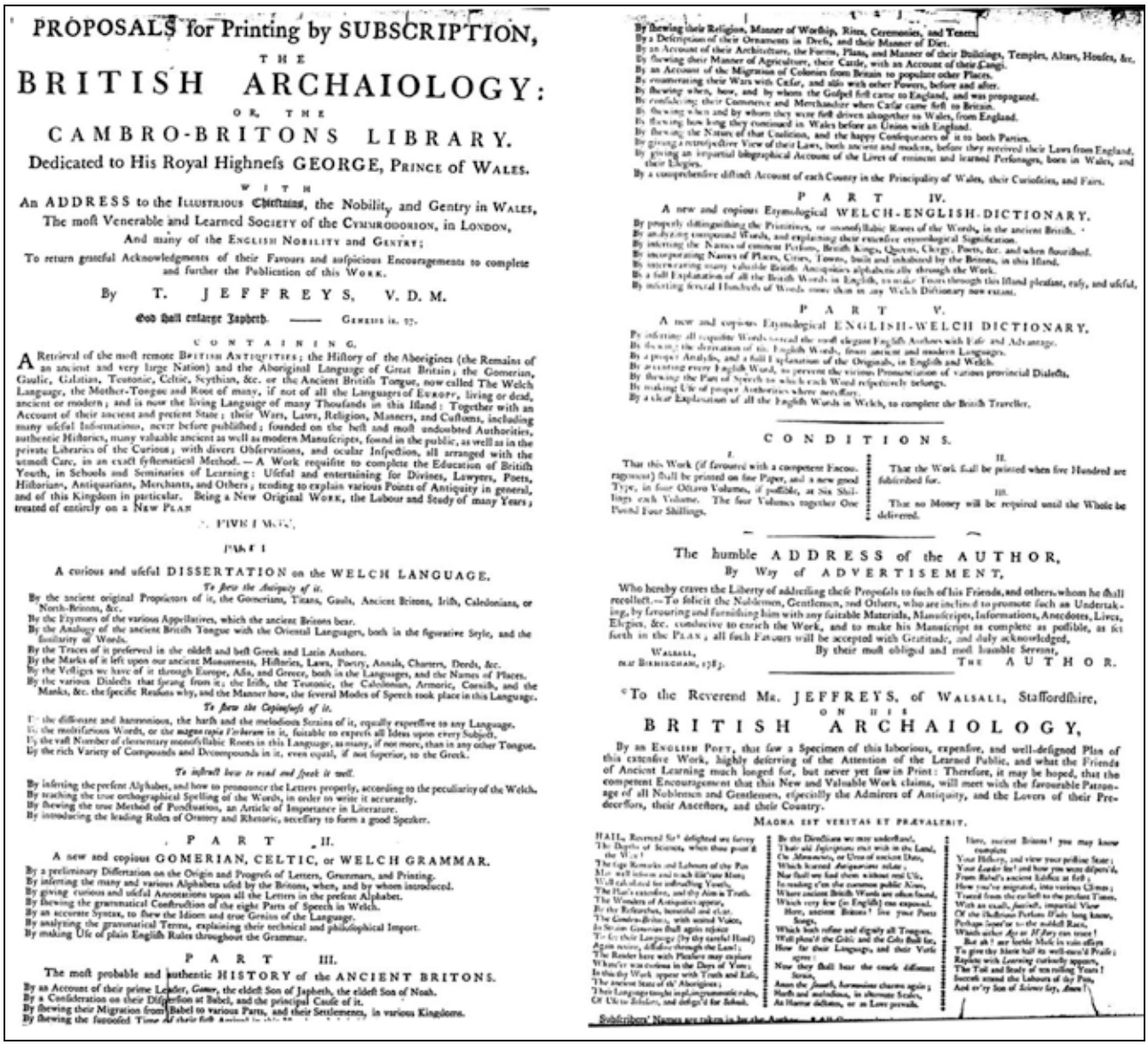
SOLD AT THE SOCIETY'S APARTMENTS IN BURLINGTON HOUSE.

M.DCCC.LXXXVII.

圖 4. 1779 年，倫敦古物研究學會出版了一本以“Archaeologia”作為主標題的書，圖為該書扉頁。（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Thomas Burnet, 1635?–1715）出版拉丁文著作《哲學考古》（*Archæologiæ Philosophicæ*，圖 2），[25] 他在書中對該詞的使用基本上與古希臘時期的本義相同，即對古代哲學的科學研究，類似於今天我們所稱的古代哲學史。1719 年，威爾士學者邁爾斯・戴維斯（Myles Davies, 1662–1715?）出版的《大不列顛雅典娜》（*Athenae Britannicae*）第四卷，使用的副標題是“對現在和過去時代學問的傳記，和目錄學特徵的考古”（*The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Characters of this Present Age and Learning, and Those of the Former Archaeology*），[26] 同樣是表示對古代進行科學研究的意思。1758 年，哈利卡爾那索斯的狄奧尼西奧斯所著《羅馬史》（*The Roman Antiquities of Dionysius Halicarnassensis*）首次被翻譯成英文，該書用古物（Antiquity）指代歷史（圖 3），[27] 其對應的希臘文原文即“αρχαιολογία”（Archaeologia）。古物學一般被認為是西方現代考古學的前身，也就是說，“古物”作為歷史見證，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人眼中幾乎等同於歷史本身。

很快地，Archaeology 一詞開始與古物學有密切聯繫。1779 年，倫敦古物研究學會（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出版的一本書使用了“Archaeologia”作為主標題（圖 4）。[28] 在威爾士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收藏的一份 1783 年的出版廣告中（圖 5），[29] 出版商為幫助詩人 T・傑



PROPOSALS for Printing by SUBSCRIPTION,

THE

BRITISH ARCHAIOLOGY:

OR, THE

CAMBRO-BRITONS LIBRARY.

Dedicated to His Royal Highneſs GEORGE, PRINCE of WALES.

WITH

An ADDRESS to the ILLUSTRIOUS Chieftains, the Nobility and Gentry in WALES,
The moſt Venerable and Learned SOCIETY of the CYMMRODORION, in LONDON,
And many of the ENGLISH NOBILITY and GENTRY;

To return grateful Acknowledgments of their Favours and auſpicious Encouragements to complete and furth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WORK.

By T. JEFFREYS, V. D. M.

God ſhall enlarge Japheth. —— GENESIS ix. 27.

CONTAINING,

A Retrieval of the moſt remote BRITISH ANTIQUITIES; the Hiſtory of the Aborigines (the Remains of an ancient and very large Nation) and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of Great Britain; the Gomerian, Gaulic, Gallatian, Teutonic, Celtic, Scythian, &c. or the Ancient Britiſh Tongue, now called The Welch Language, the Mother-Tongue and Root of many, if not of all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living or dead, ancient or modern; and is now the living Language of many Thouſands in this Iſland: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their ancient and preſent State; their Wars, Laws, Religion, Manners, and Cuſtoms, including many uſeful Inſtitutions, never before publiſhed; founded on the beſt and moſt undoubted Authorities, authentic Hiſtories, many valuable ancient as well as modern Manuſcripts, found in the public, as well as in the private Libraries of the Curious; with divers Obſervations, and ocular Inſpection, all arranged with the utmoſt Care, in an exact ſyſtematical Method. — A Work requiſite to complete the Education of Britiſh Youth, in Schools and Seminaries of Learning: Uſeful and entertaining for Divines, Lawyers, Poets, Hiſtorians, Antiquarians, Merchants, and Others; tending to explain various Points of Antiquity in general, and of this Kingdom in particular. Being a New Original WORK, the Labour and Study of many Years; treated of entirely on a NEW PLAN

PART I.

A curious and uſeful DISSERTATION on the WELCH LANGUAGE,

To ſhew the Antiquity of it.

By the ancient original Propiators of it, the Gomerians, Titans, Gauls, Ancient Britons, Iriſh, Caledonians, or North-Britons, &c.
By the Etymons of the various Appellatives, which the ancient Britons bear.
By the Analogy of the ancient Britiſh Tongue with the Oriental Languages, both in the figurative Style, and the ſimilarity of Words.
By the Traces of it preſerved in the eldeſt and beſt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By the Marks of it left upon our ancient Monuments, Hiſtories, Laws, Poetry, Annals, Charters, Deeds, &c.
By the Veſtiges we have of it through Europe, Aſia, and Greece, both in the Languages, and the Names of Places.
By the various Dialects that ſprung from it; the Iriſh, the Teutonic, the Caledonian, Armoric, Cornih, and the Manks, &c. the ſpecific Reaſons why, and the Manner how, the ſeveral Modes of Speech took place in this Language.

To ſhew the Copiouſneſs of it.

By the different and harmonious, the harſh and the melodious Strains of it, equally expreſſive to any Language.
By the multiferious Words, or the magna copia Verborum in it, ſuitable to expreſs all Ideas upon every Subject.
By the vaſt Number of elementary monoſyllabic Roots in this Language, as many, if not more, than in any other Tongue.
By the rich Variety of Compounds and Decompounds in it, even equal, if not ſuperior, to the Greek.

To inſtruct how to read and ſpeak it well.

By inſerting the preſent Alphabet, and how to pronounce the Letters properly, according to the peculiarity of the Welch.
By teaching the true orthographical Spelling of the Words, in order to write it accurately.
By ſhewing the true Method of Punctuation, an Article of Importance in Literature.
By introducing the leading Rules of Oratory and Rhetoric, neceſſary to form a good Speaker.

PART II.

A new and copious GOMERIAN, CELTIC, or WELCH GRAMMAR.

By a preliminary Diſſertation on the Origin and Progreſs of Letters, Grammars, and Printing.
By inſerting the many and various Alphabets uſed by the Britons, when, and by whom introduced.
By giving curious and uſeful Annotations upon all the Letters in the preſent Alphabet.
By ſhewing the grammatical Conſtruction of the eight Parts of Speech in Welch.
By an accurate Syntax, to ſhew the Idiom and true Genius of the Language.
By analyzing the grammatical Terms, explaining their technical and philoſophical Import.
By making Uſe of plain Engliſh Rules throughout the Grammar.

PART III.

The moſt probable and authentic HISTORY of the ANCIENT BRITONS.

By an Account of their prime Leader, Gomer, the eldeſt Son of Japheth, the eldeſt Son of Noah.
By a Conſideration on their Diſperſion at Babel, and the principal Cauſe of it.
By ſhewing their Migration from Babel to various Parts, and their Settlements, in various Kingdoms.
By ſhewing the ſucceſſive Time of their firſt Arrival in [illegible]

By ſhewing their Religion, Manner of Worſhip, Rites, Ceremonies, and Tenets.
By a Deſcription of their Ornaments in Dreſs, and their Manner of Diet.
By an Account of their Architecture, the Forms, Plans, and Manner of their Buildings, Temples, Altars, Houſes, &c.
By ſhewing their Manner of Agriculture, their Cattle, with an Account of their Langi.
By an Account of the Migration of Colonies from Britain to populate other Places.
By enumerating their Wars with Ceſar, and alſo with other Powers, before and after.
By ſhewing when, how, and by whom the Goſpel firſt came to England, and was propagated.
By conſidering their Commerce and Merchandize when Ceſar came firſt to Britain.
By ſhewing when and by whom they were firſt driven altogether to Wales, from England.
By ſhewing how long they continued in Wales before an Union with England.
By ſhewing the Natures of that Confuſion, and the happy Conſequences of it to both Parties.
By giving a retroſpective View of their Laws,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before they received their Laws from England.
By giving an impartial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Lives of eminent and learned Perſonages, born in Wales, and their Elegies.
By a comprehenſive diſtinct Account of each County in the Principality of Wales, their Curioſities, and Fairs.

PART IV.

A new and copious Etymological WELCH-ENGLISH DICTIONARY.

By properly diſtinguiſhing the Primitives, or monoſyllabic Roots of the Words, in the ancient Britiſh.
By analyzing compound Words, and explaining their exact etymological Signification.
By inſerting the Names of eminent Perſons, Britiſh Kings, Queens, Clergy, Poets, &c. and when flouriſhed.
By incorporating Names of Places, Cities, Towns, Iſlands, and inhabited by the Britons, in this Iſland.
By interpreting many valuable Britiſh Antiquities alſo through the Work.
By a full Explanation of all the Britiſh Words in Engliſh, or older Times through this Iſland preſent, eaſy, and uſeful.
By inſerting ſeveral Hundreds of Words more than in any Welch Dictionary now extant.

PART V.

A new and copious Etymological ENGLISH-WELCH DICTIONARY,

By inſerting all requiſite Words to read the moſt elegant Engliſh Authors with Eaſe and Advantage.
By ſhewing the derivation of the Engliſh Word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Languages.
By a proper Analyſis, and a full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als, in Engliſh and Welch.
By accenting every Engliſh Word, to prevent the various Pronunciation of various provincial Dialects.
By ſhewing the Part of Speech to which each Word reſpectively belongs.
By making Uſe of proper Authorities where neceſſary.
By a clear Explanation of all the Engliſh Words in Welch, to complete the Britiſh Traveller.

CONDITIONS.

I. That this Work (if favoured with a competent Encouragement) ſhall be printed on fine Paper, and a new good Type, in four Octavo Volumes, if poſſible, at Six Shillings each Volume. The four Volumes together One Pound Four Shillings.

II. That the Work ſhall be printed when five Hundred are ſubſcribed for.

III. That no Money will be required until the Whole be delivered.

The humble ADDRESS of the AUTHOR,

By Way of ADVERTISEMENT,

Who hereby craves the Liberty of addreſſing theſe Propoſals to ſuch of his Friends, and others, whom he ſhall recollect, — To ſolicit the Noblemen, Gentlemen, and Others, who are inclined to promote ſuch an Undertaking, by favouring and furniſhing him with any ſuitable Materials, Manuſcripts, Informations, Anecdotes, Lives, Elegies, &c. conducive to enrich the Work, and to make his Manuſcript as complete as poſſible, as ſet forth in the PLAN; all ſuch Favours will be accepted with Gratitude, and duly acknowledged,

WALSALL, By their moſt obliged and moſt humble Servant,
MAY BIRMINGHAM, 1783. THE AUTHOR.

To the Reverend Mr. JEFFREYS, of WALSALL, Staffordſhire,

ON HIS

BRITISH ARCHAIOLOGY,

By an ENGLISH POET, that *ſaw* a Specimen of this laborious, expenſive, and well-deſigned Plan of this extenſive Work, highly deſerving of the Attention of the Learned Public, and what the Friends of Ancient Learning much longed for, but never yet *ſaw* in Print: Therefore, it may be hoped, that the competent Encouragement that this New and Valuable Work claims, will meet with the favourable Patronage of all Noblemen and Gentlemen, eſpecially the Admirers of Antiquity, and the Lovers of their Predeceſſors, their Anceſtors, and their Country.

MAGNA EST VERITAS ET PRÆVALEBIT.

HAIL, Reverend Sir! delighted we ſurvey
The Depths of Science, when thoſe pow'rful
the Wiſe!
The [illegible] Remarks and Labours of the Pen
Muſt well inform and teach the future Men;
Will edify and inſtruct the Youth,
The Plan's excellent, and thy Aim is Truth.
The Wonders of Antiquity appear,
By the Reſearches, beautiful and clear.
The Cambro-Britons, with ſecond Vision,
In Gomerian ſhall again reſplend
To their Language (by thy careful Hand)
Again reſtor'd, diffuſive through the Land;
The Reader here with Pleaſure may explore
What's ne'er was evidenc'd in the Days of Yore;
In this thy Work appear with Truth and Eaſe,
The ancient State of th' Aborigines;
Their Language taught in plain grammatic rules,
Of Ufe to Scholars, and delight'ful for School.

Be the Direction we may underſtand,
Their old Inſcriptions muſt with in the Land,
On Monuments, or Urns of ancient Date,
Which learned Antiquarians ſtudate;
Nor ſhall we find them without real Uſe,
In reading o'er the common public News,
Where ancient Britiſh Words are often found,
Which very few (in Engliſh) can expound.
Here, ancient Britons! live your Poets
Songs,
Which both refine and dignify all Tongues,
Will plead'th Celtic and the Celtic ſhall be,
How far their Language, and their Verſe
agree:
Now they ſhall bear the cruel different
Stroke,
Amon the Fourth, harmonious charms again;
Mirth and melodious, in alternate Scales,
As Humor delivers, or as Love prevails.

Here, ancient Britons! you may know
complete
Your Hiſtory, and view your preſent State;
Your Leader he! and how you were diſperſ'd,
From Babel's ancient Kiddles at firſt;
How you're migrated, into various Climes;
Traced from the eaſtern to the preſent Times,
With an exact, fanciful, impartial View
Of the illuſtrious Perſons Fate long know,
Perhaps ſuperior to the noſted Race,
Whoſe urber Age as M'Pherſon rose!
But oh! are feeble Muſe in vain eſſays
To give the Merit half its well-earn'd Praiſe;
Replete with Learning curiouſly apparent,
The Toil and Study of ten toiling Years!
Succeſs attend the Labours of thy Pen,
And ev'ry Son of Science ſay, Amen!

Subſcribers' Names are taken in by the Author, [illegible]

圖 5. 1783 年有關“英國考古”一書的出版廣告（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佛里（T. Jeffreys）尋求出版贊助，聲稱這部名為“英國考古”（*British Archaiology*）的書包括“關於威爾士語言的謹慎、有用的論文”（A curious and useful DISSERTATION on the WELCH LANGUAGE）、“全新的、豐富的高梅語、凱爾特語和威爾士語語法”（A new and copious GOMERIAN, CELTIC, or WELCH GRAMMER）、“最可信和最權威的古代英國人的歷史”（The most probable and authentic HISTORY of the ANCIENT BRITONS）、“一部全新的、豐富的威爾士語—英格蘭語語源詞典”（A new and copious Etymological WELCH-ENGLISH DICTIONARY）和英格蘭語—威爾士語語源詞典等章節。儘管作者以研究語言、語法和歷史來達到他“考古”的目標，似乎與現在以田野發掘

為特徵的考古學毫無關係，但他在最後的慷慨陳詞中說到：

> …therefore, it may be hoped, that the competent encouragement that this new and valuable work claims, will meet with the favourable patronage of all noblemen and gentlemen, especially the admirers of antiquity, and the lovers of their predecessors, their ancestors, and their country.
>
> ［筆者譯：因此，人們期望得到足夠的鼓勵，讓這個全新的、有價值的工作，能得到所有貴族和紳士的贊助，尤其是得到愛慕古物和熱愛先輩、祖先以及家鄉的人的幫助。］

T. 傑佛里為古物收藏家而“考古”，也可能是和《羅馬史》的譯者一樣，將古物視同歷史。至少在十八世紀後半葉的英國，“Archaeology”一詞已經和古物的出土、收藏和研究聯繫在一起了。

在隨後的50年中，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出版了《古代美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丹麥國家博物館向公眾開放，湯姆森（C. J. Thomson）提出了三期說，貝爾佐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出版了《埃及和努比亞金字塔、神廟、墓葬的新發現和發掘》(*Narrative of the Operations and Recent Discoveries Within the Pyramids, Temples, Tombs and Excavations in Egypt and Nubia*)，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破解了羅塞塔碑楔形文字，考古學逐漸在歐洲被建立起來。以田野發掘為特徵的“考古”（Archaeology），逐漸與單純的歷史研究和古物收藏（Antiquarianism）區分開來。

大約是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考古學逐漸傳播到中國和日本。學界對十九世紀末考古學知識在中國的傳入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普遍認為它一方面是由西方人士翻譯、出版和介紹進入中國，另一方面則是經由日本翻譯轉換而來。包括從“Archaeology”到“考古”的翻譯，也是由日本人翻譯而直接被中國人使用的，[30] 以往的研究集中於對考古學知識的傳入進行研究，而忽視了因詞語混同而造成的概念不明，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學術史的問題。

三、十九世紀“Archaeology”在東亞的翻譯和考古學的傳入

“Archaeology”一詞，在日本最初並未被理解成現代考古學，當地的學者試圖在已有的知識中尋找對應的概念。在1874年的《廣益英倭字典》（広益英倭字典）中，“Archaeology”和“Archaeological”被譯為“古事學”，“Archaeologist”被譯為知道古事的人（古事ヲ知テ居ル人）；[31] 1881年出版的《英華和譯字典》（英華和訳字典），則將它們分別譯為“古學”和“博古者”，兩者的英文解釋分別為“學習與古代有關的事情”（learning pertaining to antiquity）和“一個精通古代的人”（one versed in antiquity），[32] 這是古物學時代對“考古”的理解。稍晚出版的《增訂英華字典》採用了同樣的中英文釋義，[33] 這一概念實際源於一位西方字典編纂者的理解，而這部字典標註的原著者是西方人“羅布存德”。

十九世紀的西方傳教士編纂了幾部重要的漢英字典，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自1815年開始編纂出版《五車韻府》（*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34]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於1847年在上海出版了《漢英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35] 以及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出版了《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36] 和《漢英韻府》(*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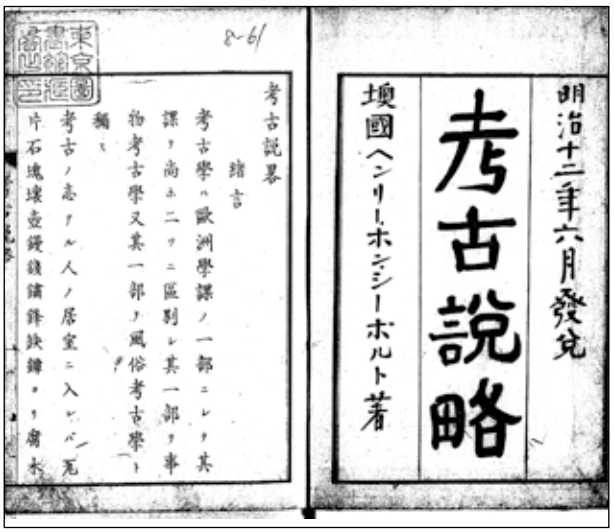


圖 6.《考古說略》扉頁（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Chinese Language）。[37] 然而，上述的字典均未收錄“Archaeology”和“考古”。前文提到的“羅布存德”（一譯“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是在香港傳教的德國籍基督教中華傳道會傳教士，他於 1866 年在香港出版了《英華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在他出版的這部字典中，“Archaeology”和“Archaeologist”可能是第一次被翻譯成了中文的“古學”和“博古者”。[38] 這些早期在澳門、香港和上海出版的漢英字典主要面向學中文的西方人，如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等，極少有中國人閱讀。許多字典又被帶到日本反覆出版，對明治時期的日本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前文提到的《英華和譯字典》和《增訂英華字典》就是對羅布存德在香港出版的《英華字典》的再版和增訂。從活動在中國、日本和東南亞的傳教士編纂的字典看來，他們當時對“Archaeology”的理解仍停留在“古物學”，還沒有在中文裡找到對應的概念。

1879 年，用日語寫作的《考古說略》在東京出版（圖 6），[39] 其作者是當時奧地利和匈牙利駐日公使館的譯員海因里希・馮・西博爾德（Heinrich Baron von Siebold, 1852–1908）。小西博爾德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醫生及日本朝鮮研究專家——菲利普・弗蘭茲・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40] 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且長期生活在日本，因此他能直接用日語寫作。小西博爾德是一名古物收藏家，他在日本收集的物品包括錢幣、藝術品和人類學資料，但他沒有參加過考古發掘，並非是一名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家。

《考古說略》是一部用日語寫就的著作，介紹了三期說、考古學的目的和方法，討論了日本與中國、朝鮮、東南亞的考古學聯繫以及日本人種的相關內容。除了文字說明，書中還引用了幾部西方考古學著作的考古遺物素描圖並附說明。[41] 小西博爾德論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是日本。[42] 此外，日本近代的第一次考古發掘是在《考古說略》出版前兩年，即 1877 年美國動物學家愛德華・摩斯（Edward S. Morse）在東京大田區發掘繩文時代遺址大森貝塚，這次發掘在《考古說略》中也有介紹。大森貝塚的發掘和《考古說略》的出版，構成了日本考古學最初的起點，即關注日本人種的來源。《考古說略》並不是一部原創性的著作，它的許多內容來自英國學者魯伯克（John Lubbock, 1834–1913）的考古學著作《史前時代》（*Pre-Historic Times*）。魯伯克是一名進化論者，他還建立了考古學的一些科學原則，並將生物分類學引入考古。在《考古說略》中，漢字的“考古”第一次擺脫了金石學或古物學，成為現代考古學的“考古”，儘管這一點仍然不為當時的東方人所理解。如為《考古說略》作序的吉田正春當時正在日本外務省供職，他在“緒言”中依然提到“嗜古癖”，認為嗜古是學者從事考古學的重要原因，這是來自金石學或者古物學的理解。隨後“考古”一詞在日本的故事就很清楚了，大批曾到歐美學習考古學或者人類學的學者歸國著書，如鳥居邦太郎的《日本考古提要》（1889 年）、細川潤次郎的《考古日本》（1889 年）、沼田頼輔的《日本考古圖譜》（1898 年）、八木奘三郎的《日本考古學》（1899 年）相繼出版，考



圖 7.《日本考古提要》扉頁（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古學在日本逐漸被建立起來，漢字“考古”一詞的含義也逐漸被明確為現在的含義。

四、二十世紀初中國的金石學與考古學

無論在中國、日本還是歐洲，“考古”或“Archaeology”一詞最初都是指一般的古代歷史研究，如果將金石學與西方的古物學等同視之，那麼就是中國更早地將“考古”用在物的研究上。歐洲以田野發掘為特徵的現代考古學興起之後，新的考古概念被傳入日本和中國。從古代研究、古物研究到考古學，“Archaeology”一詞在西方的含義和用法的變化有一個清晰的學術發展線索，但“考古”一詞在東方卻沒有。受到西方的影響，十九世紀末中國文人和學者的世界中突然出現一類全新的知識，並且與舊有的金石學知識使用了相同的概念——“考古”。多數學者並不能釐清這其中的區別，而一般民眾的認知誤區，也一直持續到現在。

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1896 年）收錄了鳥居邦太郎的《日本考古提要》（1889 年），[43] 但他可能並未仔細閱讀，更未向世人推薦過。該書的英文名即“The Outline of Japanese Archaeology”（圖 7），作者鳥居邦太郎為東京人類學會會員。至少此時的日本學界，已將“考古”一詞用於現代考古學，但康有為和他的朋友、學生、後輩卻並不知曉，如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略例》稱：

> 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於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44]

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第七節“有史以前之時代”，專門介紹了史前“三期論”：

> 據此種學者所稱舊新兩石刀期，其所經年代，最為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作耒耜，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45]

康梁均已接觸到了西方現代考古學，發現了史學研究的新前景，卻還未認識到這是一個全新的學科。今天人們常稱羅振玉、王國維、馬衡、郭沫若等是考古學家，但實際上他們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學者，而是金石學家。1927 年，王國維在清華大學的同事劉崇鋐，仍將金石學譯為 Archaeology。[46] 上世紀三十年代，郭沫若在日本撰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用金文文獻解釋中國社會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雖然他聲稱受到了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 1835–1910）《美術考古一世紀》的影響，[47] 但還是更多地使用了金石學以及歐洲漢學傳統的文獻考訂的研究方法。此外，《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重視銘文，書中的拓片有放大的圖版，器物分類多依靠銘文，其所徵引的文獻亦主要是歷代金石學著錄，類型學和層位學等現代考古學研究方法在其中的痕跡並不多。[48]

對現代考古學更為深入的理解來自當時的

留日學生。1902 年，留日學生汪榮寶在《史學概論》中編譯了坪井九馬三、浮田和民、久米邦武等日本學者的著作，他在第五節“關於史學之學科”中，將考古學與語言學、古文書學、地理學、年代學、系譜學、古泉學並論，視之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並作出了如下界定：

> 一般所謂考古學者，常分為書契以前與書契以後之兩部……自史家之眼觀之，則書契以前尚為無史之時代，以關係較少，無待深求。從而史學上所謂考古學者，其意味必為書契以後之考古學。[49]

汪榮寶認為考古學有兩種，一種是無文獻的考古學，一種是有文獻的考古學，即歷史時期考古。1903 年，李浩生翻譯並出版了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其對考古學有以下介紹：

> 人事則不然，藉令為幾千萬年前之事，但使痕跡不滅，則此事之原動力有可推而知之者。此所以考古學及人類學雖等於地質學，而實較地質學為有興味也。

此外，該書還提出了考古學的優勢：

> 然至近時，則更以遺物及紀念物為資料，而歷史始腳踏實地，駸駸有進步之盛運矣。[50]

可見，留學生自日本翻譯而來的考古學，其內涵已經是現代的考古學。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是一種未經反思的翻譯。他們在介紹考古學的時候，並未意識到考古學與中國原有的金石學的關係。

較早地將考古學與金石學進行對比的是著名報人及人類學家蔣觀雲。他於 1903 年發表了《世界最古之法典》一文，介紹《漢謨拉比法典》的發現，並在文末以“記者曰”的形式評論了西方現代考古學和我國的金石學：

> 今西洋學者，非獨發明新學理也，於古昔之事，被其發明者甚多，然皆從事跡實驗得來，與我國學者從紙片上打官司，斷斷不休，蓋有異矣。我國人以考古自尊，容詎知考古之事亦不能不用新法，而後可謂之真考古。若僅抱一部十三經，仰屋鑽研，以為古莫古於是矣，則真河伯之見也。[51]

蔣觀雲已認識到考古學與金石學，一個是實驗，一個是考據。1905 年，劉師培指出我國金石學缺少田野考古：

> 惜中國不知掘地之學，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遺物。[52]

此後的中國學術界逐漸意識到考古學的重要性，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國尋求考古學的發展。除留學歐美的李濟、傅斯年、梁思永、夏鼐在中國進行田野考古實踐外，更有趣的是一些並無留學背景的金石學學者試圖將二者結合，將吉金、碑版、璽印、簡牘、甲骨等研究都納入到考古裡來，以考古學之名，行金石學之事。

1922 年，馬衡受聘為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1924 年，研究室被改組為北京大學考古學會；1926 年，學會又與東京大學、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合作成立東方考古學協會。[53] 儘管後世稱馬衡為考古學家，但梳理他在這一時期的活動後，卻不難發現其學術雖受到日美考古學發展的影響，且曾參觀日本各處的博物館和東亞考古學會在朝鮮的幾次發掘，但他所做的努力均是金石學式的。例如他在 1922 年聘郭玉堂為河南採訪員收集古物；1925 年收購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拓片一萬兩千餘種；在北大講授“金石學”課程，框定金石學的定義及其與史學的關係，分述銅器、石刻、石經、度量衡等。本質上，馬衡還是一個金石學家。1930 年，馬衡組織發掘燕下都老姥台遺址。從發掘報告來看，[54] 除了遺址測繪圖和發掘品繪圖以外，幾乎與現在的發掘報告無異，然而，該報告卻未見完整的工作流程；考古隊能辨別建築構件，卻不能準確描述方位、大小；

同時，由於燕下都是歷史時期的遺址，馬衡花費了一大半的篇幅專注在歷史文獻中尋找發掘的依據。[55]

另一位通常被認為是考古學家的學者衛聚賢，著有《中國考古學史》等書。[56]衛聚賢畢業於清華研究院，受業於梁啟超、王國維、李濟等名師。他醉心於上古史，將統計學方法應用於《左傳》研究，頻繁參與考古調查和發掘，但因頻出怪論，不被老師李濟承認。[57]《中國考古學史》一書雖嚴格將考古與“玩古”分開，詳敘考古調查和考古報告、圖錄、展覽的流程、規範，但接下來他根據《春秋》《國語》等關於鼎、墳、銘文的隻言片語，將考古學史上推到東周，不僅把考古學與金石學混淆，也將禮制制度和學術研究混淆。隨後，衛聚賢又大談孔子、韓非、呂不韋的考古和漢晉唐宋元明的考古，皆是簡單的文獻對應。雖然他用現代考古學的理論方法來統攝後面對中國考古學史的敘述，但在衛聚賢的眼中，考古變成一種寬泛的學問，任何研究只要涉及到了現代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或方法，都被其認為是考古。

然而，從沒有人將考古學納入金石學。在近代外族入侵、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大批中國學者從西洋和東洋引進各種可增強民族自信，以此與西方平起平坐的科學知識。“科學至上”的思潮一時間使得國學式微。比照西學，國人也開始提倡國學，但國學並不排斥西學的內容，如《國粹學報》宣稱：“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特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58]在這樣的學術史脈絡裡，疑古思潮興起，加上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發表“中國文化西來說”，考古學逐步在中國建立起來，而金石學則在這次角逐中敗下陣來。二十世紀以後重要的金石學家，從學問最為龐雜廣大的羅振玉開始，如容庚、楊樹達、施蟄存、羅福頤等，其研究關注的範圍逐漸縮小，到羅福頤的晚年就只關注璽印之學了。可見，金石學在當代教育和學術體系中逐漸失去了自己的位置。

容庚受業於羅振玉，後入北京大學國學門，畢生致力於金石學研究。上世紀三十年代，容庚即完成了兩部集歷代金石學成果之大成的《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商周彝器通考》的上編論銅器的原起、發見、類別、時代、銘文、花紋、鑄造、去鏽、拓片、仿古、辨偽和收藏、著錄，下編則按功能對銅器進行論述。該作實際已引入了現代考古學的諸多方法，如對饕餮紋的論述，即有考古類型學型式分析的痕跡，[59]但全書卻隻字未提考古學，容庚一生中的其他著述對考古學亦所提甚少。其弟子後學攜着金石學的學術傳統，部分研究金石、甲骨、簡帛，研究文字者稱為古文字學家；部分研究器形、紋飾者則被稱為文物學家、鑑定家、藝術史家，世間已無金石學家之名。中國考古學雖然還有着極強的證經補史的傾向，[60]但金石學仿佛已然是上一個時代的學問，僅存於學術史中。

小結

回顧中西之間的金石學和考古學詞源、概念到學術的發展史，可見現代考古學對古物學、金石學的更新在東西方之間的“時差”並不大。事實上，從前文對“Archaeology”現代概念的回顧，可以發現其在西方的發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同樣經歷了一個從古典到現代的概念演化過程，其中的“能指”與“所指”交替前進，最後才有了現在被大家所認識的“考古”概念和考古學。十九世紀的歐洲人從古物收藏和田野發掘中總結出現代考古學的原則、方法，在幾十年後便被東方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理解、接受和應用；與此同時，西方學者也在世界各地進行考古實踐，是東西方的共同實踐才有了今天考古學的樣貌。儘管“現代”考古學首先起源和傳播於西方，但與其說是“西學東漸”，不如說是拋磚引玉。西方首先啟動了現代考古學的形成，但東方何嘗不是在主動尋求從傳統到現代的更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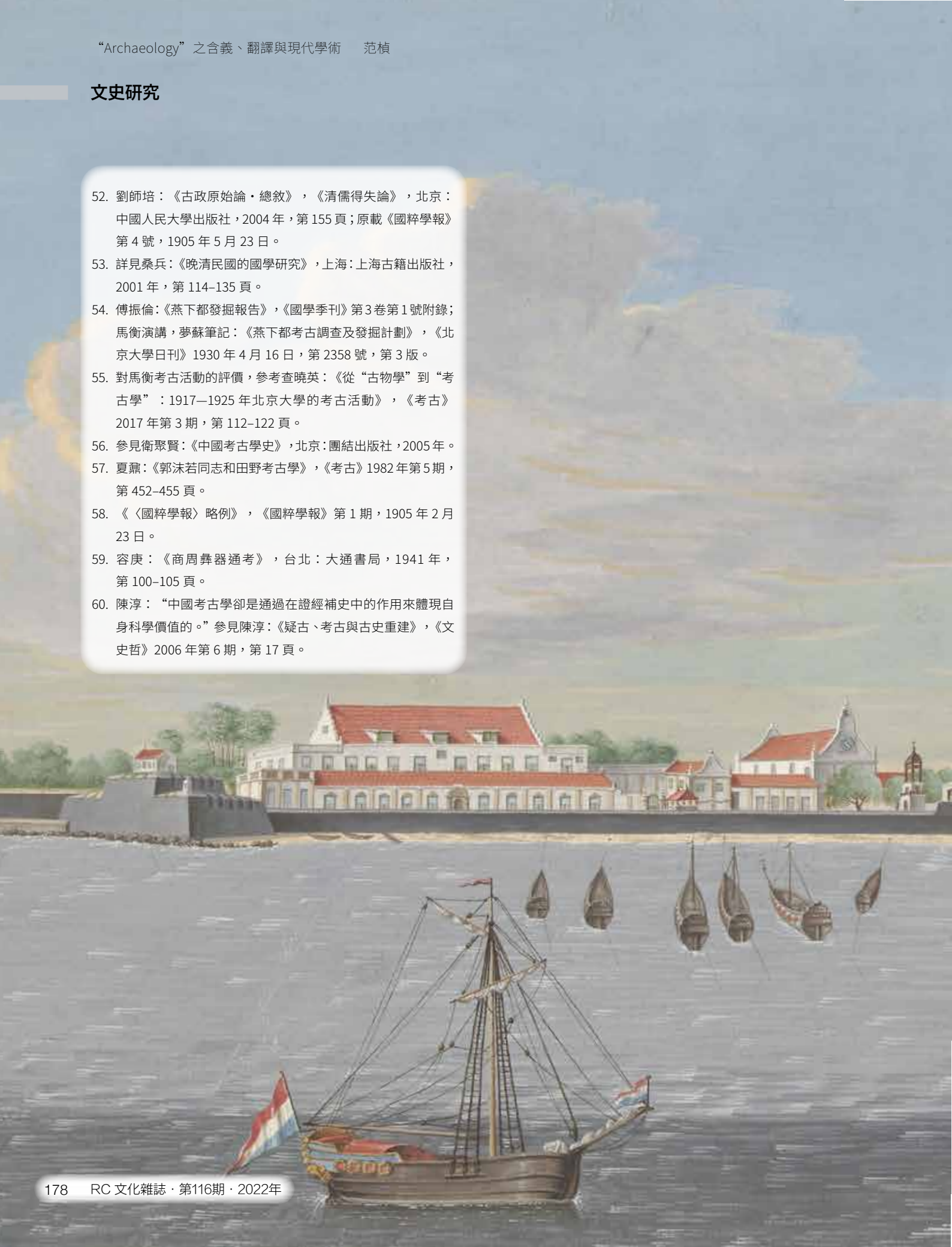
從這個角度而言，可以說金石學的式微並非是中國傳統學問面對西方學術的落敗，而是向“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現代更新。

註釋：

1. Wang Guowei, "Archaeology in the Sung Dynasty", Liu Chonghong trans., *The China Journal*, vol. 6, no. 5 (1927), pp. 222–231.
2. 詳細介紹見李天綱：《導論》，載上海圖書館編：《中國雜誌（1923—1941）導論總目》，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1–37 頁。
3. 金石學與歐洲的古物學亦不能完全等同，郭沫若認為中國的金石學大約可等於西方的記銘學（Epigraphy）。參見郭沫若：《我與考古學》，《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 10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年，第 6 頁。
4. 參見習近平：《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求是》2020 年第 23 期。劉慶柱指出中國特色考古學的四大特徵是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的結合，形成於民族危亡關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佐證中華文明國家認同與家國同構的文化基因，見劉慶柱：《中國特色考古學解讀：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之思考》，《考古學報》2021 年第 2 期，第 161–176 頁。
5. 參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學思想在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 4 期，第 107–111 頁；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年，第 1–62 頁；徐玲：《留學生與西方考古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4 期，第 6–9 頁；李孝遷：《西方考古學“三期論”傳入考》，《學術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11–117、160 頁。
6. 《漢書》卷 25 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 1255 頁。
7.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卷 96“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421 頁。
8. [三國蜀] 諸葛亮：《諸葛武侯文集》卷 2，四庫存目叢書集部 003 冊影印清康熙十三年萬卷堂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第 49 頁。
9. 《三國志》卷 4，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37 頁。
10. [西晉] 杜預：《春秋釋例》卷 10，文淵閣四庫全書 014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66 頁。
11. 楊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箋》卷 3，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118 頁。
12. 管輅所著的《管氏指蒙》有“但景純失於考古，遂至迷惑”句，但一般認為此書是宋人託名所作。參見 [三國魏] 管輅：《管氏指蒙》卷上，續修四庫全書 10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80 頁。
13. [北魏] 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287 頁。此句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有引用，《帝王世紀》成書稍早，可能為後世摻入，參見黃永年主編：《帝王世紀・山海經・逸周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2 頁。
14. [北魏] 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728 頁。
15. [北魏] 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402 頁。
16. [北魏] 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626–627 頁。
17. 如《魏書・樂志》有“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句，參見《魏書》卷 109，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837 頁；又，[唐] 竇臮《述書賦》有“嘗考古而閱史，病賤目而貴耳”句，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 年，第 238 頁。
18. 楊殿珣、容庚：《宋代金石佚書目》，《考古》1936 年 4 期，第 205–228 頁；葉國良：《宋代金石學》，台北：台灣書房，2011 年，第 52–59 頁。
19. [北宋] 呂大臨：《考古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077，濟南：齊魯書社 1997 年，第 615–616 頁。
20. 羅振玉：《古器物學研究議》，北京：《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第 215 號。
21. 《牛津英語大辭典（簡編本）》，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111 頁；夏鼐：《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年，第 1 頁。
22. [古希臘] 柏拉圖著，王曉朝譯：《大希庇亞篇》，《柏拉圖全集・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2 頁。
23. [意] 莫米利亞諾著，馮潔音譯：《現代史學的古典基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79 頁。
24. [意] 莫米里亞諾著，張強譯：《歷史與傳記》，載 [英]M. I. 芬利主編：《希臘的遺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19 頁。
25. Thomas Burnet, *Archæologiæ Philosophicæ: Sive Doctorin Antiqua de Rervm Originbivs*, Londini: Kettilby, 1692.
26. Myles Davies, *Athenæ Britannicæ: Or, the Critical News, and Parallels of Miscelanies. With the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Characters of This Present Age and Learning, and Those of the Former Archæology*, vol. 4, London: s. n., 1719?.

27.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The Roman Antiquities of Dionysius Halicarnassens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Notes and Dissertations*, Edward Spelman trans., London: Bookfellers, 1758.
28.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Archaeologia: Or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Antiquity*, London: Nichols and Sons, 1779.
29. T. Jeffreys, V. D. M., "Proposals for Printing by Subscription, the British Archaiology", Birmingham: s. n., 1783. See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link.gale.com/apps/doc/CB0129530400/ECCO?u=fudanu&sid=bookmark-ECCO&xid=03fec4e0&pg=1. Accessed 14 August, 2021.
30. 參見李孝遷：《西方考古學“三期說”傳入考》，《學術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12 頁。
31. [日] 鹿田等編：《廣益英倭字典》，金澤：大屋愷敍等，明治七年（1874 年），第 41 頁，日本國會圖書館藏，dl.ndl.go.jp/info:ndljp/pid/903009，2021 年 8 月 14 日。
32. [日] 津田仙：《英華和譯字典》，東京：山內輹，1881 年，第 131 頁，日本國會圖書館藏，dl.ndl.go.jp/info:ndljp/pid/994993，2021 年 8 月 14 日。
33. [德] 羅布存德著，[日] 井上哲次郎訂增：《增訂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氏（J. Fujimoto），1883 年，第 52 頁，日本國會圖書館藏，dl.ndl.go.jp/info:ndljp/pid/994614，2021 年 8 月 14 日。
34. [英] 馬禮遜：《五車韻府》，澳門：東印度公司（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1823 年。
35. [英] 麥都思：《漢英字典》，上海：墨海書館（The Mission Press），1847 年。
36. [美] 衛三畏編譯：《英華分韻撮要》，廣州：羊城中和行（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清咸豐六年丙辰（1856 年）刻本。
37. [美] 衛三畏編譯：《漢英韻府》，上海：滬邑美華書院（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清同治六年（1889 年）銅板刻本。
38. Wilhelm Lobscheid,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6, p. 79.
39. [德] 海恩里希・馮・西博爾德（ヘンリー・ホン・シーボルト）：《考古說略》，明治十二年（1879 年）6 月，日本國會圖書館藏，dl.ndl.go.jp/info:ndljp/pid/768284，2021 年 8 月 14 日。小西博爾德同時還出版一部英文著作介紹日本的考古發現，見 Heinrich von Siebold*, Notes on Japanese Archaeology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one Age,* Yokohama: Typography of C. Levy, 1879. books.google.com/books?id=DNY-AAAAYAAJ. Accessed 31 October, 2022.
40. 詳細介紹可參看陳輝：《西博爾德與朝鮮語》，載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 15 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 222–228 頁。
41. John Lubbock, *Pre-Historic Tim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5; Louis Figuier, *Primitive Man*,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1870; William Boyd Dawkins, *Cave Hunting: Researches on the Evidence of Caves Respecting the Early Inhabitants of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74.
42. 詳見 [日] 平田健：《H. V. 西博爾德著〈考古說略〉與明治時期的日本考古學》（H. V. シーボルト著『考古説略』と明治期の日本考古學），《明治大學圖書館紀要》（明治大學図書館紀要）2008 年第 12 期，第 193–156 頁。
43. [日] 鳥居邦太郎：《日本考古提要》，東京：文會社，明治二十二年（1889 年），日本國會圖書館藏，dl.ndl.go.jp/info:ndljp/pid/770725，2021 年 8 月 14 日。
44. 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 3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31 頁。
45.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625 頁。
46.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謝維亮、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14 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315-321 頁；Wang Guowei, "Archaeology in the Sung Dynasty", Liu Chonghong trans., *The China Journal*, vol. 6, no. 5 (1927), pp. 222–231.
47. 郭沫若：《序美術考古一世紀》，《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 10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年，第 20 頁。
48. 相關評價可參考高蒙河：《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學家》，《考古好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頁。
49. 衮父：《史學概論（續前稿）》，《譯書匯編》第 2 年第 10 期，1902 年 12 月 27 日，第 78 頁。
50. [日] 浮田和民著，李浩生等譯，鄔國義編校：《史學通論四種合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104、106 頁。
51. 蔣觀雲：《世界最古之法典》，《新民叢報》第 33 號，1903 年 6 月 9 日，第 21–22 頁。

52. 劉師培：《古政原始論・總敘》，《清儒得失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155 頁；原載《國粹學報》第 4 號，1905 年 5 月 23 日。
53. 詳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14–135 頁。
54. 傅振倫：《燕下都發掘報告》，《國學季刊》第 3 卷第 1 號附錄；馬衡演講，夢蘇筆記：《燕下都考古調查及發掘計劃》，《北京大學日刊》1930 年 4 月 16 日，第 2358 號，第 3 版。
55. 對馬衡考古活動的評價，參考查曉英：《從“古物學”到“考古學”：1917—1925 年北京大學的考古活動》，《考古》2017 年第 3 期，第 112–122 頁。
56. 參見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年。
57. 夏鼐：《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學》，《考古》1982 年第 5 期，第 452–455 頁。
58. 《〈國粹學報〉略例》，《國粹學報》第 1 期，1905 年 2 月 23 日。
59.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台北：大通書局，1941 年，第 100–105 頁。
60. 陳淳：“中國考古學卻是通過在證經補史中的作用來體現自身科學價值的。”參見陳淳：《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 年第 6 期，第 17 頁。





書籍評論

作為全人教育與知識整合平台的書院
——兼評《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念：澳門大學的探索》

龔映雪 * 黃承發 **

摘　要 住宿式書院日漸成為全球高等教育的潮流。澳門大學作為亞洲最大規模的書院教育機構，經過多年努力，為大中華地區乃至全球書院教育做出了積極的探索。《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念——澳門大學的探索》一書正是對澳大過往十餘年書院教育模式的經驗總結。本文利用該書出版之際，一方面對該書的內容作出述評，另一方面也對住宿式書院在全人教育中的積極作用作進一步闡明。在澳大，書院既是全人教育的載體，又是知識整合的平台。書院通過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心、全球競爭力、知識整合能力、團隊協作、服務與領導、文化參與以及健康生活七大勝任力，成為澳大本科教育中推動融合專業、通識、社群與研習教育的重要力量，是澳大“四位一體”教育理念的載體。

關鍵詞 澳門大學；住宿式書院；全人教育

一、緣起

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方興未艾，眾多大學都在因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積極探索高等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大學是一個社會發展的縮影，它既受到其所處社會環境的推動和制約，又反過來形塑着其所處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社會環境。大學目標在於培養人才，而對於人才內涵的認知和培養人才的手段則又因時、因地而異。澳門大學（以下簡稱澳大）作為一座剛過不惑之年的高等院校，受惠於澳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施，近年來銳意進取，其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在服務澳門、國家與人類社會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並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在人才培養方面，澳大強調全人發展，通過融合專業、通識、研習及社群教育，踐行“四位一體”的人才培養理念。而在本科教育中，住宿式書院成為全人教育的重要載體。由澳大校長宋永華、前副校長蘇基朗以及副校長辦公室主管黃兆琳博士所編輯的《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論：澳門大學的探索》（以下簡稱《書院》）一書，為澳大過去十年來推行住宿式書院教育進行了經驗總結，以期在此基礎之上繼續揚帆遠航。

澳大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為該書舉行線上發佈儀式，並邀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共同舉行住宿式書院教育論壇。本文根據該書的內容以及論壇中對住宿式書院的進一步探討來總結澳大的探索經驗。《書院》一書分為三大部分，中英文對照、圖文並茂地詳述着澳大通過住宿式書院，在本科全人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探索。我們使用詞頻分析軟件“微詞雲”對《書院》一書進行分析，統計書中最常出現的關鍵詞（圖 1）。關鍵詞分析可以挖掘文本的焦點，從而反映出書的主旨。統觀此書，我們發現書中最常出現的四個關鍵

* 龔映雪，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副院長；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 黃承發，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代院長；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副教授。

表一.《書院》一書中使用頻次最高的30個關鍵詞（單位：次）

書院	297	專業	35	重要	23
教育	191	傳統	32	品格	22
學生	146	服務	30	教學	22
住宿	115	成果	29	公民	21
大學	91	項目	29	制度	21
學院	63	社群	24	團隊	20
社會	45	成為	24	作為	20
學術	45	能力	23	培養	20
知識	40	提供	23	哈佛	20
文化	38	生活	23	育人	2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詞及其頻次依次為：書院（297 次）、教育（191 次）、學生（146 次）和住宿（115 次），這些高頻次關鍵詞正反映出此書的主旨（表一）。

二、全人教育的三個傳統

澳大推行其本科全人教育的理念，有着重要的三個傳統。《書院》一書的第一部分（第一、二章），對這個三個傳統進行了系統的梳理。第一是中國自先秦以來，尤其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教育中，強調德才兼備的傳統。中國傳統教育，多以儒家經典及三綱五常知識為基礎，兼通文史，涉獵子學，內容涵括“哲學、數理、農務、貨殖、技藝、營造等所謂百家之學”。[1] 優秀的傳統知識人多“通才博識，為官則通經致用，經世濟民；鄉居則習律行醫，修樑築堰，教化興學，和合鄉里”。[2] 儒家經典《大學》中所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成為傳統知識人為學的目標。北宋大家張載所述傳統知識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為德才兼備傳統教育所追求的目標的註腳。第二是西方教育源自於古希臘和羅馬培養德智兼備人才的傳統。這一傳統旨在通過以“文法、邏輯、修辭、天文、算術、幾何、音樂”七藝為主體的博雅教育，培養通博而有能力探索宇宙人生真理的德智雙全的人才。[3] 這一目標即是我們今天所追尋的全人教育的目標。第三是自上個



圖 1.《書院》一書詞頻圖（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以哈佛、耶魯為代表的全球住宿式書院運動而推動博雅教育的傳統。雖然博雅教育的理念根植於現代大學的先驅者（如牛津、劍橋），這一理念在現代社會受到因研究型大學崛起造成的重研究而輕教學、道德相對主義造成的知識和品格分家，以及高等教育大眾化而導致的就業壓力的三重衝擊而逐漸式微。[4] 但是，重技能而輕品德的高等教育畢業生越來越為社會所詬病。於是，二十世紀後期的高等教育又再次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住宿式書院則被全球眾多大學所採用，通過其博雅教育的理念來培養德才兼備的大學畢業生。以香港中文大學為例，其住宿式書院在 1963 年建

校開始的崇基、新亞和聯合三個書院基礎之上，於 1986 年增添了逸夫書院，並於 2012 年再增加五個住宿式書院，讓全校近一半的本科生在書院中接受部分通識教育和品格教育，以期達到全人發展的目標。在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在內的一流高校近年來也在以不同的形式探索和推廣住宿式書院的教育模式。以清華大學為例，其在 2016 年成立了第一個住宿式書院的基礎之上，再於 2020 年增添了五個書院，讓全校四分之一本科生通過書院模式接受教育。

三、從無到有：住宿式書院在澳大全人教育中的實踐

《書院》第二部分（第三至六章），系統介紹了澳大住宿式書院從無到有建立的過程。澳門因其地域狹小，大學校園空間極為有限，無法為學生提供住宿安排，加之澳門交通便捷，這兩個因素使得絕大部分澳大學生在 2014 年之前都住家走讀。在一國兩制的支持下，毗鄰澳門的橫琴為澳大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2009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澳大在廣東省的橫琴島建設新校區，並授權由澳門法律實施管轄。澳大於 2014 年搬入新校園，結束“有校無園”的歷史，成為澳門高等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澳大利用新校園充足的空間條件，建立起十個住宿式書院，以期全面提升其本科人才培養模式。隨着新校園十個住宿式書院相繼投入使用，澳大由一所走讀型大學蛻變為亞洲最大規模的住宿式書院型大學。目前，每年近五千名本科生通過書院系統來接受全人教育。書院不僅提供了住宿空間，更成為一個全面育人的空間。在新的條件下，澳大對本科教育確立了“四位一體”的教育模式，即學生通過融合專業、通識、研習和社群教育，達至成為一位品學兼優、德才兼備、有心有力的良好公民。在此教育模式中，學院負責起專業、通識與研習教育，而書院則重點承擔起了社群教育。在新的教育模式中，學生的社群教育與品格培養主要通過以下三種互動模式進行。第一，學生和四位全職學術人員，包括院長、副院長以及兩名導師共同居住在書院，通過師生同宿共膳和耳聞目染的方式對學生進行全人教育。第二，學院的教師同時兼任書院的非住宿導師的角色，以書院為平台，通過學術、通識類的講座以及提供一對一的學業和生活指導等活動，在課堂之外的互動中為學生提供受教育機會。在此安排下，書院住宿和非住宿導師總數與學生比例約達到 1：10。第三，同學之間的同伴教育。一方面，不同專業的同學被隨機分配到各書院中，跨專業的交流可以在同宿共膳等日常生活中得以進行；另一方面，書院以及學生團體組織的各種活動為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提供了平台。《書院》的第四章記錄了 23 位同學分享的住宿式書院對他們在澳大所受全人教育的積極體驗；第五章則是用圖片來展示了書院所提供的一流設施，如圖書館、臥房、研習室、靜思室、洗衣房、茶水房間、食堂、課室、小講堂、會議室、會客室、健身房、音樂室、攝影棚、咖啡座、廚藝室、休息室等；第六章則是用圖片記錄了書院為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領導能力與服務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健康生活五大能力而開展的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

四、從有到優：作為知識整合平台的書院

2014 年，澳大全面實施書院教育，第一批畢業生於 2018 年畢業。從 2019 年開始，書院在總結前期經驗的基礎上，致力於完善其教育模式，從草創階段的 1.0 版優化成現階段的 2.0 版。在書院 1.0 版所強調的全球競爭力、團隊協作、服務與領導、文化參與和健康生活五大能力基礎之上，書院 2.0 版增加了兩個培養目標，即公民責任心和知識整合能力。澳大住宿式書院新的七個方面的培養目標被統稱為“七大勝任力”（圖 2）。《書院》一書的第三部分（第七到十章），詳述了書院 2.0 版的理念、方法以及評估機制。

第七章論述了書院優化 2.0 版的動機。一方面，在澳門特區政府培養既愛國愛澳又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的期許下，澳大明確了培養人



圖 2. 澳大住宿式書院 2.0 版人才培養的目標：七大勝任力（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才目標德才兼備中“德”的內涵，即有責任心的公民。具體而言，在澳大的培養目標中，公民責任心細化為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遵紀守法以及廉潔誠信四個維度。在新的教育目標之下，一系列增強學生公民責任心的教育活動在書院中得以開展。另一方面，書院在社群教育的基礎之上，突出強調其作為知識整合平台的作用。澳大力圖通過專業、通識、研習和社群“四位一體”的教育，來達成德才兼備的全人教育的目標。在 1.0 版的運作過程中，學院承擔起了專業、通識與研習教育，而書院則承擔起社群教育。書院和學院涇渭分明，各司其職。然而，這種運作模式讓書院和學院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分工有餘而合作不足。用學生內部流傳的一句話來形容則是“我有一個爸爸（學院）和一個媽媽（書院），可惜爸爸和媽媽離婚了”。在書院 2.0 版中，澳大及時調整書院工作的重點，使得“書院要為學生專業、通識和研究實習等三部分的學業進修提供更有效的輔導及全面支援”。[5]

針對學業背景不同的學生，書院致力於提供不同類型的學術支持，讓書院成為融合育人與育才的統一體。《書院》的第八章描述了具體措施，本文把這些措施總結為三大類，即強基類、延展類與拔尖類。第一，強基類主要針對英語基礎相對薄弱的同學。澳大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不少新生入學後因為英文基礎薄弱而面臨挑戰。強基類的導修課程分為兩大類，一是專門針對英文水平提升的學術英語導修班；二是針對因為英文水平不足而導致的專業課學習困難而提供的專業課雙語導修班，如已經試行並取得良好反饋的“生命科學雙語導修項目”。第二，延展類學術項目主要針對部分學有餘力的同學，提供提升其學業能力和融合知識體系的跨學科項目，比如正在全體書院推廣的“大數據分析基礎研修班”。第三，拔尖類則針對書院中極少學業和研究能力突出的學生，由資深教師主持並由學生自願參與的高級學術研討班。拔尖類學術項目旨在為成績優異的學生提供進一步提升學術能力的機會，讓優秀的本科生參與研究過程甚至達到發表研究成果的目標。

當今社會競爭激烈，不少學生面臨精神健康問題的困擾。健康生活是澳大七大勝任力的培養目標之一。健康不僅僅包括身體健康，也包括精神健康。《書院》的第八章則介紹了書院 2.0 版本中為促進學生精神健康而進行情緒關顧所做的努力。書院為每個住宿生分配至少一位教學人員作為其大學生活的指導教師，建立點對點的聯繫，定期進行一對一的面談，指導其學業發展，並及時發現受精神健康困擾的學生，及時提供援助，且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協助尋求專業的心理諮詢和治療。此外，為提升書院團隊的情緒關顧的能力，大學對書院教學人員、行政人員以及學生領袖都進行專業的情緒關顧輔導及調解技巧基本培訓。[6]

澳大書院的建立，作為新時代踐行高校全人教育的努力，不僅僅建立起了亞洲最大規模的住宿式書院系統，更因地制宜探索出適合澳門實際情況的書院運行模式。澳大的努力，為大中華乃至全球住宿式書院運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此基礎之上，澳大積極總結和反思其經驗，並嘗試建立起一套行之久遠和具公信力的績效評估機制，《書院》第十章則對這些評估機制作出了詳細的規劃，以期在未來的實踐

中執行並不斷優化。

結語

全人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所追尋的理想。在大中華地區，無論是北京大學所確立的“立德樹人”、還是浙江大學所強調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目標，都從不同角度對全人教育作闡釋。全人教育的具體內涵，以及如何根據一個社會所處的政治、政治、文化條件來踐行這些內涵則會因時因地而異。如今，澳大利用一國兩制所提供的歷史性機遇，發展出住宿式書院這一平台，針對校訓中所強調的“仁義禮智信”的要求，探索出了一套有澳門特色的全人教育模式。在澳大，住宿式書院成為全人發展過程中知識整合的平台，以期培養出德智兼備又有全球競爭力的大學畢業生。《書院》記錄了澳大過往十年的經驗探索。無論是高等教育的研究者、高校的管理者，還是廣大師生，都能從本書獲益良多。

註釋：

1. 宋永華、蘇基朗、黃兆琳編：《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論：澳門大學的探索》，澳門：澳門大學，2021 年，第 12 頁。
2. 宋永華、蘇基朗、黃兆琳編：《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論：澳門大學的探索》，澳門：澳門大學，2021 年，第 12 頁。
3. 宋永華、蘇基朗、黃兆琳編：《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論：澳門大學的探索》，澳門：澳門大學，2021 年，第 14 頁。
4. 宋永華、蘇基朗、黃兆琳編：《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論：澳門大學的探索》，澳門：澳門大學，2021 年，第 22 頁。
5. 宋永華、蘇基朗、黃兆琳編：《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論：澳門大學的探索》，澳門：澳門大學，2021 年，第 86 頁。
6. 宋永華、蘇基朗、黃兆琳編：《住宿式書院實踐全人教育理論：澳門大學的探索》，澳門：澳門大學，2021 年，第 96 頁。





書籍評論

《廣州的中國人》——花旗旅人粵海聞見錄

何思兵 *

摘　要 美國旅人替分尼於1844年來華遊歷，通過與當地居民直接交往，探究粵海民俗風情。他在1849年出版的遊記《廣州的中國人》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地道出了寫作此書之目的：“中國人是個出色的民族，卻被不公平地貶低了，我希望能竭盡綿薄，為我的同胞提供更確切的訊息。”作者以其細膩的筆觸和浪漫的情懷，勾畫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南粵市井風情寫生。本文扼要地評介這本遊記，並將該書有關粵港澳風土人情以及鴉片貿易的內容節譯出來，以饗讀者。

關鍵詞 廣州；澳門；香港；鴉片貿易；跨文化反思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5 月，21 歲的美國青年替分尼 (Osmond Tiffany, Jr., 1823–1895) 乘坐三桅商船“先驅者號”從巴爾的摩 (Baltimore) 前往中國，經過四個多月的艱辛航行，於同年 9 月到達廣州。在清代道光年間的文獻裡，美國的譯名通常為“花旗國”或“咪唎嘩”，美國人被稱為“花旗人”或“咪夷”。這位花旗旅人在廣州停留了四個月，其間曾到香港和澳門遊覽，後於 1845 年農曆新年前夕離穗返航。替分尼到廣州，並無商務在身，純粹為旅遊觀光和搜集寫作資料。回到巴爾的摩後，他一邊經商，一邊撰寫他的粵海聞見錄。四年後，替分尼在波士頓出版了《廣州的中國人：一位美國旅人對天朝帝國的觀察》，[1] 時年 26 歲。1862 年，《廣州的中國人》改名為《美國人在中國》，在波士頓再次出版。[2] 在這本遊記的前言中，他開門見山地道出了寫作此書之目的：

> 中國人是個出色的民族，卻被不公平地貶低了，我希望能竭盡綿薄，為我的同胞提供更確切的訊息。[3]

在這本粵海遊記裡，作者利用與當地民眾直接接觸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探究南粵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詳盡地描述了當地的風俗習慣和居民的行為舉止。觀察對象包羅萬象，從富商到苦力，從老人到小孩，從黃埔港的買辦到珠江河上的疍家女，從梨園戲子到江湖郎中，從麻風病人到鴉片煙民。其所到之處遍及廣州西關街巷裡的各種商鋪、河南郊野寺院、花地苗圃園林、茶商豪宅庭院、黃埔村落墓地，以及珠江口外的香港和澳門。作者以其細膩的筆觸和浪漫的情懷，勾畫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南粵市井風情寫生。他對珠江風物充滿詩情畫意的描述尤為動人：

> 廣州城以東最有特色的景致，是莊嚴地聳立在江邊的兩座優雅的寶塔。[4] 這些見證中國古代偉大成就的建築物，給人以深刻印象。仰望這些古塔，就算是最冷漠的人，也不會無動於衷。特別是當夜幕降臨之時，江面上的帆影漸漸模糊不清，晚風吹拂着岸邊長長的蘆葦，皎潔豐盈的月亮從寶塔背後升起，塔身沐浴在銀色的月光之中。身臨其境，一種神秘的敬畏之感油然而生。這種美的感受，會留在每一個遊客的記憶之中，難以忘懷。[5]
>
> 月明之夜，美麗的景致在朦朧的月色中顯得更加柔和，一切污泥濁水都隱藏在夜幕中。寧靜的城市，在夜色中比任何時

* 何思兵，獨立學者，邁阿密大學歷史學博士。



圖 1. 琶洲塔，羅伯特・艾略特繪於 1830 年，載 Robert Elliot, *Views of the East*, London, 1833.（圖片來源：http://visualizingcultures.mit.edu/rise_fall_canton_04/cw_gal_01_thumb.html）

> 候都更為賞心悅目。沉睡的船隻，在陰影下逐漸從視野中消失，就像巨幅油畫中運用透視效果所描繪的景致，充滿活力而又安詳。月黑之時，由停泊在江面上的小艇形成的水上街道上，懸掛着一排排燈籠，在黑夜裡熠熠生輝，就像在湍急的河流上閃爍的點點繁星。江面上有時會傳來節慶的喧鬧聲，但隨着燈光一盞接一盞熄滅，聲音便漸漸消逝。到午夜時分，萬籟俱寂，忙碌了一天的蜑民都在奔騰的珠江上進入夢鄉。[6]

一個半世紀以來，替分尼的粵海遊記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直到最近，這本遊記仍然被西方學者用於早期中美關係史、廣州對外貿易史、廣州近代城市建築史、港澳史以及中國園林藝術的研究。[7] 可是，相比之下，鮮有中文著作引用這部遊記。筆者認為，缺乏中文譯本顯然是原因之一。要讀懂這本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文遊記，對於二十一世紀母語非英語的讀者來說，並非易事。再加上這位青年作者似乎為了炫耀自己的學識，不厭其煩地徵引莎士比亞、彌爾頓、柯勒律治等多位經典作家的作品以及各種宗教和政治歷史人物典故，又沒有註明出處，因此，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替分尼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一個商人家庭，其父是最早在美國南部開設棉紡廠的巴爾的摩商人之一，家境想必相當富裕。替分尼於 1840 至 1842 年入讀哈佛學院，雖然沒有完成學業，但是能考進新大陸最高學府的青年，無疑是天之驕子。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大部分領土還是蠻荒之地，即使在最發達

的東海岸地區，上過中學的人仍然很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更是鳳毛麟角。[8] 替分尼在其著述中，顯示出他飽讀詩書，接受過良好的西方傳統人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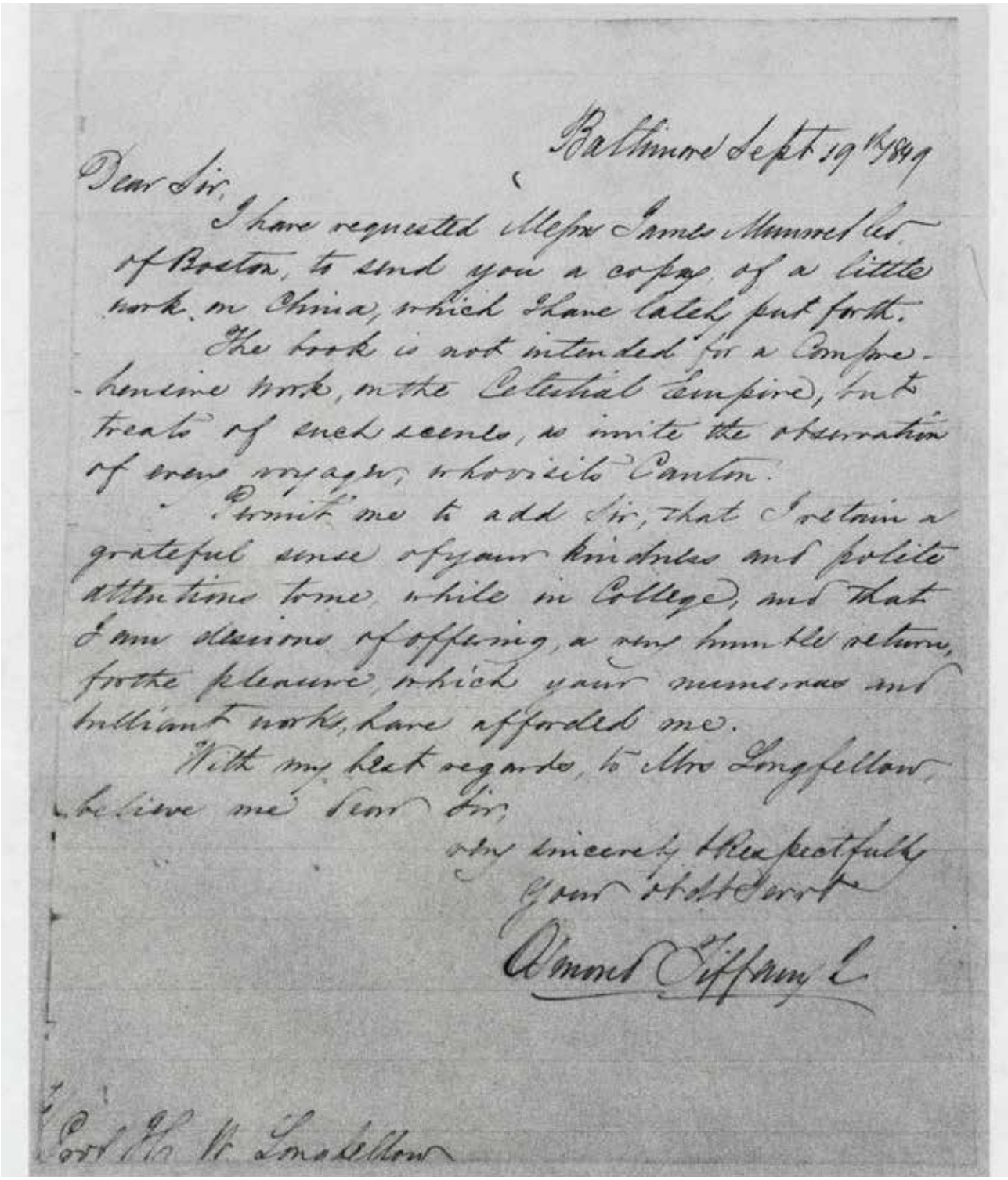
關於替分尼的生平，我們所知不多，美國早期作家詞典對這位作者只有寥寥數語的簡介。筆者最近發現，在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Houghton Library) 的郎費羅文檔中，保存着替分尼致郎費羅的十五封未刊書信手稿。[9] 這些書信顯示，他在哈佛師從現代語言教授郎費羅（Henry W. Longfellow, 1807–1882）。郎氏是十九世紀最負盛名的美國詩人之一，在歐洲也享有盛譽。他的名作《人生頌》早在清代同治年間就被翻譯為中文。錢鍾書先生認為，這是“漢譯第一首英語詩”。[10] 替分尼離開哈佛後，繼續與業師保持聯繫，不時請益。郎氏曾經向出版社推薦替分尼創作的歷史小說，對其弟子提攜有加。[11]《廣州的中國人》出版後，替分尼馬上讓波士頓的出版社把此書寄給在哈佛任教的郎費羅，以感謝業師的悉心教誨（參見圖 2）。[12] 此書展現的浪漫主義文風，顯然深受郎氏於 1835 年出版的歐洲遊記《海外朝聖之旅紀行》的影響。[13]

在西方，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被稱為“壯遊時代”（The Age of the Grand Tour）。英國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尤其是青年貴族，盛行到法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漫遊。他們在巴黎、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等歷史文化名城憑吊古典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古蹟，觀摩歐洲傳統文化藝術，聆聽古典音樂，在西方文明的發祥地汲取精神養料。這種“壯遊”通常歷時數月至數年，在此期間，英國的青年精英可以深入了解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文化藝術和時尚習俗，結交當地的名門望族，為未來的事業打通人脈，建立國際網絡。十八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14] 在其歐陸遊記中稱，海外遊歷是英國紳士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壯遊”實際上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精英人才教育體制的組成部分。[15]

美國雖然早已脫離英帝國獨立，但是在文化教育上，仍然亦步亦趨，唯英國馬首是瞻。“壯遊”的風尚，也蔓延到美國。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社會精英和富家子弟，也以遊歷歐洲為傲。替分尼在其著述中，也顯露出他曾經遊歷過英國和歐陸國家。他的中國之行，可以看作是繼歐洲遊歷之後的又一次“壯遊”，也屬於歐美上流社會精英教育的一部分。他在介紹羊城風物時，每每聯想起歐洲，對英國和歐陸國家的歷史文化地理如數家珍，似乎有意炫耀他曾經遊歷過那些國家，顯露出崇尚歐洲文化的情結。同時，他也導誘國人將視野擴展到東亞，強調到中國遊歷，對美國青年的教育是很有意義的：

> 一心想要造就子女成才的父母，如果讓一些早熟的年輕人遠航到中國，考察那裡令人敬畏的事物，他們必將獲益匪淺。無論年齡多大，這樣的旅行，從各方面來考慮，都是很有價值的。[16]

遊記是西方文學的一個特殊的文類。在十九世紀西方殖民擴張的巔峰時期，海外遊記盛極一時，擁有眾多讀者。[17] 地理大發現、航海技術的進步和海外殖民擴張，使得西方人有更多機會到海外旅行。他們在海外的所見所聞，與本國的政體、科技、文化、藝術、宗教和習俗都迥然相異，引起遊歷者的極大興趣。他們的記述也吸引了眾多無緣遊歷的讀者。在電訊和照相技術尚未運用於傳媒的早期全球化時代，這些遊記很受渴望開闊眼界的讀者的歡迎。於是，這種特殊的文類，便大行其道。1850 年以前出版的有關中國的記述著作，僅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就藏有上千種之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英國的 Chadwyck-Healey 出版社發行的一套縮微膠片叢書，收錄了七百多本西方人士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撰寫的關於十九世紀中國的書籍，其中不少是遊記。[18] 研究全球化時代東西方交流史的西方學者，已經對十九世紀的海外遊記進行了大量的研究。[19] 早期歐洲人遊歷亞洲，對歐洲的社會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西方學術界對這一過程已經有精深



Baltimore Sept 19th 1849

Dear Sir,

I have requested Messrs James Munroe & Co. of Boston, to send you a copy of a little work on China, which I have taken part in forth.

The book is not intended for a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 Celestial Empire, but treats of such scenes, as invite the observation of every voyager, who visits Canton.

Permit me to add Sir, that I retain a grateful sense of your kindness and polite attentions some time, while in College, and that I now desire of offering, a very humble return, for the pleasure, which your numerous and brilliant works, have afforded me.

With my best regards to Mrs Longfellow, believe me dear Sir,

Very sincerely & respectfully
Your obdt Servt

Samuel Wells Williams

Prof H. W. Longfellow

圖 2. 替分尼 1849 年 9 月 19 日致郎費羅函手稿，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藏，編號：MS Am 1340.2 (Box 58: 5551)。（圖片來源：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提供掃描件，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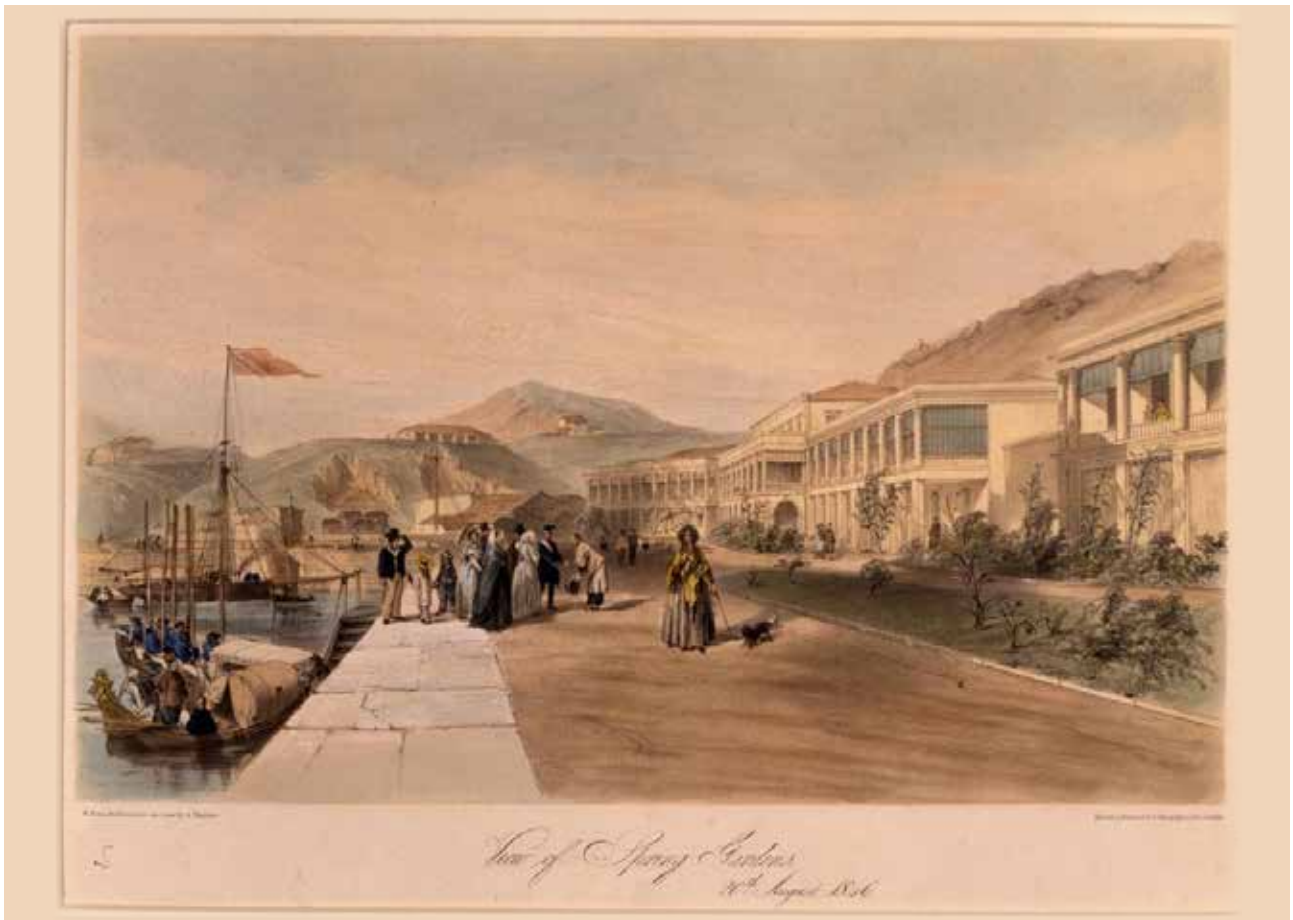


圖 3. 香港春園，佚名畫師繪於 1846 年，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藏。（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pring_Gardens,_Hong_Kong.jpg）

的研究。[20] 有關早期中美交往中的中國物質文化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影響，美國學者也作過深入的探討。[21]

十九世紀西方人士撰寫的海外遊記的特色之一，就是大都含有天方夜譚的成分。如《廣州的中國人》的內容，就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色彩。作者在結尾寫道：

> 在阿拉伯神話裡，花之中央王國是充滿魅力的土地。雖然我沒有愛上中國公主，然而，很多像阿拉丁神燈的精靈所展示的那些神奇景象，老是浮現在我的腦海裡。[22]

為了吸引讀者，這些海外遊記或回憶錄往往着重獵奇性和趣味性，充滿異國情調，引人遐想。作者在據其經歷作海外奇談時，會有意無意地誇張事實，或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甚至向壁虛構。對這些具有天方夜譚色彩的遊記，文史研究者不可當作考察實錄來讀。特別是對敘述中之文學成分，必須仔細檢視，不可想當然地作為史料來使用。

此外，遊記作者在文化或情感觀念上的傾向性或偏見，往往會對其觀察的結果產生影響。他們寫下的所見所聞和所感，也會為當時的社會思潮所左右。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以其對中國文化的豐富想像力，熱情稱頌

古老的中國文明，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但是到十九世紀中葉，隨着與中國直接交往的增多，西方人逐漸看透了這個老邁腐朽的帝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人對戰敗的中國更加鄙夷。然而，這部粵海遊記的作者卻是個異數，他仍然對中國文明持樂觀的肯定態度，高度尊崇孔子，他寫道：

> 誕生於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是位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中國宗教和法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給這個國家帶來了信仰和道德規範，一直沿襲至今。他活到高壽之齡，雖然在生前目睹了他所宣導的學說被人唾棄，卻垂名於身後。人們最終為其立廟，以祭祀他的功德，現存的孔廟有兩千多座。在孔子的誕生地，其後裔至今仍享有尊榮。孔子的聲名遠播，無與倫比，就像沙漠中的巨大金字塔一樣屹立在世界上，是名震寰宇的唯一中國人，為普世民眾所熟知。[23]

替分尼還不遺餘力地反駁西方人士對中國的種種責難和譏諷。他認為，中國人“充滿活力，努力進取，而又恭順平和”。可是“長久以來，中國人的所有禮儀舉止、風俗習慣、語言服飾，甚至情感都成為西方人的笑柄。其實，這些譏諷極為膚淺……中國人經常被說成只會仿造別人的產品。我不禁要詰問：他們究竟模仿了誰的產品？印刷、火藥和航海羅盤都是他們發明的”。[24]

由於作者懷有明確的傾向性，這部遊記不可能是“客觀”的。例如，替分尼在遊記中稱，“中國人殺嬰的報導，在我看來，大部分是彌天大謊。至少，我在中國期間，沒有在河面上看到過嬰兒的屍體”。[25] 在我們今天看來，當時溺殺女嬰的現象，是不容置疑的。據人口學者的研究，1700 至 1840 年間在北京出生的滿洲貴族女嬰，有十分之一被溺殺。在平民中，“溺女”的陋俗就更為嚴重。[26] 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關於中國人溺嬰的報導，主要出自早期來華的傳教士之手，他們不可能獲得任何統計數字去證實他們的報導。其實殺嬰的現象，並非中國獨有。在同一時期的歐洲和美國，殺嬰和棄嬰的嚴重社會問題也同樣存在，可是殺嬰卻被一些西方人士渲染為中國人特有的惡行。[27] 替分尼對中國人民懷有特殊的感情，而對傳教士沒有甚麼好感，所以根據自己的觀察，把傳教士的報導視為謊言。他在觀察這一問題上的偏差，是可以理解的。

替分尼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堅持獨立思考，以批判的眼光去審視西方權威人士的論斷，不人云亦云。當時很多西方人渲染中國人的骯髒和不良衛生習慣，但是替分尼卻着重描述了船工早上起床後洗臉、刷牙和刮舌苔的文明衛生習慣。[28] 無獨有偶，同一年到澳門談判簽訂第一個中美條約的美國公使顧聖 [29]（Caleb Cushing, 1800–1879），在日記中也寫下了與其他西方人士截然相反的觀察。他認為，他所見到的中國人比同一階層的英美人士更為乾淨。顧聖是替分尼的哈佛學長，同樣具有敏銳的批判性觀察能力。他自稱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對中國的觀察與眾不同，往往語出驚人。例如，顧聖比較中國女子纏足和美國女子束胸的陋俗，認為纏足並不比束胸更荒謬，只不過令纏足者不舒服而已，而束胸對女子造成的危害則更大。[30]

顧聖率領的美國使團是在 1844 年 2 月到達澳門的，經過四個多月的交涉，顧聖與欽差大臣耆英於 7 月 3 日在澳門城外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31] 當替分尼在 9 月底到達中國時，顧聖已在一個月前離開澳門回國。廣州此時進入了英美主導的自由貿易時代，舊行商貿易制度已被廢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州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雖然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但是很多美國船仍然繞過香港，直接到黃埔和廣州貿易。從 1784 年到 1842 年，大約有兩千名美國商人在廣州居住過。從 1830 年第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到達廣州，到 1844 年間，美國基督教新教教會共派出 19 名傳教士到廣州傳教。1837 年，



圖 4. 從主教山俯瞰澳門，佚名華人畫師繪於 1870 年。（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noramic_View_of_Macau_from_Penha_Hill.jpg）

在廣州和澳門有 37 名美國商人和 4 名美國傳教士，到 1842 年在穗港澳地區的美國男性增加到 49 人，他們代表着 11 個商行和幾個傳教機構。當時，美國在華的四大商行為旗昌洋行、瓊記洋行、同孚洋行和嘩地瑪洋行。旗昌洋行是在華的第二大外國商行，其地位僅次於英商怡和洋行。據《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刊載的統計，1844 年初在華外國居民共 462 人，主要居住在廣州、香港、澳門和上海。其中英國人最多，共 192 人，其次是美國人，有 76 人。此外，還有巴斯人、法國人、意大利人、丹麥人、瑞典人、荷蘭人、阿美尼亞人、葡萄牙人、瑞士人、普魯士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和秘魯人等多國僑民。英、美、法等國家在廣州設有領事館。[32]

儘管廣州已經開放為通商口岸，由於一些滿清官吏暗中煽動，廣州紳民在鴉片戰爭後一直強烈抵制外夷入城，外國人仍然只能在城外西關一帶居住和經商，所以替分尼的遊記沒有任何關於廣州城內的記述。雖然根據剛剛訂立的條約，美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以及在通商口岸地區旅行的權利，但是替分尼等人在河南郊遊時，仍然遭遇到當地鄉民的騷擾。不過從他的記述可以看出，當時在十三行附近的西關地區，外國人與廣州商民的關係還是融洽的。

中英《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簽訂後，儘管鴉片仍然是違禁品，但是清政府對鴉片貿易視而不見。英美商人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肆無忌憚地向中國輸入鴉片。以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為首的英國商人在廣州貿易中佔絕對優勢，美商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分別與這兩家英國商行在鴉片貿易中密切合作。替分尼對鴉片貿易的觀察，也顯示出他特立獨行的精神：

> 如果你告訴英國人，中英戰爭是由鴉片問題引起的，那是白費口舌。但是毫無疑問，鴉片是戰爭的主要起因。[33]

他又毫不諱言地指責他的同胞所從事的不光彩的交易：

> 英國人並不是販賣鴉片的唯一外國人。巴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樂於此道，被視

為模範共和主義者的美國人也不例外。很多速度最快的鴉片船掛着美國旗，它們在向天朝帝國輸入毒品的貿易中起着重要作用。[34]

販賣鴉片的人同時也在出賣他的靈魂。鴉片商人與向酒鬼兜售蘭姆酒的販子是一丘之貉，都是為了誘使癮君子掏出最後一文錢。更有甚者，鴉片販子把中國人視為可被肆意掠奪的對象。他們打定主意，不管中國人願意與否，都必須接受這種誘人的毒品，並為此付出白花花的銀子。[35]

替分尼在澳門水域目睹了武裝鴉片船的走私活動：

在澳門錨地碇泊時，看到一艘全副武裝的雙桅船以大約兩節的航速駛來，以飛快的速度超越我們後，在錨地下碇，然後鳴炮。這艘船的船頭沒有船名，起初以為是美國政府的雙桅船。甲板上佈滿水手，從他們收帆的速度和精確度來判斷，這是一艘軍艦。不過隨後得知，這是一艘鴉片飛剪船，配備有 20 門重炮和相當數量的水手。[36]

飛剪船載着致命的毒品在中國海岸遊弋，一發現機會便下碇，與那些等待誘餌的中國人交易。交易時，一箱箱鴉片搬到甲板，讓買家驗貨，交付銀子。看銀師仔細鑑別每一塊銀子，用尖鐵釘戳進銀錠，檢驗銀子的成色。成交後，貨物搬上靠在船舷的小艇運走。飛剪船繼續尋找下一位顧客。如果碇泊的地點好，上鉤的人多，鴉片船會停留幾天。要是官府的船隻來干擾，並對飛剪船的生意顯示出過分的好奇，飛剪船上的炮口便會打開，以示警告。鴉片飛剪船有時生意非常好，在中國沿海遊弋幾個月後，便可以載回一艙上好的銀子。[37]

位於虎門以外珠江口的伶仃島，曾經是無可救藥的鴉片走私販子的巢穴。在那裡，他們肆無忌憚，一點都不擔心會被查獲，被送上天堂或其他地方。他們覺得，幹這些對抗官府的勾當，其樂無窮。不過現在大多數鴉片躉船碇泊在黃埔，鴉片販子不再在伶仃島安營扎寨了。停泊在黃埔的幾艘躉船裝備精良，儲存着大量鴉片。這些船當然也武裝到牙齒。飛剪船在前往沿海地區兜售鴉片前，都從這些躉船取貨。[38]

在煙館裡，他直接觀察到進入迷幻狀態的吸食者，他們“臉色蒼白，神情癡呆，魂不附體”：

在昏暗的燈影下，這些悲慘的煙民就像太平間裡的屍體那樣恐怖。但是，鴉片產生的最強烈的效果，並非表現在吸食者的身體狀態上，而是表現在它可以使人陷入虛妄的狂想之中。受害者吸入一定劑量的鴉片後，他的意識似乎游離體外，變得非常敏感，感覺飄離了地面，在空中展翅翱翔。

在幻覺中，他會脫離其謙卑的地位、樸實的鄉土和溫馨的家園，感到自己威力無窮，可以在通往尊榮的坦途上輕鬆地飛奔，把對手遠遠拋在背後；財富和權力在向他招手，達官貴人與他攜手同行。他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錯，住的是宮廷御園，享盡話本小說裡描述的榮華富貴。

幻境中，他所擁有的宏偉殿堂裡傳出天籟之音，聖賢齊集為他歌功頌德，絕色美女簇擁左右。他半似仙人，不再貧窮、卑微和被人鄙視。豐盛的筵席上，熱酒斟滿了閃亮的杯盞，他起立歡迎在通往榮耀的道路上的落伍者，以勝利者的姿態對其手下敗將表示撫慰。

不過，如果他再往前走一步，便會步



圖 7. 澳門南灣，佚名華人畫師繪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皮博迪 · 艾塞克斯博物館藏。（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iew_of_the_Praya_Grande,_Macau,_unknown_artist,_Guangzhou,_China,_c._1830,_oil_on_canvas_-_Peabody_Essex_Museum_-_DSC07303.jpg）

> 履踉蹌，天旋地轉，他的競爭對手、賓客、樂師和貴人，以及所有的幻覺，頓時煙消雲散。黎明時分的寒意冷卻了發熱的頭腦，使他回到陰冷的現實之中。幻覺中所見的一切，原來只是個黃粱美夢，他仍然是以前那個無名鼠輩。他打了個寒戰，疲憊衰弱，無限惆悵，徒勞地企圖尋回消失了的幻覺，久久未能釋懷，整天精神渙散，無法振作起來幹他的營生，懶散地陷入無限懊悔之中。可是當夜幕降臨，他又去尋找令他沉淪的“女魔法師”，身不由己地接受她的誘惑。[39]

替分尼的描述，與美國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 1812–1891）的回憶錄《番鬼在廣州》大相徑庭。亨特聲稱，他旅居穗港澳 40 年，從來沒有發現濫用鴉片的跡象，“在廣州的外國人難得見到一個因抽鴉片而身心受損的人”。他還寫道：“與英美人士喝烈酒造成的惡果比較，抽鴉片的危害是微乎其微的。”[40] 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亨特是旗昌洋行的股東，而這個美國在東亞最大的商行是通過走私鴉片致富的，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罔顧事實，為毒品貿易辯護了。儘管替分尼下榻於旗昌洋行，並受到鴉片商人的熱情款待，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對美國人捲入鴉片貿易的譴責。

這部遊記記述的是一位具有批判性思維的

美國青年對十九世紀中國的獨立觀察，其價值不僅僅是提供了一些粵港澳歷史資料。他的觀察不可能是全面的，其中既有真知灼見，也有偏見和謬誤，但是通過分析其跨文化反思的開放心態，對理解十九世紀美國多元文化以及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會有所啟迪。我們可以看到，在殖民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文化氛圍裡培養出來的美國青年精英，也不是千人一面，萬口一腔的。

替分尼對英國殖民者在香港欺壓華人的胡作非為，也極為反感。他寫道：

> 中國人在香港蒙受諸多侮辱。對當地的無賴惡棍當然應該懲罰，並應該經常將他們置於軍警強而有力的監管之下。但是在香港的那些卑劣的英國浪蕩投機者，卻利用一切機會來侮辱華人，連循規蹈矩的良民也不放過。
>
> 來自倫敦周邊地區的罪犯和無賴之徒，僥倖逃脫了被流放到澳大利亞博特尼灣[41]服刑的厄運，卻在維多利亞城[42]裡對當地居民作威作福。那裡的華人大多數都是值得尊重的居民，聲譽比那些英國佬好得多。
>
> 曾經混跡倫敦瓦平碼頭[43]的卑賤無業遊民，三四人並排在香港的大街上大搖大擺，橫行霸道，將老實的行人用手肘搡到一邊，稍有怨言，就動手打人。[44]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45]替分尼敏銳地觀察到這個自由貿易港的經濟前景：

> 香港很可能在數年後成為英國的貿易中心。它的地理位置適合發展貿易，又易於防守。幾乎在任何風勢下，船隻都可以進出港灣。在進入港灣的狹窄航道上，進犯的船艦片刻便會被炮火擊沉。英國人明智地採取了開明的政策，開放香港為自由貿易港。葡萄牙人在澳門則採取不同的政策，為了制衡英國勢力，他們在取消某些關稅的同時，又增加另一些關稅。因此，國際輿論都傾向於讚譽英國殖民地。[46]

替分尼對澳門的觀感，與很多十九世紀來華的美國人的感受相似。他初訪這座伊比利亞格調的古城，就被其浪漫氛圍所吸引。他描述對澳門的第一印象稱：

> 澳門有很多與那不勒斯相似的景色：美麗的海灣點綴着綠色的小島，弧形海灘的兩端有聳起的山丘，從碼頭往上延伸的山坡上，矗立着各式各樣的房子和其他建築物。不過澳門沒有迷人的皇家別墅，也看不到歐洲城市裡常見的華麗馬車。這個瀰漫着浪漫情調的中葡樂園，呈現出神秘的衰落景象，整個地方看不到正常的社會生活情景。
>
> 澳門的浪漫氛圍有其歷史地位的因由。昔日強悍的葡萄牙人，如今已經淪為一幫衰弱的可憐蟲。幾個世紀以來，澳門是歐洲人在中國沿海唯一的據點，中國政府容忍他們在那裡生存。這些葡萄牙人活在被放逐的詩人賈梅士的詩歌和榮耀之中，伴隨着他們的是天主教信仰和修道院清脆的鐘聲。在古老家族的豪宅裡，掩映着以木格子裝飾的墨綠色遊廊和禁止外人進入的誘人庭園。在這些幽深的庭園裡，他們過着悠遊自在的日子。[47]

替分尼也注意到："澳門的葡萄牙人是從果阿[48]遷移過來的，他們將宗教裁判的狂熱精神帶到澳門，中國人對他們沒有好感。"[49]兩個月後，替分尼重遊澳門，對當地的獨特風情做了更為細緻的觀察：

> 澳門的外觀沒有一點中國城市的特徵，弧形的海灘，以及半島上的山丘和城市建築，倒是與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非常相

似。在日落時分，微風從海面上吹來，當地居民都到海灘上平坦寬闊的碼頭散步消遣。遊歷過氣味難聞的廣州和暴發的香港以後來到這個平靜的地方，會有一種安寧的感覺。這裡的居民可以不受本地人的風俗和敵意的影響，享受純粹的歐洲生活方式。

澳門的房子很多都相當大，屋內有寬敞的廳堂和富麗堂皇的樓梯，屋前的陽台頗具神秘感。澳門的一些居民在這種豪宅裡過着優裕的生活。沿着碼頭有一些古老的宅第，從略微打開的大門，可以瞥見裡面絢麗的花壇、幽深的庭園和以綠色木格子裝飾的遊廊。澳門是想像中外觀最為浪漫的城市。在中國的城市寓居一段時間後，這種幻覺可能變得更加強烈。這個城市孤獨的氣息和古老的氛圍引人入勝。

在中國，一切事物都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洪荒時代。而在澳門，那些飽經滄桑的古舊建築距今僅僅幾個世紀。澳門的居民看起來跟那些建築物一樣與世隔絕和怪異。在白天他們都不見蹤影，只有在傍晚他們才出門，在海灘悠閒地逛蕩。穿着傳統服裝的葡萄牙女人睜着黑眼睛，顧盼陌生的旅人。

他們大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人物，很多是沒落的古老家族的後裔，卻像彌爾頓筆下的路西法[50]那樣自傲。這些男人相當懶惰，女人則無事生非。他們的白天在瞌睡中度過，到夜幕降臨才出現在街頭。落魄潦倒、憤世嫉俗的人會發現，澳門最適合他與世無爭的心境和離群索居的意願，我找不出另一個地方更適宜這種人安家的了。

澳門城裡有很好的道路，你可以越過關閘，在沙灘上騎馬，繞過當地人的城堡，從綠色的高地上遠眺海灣。

賈梅士洞設有祭祀這位葡萄牙詩人的神龕。如果你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我有必要告訴你，他是葡萄牙人值得驕傲的唯一詩人。據說他在那裡看着洶湧的波濤，寫下了《葡國魂》。如果有人膽敢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就會被當地的葡萄牙老居民咒罵。果真如此的話，這位詩人曾被放逐到那個地方，不過現在的地貌不知道與他活着時是否一樣，不管怎樣，他的情感已經流入他的詩篇之中了。

位於澳門城後半部的華人居住區，是個骯髒的貧民窟，幾乎沒有人認為值得遊覽。山脊上分佈着一些高牆環繞的莊園，裡面有精心栽培的大型園林，青草滿園，樹木繁茂。房子裡寬敞的房間通風良好。這些幽僻寧靜的莊園是澳門最美麗的景點之一，我在到訪澳門期間有幸能住在其中一處。那是一座古老家族的房產，其中富麗堂皇的大廳可以與里斯本的宮殿媲美。這座豪宅位於山頂，從蓋有大陽篷的涼台上，透過隨風搖蕩的樹林，可以看到山下的城區，也可以遠眺閃耀着藍光的廣闊海灣。在花園上方的峭壁上，一座廢棄的修道院聳立在空中。白天，百葉窗擋住了熾熱的陽光，微風吹進大廳，屋內相當涼快。當太陽在絢麗的彩霞中落下時，暮色籠罩着夜空。海水無情地沖刷着半月形的海灘，發出音樂般的悅耳聲響。[51]

替分尼的粵海聞見錄刊行距今已逾一個半世紀，然而他所描述的昔日南粵風貌，讀來依舊活龍活現，令人神往；他對中西交往史事的評論，仍然擲地有聲。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向學術界推介這本遊記，並將該書有關粵港澳風土人情以及鴉片貿易的部分內容節譯出來，與讀者分享。[52]

註釋：

1.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2. 1862 年，《美國人在中國》與小說《榆樹鄉的海倫與娥瑪》合在一冊出版，參見：Cora Mayfield, Elmwood, or, Helen and Emma; Osmond Tiffany, Jr., *The American in China, or Their Customs and Manners,* Boston: 1862.
3.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viii.
4. 作者描述的應是赤崗塔和琶洲塔。
5.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32.
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38–39.
7. Patrick Conner, *The Hongs of Canton: 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 as Seen in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London: English Art Books, 2009; John Haddad, *America's First Adventure in China: Trade, Treaties, Opium,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 Macao: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2015;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Johnathan A. Farris, *Enclave to Urbanity: Canton, Foreigners, and Architecture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Bianca Maria Rinaldi, ed., *Ideas of Chinese Gardens: Western Accounts*, 1300–186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8. 根據 1840 年人口統計，美國在校學生中，小學生佔 91.1%，中學生佔 8.1%，而大學生僅佔 0.8%。見 George Tucker, *Pro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opulation and Wealth in Fifty Years, as Exhibited by the Decennial Census*, Boston: Little & Brown, 1843, p. 145.
9. Osmond Tiffany's Letters to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MS Am 1340.2 (Box 58: 5551),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0. 錢鍾書：《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錢鍾書集・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第 154–188 頁。
11. Henry Longfellow to Osmond Tiffany, Jr., 23 September 1858, in *The Letters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edited by Andrew Hile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vol. 4, p. 97. 除了《廣州的中國人》，替分尼還出版了長篇小說《勃蘭頓：一個世紀以前的美國殖民地故事》（*Brandon; or, A Hundred Years Ago: A Tal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New York: Stanford & Delisser, 1858）、人物傳記《威廉斯將軍傳略》（*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General Otho Holland Williams*, Baltimore: J.Murphy & Co., 1851），以及他編撰的《基督教人物傳記與歷史》（*Sacred Biography and History*, Louisville, KY: Bill, 1860）。
12. Osmond Tiffany, Jr. to Henry W. Longfellow, 19 September 1849, MS Am 1340.2 (Box 58: 5551),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3. Henry W. Longfellow, *Outre-Mer: A Pilgrimage Beyond the Sea*, New York: Harper, 1835.
14. 吉本著有《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六卷。
15. See James Buzard, "The Grand Tour and After (1660–1840)", in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7–52; Anthony Burgess and Francis Haskell, *The Age of the Grand Tour*, London: Elek, 1967; Jeremy Black, *The British and the Grand Tour*, London: Croom Helm, 1985.
1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52.
17. Roy Bridges, "Exploration and Travel Outside Europe (1720–1914)", in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7.
18. John Lust,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Bamboo, 1987;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oks on China, Cambridge: Chadwyck-Healey, 1995.

19. See Steve Clark, ed.,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New York: Zed Books, 1999; Peter J. Kitson, ed., *Nineteenth-Century Travels, Explorations, and Empires: Writings from the Era of Imperial Consolidation, 1835–1910*, 4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20. 代表作為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3 vol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1993.
21. A. Owen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roline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Imagining America: Chinese Commodities 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22.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271.
23.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83.
24.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265–266.
25.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9.
26.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bell,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 *Population Studies-A Journal of Demography* 48, no. 3 (1994), pp. 395–411;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5–70.
27. Josephine McDonagh, *Child Murder and British Culture, 172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ichelle T. King,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7.
28.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248.
29. “顧聖”是美國公使 Caleb Cushing 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清朝官員在給皇上的奏摺裡改寫為“顧盛”。不過，他們在致美方的外交文書上仍用“顧聖”一名。
30. John M. Belohlavek, *Broken Glass: Caleb Cushing and the Shattering of the Union*,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4.
31. 關於第一份中美條約的簽訂與早期中美關係，可參閱何思兵：《治外法權與非正式帝國：中美〈望廈條約〉研究述評》，《澳門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97–105 頁；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 Macao: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2015.
32. Curtis T. Henson, Jr., *Commissioners and Commodores: The East India Squadr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p. 4; 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837–1846: Prelude to Hong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25; "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no. 13 (January 1844), pp. 3–7; "List of Foreign Consuls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no. 13 (January 1844), p. 9.
33.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2.
34.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4.
35.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69.
3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0.
37.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1.
38.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178–179.
39.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171–172.

40. William C. Hunter,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Paul Trench and Co., 1882, p. 49.
41. 博特尼灣（Botany Bay）位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是當時英國罪犯的流放地。
42. 當地華人稱這一地區為“四環九約”。
43. 瓦平碼頭（Wapping Dock）位於倫敦瓦平地區泰晤士河岸，曾經是處決海盜和走私犯等海上犯罪分子的行刑地點。
44.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257–258.
45. 參閱何思兵：《香港與十九世紀美國對華貿易》，《文化雜誌》（中文版）2016 年總第 98 期，第 43–56 頁。
4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261.
47.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17–18.
48. 果阿（Goa）位於印度西海岸，1510 至 1961 年期間為葡萄牙佔領。
49.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8.
50. 路西法（Lucifer）是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名著《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的墮落天使。
51.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261–263.
52. 由筆者翻譯的《廣州的中國人：一位美國旅人對天朝帝國的觀察》已列入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組編的“西方文獻中的近代廣州”譯叢（“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即將出版。



名作賞析

“淡散”“清逸”查士標

薛達衛 *

摘　要 查士標作為明朝遺民，在明清政權的更替中，既沒有參與反清復明鬥爭，亦無意在新政權中出入仕途，唯有在隱世避居的生活中，隨遇而安，弄筆度日，沉浸於書畫之中寄託自己的情感。在以書畫謀生之餘，他潛心研究傳統中國書畫，集前人之長，融為己用，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推動了新安畫派的壯大發展。

關鍵詞 查士標；新安畫派；應物象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泛棹圖》

查士標（1615 — 1698），字二瞻，號梅壑散人、梅壑、懶老，祖籍安徽休寧西門（今歙縣），後居江南名城揚州及南京。查氏乃明末生員、清初書畫大家，其書法師顏真卿、米芾，又及董其昌，行筆俊逸豪放且深邃；其畫則以倪贊為師，上追宋元黃公望、吳鎮，用筆精煉，意境高曠，是明末清初新安畫派的“海陽四家”（即弘仁、查士標、孫逸，汪之瑞）之一。因家境殷實，查士標收藏了大量書籍、鼎彝和古人書畫真跡，名家大作見之甚多，故其畫法汲取各家精華，風格直逼宋元之精粹，是新安畫派中技法甚高甚精者。他的作品也較多，廣泛流傳於民間及海外。

明末清初的遺民畫家查士標出身名門望族、書香門第。他飽讀詩書，家族中如查應光、查維寅、查維鼎等人對詩、詞、書等的研究，也對他影響甚巨。查士標早年的思想和同時代的其他讀書人一樣，緊抱“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希望通過科舉進仕。然而，明朝政權被推翻，他的理想隨之破滅。面對政權的更替，查士標既沒有參與反清復明活動，也沒有像其他前朝遺民一樣，遁入空門去過“晨鐘暮鼓”的生活，他挈婦將雛離開安徽休寧，到南京、揚州僑居，走上了“隱居”“遁世”的道路。他在生活中隨心而行、隨遇而安，雖不及倪瓚的灑脫隱逸，卻也是自在瀟灑。這種看似逍遙，實則無奈的經歷，極大地影響了查士標繪畫風格的形成，使得他將“風神懶散，氣韻荒寒”的文人畫精神，發揮到淋灕盡致。由於家境富裕，查士標初學繪畫時涉獵甚廣，可以接觸到到宋、元以來多位名家的真跡。他師法米芾、倪瓚、吳鎮和董其昌，上溯董源、李成、高克恭、黃公望、趙孟頫、王蒙。他師古、摹古而不“泥古”，主張“師古則是師其意不師其跡”，“為畫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應物象形要有活法，筆墨須求生動，有功無性，神韻不生，有性無功，神韻不實，兩者兼備，方出精神”。[1]

這樣的精神生活和藝術見解，形成了查士標“淡散”“清逸”的繪畫風格。他的“淡”，是一種含蓄的散“淡”、溫潤的趣“淡”，可謂“風神散懶，氣韻清逸”，既有別於他崇拜的倪瓚清冷超脫之“淡”，也有別於其好友弘仁不食人間煙火般的曠寂之“淡”。

我們且看查士標這幅現藏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水墨紙本山水畫《泛棹圖》立軸（圖1）。它的尺寸為 175.3×68.3 厘米，右上角題跋錄米芾句：“砂步漫皆合，松門若抱桴。悠悠搖艇子，真似剡溪圖。”落款“士標”，鈐朱文“查士標印”及朱文“查二瞻”二枚印章，畫面未署有年款。整幅畫面是典型的一河兩岸構圖：畫面下部近處河岸緩坡，四棵松柳諸樹如

* 薛達衛，自由撰稿人，澳門藝文評論交流協會會長，澳門書法篆刻協會理事，資深藝術導賞員。

四君子聳立，紙面留白使湖面水流呈平緩狀，波平浪靜，淡墨疏描勾勒出坡岸的平緩輪廓，有倪瓚畫意；又用上米氏點苔斧皴，使凹凸陰陽呈現；雙鈎畫出老樹主幹直立向上，用重墨和輕墨寫出松針勁挺和垂柳依依。近岸處一翁閒靜遠觀坐於小舟之中，似在眺視湖中的甚麼。畫者在此處用淡墨擦出水痕，湖面波浪不興。近景層次分明，靜中帶動，好一派溫潤寧靜的水鄉情景，恰如查士標自己隨遇而安，弄筆遣日的心境。畫面上半部以淡墨勾出山形，不高的山峰向深處延伸，漸遠漸深、淡逸渺遠，而濃墨滋潤則點染出雜樹苔點。墨色深淺的差異，則顯露其繪畫風格中靈動的一面，也是查士標將董其昌書法中墨韻的清潤迷蒙移植在畫法中的一種體現。查士標的書法師承米芾、董其昌等，並溯二王及趙孟頫，其深得米、董二人書法神韻。他在《泛棹圖》題跋中書寫的米氏詩句，充分體現了米氏原作中自然流暢的氣勢和偃仰、轉折、頓挫的韻味，使得書法與畫法在作品中得以完美結合，令整個畫面共同反映出南方水岸的淡泊靈動。

查士標寫畫時的筆法運用多以“簡而不疏，清而秀潤”為特色，寥寥數筆卻有淋漓而無蕭瑟之感，這是他有別於倪瓚、弘仁之處。其墨法運用則濃淡相融，時而濃墨用米氏點皴寫葉，時而淡墨橫筆勾枝；遠山用淡墨勾形，側鋒皴染陰陽向背，又用濃墨點出雜樹苔點。如此用筆用墨，就顯現出了查士標繪畫中舒雅灑逸、隨性靈動的個人風格。其畫作在揚州畫壇廣受歡迎，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就載有“家家畫軸查二瞻”句。[2]

窺一斑而知其全貌。透過這幅《浮棹圖》，我們得以領略作為新安畫派“四大家”之一的查士標的精湛畫技。他詩、詞、書、畫俱佳，卻又因明清政權更替而淡隱於世。他的書畫風格獨特，更以畫技精到且數量頗多而居“四大家”之首。更重要的是，他能師古而不拘泥於古，集眾家之長為己所用，將前人之精髓消化吐納並加以發揚傳承，令新安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添了一筆精緻色彩。



圖 1. 查士標《浮棹圖》，水墨紙本，175.3×68.3 厘米，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編號：69.242.7。（圖片來源：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9130）

註釋：

1. 參見 [清] 查士標：《種書堂遺稿》，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弘道種書堂刻本，合肥：安徽省博物館藏本。
2. [清] 阿克當阿修，[清] 姚文田等纂：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七十二《雜志二》，揚州：廣陵書社，2006 年，第 1430 頁。

目錄回顧

《文化雜誌》中文版上期目錄（第115期）

本刊編輯部

澳門研究	探討觀本法師與嶺南地區首座女子佛學院創辦之歷程和影響	楊開荊	6
	以澳門歷史城區為核心的防災減災規劃與管理研究	周龍	30
文史研究	五代後漢《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最新錄文研究	譚世寶、譚學超	44
	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考	姜霄	64
易經研究	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白晉研究《易經》原因初探	張西平	74
	戈振東葡譯本《易經》的翻譯研究	胡婧	86
宗教研究	《道學家傳》考釋	譚樹林	98
	明清之際儒家天主教徒的思想探源 ——以《天教略意》為中心的考察	趙龍	116
故宮遺事	康乾宮廷裡的西洋傳教士翻譯	果美俠	126
	晚清英語教材研究：以光緒和宣統皇帝英語學習為例	黃萍萍	144
文學藝術	貴族統治、人文主義與科學精神： 安特衛普畫家們及其《五感》寓意畫	符周陽	156
	近代嶺南名人藏書印粹賞鑑	莫俊	172
名作賞析	美畫賞讀：吳歷《溪山行旅圖》	薛達衛	186
目錄回顧	《文化雜誌》中文版上期目錄（第 114 期）	本刊編輯部	188



RC
文化雜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網上書店精選優惠

低至 5 折

www.icm.gov.mo/bookshop

海外訂單以特快專遞服務（EMS）寄送

澳門讀者可於文化局轄下13間公共圖書館提取



稿約

為了確保學術規範和提升學術水平，本刊於 2022 年試行同行評審制度，並於 2023 年正式實行，刊登的文稿均由業內專家進行評審。

本刊誠邀澳門及國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有關來稿的類別及格式要求如下：

一、稿件類別

（一）論文：刊登具理論視野、研究方法、論證過程、研究結論等的有關澳門研究、澳門歷史文化、澳門文化遺產研究、澳門與內地在歷史上的宗教及文化交流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包括學術論文和應用論文。字數以 10,000 至 15,000 為宜，並含 300 字內的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表格、圖片、註釋。

（二）學術筆記：任何與澳門歷史文化相關的學術新發現以及重要史料翻譯、整理。刊登篇幅精簡的研究新發現、新角度或新思考，字數不限。

（三）文藝評論：刊登有關澳門文學、藝術的短評及分析，字數不限。

（四）書 評：刊登內容有關澳門或由澳門本地作者撰寫的著作之評述，字數不限。

二、投稿要求

（一）來稿須寄交齊清定的電子文檔至 cms.rc@um.edu.mo，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職務職稱或學術簡歷、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和電郵。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

（二）圖 片檔案須放置於文件夾寄交，圖片的文字說明和序號須另放於獨立的 Word 文檔，並註明圖片來源。如表格作為圖片刊登，請根據上述圖片要求提供。

（三）論文所涉課題如為資助項目，請於文末標註，如有需要，編輯部將要求提供資助證書影印文件。

（四）有關稿件的版面格式及引文註釋等規範，請參考“《文化雜誌》（中文版）體例”（www.icm.gov.mo/rc/）。

（五）所投文稿，包括引用文獻、圖片、圖表等涉及第三方著作財產權的內容，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並允許本刊使用。如有涉及侵權行為概由作者承擔全部責任。

三、其他

（一）編輯部收稿後即進入匿名評審階段，所有來稿恕不退還，如作者在四個月內未接獲採用通知，稿件可自行處理。

（二）本刊編輯對所採用的稿件有權作文字和圖片上的修改或刪節。來稿一經刊登，即支付稿酬並寄送贈書兩冊。

（三）凡在本刊發表的文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有權對該文進行翻印、轉載、再刊、翻譯、收入論文集以及製作電子版本在文化局及其指定合作方或承辦方的網頁上發表，並以《文化雜誌》電子書形式於文化局網站上銷售，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上述的使用權。

（四）所投稿件必須為作者之原創作品，倘出現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行為，作者應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

（五）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的稿件。如投稿後需要撤稿，或在本刊發出用稿通知時文稿已另投其他出版方，或已被其他出版方採納或刊載，作者必須書面通知本刊；如稿件涉及一稿兩投或多投概由作者承擔全部責任。

《文化雜誌》編輯部







ISSN 0872-4407